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文海硝烟



在硝烟中拼搏——《文海硝烟》题记

一九三六年夏，我去了张家口。在张家口的大街小巷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印着日本字母的“味の素”广告，到处张贴着。再从张家口搭乘火车，回到北平，只见铁路沿线那些交通要道旁的农舍墙壁上，漆着大幅大幅的“味の素”广告。而到了北平，才下火车，走在马路上，又亲眼目睹一群抬着“味の素”高大模型的中国人，一面敲锣打鼓，大声吆喝，一面向马路两边的行人，散发着一张张印在彩纸上的“味の素”传单。

味の素！

难道这是一般的商业广告吗？有哪一国外商，能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为了宣传他的商品，而可以不顾对象和场合，肆无忌惮地到处乱涂乱贴？难道我们还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吗？

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张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呼唤国人提高警惕：日本侵略者的硝烟，正从东北延伸到华北，眼看华北已经开始变色了。

我回到了上海。

一九三七年夏，在洪深和谢六逸两位老师的支持下，我和马良一起，主编了《作品》半月刊。可是刊物才出版第3期，“八一三”的日本侵略者炮火，竟把作品社夷为平地，马良被炸死。当时我去了无锡乡下刘家庄，幸免于难。但是铁路被炸断，回不了上海。等到我徒步前往常熟搭乘轮船回来时，上海已沦为“孤岛”，和我一起合作的文友邵子南、李雷、匠东平等，早已离开上海了。

一九三九年冬，复旦大学派我到一家由国民党CC系主办挂着洋商招牌的中美日报社，主编一个抗日反汪的副刊。编了不到3年，汪精卫的76号特务机关派人绑架我。我机智地摆脱了“尾巴”，还避开了国民党三青团对我的暗害，但是最终，我还是因为编发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国民党撤了职。

一九四四年夏，在沦陷了的上海，复旦大学金通尹教务长介绍我进了一家创建于清代末叶的民族资本家企业永祥印书馆，要我迎着敌人的刺刀，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成立编辑部，筹备出版一批伸张民族正气的图书，并首先以“丛刊”的名义（可以不向敌伪登记），出版一种不定期的期刊《文艺春秋丛刊》。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起，《文艺春秋丛刊》陆续出版了《两年》、《星花》、《春雷》、《朝雾》。从一九四五年三月起，每月还出版了一批“青年知识文库”，在第一批六本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有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导演吴天用“方君逸”的笔名撰写的《编剧和导演》等。这些书刊使长期置身于黑暗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耳目一新，受到鼓舞。但是当第五本丛刊《黎明》刚刚编好时，日本宪兵队的甲斐军曹带了手枪和翻译，到书店的董事长办公室来追捕我。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掩护下，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谈判和送礼，终于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得到了解放。

胜利后的中国，百业待兴，文化出版事业也应当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里蓬勃发展。我组织筹备了“大学文库”、“文学新刊”等七大丛书，并将《文艺春秋丛刊》改为按月定期出版的月刊。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另外四种期刊，其中包括由茅盾、叶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吴天主编的《文章》

月刊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王统照等大批进步作家为我编的丛书和期刊供稿。但是蒋介石很快撕毁了国共谈判时签署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文网愈收愈紧，书店资本家为了保存自己的“资本”，终于接受了国民党的文稿审查。这使我遭受到了一段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抽调我从事工运工作。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正当我欢欣鼓舞地准备发挥我刚刚进入壮年时期的充沛精力时，肃反运动开始，我这个曾经因为副刊文章得罪了三青团而被内定为暗杀对象，又因为“共党嫌疑”而被国民党撤职的人，竟又被怀疑为“南京暗探”（国民党特务）。经过两年半重点审查作出否定的结论后，由于我鸣放了“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而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流放青海，长期住在年久失修的喇嘛寺里，曾经多次从死亡的边缘线上蹇回来。最初，是两位半夜巡查的人民警察，发现了因患严重肺炎而倒卧路旁已经冻得不省人事的我，把我背到一家马戏团给猴子居住的灶房里，慢慢地用温水将我救活过来。此后，是和我邻居的贫苦喇嘛尼玛，把在冰雪世界里因为担水坠崖而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的我救活过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的折腾中，居然又奇迹般地，依靠我的一支画笔，救了我自己的生命。当时，造反派正提倡“废物利用”，把那些他们认为已经成为“废物”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指令去当油漆工、砖瓦匠等等。违抗指令的，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连续揪斗。由于造反派急需大幅毛主席油画像，需要绘制，就指令我这个仅仅在小学六年级“美术”课上学过水彩画的“废物”，承担这个重任。我非常害怕：如果不被“利用”，我可能像北京来的右派陆志明一样，在没完没了的揪斗中被整死；如果我被“利用”，丑化了伟大领袖的形象，那更是罪该万死，死路一条。但是我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冒着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危险，遵命画画，求得一线生存的希望。我全力拼搏，日夜学画，边学边画，居然在规定时间内画出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六平米油画像，得到了造反派的认可。从此，我画了各种大小小全身半身的毛主席油画像和毛主席语录水粉画，被造反派钦定为“右派画家”，平安地过了“文革”关，并在一九七二年我进入老年以后的六十二岁时得到平反。

为了把我失去的壮年补回来，我同意青海师范大学把我从喇嘛寺接到西宁，主编了一个语文月刊，带了两批研究生，还从七十岁起，调回上海，在只有一位青年助手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纂了一部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经过十年拼搏，终于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全书出齐。《文汇报》以头版头条新闻首先作了大幅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我“新闻出版特殊贡献”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委评定我为中国共产党市级优秀党员并授予物质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经过严格的反复评审，于一九九七年九月，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颁发了国家图书奖中最高一级的荣誉奖。

范泉

1998年3月6日

主编者的话

陈青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风云翻卷，波澜起伏，阴晴变幻，冷暖交替，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严紧宽松相随相和。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舞文弄墨，斟字酌句，布局谋篇，编织出五音交响、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夕拾朝花。这套“文坛漫忆丛书”，便采撷、辑录了五位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怀念文坛师友，追忆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

这五位作家，大多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活动，按中国现代文学史界的通常说法，属于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五位作家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有的还是中国现代小说、新诗、散文和电影剧作等方面的重要代表，但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则是几位作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中，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真善美”极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言谈举止，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旁蔓别枝，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真挚至诚的情意，丰厚深长的蕴寓，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更周详、更生动、更形象，也更使人信服，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

回顾历史，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这以后，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精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但是，社会的连年动荡，时世的多灾多难，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文苑横遭粗暴践踏，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折腾、磨难、禁锢、摧残，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有一种见解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中国古代有人说过，《离骚》、《史记》的问世，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身心倍尝苦难。另一位古人也宣称，文学家非经苦难、苦恋、苦闷三境，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外国也有类似观点。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苦闷的象征”。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它对作家人生道路的择定，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然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作家

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伟大作品”呢？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期待和呼唤“伟大作品”却又总未如愿，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还是太多？其实，“伟大作品”的问世，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非独与“苦难”一因相关。再说，即使“苦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伟大作品”的产生，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人道精神，也偏离文艺原旨，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今昔对比，时代毕竟前进了，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伟大作品”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但在今天，反对暴戾和愚昧，推崇祥和与安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往屈原、司马迁、鲁迅、闻一多、胡风、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文坛漫忆丛书”的五位作家，在文坛上笔耕墨耘、栉风沐雨的时间，都超过半个多世纪，有的更逾七十春秋，他们的经历见识，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

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前景光明，任务艰巨。此时，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诫，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踵事增华，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

文海硝烟

第一辑

记郭沫若

一次导向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茅盾先生回到上海以前，我曾去拜望了从重庆先到上海的郭沫若先生，对他在一九三七年一再从日本寄稿，大力支持我在上海编《作品》半月刊的事，当面向他道谢，并赠送他新出版的几期刊物，请他继续支持我现在正编着的《文艺春秋》月刊。

紧接着，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请郭老到我寓所便餐，邀请和我住在一起的茅盾先生作陪。那天我把熊佛西先生送给我的一瓶“伏特加”打开来喝。郭老酒量很好，而且饮酒以后更加健谈，说话滔滔不绝。他建议我编的刊物，要更加紧贴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他说任何国家的文化艺术，都是人民大众集体创造的。在文化艺术不断演进的长河中，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总是不断分化：一部分向上，产生贵族文学；一部分向下，产生平民文学。这两种文学不断互相斗争着。贵族文学不紧贴现实，脱离人民；而被贵族特权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却常常有很多来自民间的东西——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乐意接受的东西。这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因此，他要求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向人民学习，紧贴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传播人民的心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茅盾先生同意郭老的意见，而且在饭后一起上二楼茅公的卧室坐定漫谈时，他还给我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审稿组稿工作上，以建设人民文学为指导思想；在文学理论工作上，要有人民文学的鲜明导向。特别是“导向”问题，大家颇为重视地议论了一番。他俩希望这个刊物每期能有几篇短论，结合当前客观存在的好的和坏的文学倾向，加以评论，挞伐坏的，鼓励好的，明辨是非。

我决心遵循郭老和茅公的教导，着手改革。我与当时在申报馆挂名工作的吴景崧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研究，并作出决定：除了在审稿组稿工作中注意掌握人民文学的尺度外，从下月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起，开辟“文艺时论”专栏，每期结合当时的现实，发表二至三篇短论，以树立人民文学的思想，匡正种种不良的乃至反动的文学倾向。

我把这一思想理论斗争的任务，交给吴景崧兄负责。

在七月出版的三卷一期卷首第一次编发的“文艺时论”专栏里，共发表了三篇文章：郭沫若的《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湘渔的《论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文化艺术》和吴景崧的《我们仍然需要战斗性的文艺》。

郭老的文章是由我取来的，是一篇讲稿。文章的内容，是从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的对比，说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应当是反映这个国家社会真正主人的文艺，也就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文艺。因此，今天的文艺作家应当眼睛向下，应当歌颂人民群众的功德，表达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希望。这就是不同于旧文艺的真正的文艺——人民文学。

郭老的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为“文艺时论”唱出了基调，无异是开辟“文艺时论”专栏的一篇开场白。

另外两篇都是吴景崧写的。“湘渔”是吴景崧的笔名。那篇署名“湘渔”

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烂熟期的文化艺术》，批判美国的电影和通俗文学刊物，为了赚钱，不惜运用五花八门的图像和文字来贩卖色情。由于二战以后的国统区，美国的黄色电影和书刊充斥市场，因此它的毒害，已经广泛触及中国青年的心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抵制。那篇署名“吴景崧”的文章《我们仍然需要战斗性的文艺》，主要是呼唤有良心的正直的作家们，要眼睛向下，看看我们周围的血淋淋的现实，绝大多数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而骑在他们脖子上尽情享乐的人，却只是极少数。因此文章指出：一切眼睛向上，只反映那一小撮过着天堂般生活的人的文学，一切肉麻得像是梦呓一般的侍从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也不是人民大众所愿意接受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是反映血淋淋现实的文学，具有高昂战斗性和强烈正义感的文学，除了打击以人肉为食粮的、替主子说好话的帮凶者以外，还要指导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如何去解除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束缚，而把这个目前混乱得一团糟的社会，“弄得像样一些”。

文章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在文坛上出现一股御用的反共逆流，说什么共产党是“奸匪”，说郭沫若、茅盾是“左翼帮凶的政客”，而予以不指名的迎头反击。三篇文艺时论，异道同归于单一的鲜明导向——人民文学。

对于这一次的尝试，深得郭老的赞赏。记得那天下午去看望郭老时，他的几个孩子正围着厅前的小花园里已经挖好的一个泥坑，灌上了水，把从外面取来的蝌蚪放进水坑，观看它们自由自在地遨游着。孩子们的脸上、身上，涂了不少泥巴，却毫不在意，还叽叽喳喳地议论纷纷，要挖一条支流通向那一米以外的水坑。他们要看这些蝌蚪怎样摇头摆尾，打支流里游过去。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就动手帮他们挖支流，把水沟的表层用手抚摩得光光的，免得灌水以后水质混浊。正在这时，郭老从里间出来，看到我来了，就把我叫到厅前的廊檐下，让我擦干了手，对坐在两张靠背藤椅里，很随便地闲聊起来。他说：“三卷一期的‘文艺时论’已经看了，编得很好。”他低声说，“作为期刊，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就得有时代感。”

这是郭老对我的鼓励。

我说我准备遵照郭老的期望，请好友吴景崧兄协助，把刊物办得像样一些。但是出版这个刊物的书店资本家陈安镇，虽然无党无派，却毕竟是有产阶级，害怕在政治上翻跟斗，落得人财两失。他经常告诫我，当前的形势变了（指国共破裂），不像胜利初期，出版业者已经受到压力。接着，我把我们书店出版的另一刊物——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如何受到国民党的压力，终于不得不宣告停刊的内幕情况告诉了郭老。他听后不胜唏嘘。他说他今后给我编的刊物写稿，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他希望这个刊物能够在这样荆棘丛生的环境里，排除困难，坚持进步，长期出版下去。

在这半年里，除了在十月份出版的三卷四期辟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邀请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等十五位作家撰写“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的专题外，其它各期，都在卷首编发了“文艺时论”专栏。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有几个是化名，真正的撰稿人则是五位，即吴景崧、李白凤、王亚平、林焕平和范泉。专栏的选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拉朽”，把腐朽的东西加以曝光、批判；二是“催生”，指出我们的努力方向，鼓励新时代的伟大作品的诞生。前者的选题有《用笔来揭发世纪末的罪孽》、《扫荡文坛新风花雪月的倾向》，后者的选题有《论诗歌大众化的现实意义》等。

“文艺时论”一贯以犀利的笔触，朝着人民文学的鲜明导向，在催生和拉朽中战斗。

但是郭老此后提供给我的稿件，则正如他事先暗示我的那样，为了有利于刊物的生存，可以说是不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而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作者朴素的忆念和思想。他在后来的五个月里，交给我的3篇稿子是：《O·E·索引》、《文艺与科学》和《峨眉山下》。

《O·E·索引》是郭老阅读鲁迅《集外集》里的一首旧诗《送O·E·君携兰归国》时，想起有关O·E·和鲁迅以及他自己间的往事，而随手写下的一篇散文。O·E·是日本小商人小原荣次郎(Obara Ejero)的缩写。原来小原和他的好友内山完造一样，都是跑中国内地的小商贩。内山最初是在中国贩卖日本出品的“大学眼药”，开书店仅是他的副业。后来倒是因为开书店而出了名。同样，因为小原在中国采购杂货去日本时，偶尔带了中国的兰草到日本去贩卖，结果歪打正着，大受欢迎，大赚其钱，仅仅几年工夫，他在东京上野公园附近购置了兰圃，专们栽培兰草，还出版兰花杂志，翻译中国的兰花典籍，成为日本的兰花博士。他把鲁迅给他写成条幅的旧诗，装上玻璃匣，像广告一般地悬挂在店铺里。至于郭老，本来与内山很熟，北伐前后住在上海时，还曾得到过内山的帮助。一九二七年二月亡命日本后，郭老在上海所得的稿费或版税，总是由内山汇给日本的小原后转给他。因此郭老和小原也很熟。但是郭老亡命日本后半年，被东京的警视厅逮捕，拘留在日本桥警视署的拘留所里。当时，郭老在拘留所的另一独房里，看见了小原也被关押着。这也许是由于抄家时发现了郭老和小原的关系。但是后来，出狱以后，小原和郭老疏远了，连内山也有一个时期谢绝承担为郭老转寄信件或转汇稿费的义务。

另一篇《文艺与科学》，论述了文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科学是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阶段，科学的精神就是排除主观成见，认识客观真理，更依据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如以这种精神运用于国家行政或社会事业，则就是民主主义。文艺创作则是人生的批判，任何创作都需要经过一道研究的过程。生活体验也是一种研究。因此文艺工作与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当然，现实主义不能抹煞主观，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态度，它是“经过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正是养成主观的能动力量而不是阉割它。文艺的主观必然要经过科学的客观才能养成。这就是文艺与科学的关系。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号上的散文《峨眉山下》，则是郭老的一篇故乡回忆录。郭老生在沙湾，是在峨眉山和大渡河之间。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十三岁时，他去嘉定城念书。大渡河和泯江在城的东北隅合流而东行，北岸有凌云山、乌龙山、马鞍山，与西南面的峨眉山遥遥相对。那里有很多名胜古迹。可是郭老在嘉定城念书的四年间，只是常去凌云，未去乌龙、马鞍，连峨眉山也不曾去过一次。因此他对故乡并不怀恋，只是峨眉山对他还保持着神秘性。为好奇心所驱迫，今后如有机会，他倒很想去游游峨眉山上的金顶。

以上三篇文章，除《文艺与科学》隐约涉及政治外，另外两篇都是个人的感兴之作，可以说是与政治无关。

在这半年里，因为郭老家离我住处不远，我经常去他家看望他，闲聊一些最近发生的事，郭老总是推心置腹地与我谈了许多“不为外人道也”的肺

肺腑之言。他说他那篇《文艺与科学》的文章，也是他应一个文学青年团体的邀请，去给他们讲演时的记录整理稿。讲演时，是涉及政治的，而且大大涉及政治；但是整理时，删去了许多，基本上没有什么“棱角”了，才交给我发表。郭老接着说：“其实，只要是文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不是进步的政治，就是反动的政治，绝没有不痛不痒的中间色彩的文艺。”停停，郭老又说：“就拿《O·E·索隐》一篇来说吧，看来像是不涉及政治的，其实说到了鲁迅，说到了鲁迅对小原的态度，这就是政治。”他说鲁迅不像表彰内山那样地表彰小原，而是用“O·E·”来代名，这就说明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鲁迅，已经看透了小原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小商人，只知道利用鲁迅做广告，绝不是像内山那样，是一个有着进步倾向的政治头脑的人。他说：“文章反映了这一点，也就是政治，是一种潜意识的政治。”

国民党没有注意到潜意识的政治，却对公开战斗着的“文艺时论”大为不满，向书店资本家一再“忠告”，施加压力。为了在这昏天黑地倒行逆施的国统区给进步文艺多留下一些园地，在征得郭老和茅公同意后，决定改变策略，从四卷一期起，终止了“文艺时论”专栏的编发，而侧重于从文艺作品的整体内容上把握人民文学的方向。

一张名片

—

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十年动乱”时期的抄家物资时，发现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十七位作家的二十八件书信，受信人都是“范泉”。他们通过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有关同志查询，终于从茅盾先生的内弟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那里，辗转了解到范泉就是徐炜的笔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在一九五八年任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所属新闻出版印刷学校领导时，贬黜青海省鲁沙尔，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后，应青海师范大学聘请，恢复教授职称，担任研究生导师。于是他们来信和我取得了联系。直到一九八三年春节以后不久，我才写了收据，请人在上海代领了这批信件，包括二十七件书简，和郭沫若先生写在一张名片上的介绍信。

二

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上海，曾主编过半月刊、月刊和丛书十余种，报纸四种，副刊三种。大约有两千多件作家书简，包括书信、名片和便条，还有茅盾先生用墨笔书写的大约四五万字的原稿，一直保存着，准备在今后撰写回忆录时作为史料依据。这次归还的，仅仅只是这批书简的百分之一。我曾函请当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丁景唐兄，代我向有关方面探询。他确实认真联系了不少单位，但结果还是查无下落，估计已经全部被毁。读着他多方调查后回复我的信，觉得在那两千余件被毁的书简中，特别使我惋惜的，是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写给我的一封长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李励文、刘尔俸、马良、邵子南、李雷、丘东平、叶紫、萧琳等，在上海组织了文学社团作品社，决定出版《作品》半月刊和燎原文学丛书，由我和马良出面主编，邵子南和李雷协助组稿。为这个刊物写稿的，除本社社负外，还有郭沫若、洪深、田汉、司马文森、沈起予、白薇、李辉英、任钧、方之中等。刊物出了三期，郭沫若先生按月如约寄稿。在六月十五日出版的《作品》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给威廉·迈斯达译者》；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发表了短论《自由并不是中立》；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上，发表了文艺杂感《随笔三则》。

我和郭沫若先生素不相识，是由我复旦大学的老师谢六逸先生介绍，才开始和他通信，向他组稿。郭老知道我们是一群酷爱文艺的青年，正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创办刊物和出版丛书，就热情洋溢地回复我一封长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论述了青年一代和进步文艺运动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形势下，青年文艺工作者将会在运动中产生多么深远的决定性影响。他满怀喜悦地鼓励我们，期望我们排除困难，坚持到底，作出成绩。他不仅如约按期寄稿，而且不取稿酬，还答应我们在“燎原文学丛书”第二辑组稿时，寄给我们一部十余万字的稿子，大力支持我们。

由于“八一三”事变突发，保存在南市区作品社内的丛书第一辑四种的纸型，连同已经印好正在装订的《作品》第三期，被日机炸毁，马良被炸身亡，发行人刘尔俸去烟台探亲后返沪受阻，作品社遂告解体。

但是郭老写给我的这封长信，我却一直保存着。这封信的信纸，一部分

用墨笔写在略带米黄色的薄纸上，一部分用钢笔写在玉色的道林纸上，显然不是在同一天书写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抄家时乱堆乱放，查抄者没有整理出这些纸片的头绪，当作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件，把它和两千多封信一起，付之一炬，而把郭老在四十年代写给我的一张名片，却充当“代表作”，作为郭老和我有牵连的“罪证”而保留下来。

三

从名片看，那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的事：郭老“介绍徐慰慈先生”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请接谈”。在这天以前，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曾遵照郭老的预约，到狄斯威路（今溧阳路）他的家里去取稿。他交给我一篇回忆录：《峨眉山下》。他说这是他昨天夜里特地为我编的刊物赶写的。谈话中，他谈到了徐慰慈。他说徐慰慈就是徐培仁，是他抗战前的旧识，曾经翻译过《安徒生全集》，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现在徐慰慈来到上海，生活困难。不管怎样，作为我国第一位把《安徒生全集》翻译过来的人，应该有他生活的空间。他说过些时候，等他再去看望郭老时，就介绍他来看我，希望我能介绍他工作。

过了一个多月，徐慰慈拐着腿（他是一位残疾人），拿着郭老的这张名片，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在谈话中，我了解他的情况：原来他那时在中学任教的妻子，在抗战时期的浙江沦陷区，跟着别人走了，丢下一个还在念小学男孩，由他抚养。他因残不能劳动，只能在乡村的学校里教书，工资菲薄，生活十分艰难。现在来到上海，希望能做一些文字工作或教书工作。最初，我给他介绍《世界知识》的主编冯宾符兄，让他发挥外语的特长，经常给这个刊物译些稿子。后来又介绍他到一个中学里去教英语，让他父子俩的生活安定下来。

在和徐慰慈的长期交往中，我逐渐知道郭老和他仅是文字之交，因为翻译《安徒生全集》而通过信。抗日战争时期，郭老在重庆时，曾经辗转相托，在经济上支援过处身于沦陷区乡镇的他。一九四六年秋，他带了儿子来到上海，因为找不到适当工作，又去找郭老两次，郭老就又满腔热情地介绍给我，要我给他介绍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一起去迎接茅盾先生夫妇从苏联访问回国的路上，郭老还亲切地问起我工作以后的徐慰慈的生活情况。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听后不住地点头，表示十分高兴。

我写了以上一些有关郭老一张名片的回忆，试图说明郭老对于进步文艺青年一贯的热情关怀和爱护。

一九五八年，我在双反运动中补戴“右派”帽子去了青海以后，与世隔绝整整二十年，当然也中断了与徐慰慈的来往。但是等到我平反以后带了研究生出差上海时，辗转探询，我却再也找不到徐慰慈，找到的仅是他那在工厂当工人的儿子徐小虎了。小虎告诉我说，他爸爸本性耿直，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在反右时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时仍然绝不认错，终于被逐出学校的宿舍，只给数十元生活费，住在老西门一条陋巷的一小间破烂木屋里。由于身残多病，又无钱治疗，到了最后一年，已不能站立，但是他仍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决不认错，因此还被造反派拖到学校里，让他趴在地上批斗，一些穷凶极恶的打手，还说他“装死”，把他踩在脚下，鲜血淋漓。这次批斗以后，不到十天，他终于睁大一双眼睛，愤愤地离开了这个

令他心碎的世界。

对于一位曾经首先翻译《安徒生全集》给我国广大少年儿童的译者，如此无声无息地被“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禁不住使我回过头来，再看看郭老亲笔书写的这张名片——这是一张充满了友情和温暖的名片，而联系到名片上介绍的具体的人以后，在我噙着泪花的模糊了的视线里看来，它竟成为一张令我看了惊心动魄的名片！

记茅盾

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版始末

一九四五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孔另境带给我茅盾先生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他夫妇俩将要转道广州、香港而回到上海，还谈到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上海出版一个机关刊物，由他本人出面主编，叶以群负责具体工作，要我征询我工作的书店总经理陈安镇的意见，能否承担这项出版任务。

中外文艺联络社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原来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中国文艺通讯社。一九四一年，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个沦陷区汇集到香港，使香港的文艺界顿时活跃了起来。国内如重庆、桂林等城市以及南洋各地报刊的编辑，都纷纷写信给香港的文艺工作者，要求支援文稿。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为了向国内外传递延安的文艺信息，又能使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稿各得其所地寄递给急需发表的报刊，并可以在不同地区同时发表（一稿多用），以增加作者的收入，经过大家商议，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于香港正式创建了中国文艺通讯社。事实上，它是党领导下的、各地报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一个互助联络机构。当时和它取得联系的，有延安、重庆、桂林、曲江、赣州、星加坡、菲律宾、仰光、荷印、美国纽约等地的报刊编辑和文艺工作者。通讯社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一九四四年，随着湘、桂的撤退，文艺工作者又向重庆集中。当时，在大后方广泛开展的民主运动中，贵阳、昆明等地出版了不少期刊，那些刊物的编辑要求重庆的文艺工作者支援文稿，于是又遇到了一九四一年在香港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经过大家商议，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外文艺联络社。这可以说是中国文艺通讯社的继续。

中外文艺联络社的任务，主要是协调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供需关系，传播文化出版信息，开展中外文艺往来工作等。在重庆时期，曾和延安、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城市以及出版报刊的一些县城取得联系，并与苏联、英、美等国作了一些交换出版物、译介出版信息等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文化重心东移，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迁移到上海的同时，出版一个机关刊物，以扩大它的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表示支持。

在接读茅公来信以后不久，叶以群同志拿了茅公的介绍信来，和我具体商谈了有关中外文艺联络社计划在上海出版机关刊物《文联》半月刊的具体问题。

非常顺利，我向书店总经理陈安镇说明中外文艺联络社的性质以及《文联》这个刊物的特色以后，正在谋求拓展业务的几位经协理，很快同意承担这项出版任务。第二天，我约叶以群和他一起议定了刊物的开本、每期字数、出版周期以及稿酬、编辑费等一系列事项，并签署了协议书。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一个十六开本、由茅盾、叶以群主编、每期一个全张纸篇幅、主要用小五号字排印的文艺报道性半月刊《文联》创刊号出版了。

茅公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说明这个期刊准备努力做到这样几件事：“报道国内外的文艺活动乃至一般文化活动的概况。介绍国内外出版的新书——主要是文艺的。发表同人对于当前文化——文艺运动，以及

文化——文艺活动中具体问题的意见，同时并愿尽量刊登通讯讨论，以及文化——文艺界友人对于本刊言论的商榷和批评。”此外，这个刊物还将“尽可能刊登短篇‘报告’、‘小说’以及诗歌、杂文、漫画、木刻等等”。“同人们的最大愿望是使本刊能够善尽其：报道，批评介绍，联络，交换意见的基本任务。”

在创刊号里，茅公写了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地点在重庆，“写于无阳光室”。这是一篇总结八年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缺点，并指出今后应该如何努力、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的文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茅公首先指出八年抗战是为了对外挣脱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于我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侵略，对内解除封建势力和买办阶级对我人民的压迫而争取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虽已结束，这两大目标却还没有完全达到。茅公认为武汉撤退以前，抗战情绪是高涨的；而武汉撤退以后，国民党政府一面消极抵抗，一面积极压制言论，摧残民主，作家毫无写作自由，被迫形成三种倾向：一是与其不痛不痒地反映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二是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至“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三是介绍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带有既不是上阵厮杀的时候，就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的意义。事实上，大后方的这三种文艺倾向，在国民党严厉的检查制度下，也不能正常发展。比如写历史题材的《屈原》，在一度演出后就不能再演，《高渐离》则干脆不准上演。介绍世界文学名著，《铁流》就被禁止，西欧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也遭到留难。至于反映现实的作品，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总结过去，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恶劣，从主观努力的程度上看，则还有不足之处。比如武汉撤退以前，我们的文艺作品歌颂了人民的英勇，却忽略了民主，没有喊出人民的民主要求，因而不能说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在武汉撤退以后，我们的抗战文艺“即使能够更多地暴露政治上社会上的黑暗（这是事实上没有做到的），但若不能充分反映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则依然不能不被讥为回避现实与立场动摇。因此从这一点看，茅公把八年来文艺工作的主要毛病，归结为“右倾”，并且明确地指出今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必然是“配合广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茅公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用“右倾”总结过去，吸取教训，用“民主”号召未来，提出文艺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斗任务。这可以说是一篇矛头直指反民主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檄文。

八天以后，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茅公又写了《谈歌颂光明》一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文联》第二期上。文章指出在我们歌颂光明的同时，必须暴露黑暗，抨击黑暗。可是在今天还有“颠倒皂白者”强迫人们歌颂莫须有的光明而维护真正的黑暗。在歌颂光明的命令中，本身就包含着黑暗。因此，文章告诫说：“天真的青年人如果以为他们只不许暴露黑暗而已，歌颂光明尚还可以，那就上了当了。因为他们的所谓光明和我们的是不同义的。”

为了支持《文联》，扩大《文联》的影响，过了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茅公又写了《也是漫谈而已》的文章，对冯雪峰同志的《论

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左联”时期的思想斗争、统一战线问题和“大众化”问题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补充意见。

一直到五月中旬，《文联》决定停刊时，茅公还为第二届的“五四”文艺节，写了《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的文章，指出今后的文化运动，必须配合民主运动，而且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还有雪峰、以群、艾芜、袁水拍等。以茅公为首的这些论文，都是倾向鲜明地指出了今后文艺工作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方向。

在指明方向的同时，作为《文联》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发表了大量来自各地的通讯报道和解放区的文艺信息。这是文化——文艺界人士如何争民主、争自由的实际行动的反映。在《文联》第二期力扬写的《“政治协商会议”声中争自由的热潮》一篇报道中，突出地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倒行逆施。如曹靖华代表文艺界发言说：“几年来，文艺界的痛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检查制度，非常没有道理。还用许多间接的方法，如控制交通、邮局扣留、命令禁阅等等不合理的花样，来压迫作家。外国可以出版的书，中国不能出版；重庆可以出版的书，外地不能出版。这些不合理的事，就是沙皇时候，也是没有的，是应该废止的时候了。”洪深代表戏剧电影界大声疾呼：“今天，我们首先要争做一个‘人’，因为还有不把我们当‘人’的人。”然后他用事实来揭发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说：“抗战初期，武汉失守时期，我们跟着政府跑到大后方来，有的在前方服务，有的在后方努力，可是政府对我们怎样呢？第一，捐税奇重，商业捐税才有百分之四，可是戏剧电影却是百分之六十。冬令救济捐了好几年了，一年收多少，收去做什么，戏剧界一点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冬令捐税有三分之一用于冬令救济，其他的都是酬劳弄捐税的人。再有看白戏，曾有公安局负责人亲自跑到后台去要票子，而且还要在前排留两个位子，说要检查戏剧。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团体演《黄花岗》，竟然有两个巡长四个警察以检查清洁为名，一直站在后台不走。抗战胜利了，上海接收了许多的戏院器材，我们还不能回去之前，就组织了一个什么中央电影服务处，说制片自由，发行统一，不是党办，不是官办，而是中宣部中央摄影厂里一部分身份不明的人弄的。这样几个人就可以把戏剧电影都统统握在手里，一切非经过他们不可。有些人真的是落过水的，给敌人做过事，可是现在也在上海负起戏剧方面的责任了。我们千辛万苦熬过了抗战八年，将来还要到汉奸下面去讨一碗饭吃！”最后他一字一泪地说：“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电影界！救救中国！”

在解放区文艺信息的传播方面，直接间接的有好几篇。发表在第五期上张大雷所写的《话说另一个文坛——访周扬》，就是一篇直接介绍解放区文坛的通讯。通讯在说到解放区这几年来新作家的涌现时，仅小说一项，就列举了运用民间语言比较成功的孔厥的作品，以及冀中的孙犁和山西的赵树理，他们都表现出创造力，而赵树理在当时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就有《李有才板话》和《郝小二结婚》（解放前重版时改为《小二黑结婚》）。通讯还谈到了有关萧军、艾青、丁玲、萧三、杨朔、陈学昭、成仿吾等的文艺和教育活动。再如第七期发表的《北方文苑悲欢图》，报道了全国文协北平分会原来打算在“五四”举行纪念文艺节的庆祝晚会，预定有金山、马彦祥的相声，张瑞芳等演出的话剧《正在想》，但因辅成大学拒绝借用会场（当然

是受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被迫忍痛作罢,十分可悲。但另一方面则恰恰相反,北平大中学生数百人通过封锁检查,前往解放区张家口参观访问,受到了当地民主政府和各机关团体的热烈欢迎,由军区政治部和华北联大举行欢迎晚会,并接待去人民剧院看戏,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第一次听到了雄壮伟大的抗战歌声。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看到了民主普选的实况,亲眼目睹人民群众是如何成群结队地参加自由的竞选的。他们还看到了张家口市街的繁荣景象。他们返回北平以后,便写文章投寄民主刊物,出壁报专栏介绍解放区一片生机蓬勃的实况,在当时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文联》是以报道、批评、介绍为主的刊物,但在七期中发表了五篇反映当时血淋淋现实的短篇小说,它们是:徐迟的《怨》(第二期)、沙汀的《呼号》(第三期)、刘白羽的《饥饿》(第五期)、徐疫的《兴文乡疫政即景》(第六期)、艾明之的《春旱》(第七期)。徐疫的《兴文乡疫政即景》,是获得茅盾文艺奖第一名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沙汀的短篇小说《呼号》,描写廖二嫂大吵大闹,向乡长要她的男人,因为抽丁的时候,乡长几乎非常肯定地保证说:今年一定会胜利,“胜利了一定有你的廖二!……”可是现在胜利了,廖二却来信说:“他们九月开往豫东,一走拢就同共产党打响了。……据长官宣布,大家要努力干,因为要等到剿完共产党才能回家!……”这怎么不叫廖二嫂大吵大闹呢!她每天都要找机会大吵大闹一阵。逢到赶场,就吵得更厉害:

“你们说清楚打走日本人就回来的!并没有说过还要打共产党人!”

事实上,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蒋介石一面签订国共会谈的《双十协定》纪要,一面却早已密令各部队,准备向解放区进攻,部分地区则已经着手进攻,正如沙汀的小说《呼号》所反映的。十二月,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学生集会,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造成“一二·一”惨案。茅公和郭沫若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学生电》。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了我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四月,国民党密令所部禁止茅公创作的《清明前后》剧本的上演和出售。五月,国民党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一切民主运动,并封闭了党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报社。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争民主争自由的《文联》,终于被国民党内定为共产党编的刊物,非但不予登记,而且还被列为取缔的对象。刊物的发行人、书店的总经理陈安镇是无党无派的,但他从董事长许晓初那里得到了信息(许晓初是中法药房总经理,国民党员),并且告诉了我。

“谁说是共产党编的刊物!茅盾先生不是无党无派的吗?——这是谁都知道的。”我说。

“是陶百川给许晓初带的话。陶百川也是好意,说是他听到的。”陈安镇有些局促不安地说,“他说他们不会下命令,禁止出版。他们是会用其它办法,给我这个发行人下不了台。我也说茅盾先生不是共产党,可是他们说共产党借了茅盾先生的名义在编刊物。”

“那么你的意思怎么办?”

“请你和叶以群先生研究一下。”

第二天,我和叶以群研究以后,决定等茅公回到上海以后再商量。刊物暂不出版。

四月，茅公从重庆出发，路经广州、香港，处理了一些私事，在五月下旬到达上海。

在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我请茅公夫妇吃晚饭，谈到了《文联》是否继续出版的事。茅公介绍了重庆的政治空气，也介绍了广州、香港的文艺界情况。他要我通知叶以群，先一起研究一次，然后再和陈安镇商议。

根据茅公分析，国民党在签订国共会谈的《双十协定》的同时，就已经暗中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向共产党进攻。现在表面上似乎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可以在刊物上抨击那些扼制民主和自由的人和事，传播解放区的一些信息，但这些都会记在国民党备查的账上，立此存照，等到不久以后拉破了脸，公开反共，不认人的时候，就会连本带利一起清算。茅公分析发行人陈安镇是有产阶级，那三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是固定资产，肯定会有思想负担。因此，现在既然已经被怀疑这是共产党编的刊物，为了解除发行人的思想包袱，不牵连他，还是自动停刊为上策，出一期终刊号，表示有始有终，作为结束。这是茅公和叶以群同志研究以后，告诉我这个介绍人的。

三天以后，在陈安镇宴请茅公的宴会上，终于商定了《文联》自动停刊、出版终刊号、由茅公撰写停刊启事的做法。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叶以群、孔另境、司徒宗、吴天和我。吴天和司徒宗，分别是这家书店出版的《文章》月刊和《少年世界》半月刊的主编。

在《文联 停刊启事》里，茅公把停刊的原因，说成是由于“距离我们的理想尚远”。他说：

“本刊已经出了七期，这七期的内容，距离我们的理想尚远，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本来想办一个专门介绍新出的书刊，报道国内外文化动态的刊物（这是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说过的），我们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这样的刊物不容易办得好，但因有出版家赞助我们这宗旨，所以鼓勇一试。现在既出了七期，而未能尽如理想，那么，与其敷衍，不如暂停。这一期便是最后的一期。但我们仍信这样的刊物有其客观的需要，将来如果有可能，还是打算再试试的。兹当停刊之际，我们谨对爱护本刊的读者，以及赞助本刊的作家们和出版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的确，按照原来的理想，是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反映广大人民迫切的民主要求的，但是形势日趋恶劣，这样的要求显然无法做到。

茅公的这篇《文联 停刊启事》，写于五月下旬在他回到上海以后不久，但是发表时用了“三十五年六月一日”，这是他在给我的便条中特别加以说明的——“因为刊物要到六月才能出版，刚巧取个齐头数。”

写了停刊启事以后，茅公还为终刊号写了一篇纪念“五四”艺术节的文章：《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这也反映了他“有始有终”的思想。

“想不到我这次回到上海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竟是《停刊启事》，真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哈哈！”

在一次闲聊时，茅公非常风趣地向我说了这句自我解嘲似的话。他已经非常清楚：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摆在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将是一系列更加艰难曲折的斗争。

回顾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和平，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对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自前往重庆，进行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坚决避免内战，

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可是国民党却把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作为掩护它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的烟幕。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文联》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指出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方向。究竟谁要和平民主团结，谁不要和平民主团结，从《文联》反映的内容和它的被迫停刊本身，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虽然《文联》出版前后总共不过半年，但是它却已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出色地完成了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的历史任务。

1985年12月1日

茅盾谈杜重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在上海搭乘苏联轮船斯摩尔尼号，到苏联去观光。

在出国前的几个月里，为了协助茅盾夫妇准备行装，搜集旅行需要的参考资料，把茅盾先生的一些著、译交给我工作的书店印刷厂装订车间精装烫金，以便出国后送给苏联友人，我经常应邀在他们家里吃饭。

有一次吃饭时，谈到了杜重远。

我曾看过生活书店出版、杜重远写的《盛世才和新疆》。从这本书里，我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新疆的面貌，不论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景象。这些成就怎么会取得的呢？杜重远在文章里暗示我们：是由于盛世才采取了亲苏、联共政策的结果。

可是日寇投降以后，从重庆复员到上海来的文艺出版界朋友们告诉我：杜重远被盛世才杀害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询问了茅盾先生。

茅公一面吃饭，一面谈他与杜重远如何认识。饭后，又谈他怎样去新疆，以及杜重远如何被杀害的经过。他谈得十分细致，有时还插叙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原来，茅公与杜重远并不相识。

一九三八年二月，茅公应萨空了的邀请，到了香港。他一面主编《文艺阵地》半月刊，一面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还为此副刊写着一篇连载小说《你往哪里跑》（后来出书时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经《立报》负责人萨空了的介绍，茅公才认识了杜重远。

杜重远为人豪爽，心直口快，待人处事，热情真挚。

杜重远谈到他同乡老友盛世才的新疆治绩，十分赞赏。他说他已应聘为新疆学院院长，即将赴任，并热情邀请茅公去新疆学院任教。这是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事。

这时候，萨空了已经离开《立报》，去了新疆。考虑到在香港卖文为生，极不安定，茅公也就决定应聘，匆匆结束了在副刊《言林》发表的长篇连载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茅盾夫妇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转道兰州去新疆。在兰州，为了等候飞机，足足耽了四十多天。从香港到新疆的全过程，历时两个多月。三月到达新疆。

可是到了新疆，和盛世才接触以后，终于发觉他是个阴险狠毒、依靠枪杆子统治新疆的专制独裁者，决不像杜重远所说的那样是为民造福、招贤纳士的人。

“看人不能光看他怎样说的，要看他怎样做的！所谓察言观色，这个‘色’字，其实就是指的行为举止。”茅公坐在沙发里，摆了摆手，有些激动地说。“头一次见面，他来机场迎接，可是我看到了他的排场：用架着机关枪的军车来保卫他自己，真可以说得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难道这是一位亲苏、联共、热爱人民的地方父母官吗？后来，盛世才的特务统治越来越露骨了，这就使我心里盘算，将来用什么借口，离开这个鬼地方。”

茅公的这些感触，也对杜重远说了。这是为什么杜重远在当了新疆学院院长仅仅十一个月的时候，就借口患病而辞职。辞职以后，他曾一再要求回内地（重庆）治疗。但盛世才蓄意拖延，不给交通工具。当茅公于一九四

年五月初以“奔母丧”为借口，离开迪化以后大约一个月的时候，杜重远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赵丹、徐韬等五六人。杜重远被捕的最初理由，是“勾结汪逆（精卫），危害新疆”；后来又说他是“共产党的新疆省委”，说赵丹等是杜重远的“党羽”。其实都是冤枉的。

杜重远被捕以后，惨遭酷刑，于一九四三年春遇害。

自从一九四一年夏杜重远被捕到一九四三年春遇害为止，杜夫人曾一再请求去狱中探视，都遭到盛世才的拒绝，连死后的尸体也不给杜夫人看见。如果真的像盛世才所说，在狱中“病”故，那么在病危之时或死了以后，不妨让家属探视；不让家属探视，连尸体的葬地也不告诉家属，正说明死者受尽酷刑，长期折磨，终至一死，惨不忍睹。此事直到盛世才下台，朱一民执政新疆，释放了那些被盛世才冤捕的人，包括赵丹等在内，才逐渐弄清了杜重远被害的真相，找到了杜重远遗体的葬地。

说完了杜重远的冤狱以后，茅公用沉痛的语调指出：我们要从这一事件，汲取两个教训。

一是要善于认识人。杜重远为人正直、真诚、热情、忠厚，他往往以己之腹度人之心，以为盛世才既是同乡，又是老友，因而只看表面，信以为真，终于受了他的骗。

二是要善于认识事。任何事情都不能道听途说，偏听偏信，而要脚踏实地，认真调查，分析研究。杜重远写的赞颂盛世才的文章，都是根据一些官方的报道以及盛世才和他部下的口头宣传写的，没有经过深入的查证和研究，因此他不仅自己受骗，而且还可悲地骗了别人。

听了茅公的这一席话，我深受感动，就请他把谈话的内容写下来。他同意了。第二天，他把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概括地写了一篇《谈杜重远的冤狱》，交给了我，发表在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三卷五期上。这是他出国前交给我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现在，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记下来，作为茅公那篇文章的补充。

茅盾先生出国二三事

一

十二月五日，茅盾先生离开上海搭轮到苏联去了。

二

苏联大使馆邀请茅盾先生赴苏，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胜利复员，茅盾先生由重庆，广州、香港而到了上海，苏联大使馆在上海再度邀请，而且作了一次具体的决定以后，才由苏联大使馆派员陪同茅盾先生前往南京，办理出国手续。一般朋友——连茅盾先生自己，都以为出国护照一时恐无法获得，所以到南京去办理出国手续，也是抱着“姑且试办”的心情，却不料出国的事情竟会很快的实现。

当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代表们会集南京，为了国共间的和平，作最后一次斡旋的时候，茅盾先生也搭机到了南京，他在邵力子先生的帮助下，终于办妥了出国的手续，获得了夫妇两人出国的护照。

三

这次茅盾先生赴苏访问，原可以选择空路——由昆明，加尔各答，伊朗而抵达莫斯科，然而茅盾先生却选择了一条费时劳神的水路去。他像讲笑话一般地说：搭飞机我是拜领它的教训了，实在对于一个想获得一些什么的旅行者，得不偿失。譬如我现在在上海，穿了皮袍子，到了昆明，只得穿夹衫，再到印度，那热得简直汗流浹背，而最后到了莫斯科，那恐怕连两件皮袍子也不够了。我又没有钱到莫斯科去买皮货（事实上连买也来不及买），搭飞机又不能多带一些御寒的衣服，更谈不上带什么书籍用品去。所以还是让自己多吃一些苦，多带一些行李，多费一些时日，在沿路让自己多见识一些值得我去记忆和记录的东西。

四

足足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茅盾先生积极从事于赴苏的准备工作。他首先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然后阅读了一些旁人著述的苏联游记，并且计划自己抵达苏联以后的游历程序和工作内容。他也在几个留学苏联的朋友那里学会了若干简单的俄语会话。他带了不少种自己翻译的苏联文艺著作，例如《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以及《团的儿子》等，准备赠与苏联的各位原作者。而若干中国的出版商和著作人，也托他带去了不少有关苏联的译著，赠给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作为中苏文化的交流。他把这些书本装在克宁奶粉的纸匣里，他不嫌烦累，携带着去跋涉遥远的旅途。他很珍惜：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心与血的礼物。

五

有一天的晚上，茅盾先生请我和另外的几个朋友吃蟹，谈到了关于赴苏的事情。他于是像说笑话一般地说：我们到苏联去，真是去做十足的哑巴和聋子。因此到了苏联以后，虽然自己很有计划想到这里那里去玩玩，但总不能叫一个苏联的翻译官跟着你走来走去，而且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要求。所以这次去，我们连牙刷牙膏也带了去，省得到了苏联以后的麻烦。

后来又说到关于在外国买东西的事情。他说他以前在日本，懂了几句普通的日语会话，出去买东西，譬如说是袜子吧，“我说我要多少大小什么颜色的袜子。如果有，那自然很简单，他拿出来便什么都解决了。但有时他却说上了一大篇话，不知道是颜色的深浅呢还是大小的相差，使我听了莫名其妙。又有一次，我向一个日本人问路，其实他只要简单地说一声往什么方向走去就是了，可是他偏要讨好你，说了一大篇的话，结果使你还是不知道打那里走才好。所以仅仅懂几句皮毛的话，那是危险的，结果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

基于这样的理由，茅盾先生说：这次到苏联去，他准备做一个彻底的哑巴和聋子。

六

又有一次，和任钧兄一道，坐在茅盾先生那里谈天。话题终于又转到了赴苏的事情。在谈到了关于不通言语的旅行者总是不免带有寂寞感的时候，他于是讲了一段郭沫若先生赴苏途中在德黑兰闹的一次笑话。那时候飞机将在德黑兰起飞，郭先生的“翻译”刚巧有事走开，到了中午，因为肚饥，郭先生独自到一家餐室里去想吃些东西。餐室的侍者只懂得俄语，郭先生用英语和德语说话，他们都摇头，于是不得已，他用手作刀子剖切面包的状态，表示他需要吃面包。但是侍者却拿来了一把刀子。这时候郭先生再用右手的手指圈成一圈，往嘴上作口食的姿态，表示他用刀子切的东西是可以吃的，结果侍者却拿来了一杯茶。所以由此看来，郭先生在苏联所感到的寂寞感，那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这次的去”，茅盾先生说，“能够居住多少时候，那就连自己也不能知道。”——但茅盾先生是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半年，能够多见识到一些什么。

七

十二月三日的晚上，在一次小小的饯别里，茅盾先生来得最迟。他到了苏联大使馆，还去理了一次发，最后还买回了两只手提箱。郭沫若先生面对着茅盾夫人说：“你们是去蜜月旅行啊！”后来大家计算他们结婚的时间，应该是到了“银婚”的阶段了。但是茅盾夫人却很肯定地对旁人说：她本来是不预备去的，免得茅盾先生到了苏联以后真的做了一个哑巴和聋子，所以跟着一起出去，略略减少一些旅途的寂寞。这几句话虽然都是开着玩笑而说的，然而仔细一想，那真是多么值得我们再三沉思意味深长的话啊。

八

这次茅盾先生到苏联去，共带了大小行李十五件。他化了一百万元做了

一件皮大衣，他的太太用自己的手编结了几件绒线衫，他们搭乘的船是史摩尔尼（Smolny）。在十二月五日的早上八点半钟搭乘轮船，下午二时启碇。船将沿着中国的领海转往日本的长崎，再由日本的内海航行到苏联的海参崴。然后由西伯利亚铁道直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居住一个时期，再到别的大城市 and 别的乡镇。他很希望能够在冬暖夏凉的黑海边上居住一个时期，但是能否如愿，那要由临时的环境和条件来决定。

这次送行的人们之中，除了报社记者和书业代表，还有郭沫若、叶圣陶先生等大批著作人。

这里，我们谨祷祝他们平安地抵达目的地，然后再平安地归来。

茅公也写了《寄语》数行，交给我在《文艺春秋》月刊发表（见本书四十一页）。

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三卷六期上，特辟了专栏“欢送茅盾先生出国小辑”，我的这篇文章，就刊载在这个小辑里。这个专栏还刊有郭沫若的《临别赠言》、端木蕻良的《送茅盾先生出国》等文章。

附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茅盾先生和夫人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搭乘苏轮斯摩尔尼号，去苏联观光。那天下午，郭沫若先生夫妇向茅盾夫妇献了一束鲜花，并写了一篇《临别赠言》，还写了一首《送别诗》：

乘风万里廓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

明年鸿雁来宾日，预卜九州已大同。

1998年3月8日

往事五题

在日寇投降后复员来到上海，又在白色恐怖中秘密离开上海，茅盾先生在沪居住的时间，总共不过是一年又七个月。在这期间，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曾与夫人一起，前往苏联访问三个半月，因此居住在上海的实际时间，是一年零四个半月。我有幸在这段时间与茅公同住一楼，能经常聆听他的教导，并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关怀和扶持，不少往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里只写其中与我有关的五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关于茅公复员来到上海和访苏的准确时间。

一九七九年九月，茅公在《自传》里说：“一九四六年春，我回上海。”

可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里，由《茅盾专集》编辑组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一月撰写的《茅盾传略》里，谈到抗战胜利茅公回上海时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结束，同年冬茅盾到香港，次年二三月间回上海，参加编辑‘中外文艺联络社’的刊物《文联》半月刊。”把茅公回上海的时间，明确地写在“二三月间”。

其实，茅公是在五月下旬回到上海的。

我还清楚记得，在茅公夫妇到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我在“军之友”餐厅邀请他俩吃饭时，那些由日本人高架栽培的迎春花花瓣，像金箔一般地洒落在通向餐厅二楼的露天台阶上。这说明春天的步伐将要走到尽头，而覆盖在台阶两侧矮树枝头的一片浓绿，正宣告初夏瞬即到来。

另一个证明是茅公到了上海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日期。这封信是回答我能否撰写长篇小说在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的。他说：

……长篇连载目前尚不能动笔；来沪将一月，每日无事忙，朋友们来信都无暇作复，似乎尚得过一时间，方能定心写作也。……

这封信的书写日期，是“六月廿二日”。按照信里所说“来沪将一月”推算，他来上海的时间，当在五月下旬。

第三个证明是茅公回上海后，首先为《文联》半月刊撰写《停刊启事》的事。《茅盾传略》说，茅公回上海后“参加编辑‘中外文艺联络社’的刊物《文联》半月刊”。其实这最后一期刊物，早已由叶以群编好，茅公只是作出“停刊”的决定，并撰写了《停刊启事》。事情的经过，参见我写的《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版始末》一文。

从茅公才回上海就被迫撰写了以“六月一日”为写作日期的《文联停刊启事》这件事，也可以证明他是在五月下旬到达上海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茅公对我文学编辑工作的关怀与扶持。

在回到上海的最初半年里，茅公不仅为我编的刊物介绍了写稿的作家，还和郭老（沫若）一起，教导我应当如何把刊物编得更加紧贴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参见《记郭沫若》文）。为了支持我编的丛书，茅公交给我两部书稿：《文凭》和《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我还记得那部《译丛》的封面，是由我设计的。这是因为书名的字数过多，请人设计后写来的艺术字，反而觉得不美观，于是我异想天开，尝试采用茅公书写的毛笔字，准备按封面容积作相应的艺术排列。我写信给茅公，说出我的设计思想，还打算设计后送给他审定。茅公在九月十九日写了一页回信，连同他校对后的书稿

清样一起，交另境带给我。从茅公的这页信里所说：“不必送来我看，请尊裁夺可也”这句话看，他是完全信任我的。因此我按封面的尺寸比例，大胆设计。过了一个星期，硬面烫金的《译丛》封面印出来了，看来倒很别致，茅公看后还乐滋滋地盛赞我：“这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在回到上海的最初半年里，茅公给我编的刊物大力支持，几乎每期写稿，先后发表的有：七月，翻译 A·杜甫辛科的短篇小说《作战前的晚上》；八月，翻译 N·吉洪诺夫的短篇小说《苹果树》；十月，《谈苏联战时文艺作品》、《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十一月，《谈杜重远的冤狱》；十二月，《寄语》。在《谈苏联战时文艺作品》的文末，茅公标示了此文写作时间和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异常恶劣的环境。他这样落款：

一九四六年九月于上海。时则中国内战正烈，而国际的反动分子正在大肆嚣张，意图挑拨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苏战争，而压迫世界新兴的民主国家。

在同期发表的《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里，茅公写了八年抗战后人民依然得不到胜利果实，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败北，但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以前更甚，……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鲁迅活着，看到了，他会不会觉得意外？

我想：鲁迅决不会觉得意外！因为鲁迅教导我们，要正视现实，要揭开那“浩然巾”，看清那些“两面人”的藏在巾内的狰狞鬼脸，要钉那些“伪君子”的梢，暴露他们怎样在锁了房门以后干着不可告人的丑事，要追究那些下台以后念佛的屠伯们在台上时的凶恶，这才可以看透他的念佛还是为的想重操旧业……鲁迅全部的遗教都是要我们莫存幻想，莫轻易乐观，莫轻信人家的美丽的言词，看人要从他所作所为来下判断，看事要透过表面。

……

茅公在这篇短文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个“民主”者“民”之“主”、诺言即是食言的昏天黑地的时代。

茅公在十一月发表的那篇《谈杜重远的冤狱》里，分析杜重远受难的根本原因，正是太轻信于人家表面上所扮演的那一套。在这个昏天黑地的时代，不能存在任何幻想，看人要透过表面，看他真正的所作所为（参见《茅盾谈杜重远》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茅公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去苏联访问。临行时写了《寄语》一则：

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因为你们将在祖国度过阴暗的季候。谢谢我的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

《寄语》抒写了茅公当时的真实心情：祖国笼罩着一片阴霾！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茅盾夫妇在海参崴踏上苏联的领土，然后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先后居住约一个多月，曾到亚美尼亚共和国、乔治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以及列宁格勒、巴库等地观光，历时将近五个月，于一九四

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仍然搭乘苏轮斯摩尔尼号回到上海。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编写组在《茅盾传略》里说：“同年（指一九四六年）底应苏联对外文协邀请，赴苏访问，次年七月初回国，写了《苏联见（闻）录》等书。”这里所说的“七月初回国”是错的。茅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写的《自传》里，说到访问苏联的回国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这“四五月间”是对的。具体说，回到上海的时间是在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郭沫若、叶圣陶等都到江海关码头上去迎接。我有幸参加了迎送。我还把孔另境拍摄的茅公从斯摩尔尼号乘坐驳轮登岸时的一些照片，刊登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同期还刊登了茅公夫妇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人民艺术家（石刻）合影的照片和茅公亲笔题词的说明。

第三件事，是关于抵制国民党检查另办丛刊发表茅公文章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茅盾夫妇从前苏联访问回到上海。这时蒋介石已密令“在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查封了进步报刊二百六十三种，并指令胡宗南部向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国统区”的上海，已经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茅公白天接待宾客，夜间整理访苏笔记，经常忙到深更半夜。7月的一天，我和戴望舒一起，与茅公闲聊上海的白色恐怖时，谈到写作难，编辑刊物也难，国民党不仅全面发动内战，在“国统区”加强特务活动，还加紧报刊检查，从意识形态上设置监控网络。我说我在资本家的企业里编杂志，只能听凭资本家把每期杂志付印前的清样，送请国民党检查官陶广川检查。资本家还按月付给陶广川酬金，请他高抬贵手。陶广川也真算是“宽容大度”，对已经拼版的文稿，一般不“枪毙”，而是涂涂改改，有时心血来潮，加上几句，作为“照顾”。有些文章竟被“照顾”得面目全非。这使编辑的人哭笑不得，不知应该怎样才好。

“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茅公说。他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专制魔王，想尽办法不许人民“诽谤”，远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的如清代多次残酷的文字狱，但是到头来，灭绝的还是他们自己，人民的声音决不会绝响。

茅公翻阅着戴望舒赠送给他的一个译本《西班牙战争歌谣选》。他随便选择其中的几行，念了一遍，然后说，这些歌谣，充分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对我们反内战、争民主的广大“国统区”人民是一种极好的鼓舞。他说全世界有过光辉战斗历史的人民，无不流传着这种反抗暴政、要求解放的歌谣。我国古代的歌谣“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可以说是一个例子。现代诗人摄取这种歌谣的特点，为新诗注入新的血液，壮大人民的呼唤，比如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我国的蒲风、田间、柯仲平、艾青和马凡陀。

这次谈话以后，茅公写了一篇《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交给我。我把文章编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二期上发表。但是文稿的清样送审以后，却被涂改删削得面目全非，连“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这样的句子也被涂去。而这一句，在文内一再重复，恰恰是这篇文章的写作主旨。为了不折不扣地传播茅公的声音，我与何家槐、孔另境等商议，不得不另办一个可以不受检查的《文艺》丛刊，把这篇文章从《文艺春秋》月刊抽出，只字不易地发表在丛刊第一集以钟敬文一首小诗题名为书名的《脚印》里。丛刊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出版后，由另境送去，并说明茅公文章

的曲折遭遇。茅公在接到赠书后，写了以下一页便笺给我：

范泉先生：

为拙文被削而自费另办的《文艺》丛刊第一集《脚印》已转来谢谢。此刊从内容到形式，别具风格，务望坚持。但连“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也要涂改删削，则此刊能出几集，实难预卜也。匆此即颂日祺。

沈雁冰

十月十四日

《文艺》丛刊后来共出版七集，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因接到丛刊稿件也须送审的通知后停刊。当时茅公已在香港。他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由地下党安排，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非常秘密地离开上海的。

第四件事，是关于茅公在十二岁时写的作文为什么不能发表的原因。

在与茅公相处的日子里，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他正在自己动手，做饭炒菜。我问：“沈师母到哪里去了？”茅公回答，说她去了老家乌镇。过几天沈师母回到上海，和我闲聊时，无意中谈到她这次在老家发现了沈先生小时候的作文本。我喜出望外，向她借来阅读，还抄录了其中的几篇，想在征得茅公同意后发表。

茅公小学时写的作文，主要是文言体的论说文，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等。当时他才十二岁，但是文章写得层次分明，论据丰实，逻辑推理严密，文笔流畅，转折自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一文，说的是作者家乡青镇的茶室，因为不堪缴纳警察捐而罢市的事。文章先肯定应该缴纳警察捐，后说明茶室业小资薄，获利极微，已经承担了城镇学堂捐，再要它支付警察费，实在不胜负担。从而得出结论：“警察之抽茶捐，事出苛求”，也无怪乎“茶室之罢市不从”！肯定了茶室的罢市是被迫的正常行为。最后加上一句：更何况，警察所庇护的，是大商和富家，“则此款宜大商富家出之，又何必与小民缠绕不已哉！”这最后一句结语，好像是一面镜子，反过来照澈全文，反证了警察捐不应强加于茶室，使说理更加透彻，论断洒脱有力。

可是当我向茅公说明这些作文的特色，并征询他能否同意在刊物上发表时，他却作了全面的否定。他说小时候作文，一味迎合老师的口胃，是“骗骗老师”的。老师思想再新，总免不了带有故步自封的封建规范色彩，跳不出古文的老框框、旧模式。他说当时他摸索到一种撰写论说文的规律：先肯定，后否定，最后综合，再加添一条结语式的尾巴，引向论说主旨的最高境界。——这样写，老师一定会赞不绝口。“其实这是一种新八股！”他毫不掩饰地自我否定。

我遵照茅公的意见，不再发表他小学时写的作文（详见《茅盾的少作》一文）。

第五件事，是关于茅公写给我书信中的四件，如何失而复得的经过。

胜利复员初到上海，看望茅公的人特别多，其中有抗战八年来没有再见过面的老朋友，有在文教战线上需要业务联系的作家和教授，有向他组稿或访问的报刊编辑和记者，也有邀请他去作报告的学生和文艺青年。当时我住三楼，茅公住二楼。但是我在每天早上要去书店办公，晚上又在《文汇报》

工作，除了星期天或特定的约会，和茅公晤谈的机会不多。有时早些回来，想到茅公房间里去聊聊，可是走近房门，常常听见里面不止一人的谈笑声，我就不得不中道折回，走上三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常常写了便信，请沈师母转交。茅公的复信，有时交欧阳翠转给我，有时给他的内弟孔另境带到书店交给我。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茅公写给我的信和便条，大约有二十余件。

茅公写给我书信和便条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关于他为我编的刊物写稿的事；二是关于出版他的两部译作——丹青科的长篇小说《文凭》和《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的事；三是关于他主编的文艺报道性半月刊《文联》的文稿内容以及出版和停刊的事；四是关于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准备与夫人孔德沚一起启程以前，希望我协助他查找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并精装他的著作，以便赠送给苏联友人的事；五是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检查官，鼓励我坚持斗争的事；六是其它杂事，比如给萧红遗著《呼兰河传》写序、约我在星期天中午或晚上在他家里吃饭，等等。

我和茅公相处仅仅一年多些时间，茅公留给我的，是他谆谆不倦的真诚教导，以及他签赠给我的七部著译、一个条幅、二十多件书信和便笺，还有在付印以后留下的五万余字文稿。这些珍品我一直保存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红卫兵没收。同时被没收的，还有我在三四十年代从事编辑工作时保存的一些重要文稿和近两千件作家书简。其中有三十年代邵子南写的第一部小说集《青生》的原稿，郭沫若从日本寄给我的信和手稿《自由并不是中立》，郑振铎的手稿《耿济之先生传》，田汉在几个不同的写作环境里停停写写的剧作《琵琶行》手稿，邵力子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给国民党提出的最后谏言《柳暗花明》的手稿等。到了一九八三年的春节，接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友孔另境的长女孔海珠写到青海来的信，说上海市文化局正在查询我戴右派帽子后的下落，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十年动乱时期抄家物资时，发现有十七位作家的二十八件书信，受信人都是“范泉”，正在找我去领取。

我是多么高兴啊！这是我被没收的近两千件作家书简的一部分。

这失而复得的二十八件书简是：郭沫若一件，茅盾四件，巴金两件，叶圣陶三件，周而复两件，朱自清一件，吴晗一件，陈伯吹一件，洪深两件，陈白尘一件，戈宝权一件，王西彦一件，艾芜一件，周予同两件，袁水拍两件，靳以两件，冯宾符一件。

我终于在丢失十八年后，重新得到了茅公在四十年代写给我二十余件书信和便笺中的四件。当我重新看到茅公写给我的这些气韵淋漓的手迹时，禁不住回想起他在五十一岁上海生活时期的那种明爽秀逸的风貌，以及和他闲聊时的那种诙谐幽默的语调，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995年4月22日

茅盾的少作

—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那时茅盾才十二足岁，在乌青镇高等小学念书。这所小学，到了民国以后，改名为植材完全小学。当时茅盾的姓名叫沈德鸿。

茅公在这所小学里念书时写的两册作文簿，是在一九四六年茅盾夫人孔德沚回老家清理杂物时发现的。

一九四六年的一天上午，我看到茅公正在自己动手，做饭炒菜。我问：“沈师母到哪里去了？”茅公回答，说她去了老家乌镇。过几天沈师母回到上海，和我闲聊时，无意中谈到她这次在老家清理杂物时，发现了沈先生小时候写的作文簿。我听后感出意外，向她借来阅读，准备选抄其中的几篇，征得茅公同意后，在我编的刊物上发表。

这是两册封面上印有“文课”字样和“己酉”年记的线装本作文簿。只见于作文簿的封面、扉页和封底上，盖有八九个“沈德鸿、德鸿、雁宾”等作者姓名和字号的朱红印章。作文完全用毛笔书写，写在淡黄色的毛边纸上，写得端庄而又清秀。

两册作文簿同样大小，长约八寸，宽约五寸，共有文章三十二篇，约一万六千多字。

从三十二篇文章的题目看，如《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论》、《吴蜀论》、《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翌日月蚀文武官员例行救护说》、《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等，大部分是史论，也有一部分涉及社会、时事和科学考察内容的文章。一望而知，这三十二篇都是命题作文。

从作文的题材看，可以看出当时乌青镇高等小学的古典文学教学水平相当高，而且教师还结合教材命题作文，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从一些社会题材的作文题看，可以看到教师还能相应地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活学活用。对青镇茶室因捐罢市的事进行平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从作文的文采看，一个十二岁孩子能写出如此典雅畅达的文章，而且政治思想见解鲜明、演释推理符合逻辑，确实令人叹为观止。难怪审批作文的老师给优秀的辞语加了不少赞美的圈点，还在文章的顶上和末后，写了精辟的批语。如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的结尾处，老师写了这样的批语：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从以上评语，更可以看出，这位老师有眼有识，绝非平庸之辈。茅公的少作能有如此高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采，除了由于本人的努力学习外，是与老师的教育和点拨分不开的。

二

试以《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论》一文分析。文章一开头，就用感慨万分的惊呼形式引入主题：

“呜呼！上下隔阂，弊害中起，钱可通神，生者以死，生死之机，在长官之嗜好，此乃当今文员腐败之象也。老弱病羸，虚张声势，一旦有事，则闻风思窜，临阵退后，此乃当今武将腐败之象也。”

这里的“上下隔阂”，是指下情不能上达。“机”是关键的意思。文章以一泻千里之势，引出当今文官武将腐败的根源，是由于为官不通下情，以个人好恶为准；武将只讲排场，作威作福，一旦国家有事，则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然后又以语助词“夫”开头，进一步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文官“惟爱钱财，不判曲直”，因而不能“伸民情，弭盗贼”，以至“匪党林立”。武官“扣剥军粮，不加操练，务外观而不求实力”，因而不能“除凶暴”，“御外敌”。文官“量缺肥瘠，为价轻重，因而公卿将士，尽奔走门下”，对于那些“不肯阿附”的“杰士贤臣”，“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因而“盍国之膏，岂可屈指”。而那些谎话连篇的武官，“兵戎四起而言乎宁，数丧国威而曰小败”，明明是“劫掠良民”，却说成“讨贼大胜”。等到“敌兵临境，则又纳贿私和”，终至“倾国移祚”，“国脉尽伤”。

在反复辨析文官武将爱钱惜死的利害关系以后，文章以“总之”开始，稳步导入结论，引出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话：“文不爱钱，武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原文：“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在最后一个结束语层次中，作者以惊人丰富的历史知识，指出“宋之包孝肃（即包拯，见《宋史》卷三百一十五《包拯传》）、岳武穆（即岳飞）；唐之陆贽（字敬舆，传见《唐书》卷一百五十七）、张巡（安禄山反，他守卫睢阳，城陷被俘，从容就义，传见《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明之史可法（明末福王时，督师扬州，清兵陷城，不屈而死）、郑成功（明末桂王时，封为延平郡王，抗击清兵。旋渡海驱逐荷兰殖民军，收复台湾，并以台湾为根据地，与清王朝对峙），诚不世之人也。”文章以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为佐证，引出一句反映本文主题思想的话：“欲在文无卖官鬻爵、重赋繁役之官，武无私和敌人、临阵退后之官，而天下也可稍稍太平矣！”

这篇气势磅礴而又锱铢精审的作文，老师在文末作了这样的批语：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雄，笔锋锐利，正有五郎拔剑斫地之概。”

三

再以撰写社会题材的作文《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为例。

这篇文章，说的是作者家乡青镇的茶室，因为不堪缴纳警察捐而罢市的事。文章先肯定“警察有益之事也”，警察捐应该缴纳。接着说明茶室业小资薄，获利极微，已经承担了城镇学堂捐，再要支付警察费，实在不胜负担。“且加一捐，其茶价亦必增一倍，吾恐吸茶少而益致亏矣。”因而得出结论：“警察之抽茶捐，事出苛求”，也无怪乎“茶室之罢市不从”，岂能指责它“以私念而败公事”？完全肯定了茶室的罢市是被迫的正当行为。为了说理更加充分，最后还加上两句：“且办警察非一二千元不能，则区区茶捐何足敷用？况警察非所以卫大商及富家耶，则此款宜大商富家出之，又何必与小民缠绕不已哉！”作者既从“捐”字着眼，说明茶捐为数极微，不足以支付警察的工资于万一；又从“卫”字着眼，说明警察所庇护的，主要是大商与富家，因此这笔款项应该由大商与富家支付，何必与一些贫穷的小市民纠缠

不清呢！这最后两句结语，好像是一面镜子，反过来照澈全文，进一步反证了警察捐不应强加于茶室，使说理更加透彻，论断洒脱有力。

这篇文章，仅仅二百二十三字，却组织了两个回合的剖析，论据丰实，令人读来非常信服。

可是当我向茅公说明这些作文的特色，并征询他能否同意在我编的刊物上略加分析后发表时，他却作了全面的否定。

茅公不加思索地向我说明当时的情况。他说小时候作文，一味迎合老师的口胃，是“骗骗老师”的。老师思想再新，总免不了带有故步自封的封建规范色彩，跳不出古文的老框框、旧模式。他说当时他摸索到一种撰写论说文的规律：先肯定，后否定，最后综合，再加添一条结语口吻的尾巴，引向论说主旨的最高境界。——这样写，老师一定会赞不绝口。

“其实这是一种新八股！”他毫不掩饰地自我否定。

我当然遵照茅公的意见，仅仅抄录了几篇，不再发表这些小学时写的作文。

后来，为防止丢失，沈师母把这两册作文簿和其他的一些书籍，寄放在当地著名中医沈远孚先生家里，由他妥为保存，说明今后适当的时候来取。沈远孚先生病逝后，由他的哲嗣沈罗凡妥善保管。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沈家被定为“查抄对象”，两册作文簿也被没收，不知去向。“四人帮”垮台后，桐乡县的文教部门干部，了解到这些情况，估计可能作为“四旧”，堆放在大批“四旧书画”里。经县博物馆的干部认真查找，终于在四旧书画堆中找到了这两册线装的作文簿。

这两册作文簿，是茅公留存于世的最早的文稿和手迹。它为研究茅公小学时期的思想发展以至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茅盾与胡风

一九八一年夏，赵景深先生寄给我一篇文稿，说曾寄给杭州的《语文新圃》，孙席珍认为是新文学史料，很有价值，但与语文刊物“不大对口”，因此转寄给我，并郑重声明：“您如认为也‘不大对口’，请寄还给我。”当时我在青海师大任教，并兼编一个语文刊物。我读了他附寄的文稿，题目是《茅盾给我的两封信》，文章主要记叙了两封信的基本内容。

署名“玄”的第一封信，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说有留学东京大英文学研究院的张光人（作者按：即胡风原名），“拟以译品数种求出版地”。接着用英文开列了四种书名和作者，然后说：“因为译者目下需钱用，请兄尽力帮忙，期此数种内必有一二收购。至于译事，弟可以保证。”

署名“玄珠”的第二封信，写于同年八月八日。那是在茅盾接到赵景深同意先收购高尔基的“Bystander”一书后写的。他说“By-stander 一书，张君尚未动手译，如果北新要，则可以先译。”

文章最后说，由于北新书局因出版蒋光慈的书而被封，收购成为泡影。但从茅盾的两次来信看，证明他巨眼识人，信任青年胡风的译品，敢作担保，并热情帮助他寻找译品的出路，这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我读了这篇文章后，觉得这是一段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跟我编的语文刊物确实“不大对口”。但是我考虑再三，不愿割爱，回复作者一封信，说“可以对口，只要把焦点放在信任胡风一点上，与鲁迅先生对胡风的信任联系起来写。因为我在这个刊物里，已经辟有‘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系列特辑’，全年十二期，每期有三四篇纪念文章发表，大作改写后，可以编入特辑。”

半个月后，收到了改写后的文章《鲁迅·茅盾·胡风》，副标题仍是“茅盾给我的两封信”。文章说，看到了本刊今年第四期上李何林的《谈“神化鲁迅”问题及其他》一文，说鲁迅晚年相信胡风，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胡风在一九三三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驱逐回国以前，是日本共产党员。回国以后，他参加了革命的文艺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斗争，在“两个口号之争”期间，对革命文艺运动做过好事，有过贡献。无独有偶，在一九三三年时，茅盾早已对青年胡风十分信任，有信为证。这样赵景深就引出了茅盾写给他的两封信。

文章对了口，终于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特辑”里发表了。

1996年1月

茅盾的爱和憎

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茅盾先生住在上海。我有幸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目睹他非常简朴的日常生活，和蔼可亲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对文艺青年，他爱护备至，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基本上做到尽心尽力，有求必应。但是在政治上，面对时代的逆流，他却毫不含糊，一贯是非分明，疾恶如仇。

抗战胜利后，茅公从重庆转道广州、香港而来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六号二楼一间二十余平方米房间里。初到上海的两个月光景，差不多整天有人来看他，一批接着一批。茅公的谈锋很健，说话的声音文静而柔和，常常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叫人听着感到亲切。两个月以后，客人逐渐减少，但是来信来稿却多了起来。有不少是和他素不相识的文艺青年写来的。有的邀请他去做报告；有的提出问题，请他回答；有的寄上自己的创作，请他修改，或者读后提出意见。茅公总是有求必应，挤出时间，给他们一一回信，有时还写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接连写了好几页信笺。从一九二一年接编《小说月报》以来，对待文艺青年的来信来稿，他都是这样做的。比如，在一九三一年，沙汀的第一篇小说《在码头上》，就是在他看了以后，认为虽有印象式描绘的缺点，但写得还不错，可以发表，因而在《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再如这次回上海，他应文艺青年的邀请，作过多次报告，其中就有丁景唐、袁鹰他们组织的一个文学社团（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的邀请。他的这种为文艺青年尽心尽力服务的做法，几乎占到他三分之一的的时间。

这次茅公来到上海，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迫写了一篇《文联停刊启事》。《文联》半月刊由茅盾、叶以群主编，是我介绍给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茅公来到上海的时候，刊物已经出版了六期。创刊号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版，茅公写了《发刊词》，还发表了他写的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总结了八年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缺点，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此后，他又发表了《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等具有鲜明导向的文章。刊物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工作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方向。这使国民党内定为共产党编的刊物，非但不予登记，而且还被列为取缔对象。经国民党陶百川通知书店董事长许晓初，劝令停刊。茅公来到上海后，为了解除刊物发行人陈安镇的思想顾虑，决定出版第七期终刊号，宣布自动停刊。

刊物停刊，但是茅公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记得是在六月一个星期天，茅公和郭沫若先生一起，建议我编的文艺刊物应当如何更加紧贴现实，倡导人民的文学。我接受他俩的导向，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开辟了“文艺时论”专栏，专栏的第一辑第一篇文章就是郭老写的《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直到一九四七年冬茅公离沪去香港以前，还写了一篇《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交给我发表，说明他坚持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

从五四运动后一年，茅公接编《小说月报》后，就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开展新文艺运动。新文艺运动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茅公的初期工作，就是翻译介绍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他还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大革命工作。到了文艺大众化口号提出以后，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定论。在这经历二十多年的新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茅公一直是领导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的民族民主立场，一贯坚定，毫不

妥协。比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时，徐志摩、郑振铎他们前往欢迎，茅公却不去，因为泰戈尔不反对印度的占领者——英国帝国主义。

回忆茅公在五十至五十一岁居住上海的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他一直与时代同进步，一直坚持革命的文艺事业。为了培植新生力量，他对文艺青年无比热爱，有求必应；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他面对民主的敌人，毫不退让，疾恶如仇。我真正看到了他坚持一生的爱和憎。

记夏丐尊·叶圣陶

丐翁和叶老

丐翁和叶老，都是开明书店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和丐翁认识，是经《鲁迅全集》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的介绍，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初。

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起，在内山完造先生的推荐下，我开始翻译了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虽然在鲁迅逝世几个月后，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六十四号鲁迅先生的家里访问过许广平先生，但是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不深，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细，加上当时有关鲁迅先生的研究、考证、回忆录等参考资料发表的不多，占有材料不够，有很多地方写得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开掘鲁迅先生的思想境界也比较肤浅。但即使如此，内山先生还是推荐给我，让我翻译，认为今后给创作鲁迅传的作者多少可以作为借鉴。

一九四四年初，《鲁迅传》的译稿在经许广平先生阅读、并遵照她的书面意见作了修改以后，由黄幼雄先生介绍，连同原著一起，交给丐翁，请他对照原著，从译文上，并从原著的一些叙事方面，订正错误。当时我也同去。只见丐翁把译稿和原著略加翻阅，便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我第二次去看望丐翁。他像见到一位熟识的老朋友一般，很高兴地和我握手，招呼我：

“啊，你来了！译稿我已看过。我们开明书店今后可以出版。”

等我坐定以后，他具体地说明了这部书的优缺点：优点在于简明扼要，缺点在于有不少因为是外国人的观点，说得似乎不够恰切。然后他亲切地指出我译文的一个毛病：

“有些语句，得意译。不能完全直译。意译了，反而能够表达原作的精神。”

他随便翻阅原著，念出原文，举了几个例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指出的毛病，正是我长期来十分苦恼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从上海沦陷以后，我长期失业，开始了文字翻译工作。我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的《文章》、岛崎藤村的《断片》，过分地以忠于原著为教条，对一些含义复杂、语法结构极其繁琐的语句（有些语句甚至不符合语法规律），总觉得很难用汉语来表达得完善，事实上也的确处理得不好。经他这一指点，使我豁然开朗。此后我又翻译了朝鲜作家张赫宙的《朝鲜风景》和《黑白记》，就按照丐翁的教导，不仅突破了不少难点，而且还大大加快了翻译的进度。

拙译《鲁迅传》的出版，已经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当徐调孚先生把我的译稿和清样派人送来，并附信要我最后校读一遍时，丐翁已经病逝。但是当我打开纸包，把我的译稿一页一页地看去，赫然呈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丐翁不止一处地代我修改的手迹！这使我回想到一九四四年第二回看望丐翁时的那次教导。他指出我译文的毛病，却为了避免我丧失信心似的，没有把译稿退还给我，而是由他自己耐心细致地一一修改。这要花费丐翁的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丐翁教导我的，不仅是他的诲人不倦、扶持后辈的精神，而且还有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样一位淳厚的长者，我再也不能亲聆他的教诲了。我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终于在

译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夏丏尊先生”的几个大字，并在下面写了四行小字：

我流了感激的眼泪，翻看着留在
译稿上的夏先生的手迹。想不到
这个集子出版的时候，夏先生已
永远不再和我们见面了……

认识丐翁是在沦陷了的上海，认识叶老是在胜利后的上海。

那时我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和叶老工作的开明书店，相距不过数百步，因此常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特别是为了推荐一些新人的作品，他经常写信给我。为了约请他写稿，我也常到他书店，有时到他家里，他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编写者善秉仁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和叶老都参加了茶聚，并合影留念。一起参加茶聚并合影留念的，还有徐调孚、梅林、孔另境、臧克家、赵景深、唐弢、罗洪、朱雯等。到上海将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人，经常到星期六晚上，轮流充当东道主，每次约在跟上次不同的地点，秘密聚餐，相互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艺术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秘密聚餐的，有《中学生》编辑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编辑冯宾符，《观察》编辑储安平，《文艺复兴》编辑郑振铎、李健吾等。我是《文艺春秋》月刊的编辑，也参加了聚餐。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的聚餐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以后，只见气喘吁吁的储安平才从外面赶来，向大家打招呼：

“真对不起，我迟到了！”

接着他坐下，边吃边谈，很风趣地讲述了如何把两条国民党特务的尾巴甩掉的经过。他熟悉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带的饮食商店。他从一家饭馆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后门的弄堂两头各通一条马路。他是从另一头出来，跳上三轮车，赶到我们聚餐地点的。大家听了议论纷纷。当时坐在储安平左侧的叶老，就很冷静地分析三点：一是“特务盯梢”，肯定不自今日始，一定是早已跟踪了，可能自己还不懂得；二是他们跟踪的目的，不是要立刻动手暗害，而是要清查“同党”，等待时机，一网打尽；三是既已成为“盯梢”的目标，家庭的住处也一定被监视了，希望今晚不要回家，另找住处，而且今后最好也不要回去。

储安平听了叶老的话，再也没有回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观察》周刊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的时候，国民党特务终于下毒手，封了周刊社的门，逮捕了社里的工作人员，把已经发行出去的《观察》第五卷第十八期，从街头的报摊上没收了。一位潜逃出来的编辑悄悄地到我工作的书店来看我，告诉我被查封的经过。因为我在这一期里写了一篇歌颂解放区劳动妇女当家作主的小说《人像》，他从怀里取出两本，送给了我，还带着歉意似地说：

“稿费再不能付了。”

我非常激动：

“别这么说！——我又不是为了稿费写的。”

接着我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迟疑了一会，看看四周没有人，便小声

地告诉我说：

“跟储先生一起走，离开上海。”

原来他已经跟储安平联系上了。

事后获悉：被逮捕的那位同志，后来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而储安平却听了叶老的话，终于离开了上海，平安地到达了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城。

此后叶老也离开了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

一九五八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离开了上海，但是我没有去北京，而是来到青海的一个山沟里。二十一年过去了，在我消磨了整个壮年时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终于照耀到我的身上，使我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平反和改正。二十一年来，我总是过着挨整和被人嫉视的生活。人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一个麻风病人一样，不敢接近我。在和别人一起走路的时候，熟识的人们也总是对我视而不见，他们点头或招呼的，是和我一起走路的人，而决不包括走在他旁边的我。长期来我当基建仓库的保管员、拉运砖砂的押运员、司机招待员。一座座楼舍建成了，可是那些阶级斗争挂帅的“首长”们，总是把新建的住房分配给不搞基建的干部住，让搞基建的我一直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喇嘛寺里，和喇嘛住在一起，连喝一口水，也得从几丈深的井里，使用全身的力气吊起来，然后凭借自己的双肩，担到几丈高的崖岸上。多么艰难的生活呀，多么卑微的人生！而正是这种长期来的自卑感，统治了我的思想，使我在平反改正以后，仍然满腔踌躇，不敢也不愿把我自己的遭遇告诉别人，特别是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早已把我忘记了，我又何必去打扰他们呢”，我常常这么想。一九八一年，由于我任教的大学校长要我主编一个语文刊物，这才促使我鼓足勇气，尝试写了一封给叶老的信，询问他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同时倾诉了我多年来的遭遇。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整整三十二年过去了，叶老还能记得我吗，我有些疑虑，甚至有些忐忑不安。我在写给他的信里，一开头就提出，不知道还记得记不得我。

“我还记得您。”

叶老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句多么亲切而热情的话语呀！它温暖了我的心，鼓舞了我生命的活力！

自从我来到青海高原的二十多年来，早已和文学告别，更从来不敢存在有谁还会记得我的奢望，更不要说像叶老那样文艺界的老前辈还会记得我。叶老不仅亲笔复了我的信，而且还不顾割除胆结石后体力不济、视力极度衰退的实际困难，写了五百多字的几页长信，并安慰我：“读所叙种种，不胜叹惋，幸恶梦已过，尊怀旷达，殊为欣慰。”

这是一位深厚的长者发自肺腑的声音。

而正是在叶老的鼓舞下，我又重新走上了涂写文艺习作的文学道路。

应该说：丐翁和叶老，都是在我十分关键的时刻——在我长期失业、开始翻译遇到困难而十分苦恼的时候，在我从一个恶梦醒来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走的时候，亲切而热情地指点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思想上豁然开朗，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他们都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难忘叶圣老

我和叶圣陶先生认识，是在他胜利复员回到上海以后。当时我在一家书店工作，和他工作的开明书店相距不过数百步，因此常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特别是因为我在编《文艺春秋》月刊，总免不了经常去缠着他，要他写稿。叶老真正是一位淳厚的长者，待人处事谦和慈蔼、诚挚热情，只要我每次说出组稿的理由，他总能排除困难，有求必应。

一九四七年春，我向叶老反映：有些读者来信，问起怎样才算是一篇像样的作品，内容和形式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好。叶老就根据我的反映，写了题为《一篇像样的作品》的文章交给我，在《文艺春秋》一九四七年三月号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首先，“必须是具体的有所见”，其次，“必须语言文字顺适畅达”，这样的作品，“才可以比较像样”。这里的所谓“具体的有所见”，是指作者必须从具体的生活内涵中汲取题材，提炼主题思想。语言文字的“顺适畅达”是指表述技巧必须为广大读者所乐意接受。也就是说，一篇比较像样的作品，必须有来自生活的真知灼见，而且要用群众乐意接受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我在十三日早上见报后，考虑到他在逝世前编辑《闻一多全集》时，曾将闻先生还没有发表过的遗文，一再介绍给我，在《文艺春秋》发表，还来信表示，准备自己也写稿支持我。现在他突然病逝，我深感悲痛，决定在刊物上作出反应，表示哀悼。又考虑到叶老和朱先生既是同事，又在写作上是长期合作者，情谊深厚，由他撰写悼文最为合适。因此这天上午，我送了约稿信，又去看望叶老，说出了我这次组稿的理由，还要他当天交卷，因为《文艺春秋》的出版日期是每月十五日，而将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早已印好，正在装订，为了悼念朱自清先生，准备抢时间赶印蓝色插页，编在卷首。叶老获悉老友噩耗，心情沉痛，听了我的组稿意愿，就一口答应。当天下午，他写了两千余字的悼文《佩弦的死讯——悼朱自清先生》，在下班以前如约交给了我，还附来先生的遗墨：写给叶老的一页信。我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制版排校印刷的任务。在叶老的大力支持下，刊物终于照常于十五日如期出版。这就是为什么在朱自清先生逝世后仅仅不过两天，每期总字数多达十五万字的《文艺春秋》月刊，就已经发表了叶老悼文的原因。

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初，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危。为了互通信息，在上海的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定在每星期六晚上轮流作东，每次在不同地点聚餐，互相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聚餐的，有《中学生》月刊的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半月刊的冯宾符，《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文艺复兴》月刊的郑振铎、李健吾。我是《文艺春秋》月刊的编辑，也参加了聚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观察》被查封，工作人员两人被逮捕。不在现场的储安平幸免于难，但是再也不敢回青年会宿舍居住。大约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在参加了最后一次聚餐后，即潜离上海，前往解放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随后离沪赴港，转往北平。叶老在离沪以前，写下了在他毕生留居上海期间的最后一篇文章：《作者·读者》，交给了我，在《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的“新春随笔”专栏里发表。

解放以后，叶老在北京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领导工作，再也不

回上海，而我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一九五八年起，贬职青海整整二十年。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改正后，青海师范大学将我接到西宁任教。第二年，为了广泛培养中小学语文教学师资，要我兼编一本《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我从未编过语文刊物，不懂得应该怎样编才算是抓住编辑语文刊物的要害。经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写信给叶老，向他求教。当时我想：叶老年事已高，而且阔别三十多年，不知道他还能记得记不得我。

“我还记得您。”叶老复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而且他不顾割除胆结石后体力尚未恢复、视力极度衰退的困难，给我写了五百余字的回信，满腔热情地指点我语文刊物的编辑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提高语文教师的认识，以及“教是为了不教”的教学原理，等等。他的字写得很大，句号的圆圈不仅画得大，而且还有些歪斜，圆圈都还没有收口，足见他目力不济，在一点一划地书写这几页信纸时是多么艰难。可是他却不顾这些，在我编辑语文刊物的三年里，竟先后五次写了这样的信，亲切地教导我，希望我能有所作为，做出成绩。后来我去北京拜望他。那天，他的次子叶至诚刚巧从南京来看望父亲，是他把我从大门引进到客厅，边走边告诉我：叶老写字，仅凭感觉，凭着习惯，“想当然”地写，因此只能用钢笔或圆珠笔的硬笔头写；即使如此，他对所有来信，还一直坚持亲笔复信，不让别人代笔。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我三次出差北京，每次总是首先去拜望叶老，倾听他亲切的教导。每当我向他告别时，他总是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起立送行，站在客厅的门口，举起颤巍巍的双手，拱手作揖，直到我走出院子看不见为止。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叶老那样对晚辈如此慈蔼而谦和的长者。

一九八九年，当我最后一次在叶老家里向围着黑纱的叶老遗像和安置在鲜花丛中的叶老石膏面型行礼告别时，我的思绪万千：我从哪里再去找一位像叶老那样有求必应，不因我地位卑微而看不起我，不顾自己的体力目力极度衰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然那么真诚而亲切的关心我、教导我的前辈呢？……

“教——不教”——谈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

《叶圣老论语文教育的三封信》，引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也引起了我关于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一些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叶圣陶先生曾经当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三十年代，他开始撰写语文教育的书。四十年代，他和朱自清先生合编过《国文》课本。六十年代，在吴晗主编的《语文小丛书》里，他写了《评改两篇作文》的书，还写了《语文教育书简》。七十年代，《中国语文》发表了他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发言稿。八十年代，他写了包括语文教育在内的、内容更加广泛的教育随笔——《晴窗随笔》。

叶圣陶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三十年代合著的语文教育书籍《文心》，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阐述语文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寓丰富的思想内容于生动的形式之中，受到了当时广大中学师生和文艺青年的欢迎，可以说是我国成功地运用文艺形式来写作语文教育读物的创始。

在四十年代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里，叶圣陶先生曾经写过好几篇涉及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在题为《一篇像样的作品》里，他说：首先，“必须是具体地有所见”，其次，“必须语言文字顺适畅达”，这样的作品，“才可以比较像样”。在另一篇《作者·读者》里，他说：“没有真知灼见，徒然做一些文字游戏，算什么？自以为有真知灼见了，可是材料缺乏，表现不够，所知所见还是藏在自己心里，没法印入人家的心，空费笔墨，算什么？”这里的所谓“真知灼见”，是指内容；“表现”，是指形式。内容和形式必须浑为一体，两者不可偏废。叶圣陶先生在《评改两篇作文》一书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蕴蓄或内容，写作技能虽好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叶圣陶先生认为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的统一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作用于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的语文教育，讲究的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视角是在写作技能的培养上，但必须防止形式主义，要在传授语言文字的技能技巧时，突出阐释它是如何表达了思想内容的。

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语文教育目的的认识问题。

叶圣陶先生曾在写给我的信里说：“……最要紧的是提高语文老师的认识，学生为什么要学语文，学校里为什么要有语文课，教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见《叶圣老论语文教育的三封信》）叶圣陶先生的这一思想，早在他六十年代写的《评改 最近半年工作情况汇报 》一文中，就曾作过形象的说明。他说：

“咱们可以这样说，给学生批改，目的在使他们达到自己能够批改的地步，自己能够批改了，无论写什么都比较稳妥了。打个比方，这情形有点儿像教小孩走路，一面要留心扶着他，一面要准备放手，先是放一点儿，到末了完全放手。各科教学工作和整个教育工作都如此。总括一句话，尽心尽力地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学生真正不需要教了，这才是教学工作 and 教育工作的大成功。”

这段话的主旨，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教——不教”。“教”是行为，“不教”是指导思想，“教”是为了达到“不教”的目的。“教——不教”，我以为就是叶圣陶先生七十多年来教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

叶老论语文教育的三封信

一、教语文，要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学生启发和引导，让他们逐步提高，最后能够不依靠老师。

语文教学刊物，各地出版甚多。大多帮助教师备课，教师看了，可以去教某册某课，认为有用。这当然有用，但是其用不大。我的意思，此类刊物最要紧的是提高语文老师的认识，学生为什么要学语文，学校里为什么要有语文课，教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其次是“教”是否就是一篇一篇地讲，还是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学生启发和引导，让他们逐步提高，最后能够不依靠老师，自己练成良好的习惯，具有应用的能力。我老是希望语文刊物多注意这些方面，有时也向编辑同志说说，但是当面虽回答说“不错，不错”，而照这样办的并不多。现在您下问于我，我就把鄙意再说一次。请考虑语文刊物是否这么办。

……

叶圣陶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

范泉附记：一九八一年春，青海师大党委要我主编一个语文刊物。我从未编过语文刊物，满腔踌躇，犹豫不决。我想到了叶老。他是我的前辈，是语文专家，可以写信问问他。六月十四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叶老，叶老不顾割除胆结石后体力不济、视力极度衰退的实际困难，竟在我发信后的一个星期，给我写了将近六百字的回信，不仅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亲切地安慰了我……

二、师范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合格的教师。什么叫合格？最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教育，能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想师范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合格的教师。现任教师不尽合格，师范院校也应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渐能合格。什么叫合格？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必须懂得怎样在各科教学和各项课外活动中启发学生，引导学生，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当今社会中一个健全的分子。教师不合格，学生名为受教育，实际没有受到多少教育。合格的教师越多，真正受益的学生也越多。你们师范学院的责任真不轻呀。

语文教学研究会分不分中学小学，我以为两可，总之中小学必须兼顾，不宜割断，那是一定的。研究会总要真干些事，既研究，又试验，得出成绩，逐渐推广，大家共进。切不要挂起牌子，选出人员，一下就冷清清了。祝你们的研究会决不如此。……

前次，惠书说我的语文杂谈可称体系，我不再辩论。我只觉得我所说的大多是“想当然”，人家问我具体办法，我回答不出，这已经不止一次了。

语文教材编不好，这是编辑同志对语文教育的目的摸不准之故。教学大纲也是他们撰写的，实际是空无着落，而老师们却捧着大纲用脑力，费心思。照这样干下去，学生语文程度怎么能提高？大部分老师对语文教育也摸不准，想法各色各样。或以为目的在能练成一种本领，能架空写些弄花巧的文

篇就好。或以为能按照文件、社论、首长报告的内容和腔调写出文篇来就好。或以为要多读古代文、文言文，说读好了则写些现代文不成问题，但是古代文、文言文如何才能读好，却不大留意。至于如何听他人的话，如何好好地说自己的话，似乎这是耳朵和嘴的事，不是语文课的事，没想到“语文”这个词里头就有个“语”字在。——总之，在如此繁杂的情况中，教师想教好语文，学生想学好语文，实在不甚容易。

……

叶圣陶
十月六日上午

范泉附记：这封信写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六日。

三、“语文”里面有个“语”字。如何听他人的话，如何好好地说自己的话，正是语文教师应该教会学生的。

语文教学既有和其他工具课教学的共同规律，也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八十年代初期的语文教学课，有不少教师还侧重于“道”的传授，以致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当然，语言是思想的外壳，特别是课文中的一些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形象感染力，构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思想教育作用。但是这种思想教育，必须体现出语文课自身的特点——必须在听说读写的训练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语文”里面有个“语字”。如何听他人的话，如何好好地说自己的话，正是语文教师应该教会学生的。……

叶圣陶
八月八日下午

范泉附记：这封信写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这时，我已在教学之余，开始兼编了一个语文月刊。我把叶老六月二十二日写的信，在九月号上发表。我在“编者附记”中写到，这封信有助于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参考。

叶老的教育思想，紧紧抓住了语文课的学科特点，要求在听说读写的实践过程中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即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听说读写能力、想象能力的同时，启迪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最终能够自觉地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能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叶老的这种教育思想，必然会促进语文教学的一系列改革。因此，有系统地研究叶老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

第二辑

邂逅鲁迅先生

我在一九三三年见到了鲁迅先生。

那是我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快要毕业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跟着在大学念书的同学马华，一起到内山书店去买书。马华正在筹办一个文艺刊物。他已参加了“左联”，和鲁迅先生认识。我们在内山书店遇到了正要离店的鲁迅先生。马华一面和先生握手，一面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周树人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他穿着一件青灰色长衫，上唇蓄着浓黑而整齐的胡须，平顶头发，身材不高，脸色有些憔悴，但两眼炯炯有神，笑声爽朗，和我握着的右手虽然瘦削，却很有力。当他知道我热爱文艺，自学日文已经三年，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已经发表过几篇文章以后，就亲切地和我交谈，问我用的是什么笔名，文章是什么内容，还关照内山完造先生帮我找寻要找的书。他那对待文艺青年亲切热情、一见如故的神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四年，我曾跟着正在从事版画创作的朋友陈烟桥，一起到过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家，认识了许广平先生。鲁迅先生不在。此后我去北平学习。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的时候，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追悼会。我默默地注视着鲁迅先生的巨幅遗像，长时间地缅怀三年前和先生在内山书店邂逅的情景。听着追悼会上朱穆之的悼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正是由于他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匠心独到的艺术创造，才使我国新文学奠定了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可是，就在这个追悼会上，代表鲁迅先生家属致答辞的周作人却大唱反调。他一面在台上来回踱步，用他的右手一次次抚摸着他的光头，一面却念念有词地说，人死了，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可哀悼的。他用低沉的语调，竭力贬低鲁迅先生。从他的言语举止，使我清楚地醒悟到一个道理：鲁迅先生耗尽毕生精力所取得的战斗成果，还需要我们不懈努力，用战斗来保卫。

两次迥异的邂逅，形成正反两面完全不同的鲜明对照。

悼念耿济之先生

文艺界前辈，文学研究会干部之一，《复活》、《父与子》、《狂人日记》、《罪与罚》、《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人之一生》、《白痴》、《雷雨》、《俄罗斯浪游散记》、《玛特威的一生》的译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德列夫、杜斯妥益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的介绍者，现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长的耿匡（字济之）先生，于三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沈阳友人张国桢先生的家里，午餐以后，突患脑溢血病逝世了。

这无疑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我与耿济之先生见面的机会只有两次：一次是抗战以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偶然相遇，谈了一些关于翻译的话；一次是盛康年先生的宴会上，在红棉酒家的三楼，和耿济之先生再度见面。那时胜利初临，蛰居在上海的文化人都是满怀喜悦，想在胜利以后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些文艺工作，所以那天见面的时候，大家喜形于色，谈话滔滔不绝，但是耿先生因为先到，而且和郑振铎先生等坐在一桌，所以这一次的见面，除了点头握手以外，并不曾谈论什么。

但哪里想到，仅仅是两次见面，竟成为“初识”和“永别”。

耿济之先生现年五十岁，原籍上海市，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平俄文法律专科学校，历任赤搭领事、驻苏大使馆二等秘书、海参崴总领事等职，胜利后，随张嘉璈理事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往东北，就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长。逝世以后，沈阳方面耿先生的友好，曾于三月十六日假小西关关帝庙，举行了“耿济之先生追悼会”；上海方面，中华文协和中苏文协，于四月五日，假南京西路静安寺佛堂举行公祭。

作为耿先生友好之一的王之相先生，曾在一篇《追念耿济之先生》的文章里，描画了耿先生的个性说：

“济之先生赋性温和，处世接物，从无疾声厉色，平时沉默寡言，遇事专心致志，务求实际，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实在是天性纯厚，并非专靠修养得来。”

再说到耿先生的成功，他说完全是由于困学的精神。例如——

“有一次，他（济之先生）想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完全译出。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太严重了，他很坚决地说：‘我要勉为其难，这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很有益处，同时我国新文学正在勃兴，我多介绍一点俄国文学，或者多少有点贡献。’从此以后，他继续工作，始终不懈。”（见《沈阳日报》）

这种困学的精神、工作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便是使耿先生成为我国惟一的大宗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者。

耿济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功绩和值得称颂的治学态度，是在——

第一，身处文艺翻译的启蒙时期，他做了一个开路的先锋。那时候毫无参证的资料，全凭一己的奋斗，苦心焦虑，突破万难，终于精益求精，始终一贯地重视自己的开拓工作，使中国的文艺翻译界有了一个成功的试探，而且他的译品，充实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血和肉。这些功绩，我们是不能也无法轻易忘记的。

第二，是他翻译态度的严肃认真。他对于翻译的作品，要求自己必须有

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才着手翻译；而每有译品完成，他往往撰文将原作中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一探讨，例如《猎人日记研究》（刊《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也正是王之相先生所说的有着困学的精神。他孜孜不倦，眼见巨大的工程并不畏缩，而有始有终地不断做去。一直到三月二日以前，他仍在翻译高尔基的《玛特威的一生》和著述《华俄大字典》。据沈阳报载，他在逝世以前，曾对友好表示，将再选一二部苏联大作品翻译。这种再接再厉愈战愈勇的精神，可以作为我国新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巴金佚诗的发现经过

那是一九八九年二月下旬的事。

我接到巴老女儿李小林同志的信，要我到医院去看望她爸爸。我在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去华东医院北楼七 一室看望了巴老。

巴老伤势很重。这是因为一月二十六日晚间，他在寓所客厅里不慎摔跤负伤。年初三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是扭伤了腰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他在书房里摔伤了左腿股骨，一九八七年四月弯腰取书时，不慎摔倒，搓伤了右胸肋骨软组织。这回是第三次摔跤负伤了。经过住院后输液、服药、推拿和理疗，还不能自由活动，连转侧翻身和大小便也需要他的亲属来护理。但是他头脑却非常清楚，记忆力惊人，和我谈到四十年代我编刊物他写稿子的往事，说来如数家珍，似乎历历在目。

我这次去，是带了一九二三年四川成都出版的一本诗刊《孤吟》合订本去的。那刊物上有四首署名“佩竿”的《小诗》，据上海图书馆张伟同志推断，可能是巴老的“少作”，要我请他验证一下。当时他躺在床上，痛得不能动弹。我坐在他的床边，把刊物打开，临空提到他的面前给他看。他仔细看着，带着一丝微笑，像看到了自己青年时期初生之犊勇于闯荡而又很不成熟的形象，既高兴又腼腆地说：“是的，是我写的。‘佩竿’是我当时的笔名。”他看着刊头的出版日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思索了一会，轻声说：“那时我是十九岁。”

巴老看到这六十多年前出版的刊物，有些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招呼他的侄女，要她把他的手从被窝里提出来，让他亲自翻阅一下。他缓缓地翻着，告诉我说：“这第三期上的小诗三首，也是我写的。当时我受冰心的影响，常常写些蕴含哲理的小诗。”再翻到第一期，又说：“这首《报复》，也是。”我看了看作者署名，都是“P.K.”。我想：不是有人已经作了结论，“P.K.”是“巴金”两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是从一九二九年才开始使用的吗？连巴老自己也曾经肯定过。现在看来，“P.K.”是“佩竿”两字的英文缩写，而不是“巴金”两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我问了巴老，他在枕上点了点头。这可能也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笔名来历的表态。

说到这里，巴老托我把他的这些“少作”复印一份给他，准备寄给北京，编入全集。他还告诉我，一九二三年前后还写过一些诗，发表在当时四川出版的一些刊物上，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借助于我从这个刊物上看到的一些提示，他回忆起“五四”以来四川新诗界的创作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以《星期日》和《直觉》两个刊物为代表，是提倡抒情诗的先驱；后来以《半月》和《平民之声》为代表，鼓吹平民思想，有着明显的激进色彩；此后以《草堂》、《孤吟》和《小露》为代表，进入了抒情诗比较成熟的阶段。当时和他一起热中于诗创作的青年朋友，有张拾遗、唐苇杭、杨鉴莹、刘叔勋等。

从这次发现的八首佚诗看，《小诗》七首，有对暴虐的诅咒，有对无知的揶揄，有对母爱的歌颂，也有孤寂的独白，风格轻柔幽婉，正如巴老自己所说，比较明显地带着冰心小诗的印痕。但长诗《报复》，却是以无比愤怒的爱国主义激情，控诉了军阀赵恒惕对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的残酷杀害，是一首血泪凝成的诗，那出于作者纯真创造的粗犷而喷薄的气势，有别于那些格调轻柔幽婉的小诗。特别是这首诗前的小序，虽然寥寥数语，却已充分

反映了巴老当时的艺术观。因此我认为，《报复》是一首研究巴老早期思想和艺术创作的重要诗篇。

附：佚诗八首

报复

本年一月十七日是黄、庞二君被赵恒惕冤杀的周年纪念日。黄、庞二君被杀已有一年了，而赵氏还安稳地在湖南做省长，想起来实在令人愤怒。这首诗是在愤怒时做的，所以不像诗；但是只要能感动人，是不是诗也不要紧。

我们是量小的人，
一切过去的事都永远印在我们心上，
一刻也不能忘记呵！
我们的兄弟被冤杀了。
我们怎能忘记了么？
不！我们的心终久还在，
我们就实在不能忘记呵！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的血要为着我们的兄弟而流的；
我们的血原也是我们兄弟的血呵！
一切有良心的朋友们：
我们用什么来安慰我们被冤杀的兄弟呢？
我们用什么来对待杀我们兄弟的仇人呢？
我们的兄弟正等着呵！
呵，我们有的是“血”呵，
我们青年的热血呵！
我们快起来报复罢！
还等着什么呢？
未必要等到杀我们自己的时候么？
呵！良心在何处去了？
我们的兄弟原也是我们自己呵！
我们还是“人”呵！
我们有“人”的热血呵！
如果我们“人”的热血还没有尽冷，
这杀兄弟的仇终久是要报复的呵！
并且我们的兄弟也是为着我们全人类的利益而死的呵。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绝对不能让恶魔安静地生存着，
因为我们终久还是“人”呵！
“你该死！”这是恶魔与我们“人”的宣战书呵，
也就是我们兄弟的“死刑判决书”呵！

如果我们能承认是“人”，
我们总要起来争回“人类之光荣”罢！
我们总要与恶魔决一死战吧！
这是我们与恶魔最后的决战呵！
一切有良心的朋友们：
我们记着我们兄弟的血，
预备着我们自己的血，
来与恶魔决一死战罢。
杀兄弟的仇是必要报复的呵！

(刊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孤吟》创刊号)

小诗七首

一

一株小草正想安静着，
忽然一阵风来，
便把他吹动了。
他真是不幸呵！

二

最可怜的是我家园里的桂花呵！
一阵的秋雨，
把他打落在地上；
一阵的秋风，
又把他吹到污泥里去了。

三

夜深了，
躺在床上的病了我的我，
静听着一个蟋蟀的亲切的叫声。

四

笼中的鸟也曾高飞天空呵！
可是现在他嘲笑在空中徬徨的乌鸦了！

(以上四首，刊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孤吟》第二期)

五

没有母亲保护的小孩，
是野外任人蹂躏的荒草呵！

六

——哭侄诗之一

“四叔！”“四叔！”
从可爱的小口里叫出的这声音，
我能再听一回么？

七

这个月夜与数年前的有甚么分别呢？
但如今却只有我一个人徘徊了！

(以上三首，刊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孤吟》第三期)

范泉附记：

《报复》原署名“P.K.”。在小序中，原刊“是在愤怒做的”一句，显然丢了字，经彭新琪同志代问巴老，他说已记不起当时写的是什么字。现在我加了“时”字，成为“是在愤怒时做的”。

《小诗》前四首，原署名“佩竿”；后三首，原署名“P.K.”。

记王统照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淳厚朴直、言出必行、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老一辈文艺战士。

一九四四年冬，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时候，经开明书店黄幼雄先生介绍，看望了这位文坛前辈，向他组稿。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他还是热忱地接待了我。他非常诚恳坦率，和我谈了处身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要办好文艺刊物的种种难处。他也谈到他自己，为了避免“麻烦”，蛰居一隅，用了一些惹不起人注意的笔名，胡乱地涂写了一些，给报刊发表。但他还是答应我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一定用真名给我写稿。

第二年，他离开了上海，从青岛写信告诉我新址，并说临行仓促，没有道别，表示歉意。他仍然答应我在适当的时候，遵照我的要求，不用笔名写稿。

一九四七年夏，我终于收到了他同时寄来的两篇文章稿：《“五四”之日》和《追怀济之》，署名“王统照”，附信说，实践了他多年的诺言。第二年，一九四八年夏，又收到他的第三篇文章稿《散文诗十章》。一九四九年初，收到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稿——用历史题材写的短篇小说《狗矢浴》。

从《“五四”之日》到《狗矢浴》，使我清楚地看到王统照先生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疾恶如仇的一面。

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春秋》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的《“五四”之日》，是一篇针对现实、回忆过去，促进国统区蓬勃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力作。当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从北平开始，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爱国运动。一九四七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迅速获得工人、教师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从五月到六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统区的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高潮。正是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王统照先生在“五四”前三天，写了这篇文章。

《“五四”之日》，写了“五四”这一天青年学生们游行声讨的热烈情景。五四前一天，北大的学生代表分别到全市的大、中学校，通知明天中午十二点，集合到天安门开全市学生大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作者随着中国大学的学生，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有三五个学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卖国官僚，全场掌声雷动。有人提议游行，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质问“卖国贼×××部长”，得到全体学生“异口同音”的赞成。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东，到东交民巷西口，向各国使馆提交了请愿书，又到东单牌楼，再到赵家楼，呼喊“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举火焚烧。这时大批军警赶来，枪棒交加，强行驱散了学生群众，还抓走了一批学生。这场斗争使作者第一次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使他第一次热血沸腾，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他说：“每个在行列中的青年都是人人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把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逊毫不犹豫地搁在自己的肩头。”

赵家楼事件终于震撼了全中国。从那天起，正如作品的结语所说，“揭开了中国史的‘新’页”！

作者以满腔爱国主义的激情，回忆二十八年前的“五四”之日，正是为了要欢呼、鼓舞二十八年后的那些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青年

学生们，以五四精神为榜样，在国统区掀起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中国史的另一个“新”页！

王统照先生写作历史小说《狗矢浴》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八年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十月十一日，又公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正式开幕，通过了一部维护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伪宪法。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令封闭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撤返延安。三月十三日，急不及待地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进攻。四月，又纠集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在山东战场上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我华东解放军，解除京、沪的威胁。与此同时，又演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丑剧。十月，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遭到迫害。

但是事实刚刚和蒋介石的愿望相反：到了一九四八年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歼敌四十七万余人；淮海战役也已接近尾声，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全歼了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平津战役刚刚开始，却已解放了平津两市以外的新保安、张家口等重大据点。蒋家王朝险象毕露，已经面临覆灭的绝境。正是在这个时候，王统照先生针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针对他的那种睁眼说瞎话的独裁统治，写了一篇题为《狗矢浴》的小说，寄给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上发表。

小说一开始描绘富商李季荣归故里。当他走进家门时，遇到了一阵“旋风”，从大门内卷起，向村外窜去，只见它披着长发，全身裸露。但是家人并未见此怪物。于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为了驱除邪气，取五姓人家的狗矢，化在浴汤里，让李季洗了个澡。此后他去燕都，与子之相爷谈论理政之道。李季献计：请相爷睁眼说瞎话，故意胡说一匹白马走出门去（其实什么也没有），迫使众人不敢说非。唯有如此，才能“令出无违”，不愁“燕国的臣、民、号令，不在你掌握之内”。正说到兴头上，相爷忽然醒悟，想起庄周的一句名言：“道在溺屎。”李季听了，倏地从席上跳起，又立刻坐下，联想到自己的狗矢浴，满心会意地伸伸脖子，连连点头称道：

“是呀，道在屎——溺！道在屎——溺呀！”

这是非常明显地讽刺了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独裁统治，讽刺了他妄图迫使他的“臣民”俯首帖耳地执行他“睁眼说瞎”的呓语，预示其覆亡的结局将指日可待矣。而采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反映这类题材，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王统照先生明智的选择。他在寄稿的同时附信说：“时值残夕，唯寓意耳。”记得他在信里还说，如果喘病稍愈，准备继续给我编的刊物写几篇这类小说。

可是此后不久，全国解放，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再也无需继续写作寄寓式的历史小说了。我也因为组织抽调，从事工运工作，和他中断了通信联系。直到一九七九年，当我平反改正重新编辑刊物的时候，一位朋友把茅盾先生写给王统照先生的一页亲笔题辞（茅公写好后未及面交剑三先生）送给了我，并告诉我：王统照先生已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病逝。

写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的茅盾先生题辞，是白居易的《新乐府·青石》。在题辞的最后，写了以下一段话：

“一九五七年六月，剑三来京，出席人大会议。旋忽得病，入医院。以

书告余，谓卧病半载，近稍痊，可力疾来京，借晤故人。不意出席大会一次，喘病复发，不得不入院治疗云云，并附一小本，嘱为题数字。故人之托，何敢重违，因书白氏《新乐府·青石》如右。白氏生于封建时代，故有‘慕为人，劝事君’之言。但在今世，‘君’亦可指人民，忠于人民，事人民。则白氏此诗，正亦未可以词害意也。剑三以为何如？”

从茅公的这段话里，使我知道王统照先生（字剑三）逝世前的情况：曾长期卧病，喘病复发，一再住院。我推断，连年不能根治的哮喘一定会影响了他的心脏，终因心脏的不胜负荷而与世长辞。我年龄较小，又迫于当时的日伪环境，与王统照先生仅是一面之交，通信也不过十次左右（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中都被没收），但是他在我编刊物的时候，曾经大力支持了我；他寄给我的那四篇极有份量的文稿，特别是《“五四”之日》和《狗矢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他的为人淳厚朴直，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他对旧世界是那么疾恶如仇，而对促使新中国诞生的一切新生事物却又是如此热爱！

疾风知劲草。在时代的激流里，我终于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王统照先生。

1989年 11月

第三辑

闻一多·朱自清·吴晗

朱自清先生请吴晗先生将闻一多遗稿转给我发表时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上说：“春晗兄：送上《什么是九歌》一稿，兄可交《文艺春秋》。稿费到后，乞转交闻太太；并示知数目，为感！即颂日祺！”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在这页信纸的左侧，吴晗写了以下几句：“范泉兄：奉上一多遗稿一份，乞即刊载为感。揣此敬颂编安。”时间是在三天后的六月二十八日。我查看了《文艺春秋》月刊发表《什么是九歌》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五卷第二期上，因此书简的书写年份，肯定是在一九四七年。

在此以前，即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施蛰存转给我闻一多遗稿《歌与诗》一篇，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四卷第四期上。遗稿是由吴晗交给施蛰存的。他们是同事。

施蛰存曾在抗战爆发后的昆明云南大学任教。吴晗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教授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聘请吴晗任该校文学系教授，因此他和施蛰存在云南大学同事。而当吴晗就读于清华大学时，朱自清已是该校文学系主任。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吴晗以优异成绩留校任职，初为历史系助教，一年后晋升为讲师。从一九四一年起，吴晗又离开云南大学，回到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胜利复员后，他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乃至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朱自清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同事。

早在“五四”时期，朱自清已开始创作新诗和散文。一九二五年，他去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三十年代初留学英伦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比朱自清年轻一岁的闻一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从一九一九年起，开始新诗创作，并曾用新的方法探索中国诗歌的格律。赴美学习绘画艺术回国后，一度从事艺术教育和文学编辑，最终转向中国文学的研究。一九三二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文学系教授后，全力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因此他与朱自清既是同校同事，又是同样以新诗创作登上“五四”时期的文坛，然后又先后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志同道合者。他俩经常促膝谈心，有着共同的语言，交往非常密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蒋介石在策划内战的同时，对爱国进步人士也加紧镇压。在昆明，先是发生“一二·一”惨案，接着李公朴被暗杀。特务公开扬言以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面对房前屋后遍布特务的状况，闻一多毫无惧色，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召开的“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就在这天下午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归途中，他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终年四十七岁。

一九四六年六月，为了随学校复员迁回北平，朱自清来到成都自己的家，准备安排家属一起北上。当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来时，他悲愤万分，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想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他不顾有被特务伤害的可能，毅然出席，报告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向国民党提出严正的抗议。

那年十月，朱自清举家迁回北平。十一月，由他倡议，整理出版《闻一多全集》。他担任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经过整整一年时

间，他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目录，还将没有发表过的遗文交给一些进步刊物发表，取得稿酬，资助作者家属。

由施蛰存转给我的《歌与诗》一篇，写的是有关歌与诗的区别和合流。作者认为歌与诗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歌起源于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声音，是抒情的；诗则是记事的，在散文未成形以前，诗就是史。后来散文产生了，诗与歌才开始合流，融二为一。

由吴晗直接寄给我的《什么是九歌》一篇，写的是“神话的九歌”如何演化到“楚辞的九歌”，以及有关九歌的内容、用途乃至体裁格式的考释。传说中的九歌，原是“天乐”，被夏后启偷到人间，使九歌韶舞成为夏人的盛乐。乐舞的内容很猥亵。不论是神话中带猥亵性的九歌、或是经典中带教诲式的《元首歌》，只要是“三章章三句”（九句），都可称“九歌”。但是到了战国，随着文化的发展，文体篇幅不断扩充，九句的九歌，膨胀成九章的九歌。甚至发展到将十一章如《东皇太一》，也称为九歌。这是因为《东皇太一》这首迎神曲，从宗教观的角度看，首尾二章是迎神送神曲，是祭歌的主体；其他九章，是祭歌的插曲，起点缀、烘托、渲染的作用，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但是从艺术观点看，这中间的九章，倒是十一章中真正的精华。

《楚辞》的编者把十一章统称为九歌，正是立足于艺术观点的考察，是为了突出具有艺术价值的核心部分，这才可以说是九歌的真正主体。作者引经据典，以诗人本色，从艺术的心理经验中深入探索，拓展了九歌研究的新的境界。

从一九三二年起，闻一多全力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上溯到乐府、庄子、楚辞、诗经、易经、乃至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和民俗学。在十三四年间，他写出了许多具有独特见地的著作。仅仅在《闻一多全集》以外的手稿，还有数百万字之多，有待进一步整理和出版。

为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完成《闻一多全集》整理出版任务的朱自清，迁回北平后，因受胃病影响，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过去，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最后几年，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不得不让夫人陈竹隐带孩子到物价比较便宜的成都去，留下他一个人，在昆明的孤陋环境里生活。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他总是披着一件从街上买来的赶马人用的毡披风，从乡下进城去上课。每次要走很多的路。他不仅饮食极不正常，而且营养不良，身体日益憔悴，得了严重的胃病，时发时止。回到北平后，胃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密，而且每发必凶。虽然知道这是十二指肠溃疡，但是因为忙于工作，而一再推迟了去医院开刀的时间。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早上四时，觉得胃部剧痛，送北大医院，已不能动弹。下午二时开刀，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发现有肾脏炎并发症，情况十分严重，延至八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逝世，享年五十一岁。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他亲自编定、写了序文和编后记的《闻一多全集》，在他逝世以前一个月出版了。他亲眼目睹了这部书的出版。

我和朱自清先生是因为发表闻一多遗文而直接通过两次信，曾经约请他为我编的刊物写稿。他回信表示同意。但是后来，他忙于赶编（与叶圣陶先生合编的）国文课本，加上胃病变本加厉，以致未能如愿。为了感谢他对《文艺春秋》的支持，我在他逝世的第二天，约请叶圣老写了一篇悼文《佩弦的死讯——悼朱自清先生》，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同时还影印发表了他用墨笔手写给叶老的两百余字书简一通。

和朱自清先生一起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吴晗先生，在我一九三四年去北平

念书时，曾经为了向图书馆借书，经友人介绍，和他见面多次。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留校当助教。他为人豪爽，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四七年秋，为了发表闻一多遗文，他开始与我通信。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北京市副市长。虽然繁忙的公务羁身，但是为了一套抗美援朝丛书的出版，他仍亲笔给我复信，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文革”期间，我在青海蒙难，与外界隔绝，不知道他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已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含恨死去，家破人亡。

三位文坛前辈闻一多、朱自清和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和坚强的民主斗士。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惧风雨，不畏强暴，有着经狂飙而仍挺立、迎暴雨而仍含笑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是我辈年轻一代毕生学习不尽的楷模！

1995年10月5日

偃蹇苍松惯傲霜——记许杰一生的文学活动

与世纪同龄的许杰，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逝世时，是国内仅存的三位文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另外两位是；北京的谢婉莹（冰心）和贵州的蹇先艾。

由于出身贫寒和进步文艺的影响，许杰的思想一贯左倾。他一直追求进步，勤奋创作。曾经受到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长期迫害，生活极不安定。全国解放后，他曾按照党的指示，真心实意地帮助党整风。哪里知道，扩大了的反右运动，竟把思想一贯左倾的他，错划为右派，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经历了二十一年的折磨。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时，他又不计前愆，为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呐喊，而且最终在86岁时，重新加入了他二十七岁时曾经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

许杰一生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我国许多老一辈进步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缩影。

一 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

许杰出生在浙江天台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先是店员，后来成为肩挑小贩。为了不让孩子做“睁眼瞎”，才把许杰送进私塾念书，后从小学而考入中学。不久母亲去世，全家陷于困顿，迫使才上一个多月中学的许杰，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十七岁时，考进了半官费的师范学校，依靠借贷和亲友支助才得以入学。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四”运动爆发，他接触到宣传科学民主新思想的报刊，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与同学蒋径三等一起，宣传抵制日货、拒绝二十一条、反对卖国政府，并提倡教育改革，要求废除不合理考试制度，终被学校以“聚众闹事，干预学校行政”的罪名，与蒋径三等六名同学一起被开除。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接到已经转入绍兴第五师范念书的蒋径三的通知后，许杰徒步来到绍兴，进入五师继续求学。

入学不久，许杰与同学蒋径三、何竞业等发起组织“龙山学会”，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又与何竞业、郑文炳等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文学社团“微光社”，并在一九二二年元旦，借绍兴《越铎日报》的副刊地位，创刊了《微光》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以“全体同人”署名的《宣言》，表白了“为人生”的文学观。许杰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爸爸》，就在创刊号上发表。

《微光》共出版二十一期，许杰亲自编辑约十期，发表了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导等十四篇。

在编辑《微光》副刊的同时，许杰还与许钦文等十六人组织了“艺文社”，以研究文学、哲学、艺术为宗旨，社址设在许钦文的工作地点江苏省浦镇，但实际活动不多，并未编印过刊物。

那年夏天，许杰在五师毕业，回到天台，到台州霞城小学教书。九月，与王以仁等组织了以改造小学教育为目的的“星星社”，由许杰起草《星星社宣言》，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十月下旬，应张任天的邀请，辞去霞城小学教职，来到上海，任安徽公学师范部教师。十二月，创作了短篇小说《秘密》，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被改题为《游戏》后刊出。一九二三年夏，短篇小说《祈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一九二四年，为筹办文艺刊物，许杰与蒋径三、张任天等组织知社，出

版《知》半月刊。刊物由许杰一个人编辑、校对，并送民智书局寄售。朱自清曾在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过文章。那年秋天，许杰的短篇小说《惨雾》，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八号发表。小说反映浙东农村玉湖与环溪的农民，为了争夺河水灌溉，而发生的一场械斗，导致不少农民惨死。这是一篇三万字的小说。它把激烈残酷的械斗和缱绻伤愁的闺房生活交织起来，展示了特殊的层次和情调，并将众多人物勾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最后以感伤的尾声烘托出整个故事的惨痛结局，撼人至深。茅盾在30年代把它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他认为小说“结构整密”、“气魄雄壮”，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见《导言》）

许杰的《惨雾》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以后，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萌生了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这一年，他接二连三地创作了十多篇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

他经郑振铎介绍，加入了全国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他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二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和张任天的接近，许杰曾经一度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他的一些小说如《纪念碑的奠礼》中反映出来。由于和王以仁的关系，许杰经常去创造社出版部，开始和创造社同人有了接触。在创作思想上，也受到创造社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而终于创作出《醉人的湖风》、《萤光的灵隐》、《火山口》和《黑影》等反映城市流浪青年的苦闷、热情和感伤的短篇小说，明显带有颓废色彩的浪漫主义倾向。所以茅盾说：许杰创作的“题材是两方面的，他的作风也有两个面孔”。（见《导言》）

一九二五年七月，许杰经朋友介绍，去宁波四中任教，同事有夏丏尊、方光焘等。年底，因为校长经亨颐被省议会中的顽固势力排挤出四中，许杰便离校，转任上海中华学艺大学的图书馆资料员，并在江湾立达学园兼教国文课。

一九二六年十月，与戴介民（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参加《华侨努力周报》编辑工作。三个月后停刊。年底，北伐军光复浙江，他回天台。一九二七年三月，被新政府任命为台州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并接受戴介民邀请，兼任台州六中小学部主任。

许杰在台州，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原来北伐前夕，许杰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飞跃。在新华艺术大学讲文学课时，讲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他写的讲义，后来以《明日的文学》为书名，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由现代书局出版。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提倡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之一。因此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这一时期，虽然他受创造社作品的思想影响，写了一些以城市流浪青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小说，但是他写作的核心部分，仍然是农村生活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在一九二五年的《小说月报》上，除了一月号发表《醉人的湖风》外，二、三、六、十二月号接连发表了《台下的喜剧》、《菜芽与小牛》、《小草》、《隐匿》等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而十二月份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短篇小说《赌徒吉顺》，更是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在文学

作品中描写农村“典妻”的陋习，比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的发表还要早五年。这篇小说，也被茅盾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一九二六年，虽然他的生活极不安定，但是他仍勤奋创作，写了短篇小说《暮春》、《白日的梦》、《堕落》、《末路》、《纪念碑的奠礼》、《督办署的候差员》、《梦中》、《和平》等十个短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惨雾》，在一九二六年十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七年一月，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暮春》，由光华书局出版。

三 培植了一批马华作家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由许杰任校长的文明小学前校长，诬告许杰藏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许杰被逮捕，被押解到海门（今椒江市），在省防军司令部关押近一个月。保释后来到上海，失业，由地下党支持每月生活费，赁屋后为党作联络工作。此后受党的派遣，以张士仁（字子三）的化名，任泉漳中学语文教师，与学者李平心等同事，同属一个党支部。十月十九日，中国济难会为筹备出版刊物《人道》，以王望平和许杰的名义，宴请文化界知名人士鲁迅、郁达夫等组稿。这是许杰和鲁迅唯一的一次会面。一九二八年初，又受地下党派遣，任浙江海宁中学教师兼教导主任，与林淡秋等共事。当时作家柔石任海宁县教育局局长，并在海宁中学兼课。学校是地下党的活动基地。五月，由于地下党县委领导的亭旁乡农民暴动失败，领导暴动的同志被捕，宁海中学解散，许杰潜回上海。

七月，由于白色恐怖和生活困难，经老友张任天介绍并经办，许杰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取得地下党同意后，前往在马来半岛吉隆坡出版的《益群日报》工作。在办理出国护照和订购船票时，认识了同去吉隆坡工作的湖南籍姑娘何显文。他们一起搭轮前往新加坡，转乘火车到达吉隆坡。后来何显文成为许杰的夫人。

在吉隆坡，何显文任坤城女校教师，许杰任《益群日报》总编辑，主编第一版要闻，每天写社论一篇，并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文艺副刊《枯岛》，每周一期。副刊取名《枯岛》，是因为“人间是一座枯岛，我们须用文艺的锄头去开垦它。”（见许杰写的《枯岛》发刊辞：《枯岛题辞》）

许杰在吉隆坡的文学活动，除继续创作小说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枯岛》文艺周刊的编辑上，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和编后记（题《尾巴的尾巴》）。

许杰在《枯岛题辞》中说出了这个副刊的组稿要求：

我们所要求的是对于下层社会的同情，和对于上层建筑的反抗。

他还呼吁南洋各报的文艺副刊，共同来做文学革命工作。他说：

革命文学是因着革命潮流在澎湃的激进中，而且已经因了世界的革命的趋向，已经有些趋向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条路上了。但是在南洋，我们文艺青年，却还滞留在恋爱文学的境域里而没进步，这不是很可惜的吗？（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尾巴的尾巴》）

许杰编辑《枯岛》的态度是非常左倾和激烈的。他希望《枯岛》的出版，成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的大本营”。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远在吉礁的朋友，远在星洲的朋友，檳城的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小小《枯岛》工作着了。”（《尾巴的尾巴》）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由于一再受到英国殖民当局华民政务司的警告和威胁，许杰被迫辞去了总编辑职务，与已经是他妻子的何显文一起，离开吉隆坡，经新加坡回国。

许杰在他主编的五十九期《枯岛》上，选刊了小说三十六篇，散文三十三篇，还有其它诗歌杂感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反映了穷人的苦难和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抨击，基本上符合许杰提倡的革命文学的要求。例如昂丁的小说《阿茂》，写的是穷苦人阿茂来南洋当苦力，吃尽了千辛万苦，在病中仍被雇主勒令劳动，又因工伤而终被解雇。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南洋资本家欺诈压迫穷苦工人的社会现实。再如散文作品云颜的《馈礼》，写一位工头必须在佳节赠送礼品给上司，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但他又不愿剥削工友，榨取钱财，因此长期陷入左右为难、极度痛苦的境地，充分揭露了殖民地社会坏人当道好人遭殃的黑暗面。

许杰在南洋的突出贡献，是传播了“五四”新文学，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促进了南洋色彩的文学和新兴文学的诞生和成长，发掘了不少有前途的青年写作者，为新马文学史谱写了极为重要的一页。

在南洋时期，许杰写了短篇小说《七十六岁的祥福》、《锡矿场》、《到家》、《剿匪》，中篇小说《马戏班》。其中《锡矿场》一篇，揭露了殖民地社会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篇《马戏班》，是撷取南洋华工向帝国主义抗争的题材，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

一九二八年九月，短篇小说集《子卿先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二九年六月，短篇小说集《剿匪》，由上海明日书店出版。八月，中篇小说《马戏班》，由朝阳社出版。

四 开展东南文艺运动

回到上海后，在一九三一年初，经友人介绍，许杰去建国中学任教，并立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他的家，又成为党的秘密活动场地。

三月，“左联”成立。经王任叔介绍，许杰参加了“左联”，并开始以南洋见闻为题材的系列散文《南洋漫记》。六月，因为他的文章在左翼刊物上发表，引起身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建国中学校长陈德征的注意。他通过介绍人向许杰提出警告。这使许杰在学期结束时，不得不被迫提出辞职。那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派人到上海延聘教师。经老友蒋径三介绍，应聘为中山大学现代文学教师，并匆匆前往广州。因事先未向党组织汇报，到广州后，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从此脱党。

在大学任教后的五年间，许杰潜心编写讲义，不写小说。

许杰经中山大学、安徽大学，而最后于一九三五年夏天，在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他与周予同一起，买下了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新民村二十四号一幢石库门房，两家合租。定居以后，许杰重新执笔创作，发表了《督学下乡》、《旅途》、《贼》、《晚饭》等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写了《冬夜》、《冬日》、《放水田》、《公路上的神旗》、《寿平》等短篇小说。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暨南大学停办，许杰在郑振铎

帮助下全家撤离。此后他历任天台大公中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暨南大学教职和《前线日报》编辑，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仍住在马当路的旧宅里。

八年抗战期间，为了宣传抗战，他创作了话剧《东亚新秩序》、《精神总动员》，供剧团演出。一九四二年十月，创作了中篇小说《看〈的笃戏〉去》；一九四三年一月，写了短篇小说《一个小小的别扭》。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教务长任期内，许杰有鉴于日寇进犯湘桂后，与文化中心的大西南交通中断，东南地区的文化相对萧条，便首先提出倡议，开展东南文艺运动。他接连发表了《关于开展东南文艺运动》、《东南文坛和东南文艺》、《从东南文坛现状说到东南文艺运动的前途》、《关于东南文艺》等文章，号召东南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们联合起来，集中反映本地区人民的生活，为抗日战争服务。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关于东南文艺运动的初步计划》，提出了具体设想和措施，不少报纸副刊积极响应，出版了“文艺专刊”、“文艺周刊”和“文艺半月刊”等扩大版，闽、浙、赣、皖等东南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撰文支持，刊载了文艺创作数百篇，使萧条的东南文艺出现了新气象。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为了引导东南文艺进一步繁荣，许杰发表了《半年来的东南文艺运动》，对运动作了总结评述，并倡议将东南多家报纸副刊联合起来编发专栏《东南文艺》，版面和内容保持相对一致，客观上形成一个大型期刊的组合，进一步促进作家们的写作积极性。后来因为抗战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而终止。

一九四五年九月，许杰由前线日报社派遣，来到上海，接收日伪报社《新申报》的房产和印刷器材，出版《前线日报》。又按总编宦乡的意见，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组成副刊班子，编辑报纸的各种周刊。

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海临时大学成立，许杰辞去《前线日报》编务，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了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欢迎新近来沪的许杰等十位会员的集会。许杰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明他抗战时期发起东南文艺运动的经过，最后又指出了今天文艺的战斗任务。他像宣誓一般地说：“我们该替老百姓发表意见，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冲破黑暗。眼前的责任重大。”（赵景深：《记一个作家集会》，载《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五月，经沈志远介绍，许杰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五 冲破黑暗，迎接光明

一九四六年夏天，经叶圣陶介绍，我和许杰开始了交往。

我经常到马当路许杰的家里去闲聊。有一次，他的夫人何显文，特地准备了几个菜，买了白酒，邀请我吃饭。我们谈得很多，谈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裙带风、发国难财、反共打内战，更谈了知识分子生活如何艰苦、如何处处碰壁，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受当官的欺压勒索，无处申冤，有些事说出来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他最后归根结蒂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文艺作品，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一定要冲破这黑暗的人吃人的世界！”

“冲破黑暗”，迎接光明，替老百姓说话，许杰在解放战争时期，旗帜鲜明地一直在国统区借用文艺作品这个载体，实践了他的诺言。

别的不说，仅以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和《文艺》丛刊说，从一九四

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即从胜利后复员来上海直到上海解放前两个月这段解放战争时期，许杰用小说、论文、随笔等文艺形式，先后发表了作品十七篇，其中为老百姓说话、色彩特别鲜明的，是四个短篇小说，即《逃兵》、《宿营》、《沉闷的灵魂》和《在钱行的席面上》。

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文艺春秋》三卷一期上的短篇小说《逃兵》，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滕有库，在日寇投降后，再不愿为残杀自己人而卖命，逃回老家，在寡母身边仅仅住了一夜，又因为国民党乡公所来抓兵而再度逃亡的故事。发表在同年九月十五日《文艺春秋》三卷三期上的短篇小说《宿营》，写的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连长，不仅克扣粮饷，还利用全连新兵，挑运山货，走私贩卖，为他赚钱，而对待这些新抓来的壮丁，他却棍棒交加，任意枪杀，逼得连押运他们的老兵也被迫开了小差。两篇小说都是反内战的题材，揭露国民党与人民为敌，为被压迫的广大农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文艺春秋》五卷二期上的短篇小说《沉闷的灵魂》，是写一位教了二十年书的知识分子赵文新，在经历八年抗战、两年内战后，被迫失业，一家四口的生活无法维持，想写文稿谋生，模棱两可的不愿写，揭露现实的又不许写，尽看着摊在面前的一张纸发愣，无法落笔，充分反映了有着正义感的国统区知识分子被迫走上穷途末路的悲哀。

一九四九年一月，当解放大军即将横渡长江、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的不少民族资本家，居然听信国民党的宣传，害怕共产共妻，而纷纷带着“资本”和妻妾，逃往香港或国外。正在这个时候，许杰却大喝一声，写了短篇小说《在钱行的席面上》，劝告他们不要轻信流言蜚语，留在上海，安心等待解放。这篇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春秋》八卷二期上发表的小说，是写兴华百货店老板张文卷，害怕共产党来了真的共产共妻，便邀请几位朋友，在家设宴，想在欢送他的同乡——大安袜厂老板先走一步的筵席上，听听大家的议论，再决定行止。他在听了自己的本家、一位思想进步的中学教师张隐民介绍了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一番谈话后，终于打消了他准备抽走资本、逃离上海的主意。这篇有的放矢的小说，大胆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这在当时谣诼纷纭、一片动乱的上海，确实起到了澄清认识、稳定人心的作用。

仅从以上四篇小说看，就可以看出：许杰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旗帜鲜明地运用文艺这个载体，为反内战、争民主，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说了许多老百姓想说而还不敢直说的心里话。面对着春天即将到来的新的现实，他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正如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发表的“新春随笔”的结尾所说：“我希望把我自己的这一点微细的生命的力，投入这人民的力量的大海之中。”（见《文艺春秋》八卷一期，题为《面对着新的现实》）

在解放战争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短篇外，许杰还写了《胜利以后》、《来客》和《梦的埋葬》等短篇小说，出版了《许杰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短篇小说集《别扭集》（开明书店）和短篇小说集《胜利以后》（黄河出版社）。由我为中原书局组稿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虽然在这时已经排版打成纸型，但到解放初才出版。

六 经历了二十一年的折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

上海的各种报刊纷纷向许杰组稿。许杰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应复旦大学（院系调整时转往华东师范大学）聘请，任中文系教授。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理事，华东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民盟华东师大主任委员。人民给予的荣誉像雪片一般飞来。

一九五六年冬，许杰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集《铸炼集》的《后记》中说：“我的心不死，我还想拿起笔来，在这从来未有的时代中，跟着年轻的年老的文艺战士，为我们从来未有的人民的文学事业，添上一点极微薄的力量。”

一九五七年三月初，许杰应邀去北京，出席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荣幸地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会后，毛主席还走到代表们中间，在见到许杰时，紧紧地握手，并大声说：“久仰、久仰，你原来就是那个写小说的许杰；喔，还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学家许杰。欢迎你们民主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许杰亲耳聆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感到无上的光荣。他满怀喜悦，回校后，立即召开中文系和民盟华东师大支部会，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真心实意地鸣放，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接着，许杰毫不顾虑地带头贴出了中文系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主要是：高校是传授知识的领域，外行不应领导内行；有些党的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群众之间堵着一座墙，我们应该去拆除它。五月九日，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墙是怎样形成的》。

哪里知道，过不多久，竟是天旋地转，把一贯“左倾”的许杰，抛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从六月下旬开始，华东师大中文系、民盟华东师大支部乃至全校，召开了批判许杰“右派”言论大会，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七月十八、二十三、二十六日，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厅里，接受文艺界群众的反复批判。许杰真的吓懵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一个站在右派立场上与人民为敌的“我”。他不能再有其它选择，只得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作自我检查，接受批判，低头认罪。

六月二十六日，华东师大正式宣布了一批右派分子首脑人物，许杰名列前茅，是头号右派。

许杰感到委屈和震惊。

八月下旬，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许杰写了书面检查：“我在人民面前低头认罪”。

被错划为右派后，许杰的教授职称被取消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被撤销了，他被责令在校内从事清扫劳动，工资降三级，从三百元减到一百五十元，全家被赶出了独立的有楼小洋房，搬到田字形四间一套的小平房里。到一九五八年初，他被调往图书馆整理卡片。九月，和上海市文化界被错划为右派的四十多位市级大右派一起，到市郊颞桥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又随大右派们到嘉定外冈社会主义学院劳动、学习。半年以后，由于许杰劳动积极，

表现突出，终于在一九六一年由学校宣布，第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六三年，从图书馆调回中文系，帮助青年教师批改作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初夏，许杰首先被揪斗、抄家，门前贴满大字报。先后被抄家七次。再一次扫地出门，从田字形四间一套的平房，被勒令搬迁到由琴房改建的、没有厨房厕所的单间平房。工资降到每月仅拿六十元生活费。八月四日，在操场大型批斗会上，和全校“牛鬼蛇神”一起，跪地数小时。又被隔离审查数十天。审查结束后，在校内劳动。一九七五年初，驻校工宣队勒令他退休。直到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才得到纠正：调回中文系，恢复教授职称和二级教授待遇，搬到三间一套有厨房厕所的楼房套间居住。

一场噩梦，整整折腾了二十一年！

七 不顾安危地接济难友

许杰被错划为右派后，工资两度被割，当然生活困难。但是他心地善良，从自己的困顿设身处地体谅人家的困顿，因而能真诚地关心同样遭受不幸的朋友和同事，毫不顾虑个人安危，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粮悄悄地去接济他们。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路永明，虽未鸣放，也未贴大字报，未向学校领导提过意见，却被凑数划为右派，下放校印刷厂当校对。一次“毛泽东”三字中的一个错字没有校出，立刻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逮捕。清查了两年以后，认为是工作失误而释放回家时，竟被告知他已被开除了公职。全家六口，仅靠妻子四十二元月薪维持生活，只能天天用酱油汤淘饭。饥饿的孩子们常去荒地摘野菜，到菜场拾些人家丢弃的烂菜皮。知道了这些情况后的许杰，出于友爱和同情，压缩了自己已经是十分困难的生活费用，悄悄地每月给他们二十元，从一九七一年七月起，一直给到一九七二年九月路永明得到在学校医务室当勤杂工的工作为止，整整给了两年零两个月，至今谁也不知道。

三十年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掌握日、俄、英等多国语文的费明君，翻译过《为什么》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等书局出版，曾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我在一九四六年和他认识。他曾为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翻译过几篇苏联的文艺作品。比如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翻译专号上，他翻译了苏联高尔基早期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书》。他在译文前写了这样一段介绍：

这是属于高尔基初期发表的作品之一，形式虽短，但正如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菲特尔·卞里宁所说的一般：在艺术上的成就，却比后期的作品更为杰出。本篇的故事很是简单，但含有幽默性，确是一篇能使人感动的优美的短篇小说。

再看译者对这篇作品中涉及的四个人名、地名的注释：

(1)史本修(E·Spenser 1552~1599)：英国诗人，所著《仙女王》为英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2)佐可夫斯基(V·Zhukovsky 1783~1852)：纯正的浪漫派诗人，作品不多，功在

翻译英德各国诗歌到俄国,以打破俄国当时专尚法文的风气。(3)莱蒙托夫(M Lermontoff 1814~1841):俄国诗人兼作家,代表作《当代英雄》已有中译本,北新版。(4)杜尔盖斯克州:瑞士的州名。

仅从译者所写的以上介绍和注释看,可以看出费明君对苏、俄文学的造诣之深和对世界文学史知识的掌握程度。难怪五十年代初,在费明君调到华东师大任中文系教授时,许杰非常高兴,在听了他的一堂课后,赞不绝口:“你这么年轻却才学出众,果然名不虚传啊!”从此,他俩成为莫逆之交。

可是一九五五年,费明君陷入胡风冤案。那年六月八日晚,费明君全家正在吃饭,突然闯进几个人,把他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费太太要养活六个子女,而且还怀着孩子,家无积蓄,立即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许杰知道后,坐立不安,到处探询,毫无结果。为了安顿费明君一家七口的生活,他冒着与“反革命胡风分子”划不清界线的罪名,拿出自己仅有的二千元积蓄,送给费太太,名义上是作为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

此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了费明君的案件后,认为没有问题,通知学校去青海领回。但是学校又罗织一些罪名,判费明君七年徒刑。一九七三年,费明君终于在青海牧区的德林哈劳改农场,身心交瘁而死。

直到一九八一年,我从青海来上海看望许杰时,他还谈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费明君的遭遇。他说费明君的冤案已经昭雪,但是学有专长年富力强的费明君,正可以为祖国多作贡献的时候,却被剥夺了生命,这是国家财富的毁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不胜唏嘘叹息,要我回到青海时,打听费明君在劳改农场是怎样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

我回青海后,多方面辗转探询,找不到当时和他一起劳改而又平反的难友。柯灵也曾托我探询阿湛的尸骨埋在哪里。阿湛也是我在四十年代就已经认识的青年作家。他给我编的刊物发表了《贵戚》、《酒席上的谎言》、《梁姑》等好几个短篇小说,很有才气。反右时他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青海的劳改农场后死去。我也遍询毫无结果。后来遇到一位在当时劳改农场工作过的陕西干部,据他说,阿湛是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被人揭发后整死的。当时有人死了,就埋在雪地里。冻土硬得像石头一样,挖不下,实际上等于埋在雪层底下。等天气转暖,雪层融化,尸体暴露时,狼群就来撕咬吞吃了。因此要问谁埋在哪里,那是无法回答的。

八 偃蹇苍松惯傲霜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开始的八年间,许杰写了八十三篇文章,包括论文、散文、诗歌、慰问信、报告、书评、访问记,还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创作了解放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短篇小说《王老板》,发表在《小说》月刊上。

从一九七八年六月起,许杰交了二十年的“白卷”后,重新恢复学术活动,开始写文章,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病逝为止,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写了文学评论、感怀诗词、文艺讲话、序跋文章,以及长篇回忆录一百一十五篇,不再创作小说。那篇写他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长篇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从一九八三年一月开始,在《新文学史料》季刊上连载,

一直写到一九八七年八月，写完了他半生的记录。解放以后的后半生没有写。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许杰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八年三月转正。

在错案得到纠正以后，许杰对党的认识逐步有了提高，从失望、观望而又衷心地热爱党、相信党，而至于寄无限希望于党。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从青海调回上海、知道我早已恢复党籍以后，和我多次谈论到党。他说党能正视自己的失误，并勇于纠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任何政党都不会这样做。这也正是党的伟大之处。他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这个除台湾以外已经由她完全统一起来的、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国家，建设得既富裕又强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毫无愧色。因此他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仍然要在耄耋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呐喊。

在一九八八年秋季的一次谈话中，许杰在回答我“为什么长篇回忆录不再续写解放后的经历”时，他最初是说，因为解放后只写了一个短篇，不再创作小说，没什么可写的。这当然是他表面敷衍的说法。后来谈得深了，他终于暴露了自己真实的思想。他说：

“说真的，解放后的事，很难落笔。怎么写呢？要说过去那可怕的二十年的阴影在头脑里不再出现，那也是不现实的。那可怕的二十年，受尽了精神的折磨、人格的侮辱，怎么写呢？”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次，在他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还没有错划为右派时，他想向学校主要领导反映自己的思想活动，哪里知道，刚敲开房门，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这位领导竟怒目吆喝：“滚！同你这种人还说什么！快给我滚出去！”还有一次，一位工宣队的老师傅约他谈话，睥睨地看着他，带着厌恶的口吻对他说：“老家伙！快去打个退休报告来，拿点退休工资，吃到死算了！”他被当作“废品”一样看待。他说：“一个人肉体上的折磨还可以忍受，最怕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人格的侮辱。”他说他的好朋友王任叔，就是因为精神上受到迫害以致发狂发疯而死去。他的好朋友李平心和傅雷，都因为无端地被捏造罪名，不堪人格的侮辱而自杀的。但是他却鄙视这种失去人性的“疯狂”。他决心忍辱负重，坚持“好死不如歹活”、“活着就是胜利”，因而挺过来了。“现在”，他说，“只有抛开这可怕的二十年，一切向前看，才能重新挥毫上阵，为人民的事业作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的这种晚年的豁达心态，正如他在《代周予同作》的七绝里吟咏的：

封姨挟雪临天下，偃蹇苍松惯傲霜；

大地春回苏百卉，千花万树耀文章。

许杰一生的文学活动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不仅表现了他们的悲惨和哀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他是我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二、最早提倡并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认真实践。他在北伐前夕的新华艺术大学所讲文学课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后来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以《明日的文学》为书名由现代书局出版。他在吉隆坡创作的《锡矿场》和《马戏班》，虽不免有概念化之嫌，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具体创作实践。

三、第一个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二十年代末期文化荒芜的南洋开辟

了新马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地，撒下了大批文艺种子，给东南亚地区留下深远的影响，至今被尊为“马华文学的宗师”。

四、首先倡议并大力推进“东南文艺运动”，得到东南地区各报和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虽然运动开展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因为地区广，报纸多，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应该像桂林、昆明的“西南文学”、沦陷区上海的“孤岛文学”那样，同属于抗战文学的一环，应该同样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许杰一生留下的著作，已经先后出版的，有(1)创作小说集九部：《惨雾》(商务)、《飘浮》(出版合作社)、《暮春》(光华)、《火山口》(乐华)、《剿匪》(明日)、《子卿先生》(开明)、《胜利以后》(黄河)、《一个人的铸炼》(中原)、《马戏班》(朝阳)。(2)散文集二部：《椰子与榴莲》(现代)、《别扭集》(开明)。(3)文学论文集三部：《明日的文学》(现代)、《文艺、批评与人生》(战地图书)、《冬至集文》(新纪元、上海书店)。(4)文艺短论和文艺评论集二部：《新兴文艺评论》(明日)、《现代小说过眼录》(立达)。(5)鲁迅研究专著二部：《鲁迅小说讲话》(泥土、陕西人民)、《野草 铨释》(天津百花)。(6)少年故事集一部：《柳毅和龙女》(少年儿童)。(7)各种选集六部：《许杰短篇小说集》(商务·上中下三册)、《铸炼集》(人民文学)、《的笃戏》(福建人民)、《许杰散文集》(上海文艺)、《许杰散文选》(增订本·上海文艺)、《许杰文学论文集》(华东师大)。以上合计二十五部。

记艾芜——一个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老友艾芜一生，遭遇过难以想象的贫穷、饥饿、侮辱和压迫，尝遍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酸涩，吃尽了苦。但是他矢志不渝地热爱写作，即使在缅甸的茅草地，也把墨水瓶用细麻索吊在脖子上，把小纸本搁在自己的膝头上写；在“文革”坐牢四年获释后，写了彝族题材的小说《高高的山上》，受到国务院文化小组和成都刊物的大事围攻，不得不被迫放弃创作时，仍埋头研究《诗经》，写下了不少笔记。写作是他生命的最大快乐。他一刻也离不开写作。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五年间，右腿股骨骨折，身上安装了起搏器，病魔牢牢地缠绕着他，使他过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漫长病榻生活时，他仍绞尽脑汁，反复推敲，不放过细微末节地修改了他最后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远山朦胧》的原稿，并在帕金森氏症加剧、病体不容许他伏案书写时，仍坚持以片言只语，艰难地写下他对文学、友情、学习和生活的观照。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在将近七十年里留给我们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为祖国的现代文学画廊增光添色。

他是我国并不多见的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一 在缅甸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二十一岁的艾芜怀着“劳工神圣”——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争取半工半读的向往，而鼓足勇气，迈向世界。

他先从四川老家新繁县（今并入新都县），步行到昆明。出乎他的意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都市里，他像被人抛弃的垃圾一样，即使街头巷尾到处巡游，也找不到工作，卖草鞋碰了壁，拉黄包车被人偷去了鞋子，成天只是同饥饿做朋友，饱尝了恐惧和痛苦。幸好明善书局的王老先生介绍他到中国红十字会云南分会，当了一名受人驱使的杂役。“半工半读”的向往成了泡影。当时他很想去看北京或上海，但是苦无路费。又听说去南洋容易找工作，而且那里是热带地方，穿衣不成问题，因此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又从昆明出发，步行到缅甸的八莫，在克钦山茅草地当了一名早晚招呼客人，打扫房间，白天打扫马场马粪的伙计。大约半年以后，他再度漂泊，从八莫、杰沙、曼德勒而到达仰光。他初到缅甸的首府仰光，住在五十呎路四号的腾越客栈里，因为交不出房钱，又打着摆子病，客栈的老板张天生哄他到医院去看病，等他回来时，已把他的包袱丢在门口，再也不让他进栈。贫病交迫的艾芜，只得坐在阶沿上，听任生命的消失。幸亏客栈有个好心人，引领他去投奔四川同乡万慧法师，才算稳住了脚，在仰光安定下生活。

万慧法师是四川乐至县人，原名谢善，是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曾留学日本，与女同学恋爱，因父母反对，结不了婚，女方忧郁而死，他也在父母包办婚姻正筹备成婚时，削发为僧，法名万慧。此后，曾去印度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英文、法文、藏文、蒙古文，悉心研究印度的佛学、哲学和文学，学识渊博。在缅甸，他从事教学工作，也写作一些古诗，生活并不富裕，却与仰光华侨中的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交往。

艾芜在万慧法师那里，治好了病，每天给万慧法师买菜做饭，打扫房间，空闲的时候，伏在临街靠窗的桌子上，写些游记和杂文。万慧法师发现艾芜爱好写作，就介绍他给《仰光日报》写文章，给《觉民日报》当校对。从此

以后，艾芜积极读书写作，和华侨中的进步青年，包括印刷工人、小学教师和学生等来往。在认识了《仰光日报》的总编辑陈兰星以后，他又认识了这家报纸的《波光》副刊主编云半楼，就经常撰写新诗和散文，在《波光》副刊上发表。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经报社同事郭荫棠的介绍，艾芜结识了原上海引擎社成员吴景新。他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到缅甸的。他正在仰光华侨的进步青年中串连，组织缅甸共产主义小组。艾芜与他结识后，成为小组的第一批成员。

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地委”。

在缅甸华侨中创立共产党组织，目的是要把华侨中的劳动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团结缅甸各族人民，打倒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当局，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工农政权。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在缅甸出版的华文报纸上，揭露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以及它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马来亚共产党以马共中央名义，在新加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马共缅甸地委派一代表参加。缅甸共产党指派艾芜去开会。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使命，从仰光搭乘轮船，经印度洋到达槟榔屿。因为轮船是从已经宣布为疫港的曼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地而来的，必须消毒，所以只允许二等舱的旅客自由上岸作医药处理，坐三等舱的，全部送到一个小岛上，打针服药，并用药水洗衣，整整消毒了一个星期。这就贻误了参加党代会的时间。

一星期后，一艘小轮船把这些在小岛上已经消过毒的男女老少，送往槟榔屿。这时候才算获得自由。艾芜在槟榔屿买了火车票，乘渡轮登上去马来亚的火车。经过一夜又一天的时间，到了新加坡。他住进马共通知中指定的街道和旅馆，用指定的姓名登记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有人用吉普车把他送到另一条街道的一座四合院式的楼房。这样住了将近两个月光景，才有两个人来找他。一个人自称是党中央书记，另一个自称是团中央书记。他们没有追问什么，但是他们也不告诉他有关开会的内容，只是询问仰光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在知道了仰光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而且都是一些仓库工人、小学教师和商店职员时，就提出严厉的批评，最后指出：应该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第二天，他们给艾芜买了回仰光的轮船票，并用吉普车送他上船。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要他居住一个多月才来找他和他谈话的原因：他们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是调查了他在槟榔屿消毒而耽误开会时间的事实。

在缅甸首府仰光的华文报纸，有《仰光日报》、《觉民日报》和《缅甸新报》。除了《觉民日报》为国民党控制外，其它两种报纸，都是掌握在缅甸共产党手里。

艾芜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由万慧法师介绍到国民党控制的《觉民日报》去当校对后，由于观点不同，只向《觉民日报》的副刊投过一次稿，是一篇散文，题目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的作品，经常在反对国民党的《仰光日报》副刊上发表，因此被看做是《仰光日报》一边的人。这一事实，引起了《觉民日报》经理、国民党顽固分子林宝华的不满，终于有一天用书面暗示他，把他解雇了。

艾芜在《仰光日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诗，也有短篇小

说。略举数例：写漂泊生活的，有《漂流在八莫》、《野人山中》、《万山丛中的匪窟》、《暴动前后》，也有以仰光华侨为原型的小小说《厨子》，新诗有《墓上夜啼》、《逃婚之夜》、《漂流曲》等；也为《仰光日报》的纪念特刊写过一些涉及中缅关系的文章，如《中缅关系史资料》、《滇系记载缅甸的花花絮絮》等，这些文章，都是以万慧法师向仰光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中文典籍为依据，经过潜心研究，然后写成的较为系统的史料。这可以说是缅甸华侨研究中缅关系史的最早的文献。

艾芜在《仰光日报》上不断发表作品以后，引起了这家报馆的排字工人黄绰卿的注意。黄绰卿爱好文学，有时也写些散文，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失学青年。他给艾芜的诗文排字，受到感动，不禁产生仰慕之情，终于经人介绍，与艾芜成为至交。他们几乎每星期都坐在绿绮湖畔的草地上谈着夜话，既谈文学和写作，也谈社会和人生。一起来往的，还有出生云南的王思科（后来在缅甸共产党内负责组织工作）、段丛桂等几位进步青年。当时艾芜还从英文的《仰光公报》上看到一篇介绍高尔基的文章，翻译以后，在华人报纸上发表。高尔基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激励了黄绰卿等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劳动者。这是缅甸华人报纸上头一次介绍高尔基。这也可以看出艾芜与这些青年朋友们的进步思想倾向。

一九二八年冬天，艾芜用共产党（CP）的名义，在住处悄悄印刷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的传单。印刷的铅字，是由一家华侨印刷所的一位姓周的工人偷出来的。正当艾芜用绳子把铅字扎好后印刷时，被万慧法师看见了。他看到那传单上印着“庆贺苏联十月革命”、“缅甸人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英帝国主义”等文字，就对艾芜说：“你们搞革命，是可以的，可不能影响我的安全。”就这样，艾芜中止印刷，离开了万慧法师。后来由姓周的印刷工人在印刷所偷偷印了数百张传单。这位印刷工人，为了不致因为追查逮捕而影响党组织，在印罢以后，便永远离开印刷所，到外地做矿工去了。

艾芜离开万慧法师后，最初由黄绰卿介绍，住在一家裁缝铺的裁缝桌上，后来在一所华侨平民学校教书，住在亚弄苏巴彬街的一小间屋子里，和万慧法师仍有来往。

缅甸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吴景新，改名吴怀世，经《仰光日报》总编辑陈兰生的介绍，任《缅甸新报》总编辑。他在《仰光日报》和《缅甸新报》上写了不少社论，揭露国民党的苛政。后来他去伦敦读书，马共中央又派了林环岛来仰光接任第一书记。他也为《仰光日报》写社论，还动员华侨店员工会出版《新芽》小日报，由林环岛任总编辑，艾芜任副刊主编兼校对。从此党的队伍逐渐发展，党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致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经常派遣会讲华语的印度人尾随监视。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缅甸发生了达拉瓦底县农民起义事件。艾芜、王思科、郭荫棠、林环岛等在《新芽》小日报上发表了一些同情和支持起义农民的文章，被英国殖民当局注意，就在《新芽》小日报的编辑部逮捕了他们，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将他们押送到仰光江的江边，驱逐回国。

在艾芜坐牢期间，万慧法师曾去看望过他。在艾芜被押送上轮船时，万慧法师到江边码头上去送别，后来还写了怀念艾芜的诗：“有文皆苦，无食不酸；茅草地来，别我江干。”在万慧法师交往的外国朋友中，也有不少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总有一些言辞，对他起了进步的影响，因此晚年时期的万慧法师，渐渐同情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取得胜利，比起一般华侨老

人，更加容易接受。在他后来写的《送耶舍灵光同学远筹叙》中，表示“共庆于今解放”，热情歌颂了祖国的新生。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和艾芜的一次闲聊中，谈到他在缅甸的四年漂泊生活，历尽艰困，极不安定。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写过一些诗文，当过校对，跟吴怀世等一起办过刊物《如是周报》，在《缅甸新报》当过编辑，在《新芽》小日报主编过副刊，这些文字工作，归结起来有三点好处：首先是使他有条件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报刊上一篇篇发表，因而鼓励他更加热爱写作。其次，自己以及别人投寄的作品，经过铅字排印出来，再细看咀嚼时，更加容易看出不足之处，因而学会了“推敲”。第三，跟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工人黄绰卿、王思科等经常讨论一些作品的是非得失，初步体会到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怎样把握的。当然，这是从文字表达的角度着眼。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着眼，则在缅甸的四年漂泊生活，正是他后来写作大量文学作品的源泉，这方面的好处是说不完的。

二 在上海

艾芜经厦门而到达上海。

在被迫离开缅甸时，仰光的华侨和文化界朋友送给艾芜一笔生活费。他在厦门居住一些日子后，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到上海住小旅馆，最多只能再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他一面努力写稿，一面设法寻找熟人。他想起了在云南曾经接济过他的青年学生王秉心。经过通信，联系上了。王秉心正在上海郊区宝山县泗塘桥的劳动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习。他给艾芜租了一间农民家的屋子住，还带有一间灶房，每月租金只需一元钱，而且每天可以到农学院的图书阅览室去看报纸。艾芜托王秉心找工作，却没有成功，只得坐下来写作。他在仰光就是这样，虽然稿费少得可怜，但是还能养活自己。他向《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投稿，写缅甸的奇风异俗，总题目是《缅甸漫画》。哪里知道文章发表了，去要稿费的时候，竟像打发叫化子似的丢给他两元钱。他当面把这两元钱的纸币撕了。不久，他又给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文学评论》寄去一篇应征的小说稿，被录取为第三名，印成一本小册子发售。当时去信要一本小册子和稿费，但似石沉海底，连信也不复。又因为没有钱，买不起小册子，那篇应征小说的题目后来也忘记了。这件事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他在给我的信里还提起，要我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他说：

……您在寒假期间将回上海，为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查寻图书资料，想请您帮我寻找一份资料。我在一九三一年写过一篇小说，是应《现代文学评论》的征文写的。现请人找出《现代文学评论》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其中有“选拔作家”一栏，登了征文目录，第一名作者素雅，第二名张宗哲，第三名汤艾芜。通讯地址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只是刊物只登了第一名的小说《山鬼》，第二名和我的小说，没有发表。但我记得在《现代文学评论》出版社（现代书局），看见三篇应征的文章，印成一本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出售。我至今记不起小册子的书名，也记不起我那篇小说的名子，内容还记得是写新加坡的失业工人。上海图书馆有《现代文学评论》。……

我查看了图书资料，只找到杂志，却找不到附册。

这时候的艾芜，虽然写稿取不到稿酬，生活困难，但是他看到邻居老太那个在纱厂工作的女儿，被人贩子卖到厦门为娼，来信要老太设法赎买，老太失声痛哭，说她连吃饭也困难，哪来的钱赎买。艾芜看到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觉得自己没有钱，帮不了别人，但有责任用笔反映这些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他熟悉的滇缅边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写出来。

一九三一年七月的一天，艾芜在北四川路上行走时，巧遇四川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老同学——也在学习写作的沙汀，于是搬进上海，和沙汀同住。他俩曾经一道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创作的题材问题，还附去作品求教。此后，艾芜还写了短篇小说《伙伴》，投交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文稿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没有发表，却邀请艾芜参加了《北斗》读者座谈会。被邀的读者有三人：李辉英、朱曼华（女）和艾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作家郑伯奇、冯雪峰、华蒂（叶以群）以及主编丁玲。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把艾芜编入小组，吸收他为盟员。

这一时期，艾芜继续写作，但是仍然得不到稿费，主要依靠缅甸的华侨朋友募捐接济，也向上海的友人借贷，过着远不如工厂工人的极其贫困的生活。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丁玲代表党组织，口头宣布，批准艾芜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艾芜接受了丁玲交给的任务，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

在杨树浦，左联办了一个弄堂小学，名叫涟文学校，招收工人子女读书，晚上，成为男女工人的文化补习学校。艾芜的任务，是白天晚上义务教好书，还要从晚上补习的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文学作品的文艺通讯员。由于补习的男女工人还在识字阶段，要很快培养成文艺通讯员是有困难的。于是他物色在工人中活动的知识分子。一位新来学校的女教员周海涛，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革命热情高，常在深夜外出贴标语，散传单，有时白天参加飞行集会。她的丈夫阿尹，是搞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她的哥哥在莫斯科学习，嫂嫂在纱厂做工，也是知识分子。她的妹妹中学毕业，准备进绸厂做工。艾芜通过这一进步知识分子的家族，结识了许多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知识分子，动员他们尽可能抽出时间从事文艺写作。他还扩大了活动范围，不仅杨树浦，还步行到曹家渡、梵皇渡，以至黄浦江上游的周家渡。有时，组织他物色到的培养对象到虹口公园开会，丁玲也曾出席指导过。

艾芜在涟文学校没有教到一学期，因为散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暴露了身份，被人注意，而由李辉英代替他教书。这时候，《文学月报》的主编周扬，把艾芜去杨树浦工作前写的短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给茅盾看了，说是可以发表。周扬要艾芜再增写了一段。后来果然发表了。北平左联出版的《文学杂志》，也发表了他的一篇小说《茅草地》。这些都是左联办的刊物，发表青年盟员的文稿，一般都没有稿费。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下午，艾芜到曹家渡一家绸厂同工人联系工作时被捕，关押在南市伪公安局里。首先由督查处审问，然后关进一间小牢房。那里已经关押了二十多个囚犯，除了两个绑票匪徒外，全是政治犯。大家睡在地板上，挤得满满的，没有被子盖。涟文学校女同事周海涛的丈夫，阿尹，也和艾芜关在一起。

艾芜当时用的是“唐仁”的假名。他多给拘留所的看守两毛钱，请他把

一封信买了邮票寄出去。信是写给穆木天的，由内山书店转交，署名“唐仁”，说是被捕了，请受信人认出笔迹是谁写的。不久，华蒂和梁文若疏通了公安局里的朋友，来看望艾芜。后来梁文若又受左联领导的委托，送来了食品。左联原来想通过互济会出钱把艾芜赎出来，后来互济会遭到破坏，再无钱赎买。

南市的拘留所，是在一个长方形天井的两边，用木栅栏圈起来的两排小房间，全关押着男犯人。连着两排男拘留所的，有一间大屋子，关押着女犯人。从木栅栏里，可以看见女犯人的动静。阿尹的妻子周海涛，不久也被关进来了。

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光景，有一天，艾芜被押到地方法院，问了姓名籍贯后，就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转解苏州的高等法院。艾芜等七个人，都用手铐，两人一组地连在一起。艾芜一组是三人连在一起的，他被铐在中间，行动非常困难。坐在火车上，走在苏州街上，人们目光炯炯，以为是一批罪大恶极的强盗。

艾芜被关在苏州伪高等法院的第三监狱七字间牢房里。那里共有四个长形巷道，每个巷道两边，排列了许多小牢房。放风时，犯人可以在巷道里散步一二十分钟。艾芜住的牢房里，共有十来个人，除了一名强盗外，全是政治犯。牢房四周有木炕床，已被先来的犯人占据了，后来的都躺在地板上。同牢房的犯人中，有两个是因为执行李立三路线，在暴动失败后被捕的，被判无期徒刑，上诉高院，听候审判。有一个是共产党的叛徒。听大家悄悄说，他被捕后供出了同伙，使组织受到损失。被他出卖的同伙关在一起，大家不理睬他。其余的人也都小声骂他“叛徒”。

监管四条巷道的看守，只有两三个人，很少巡视，有时进牢房看看。只要给些好处，可以代买香烟或报纸。给一角小洋，就可以代寄一封信。艾芜在牢房里，借用炕床作书桌，写了一篇小说《咆哮的许家屯》，请看守偷偷寄出。

放风的时候，先后发现青年作家金丁和刘雪苇，同住在一个巷道里。

有一天，看守通知艾芜，说有律师来问话。艾芜被带到监狱门口的小屋里。律师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她往来于上海南京，设法营救。左联很穷，是鲁迅捐送五十大洋，作为聘请律师的费用。这是后来知道的。由于这位律师的出庭辩护，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伪高等法院对艾芜和另外六个工人，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个律师就是史良。

那天，任白戈特地从上海赶到苏州来接艾芜。

艾芜和任白戈在苏州吃了午饭，乘火车回上海，住在打浦桥新天祥里沙汀的家里。当时沙汀住二楼前楼，任白戈住后楼，艾芜同任白戈一同住。因为害怕有特务尾随，决定任白戈和艾芜另租屋子住。几天以后，沙汀也搬迁了住处。

从苏州监狱出来，回到上海后，摆在艾芜面前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活下去，求得生存。他不好意思再请仰光的华侨朋友捐助。沙汀的爱人即将分娩，生活也困难，不忍心再向他借钱。任白戈忙于为左联写论文，需要安静，而艾芜日夜外出活动，整天忙乱，肯定会打扰他，影响他的写作。再说，左联最重要的工作，应该用作品（包括论文和杂文）来战斗，群众是不能满足于只看看散发出来的标语口号的。考虑到这些，艾芜向周扬建议，另找盟员，代替他培养文艺通讯员的工作，让他专心写作，争取在上海能够生活下

来。

周扬同意了。

从此以后，经周扬介绍，艾芜的作品陆续在有稿费的刊物上发表，如北新书局赵景深编的《青年界》发表了她的《山峡中》，中华书局钱歌川编的《新中华》发表了她的《松岭上》。这使艾芜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过去在国内外漂泊六年的丰富生活，化成一个个场景，涌现在他的面前，争着倾泻到艾芜书写的稿纸上。他白天写作，晚上读书，求得提高。任白戈看到他能够独立生活了，就决定分居，各租一个小亭子间住，便于更好地写作，给左联的文艺运动多作贡献。

这一年，经诗人杜谈介绍，与左联盟员、中国诗歌会会员、女诗人王蕾嘉认识。她原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结为连理。

八月，穆木天、卢森堡（任钧）等被捕。十二月，因为怀疑叛徒跟踪，艾芜与蕾嘉一起，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再到济南和青岛。一路上，写了不少散文和游记，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发表。一九三五年九月，他俩才回到上海。

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解散，艾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艾芜过去的写作，署名有汤道耕、荷裳（“和尚”的谐音）、爱吾、艾芜、无艾、芜艾，等等。从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文学月报》发表《人生哲学的一课》起，才固定使用了“艾芜”的署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

十月初，艾芜送走了蕾嘉和两岁的女儿，让她们去蕾嘉的家乡湖南省宁远县。蕾嘉的女朋友陈昭华与蕾嘉同行。艾芜暂留上海，想看看时局的变化再决定行止。后来北站不通火车，只有沪西梵皇渡站还能上车，于是不得不在十月下旬，离别了居住将近七年的上海，前往武汉。

在上海期间，艾芜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山中牧歌》、《南行记》、《夜景》、《海岛上》，中篇小说《某校记事》、《芭蕉谷》、《春天》，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他成为一九三三年在文坛崛起的新人。他以奇特清新的风格，真实而朴素的题材，扭转了早期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倾向。他被鲁迅认为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向外国友人推荐了他的作品。

三 在桂林

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艾芜到了武汉。他在这里遇到了冯乃超、穆木天、老舍、萧军、萧红等一批从上海、北平去的作家，并接受一家书店的邀请，准备创办一个刊物。创刊号的稿件收齐了，但是书店出尔反尔，改变了主意，不再办刊物，只得一一退稿。十二月中旬，无事可作的艾芜，乘火车去湖南长沙，转往宁远，与妻子女儿团聚。妻子王蕾嘉在宁远县的育群中学当教师，艾芜在女校任代课教师。在这里，虽然创作不多，却接触到城乡社会的各种人物，了解劳苦人民的生活习俗，还收集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有关情况，为艾芜后来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积累了

资料。

一九三九年初，为了发表作品和出版刊物的方便，为了能在存亡之秋担负起为祖国战斗的责任，艾芜带了家属，来到已经成为文化城的桂林。他看到墙上贴着《救亡日报》准备在桂林复刊的消息，便想起报社的熟人林林。他找到了林林。先住在救亡日报社的宿舍里。此后迁居东郊施家园。一九四

年后，在离城五里的观音山脚下二十六号找到了路易·艾黎等为办工农合作社而建造的简易竹屋住下。他带着妻女，在观音山脚住处周围空地上开荒种菜。生活清苦，但精神却很愉快。除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逸仙中学教书和短期的副刊编辑外，主要时间都在这里埋头写作。

刚到桂林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吴奚如。艾芜在上海时和他见过一面。这次重逢，吴奚如同他的爱人朱女士请艾芜夫妇吃饭，为他们洗尘。不久，吴奚如去了重庆，由李克农接任。艾芜经常向李克农请示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在桂林的报纸副刊中，哪些可以答应写稿，哪些可以多写，哪些不写。李克农回答，凡是主张抗战的，都可以写。这使艾芜的心中有了底。在桂林，《新华日报》社设有代卖部，也代售重庆出版的《群众》周刊和一些政治时事性的小册子。艾芜就从这些报刊和书本上，理解党的政策，领会应该怎样把握“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时代精神，把文学作品写好。

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桂林的文艺界决定成立桂林分会。作家王鲁彦热心会务，积极筹备，大家都拥护他承担负责人的工作。在分会成立前，艾芜把分会负责人的候选名单送请李克农审查，他表示同意。艾芜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桂林文艺界团结的好，一致抗战，王鲁彦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桂林，艾芜遇见了不少作家，比如筹备出版文学杂志《一九三九》的东北作家阳朔和舒群，在上海时和王蕾嘉编在左联一个小组的周钢鸣等。但接触最多的，要数王鲁彦。他们经常一同到街上去走走。

王鲁彦在桂林中学教书，因为工作不稳定，又到三江县去教书。但是三江县中学的工资低，工作一段时间后，生活不下去。当时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了。他只得把第四个孩子送给当地农民，不再教书，回到桂林。为了安排王鲁彦在桂林的生活，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即着手编一个文艺杂志，由王鲁彦拿固定的编辑费，大家踊跃写稿。在《力报》编副刊的王西彦，帮助他看稿编稿。刊物定名为《文学杂志》，每月出版一期。通过这个刊物，团结了更多的作家。大家把这个刊物看作是文协桂林分会的会刊。为了帮助王鲁彦把刊物办好，艾芜写了长篇小说《故乡》，按期交给刊物连载。《文学杂志》在大家的培植下，终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树立了很高的声誉。后来王鲁彦病逝，日寇占领桂林以后，邵荃麟还将《文学杂志》移到重庆继续出版。

王鲁彦当时患有痔病，需要开刀，但又无钱治疗，痛苦异常。幸经人介绍，到周泽钊医师诊所免费动了手术，得以痊愈。据鲁彦说，这个诊所对贫困的文化人都可以免费治疗。解放后，艾芜才知道：原来这是党在桂林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医师周泽钊，留学德国，在桂林当过医院院长，思想进步，曾在去延安途中，被国民党发现后折回。他与周总理商量。周总理给他一笔钱，要他在桂林开设私人诊所，并派女党员担任护士工作，成为党在桂林的一个据点。全国解放后，周泽钊任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北京医院院长。

鲁彦患结核病，需要长期疗养。为了节约支出，他把刊物委托王西彦摘编，自己携带家属去茶陵养病。这期间，柳亚子曾经发起为他募集医疗费，

让他安心养病。可是后来茶陵沦陷，他在临危前负病跟着妻子，带了三个儿女逃难。他们逃到衡阳，准备搭乘火车再去桂林，可是火车拥挤，体弱有病的他无法上车，在车站上等了三天三夜，得到车站工友的照顾，才帮助上了车，到了桂林。经过这次艰难的跋涉，他的肺病加重了，加上国事日非，忧患交逼，终于不能支持，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病逝。这是后话。

一九四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的反共真面目再次暴露后，重庆的一批进步文化人，纷纷前往香港，另建文化基地。他们多数经过桂林，有的还到艾芜的家里看望他。在朋友的影响下，艾芜也曾考虑到去香港的问题。但是一想到子女多，在桂林乡下生活，已经很勉强，哪里还能有去香港生活的奢望呢？有一天，《救亡日报》的林林来看他，说报社的工作人员也将全部撤走，问艾芜有没有困难。艾芜说：“就是经济困难。”当时林林的心情也很不安定，没有谈到是否离开桂林的问题。艾芜也知道《救亡日报》要撤走工作人员，经济一定也困难，没有提出支援他去香港的要求。

艾芜不去香港，还有另一个顾虑。那是一九三一年他被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在宣读他的判决书时，明文指出：被驱逐者今后不得再到英属殖民地，包括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如果在这些地区发现他来，立即逮捕，关押。那年被驱逐时，轮船经过香港，只住一夜，即被押送厦门。如果这次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有可能会发现他，因为他在缅甸发表文章的署名中，也曾使用过“艾艾”这个笔名。

当时的艾芜心神不定，就去市里找邵荃麟，想问一下如果不走，桂林会发生什么变化。到了邵荃麟家，只见他正在收拾行李，说要到外县去，对于桂林的变化，他说现在还看不出来，“文协分会存在一天，就坚持一天”，他这么说。

艾芜只得硬着头皮，奋笔写作，迎接暴风雨。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大批文化人又逃回桂林和重庆等地。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桂林已有沦陷的危险，大家都在准备逃难。国民党中央社从桂林发了一则新闻，说艾芜生活困难，在桂林街头摆地摊，出售生活用品。重庆的一家国民党报纸则说，艾芜生活并不困难，最近还在桂林出售大肥猪。这些信息可以说是半真半假，造谣中伤。地摊没有摆过，经济困难确有其事。在桂林乡下确曾喂过一头小猪，当快要离开桂林时，艾芜请一位朋友帮助，一起把这头养了不到三个月、仅仅只有三四十斤重的猪，抬到市上去出售，结果一个钱也没有赚，反而亏了本。因为只有降低了价钱，人家才肯买。

在离开桂林时，由于大家争搭火车逃难，火车已经不卖票，谁都可以上，谁的气力大，就上去。上火车就像上战场。那些拖男带女、年老体弱的，休想上去。艾芜当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还不能走路，必须抱着，加上行李不少，这使他们夫妇俩无法上车。车站上也遇见了不少熟人，但是谁都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有一家报纸的记者，凭着报馆的特殊关系，搞到一节运货车厢，装上了一卷一卷的白报纸。这位记者拿着手枪，吆喝着不准别人上车，却让他的一家有特殊关系的熟人，大大小小都上了车。艾芜同他很熟，平时他对艾芜也很热情，但是当艾芜同他商量，能不能也让他们一家六口上车时，却被这个势利的记者毫无表情地干脆拒绝了。

后来，一列没有车厢的平板车开来，平板上堆满了铁轨，是从靠近前线的铁路上拆下来的。人们顾不得搭乘平板车有被颠下来的危险，还是一窝蜂地往上爬。眼睁睁地看着挤抢的人群，艾芜一家又上不了车。正在这时，司马文森来了，他带着一群学生。他们人多手多，一下子把艾芜全家六口人连同行李送上了车。司马文森还通知艾芜，到了柳州，去龙城中学找黄谷农。后来艾芜全家找到龙城中学，遇到了周钢鸣，才知道桂林的文化人有好几十个都在这里。周钢鸣代党组织给了艾芜一笔钱，还把桂林邵荃麟给他的逃难费用也交给了他。

在当时逃离桂林的文化人中，柳亚子去了八步。他因母亲病逝，自己又脑病复发，精神上受到新伤旧创，十分不安。和柳亚子一起，在桂林组织过南明史社的宋云彬，带着南明史的残稿，也来八步。翻译工作者胡仲持带了十多年来的译著，从桂林逃到平乐。方敬、邵荃麟、葛琴、穆木天、彭慧、熊佛西、端木蕻良等，都散处在贵阳等地。后来，驻足于平乐、八步、柳州的作家们，又踏上了再度流亡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艾芜一家到了贵阳。艾芜患了疟疾，手脚发颤，头昏目眩。幸亏在贵阳的旅馆里遇到了中共协助湘桂文化人逃难的负责人之一的李亚群。他在了解艾芜贫病交迫的处境后，从党的经费中取出三千元资助他，使他治好了病，在半个月后搭乘汽车，经松坎进入四川。十月，到了重庆。

艾芜先住在重庆的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个月后，搬到南温泉白鹤林乡下。在这里，他和沙汀重逢，与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艾芜在桂林住了五年多，有四年住在乡下。他从未游览过“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直专心埋头写作。他在桂林时期撰写的作品，结集的有散文集《杂草集》、文学评论集《文学手册》、短篇小说集《秋收》、《冬夜》、《荒地》、《爱》，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故乡》是在重庆南温泉乡下的白鹤林时完成的；《山野》是在胜利以后的一九四七年住在上海南汇县鲁家汇时完成的。

四 在重庆

在南温泉的乡下，艾芜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他确实兴奋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写了《春天》的续篇《落花时节》以后，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地蓬勃地展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随后闻一多等民主人士遇害。艾芜再也不能在乡下过平静的写作生活了，他搬到城内张家花园孤儿院居住。

孤儿院是在张家花园斜坡通道的底脚，三面小坡，有几家简陋的小屋。坡下小块平整的地面上，修有一列草屋，其中有四五间屋子可以住人，这就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用西南联大学生为救济湘桂逃难的文化人而募捐得来的钱买的，最初由邵荃麟一家以及聂绀弩等居住，他们在胜利后转往上海等地去了，艾芜一家便搬来居住。

艾芜住在孤儿院十三号期间，常爬坡向上，到达观音岩，即上了大马路。这是重庆最热闹的街市。艾芜就在大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看到过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农家妇女，坐在地上，把自己生的三岁多的女儿，放在前面的地上坐着，孩子的头上扎了个草圈，表明要把孩子出卖。又从张家花园六十五号下去，在大溪沟的岸上，看见一个农民从竹篮里取出糠来，一把一把地往自己嘴里塞。在大溪沟，沿嘉陵江而下，从临江门爬坡上到大马路，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被人抓住当扒手打，只听得孩子惨叫：“伯伯，我饿啊！”再到临江门大马路的茶馆里，看到有个叫化子，赤裸上身，用一块扁平的石头狠狠地砸打他自己，以求得人们的怜悯，给予施舍。所有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使艾芜难以沉默，写下了《流离》，副标题是“重庆街头速写”。

在孤儿院，使艾芜特别悲痛的，是在桂林时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何雪松。他思想进步。他的姐夫在国民党军队的“五总”工作。何雪松就来重庆，在“五总”当一个小职员，编辑刊物《五总》，每期编好后给艾芜看看。他知道艾芜生活困难，曾请人挑了大米送给他。夏天还送西瓜来。后来重庆解放，艾芜才知道，他已在关押他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刑场被枪杀了。艾芜坐解放军的车子，赶到现场，看到他那躺在地上已经烧焦了的躯体。

艾芜迁居孤儿院十三号后，常参加文艺界的集会。由张友渔、何其芳组织的半月举行一次的时事政治报告会，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艾芜也被邀请，每次会后，招待吃饭，使他认识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晚上，又到邓初民任校长的社会大学这所夜大学教书。这使国民党特务组织把艾芜划入民主同盟，写上黑名单。这是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黑名册子上查到的。

艾芜迁居孤儿院十三号后，与何其芳的接触最多。

艾芜常去曾家岩周公馆找何其芳，何其芳也常到孤儿院找他。当时邵荃麟在武汉工作，有信给何其芳，都寄给艾芜转交。有一次，何其芳一面看信，一面高兴地说，老邵已在武汉找到了“老伯”。“老伯”是指党组织。

当时的何其芳，充满信心，认为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一定会成立。他对成立联合政府后的文艺工作，作了多方面的安排。比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后，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由沈起予出面主持。召开文艺界的什么会议，也由沈起予出面。何其芳与重庆《新民报》联系，创办副刊《虹》，由柳倩主编，专门刊载诗稿，作为重庆文艺协会会刊之一。又与重庆《大公报》联系，创办《半月文艺》副刊，由艾芜主编，作为重庆文艺协会会刊之一，只支付发表费，不支付编辑费。

艾芜承担了《半月文艺》副刊的主编后，即向会员约稿，字数不够时，自己写些短稿补充，编好的稿件交给《大公报》编辑罗承勋，由他设计版面。何其芳希望艾芜留在四川，等到联合政府成立后，《新华日报》迁往南京出版时，将租用轮船，把印刷机器运去，那时把他一家人接到船上，送往上海，去上海工作。上海的文化人比较集中，书店出版社多，发展的条件好。艾芜也曾在周公馆的徐冰办公室里看到过共产党提出的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名单，其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主人士如郑振铎等。

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新华日报》被封闭，何其芳等被迫撤往延安。但是《半月文艺》却没有停刊。这是因为它是以《大公报》副刊的面貌出现的，既不标榜全国文协重庆分会的会刊，也没有署名由谁主编。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蒋介石加紧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艾芜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不得不随重庆育才学校的教师，乘客轮前往上海。因为复员东去的人多，船票难买。他们托人找了关系，才买到“活统”票，即四等舱的船票。

几乎白天黑夜，艾芜都坐在舵工室门外的甲板上。第一夜，有坐处无睡处，幸亏同行有三个伴，可以腾出一点地方，勉强轮流着睡觉。也就是说，每一次，总是三个人坐，一个人睡。而睡的地方，是紧靠着船栏的边上，躺下以后，必须用手挽住铁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江去。艾芜担心掉到江里，不敢睡。坐“活统”的人，没有固定的铺位。要碰运气。如果先上船，可以出钱买个空地方；如果后上船，出钱也买不到铺位，只能在过道上找个坐下来的地方。过去只有“固统”（有一定铺位），因为复员东去的人多，船票供不应求，才创造发明了“活统”票。不但客人诅咒，连船上的茶房也在骂。第二夜，大家想出个办法，把捆行李的索子解下来，拴在船边的铁栏上，把那些可以掉下人的一条条横向的栏条空隙，用索子上下拦住，睡的时候，人就靠在索子上。但是轮船不停地前进，铁栏不停地颤动，身子的重量压在索子上，有可能压断索子，或使索子移动，让睡熟的人掉下江心。据茶房说，先前确有客人掉到江里，他叫大家小心。艾芜没有冒这个险，三个夜晚都没有睡，只是坐着。

船上的伙食倒是不错，每日三餐，每桌八人，每餐四菜一汤。可是坐“活统”的人，只能把菜放在甲板上吃。由于艾芜坐的过道，是通往厕所和盥洗室去的必经之路，所以皮鞋拖鞋不免擦着菜碗汤碗而过，有时还要你拿着碗筷的手让一让，叫人一口饭分几次咀嚼。特别是因为“固统”的客人先开饭，轮到“活统”的客人吃饭时，正是“固统”的客人忙于去厕所大小便、去盥洗室打水洗脸的时候，来往特别频繁，令人啼笑皆非，以致经常发生争吵。

另一种争吵是在上下层之间。上层坐“固统”的人，吃罢了饭，茶房收拾碗筷时，往往不管碗里还有什么残余的菜脚或汤水，一律往江里泼去。有时上层的客人为了自己方便，把洗脸水或尿水泼往江里。可是风向一转，常使坐在下层“活统”的人，头上脸上身上，洒得满是余沥，不堪忍受，于是大声吆喝，把上层的客人奚落一番，而上层的客人一般不作回答，却变本加厉地继续泼洒，以示无声的抗议。这类争吵时有发生。

艾芜就是坐着这样的轮船来到了上海。

经育才学校教师的介绍，艾芜居住在上海郊区大场乡。

一九四六年夏，茅盾先生来上海后，给我介绍了一批作家，包括一些外地作家，其中有成都的SY（刘盛亚）、重庆的艾芜。我与艾芜通信联系后，他寄来了第一篇稿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艾芜的短篇小说《敲猪草的孩子》，就在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

艾芜在上海定居后，提着一个小布袋，从大场乡下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他交给我在重庆出发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我和他头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浅灰色裤子，短统袜，一双胶鞋，非常简朴。他的脸面黄黑瘦削，一双坚毅的眼睛，腰板挺直，看来比较精悍、健康，是劳动人民的模样，毫无书生架子。我们一见如故。那天我请他在福州路的一家全市闻名的美味斋菜饭馆吃红烧大肉百叶汤的菜饭。他谈了重庆和搭轮来上海的情况，谈得非常坦率而亲切。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艾芜的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在《文艺春

秋》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我以文艺春秋社出面，邀请重庆来的艾芜与台湾来的黎烈文，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茶聚，请经常为《文艺春秋》月刊执笔的李健吾、许杰、臧克家、碧野等作陪，由翟立林、叶德馨录像，历时三小时。大家不拘形式地谈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台湾新旧文化的交替、莎士比亚的翻译、老舍和曹禺在美国的情况、叶君健在英国出版的《山村》、郭沫若和周学普的两个《浮士德》译本、现阶段戏剧运动的趋向、中国作家的贫困和饥饿。这次茶聚的照片，发表在《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二期上。

艾芜谈到了上海的生活水平远比重庆高：重庆和上海的物价大约是一与五之比，重庆的铅字排工费每千字不过数千元，而上海竟高达四万三千元。上海吃一次客饭，相当于重庆吃两天的客饭。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艾芜到上海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石青嫂子》。

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六卷第一期起，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开始连载，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六期为止，全部刊完。此后，在这个刊物上，他还写了短篇小说《猪》（七卷一期）、《流浪人》（七卷五期）、回忆录《海》（八卷一期）。在我编的另一不定期刊《文艺》丛刊上，他写了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一九四七年十月）、散文《旅途通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我为香港《星岛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叶圣陶的《从梦说起》、何家槐的《青果》、艾芜的《在卡拉巴士第》、端木蕻良的《古文艺》。我把艾芜的作品放在第一篇。此后，他为这个副刊写了《旅情》（一九四九，十二，二十九）、《到柳州的第一天——乱世杂记》（一九四八，二，二十三）、《论黑人诗》（一九四八，四，十二）、《四叔父——怀旧之一》（一九四八，六，十四）、《山路》（一九四八，十，十八）等。在《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的《猪》和《海》两篇，曾在这个《文艺》副刊上同时发表。我编《文艺》副刊共六十期，编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为止。因为上海临近解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停飞，稿件无法寄递。《星岛日报》的总编沈颂芳为我预购机票，盼我去香港工作。我因接到周而复从香港来信，暗示我留在上海，因此未去香港。

艾芜在上海逗留的实际时间，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抵沪，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搭轮离沪计算，不过半年。他在离沪前，曾到我家里看我，在一起吃饭时，他说他妻子蕾嘉即将分娩，家里无人照顾。如果重庆的政治条件不容许居住，准备三个月后，与蕾嘉一起，带着五个孩子，同来上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艾芜回到重庆后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说他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分娩十七天了。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第十六期上的“文艺广播”栏里，摘录了艾芜来信中的一段：

……由汉口到宜昌的一段水程，风雪交加，极其寒冷。但从宜昌一入三峡，便不大冷了，一进四川地界，两岸斜坡，满铺麦苗胡豆，一片浓绿。远山则终天笼在雾中，若隐若现，颇为悦目，使人感到春天业已到来似的。……到家时，内子已生小孩十七天了，大小均安，这是使人感到愉快的。……

这封信，连同其他两千件左右作家书简，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抄家

时没收，全文无法抄录。一九八二年春节，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文革时期抄家物资时，发现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写给我的名片、书信二十八件，粘贴在几张十六开大小的白纸上，可能是作为我的“罪证”，在两千件书筒中挑选出来并保留下来的。上海市公安局发现以后，通过上海市文化局转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通知在青海已经平反并在任教的我，请人到上海领取。这时我才知道，我长期保存的两千件左右的作家书筒，仅存二十八件，其它都已被毁。此后，在领取的二十八件“罪证”中，我发现艾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从重庆寄给我的一页信，原文是：

范泉兄：

接读来信，您对朋友热情，极为感动。你生活亦靠写作，收入并不多，帮助沙汀兄，可不必勉为其难，因今天上海物价较内地过高，弟担心文化界友人，不易生活。至于说到帮助弟，这点不可以的。蒙您厚爱，只望《我的幼年时代》一书，催书店早付版税即可。

小时没有照相，只去年照的身份证照片，现寄上一张，不知可否合用？并望用与否，都请寄回为禱。白坐兄信，请代转交，谢谢。敬祝
安好。

弟 艾芜 十一月十日

内附两信，烦兄转交为禱。

另照片一张

这封信里述及的内容，需要说明两点：(1)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获悉沙汀从解放区回到四川老家，因患胃病（一说肺病），吐血多次，生活困难，我请艾芜转递我个人的一笔汇款给沙汀，并要求他不宣布赠款者的名字。(2)为了缓解艾芜一家七口的生活困难，我把他在《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完毕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介绍给中原出版社出版，信里说起他寄给我的“照片一张”，那是中原出版社向他要的，准备印在书里。

艾芜住在上海时期，我曾去看望他一次。那是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中秋节前一天，我应《文艺知识》杂志主编王郁天的邀请，和许杰、戴望舒、碧野、谷斯范、孔另境等一道，到浦东大场去看望了他和何家槐。

艾芜住在《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老家。这是在农村常见的一所旧式楼房。陆诒在外工作。他的母亲居住在这所楼房的前楼。而用木板隔开的后楼，很狭窄，实际上是从楼梯走上来到前楼去必经的楼梯间。就在这里，安置着十分简陋的写字桌，是一张从学校里借来的学生用的课桌，没有凳子，一张木板床的床沿作为凳子。艾芜就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写作。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石青嫂子》，就是坐在这里写的。

何家槐是在附近的大江中学教书。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郊游以后，就在大江中学的操场上踢小橡皮球。碧野与我同年，都是勇于冲刺。与世纪同龄的许杰，已经四十七岁，还能轻松地跑动。艾芜已经四十三岁，既能奔跑，又能冲刺；比他年轻一岁的戴望舒，反而连连喘气，他说“跑急以后，心跳得厉害”。晚上，在大江中学的大天井里，东道主王郁天请我们吃饭。饭后，由农村的说书人吴文熙说了一部新编的唱词《陈公博》。夜宿大江中学的教师宿舍。第二天，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漫谈了年轻一代如何接受文学遗产问题、集体创作问题以及文

学倾向问题。这次浦东郊游，由孔另境拍摄了许多相片，在《文艺春秋》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的第五卷第四期上发表。

艾芜离开重庆时，大公报社不知道，仍将读者寄给《半月文艺》的稿件转送到艾芜家里。艾芜夫人王蕾嘉，考虑到这是何其芳布置的工作任务，虽然带着四个孩子，而且还有身孕，还是勇敢地承担起编务，继续发稿，直到她分娩为止。

回到重庆后，艾芜专心创作。从一九四八年秋季起，他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从一九四七年夏到一九四八年秋，这是艾芜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他在这段时间里写的短篇小说《石膏嫂子》、《田野的忧郁》、《都市的忧郁》、《重逢》、《乡镇小景》、《暮夜行》、《小家庭的风波》，以及中篇小说《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等，充分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群众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以及对和平与光明的期望。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创作中的精品。在写光明的问题上，艾芜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决不因为主题思想的需要而强加“光明”的尾巴，而是按照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写。从总体上说，他能认识时代，把握社会，形象地反映生活，正确地表现主题，在思想艺术上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 在成都

重庆解放以后，艾芜被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和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人民政府委任他为市文化局局长。但是他仍留在重庆大学任教，并任中文系主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他需要学习新事物。他每周抽出一天，到郊区去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并参加了歌乐山的土地改革运动。市文化局他一天也没有去。1950年春天，在全国文联的安排下，他与夫人蕾嘉一起，去东北鞍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在一个平炉车间工作。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作为全国作协的驻会作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夜归》、《初春时节》等。

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艾芜访问了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访问了波兰的华沙。二月二十七日到达莫斯科，三月十一日回到北京。那年冬天，他又应邀访问了苏联，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几个加盟共和国参观访问。两度出国，艾芜写下了不少游记，后来结集为《欧行记》。

三年自然灾害后，在中国作协组织下，艾芜与沙汀等参观访问了云南边疆地区。这是他第二次南行，看到了原先苦难的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他写下了《南行记续篇》里的作品。此后，他在大庆蹲点两个月，写了几个短篇。又去老家收集了红军活动的情况。四清运动开始，他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准备写作长篇小说《春天的雾》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文革初期，因为艾芜从北京迁来成都不久，一直挂着“专业作家”的牌子，不搞任何行政工作，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因此，文联的大字报很少牵涉到他，未受冲击。到了一九六八年春，造反派从三十年代开始，检查艾芜的历史，说他曾经写过文章，拥护国防文学，跟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罪名大

得吓人。但是面对大字报，艾芜有口难辩，不知怎样才好。

为了避免劫难，艾芜最初躲到成都大学，和持“红成”（指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被认为比较温和保守的一些文联机关干部一起，在教室里睡地铺。后来另一派红卫兵要来攻打成都大学，便又躲到东郊的一家餐馆楼上。在那里受到了冷遇，于是再搬到沙河电影院的三楼。

当时，宜宾市的头头刘杏挺和张西廷，起来造反，取得“826”造反派的拥护，“红成”反对。一九六八年，中央文革印发了文件，委派刘、张统治四川。至此大局已定：文联的“826”派获得全胜，有权斗争人和处罚人。作为“红成”派的艾芜，只得回到文联，准备挨斗。

“826”派首先斗争艾芜，说他是“反革命”，围攻鲁迅，罪大恶极。在大会场上，命令他跪在地上，承受一切侮辱。有一次在城建工人礼堂挨斗，被城建工人在腰背部猛踢一脚，几乎置人于死地，痛得无法忍受，腰干受了重伤，吃了一个月的“三七”才算止住了伤痛。批斗的规模一次次扩大。他们用枪杆子把艾芜押着，跪在台上不许挪动，把揪斗的缺席对象如沙汀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扎了稻草人代替。一些造反派家属中的孩子，用稻草塞在这些挨斗人的嘴巴里，当然也塞在艾芜的嘴里。

经过数十次揪斗和侮辱以后，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文联的“826”派头头，把艾芜押到民主学院，参加“干部学习班”。学员全是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组组长是拥护刘、张的戈壁舟。担任辅导员领导学习的两个“826”派骨干分子，硬说艾芜拥护国防文学围攻鲁迅。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学习班结束，多数学员自由了，而艾芜与少数几个人，被押送到昭觉寺临时监狱，不给工资，每月仅发二十元生活费，家属被迫迁居到小屋子里居住。

昭觉寺的部分宿舍改为临时监狱后，由军人直接管辖。最初艾芜和另外六七个人关在一间房里，后来改为每间牢房关一个人。牢房日夜上锁，仅在放风时开启半小时，让犯人出来透透气。犯人关在屋里，不能自由走动，即使要喝水加衣，也得高喊：“报告，我要喝水。”“报告，我要加件衣。”“报告，我要尿尿。”经窗外的武装军人表示同意，说声“可以”后，才能加衣、尿尿，否则就得挨骂、罚站。白天如此，晚上睡觉也同样不得自由：双手必须搁在被盖外面。可能是他们要防备犯人用自己的双手处死自己。每间牢房里，一到晚上，六十支光的电灯照得通明，卫兵从窗外望进去，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犯人想要自杀，也是无从下手。有时偏偏遇到停电，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就立即叫犯人们起床，穿上衣服，坐在牢房外的阶沿上，每人面前点一支蜡烛，用烛光来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

在夏天，蚊子虽多，犯人的床上却不许挂蚊帐，以免妨碍监视。等到犯人的历史弄清楚以后，才允许点燃蚊香。艾芜不仅要交代国防文学的历史，还要交代在缅甸参加共产党、出席马共中央在新加坡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历史，交代量大，而且远在异国他乡，一时不易取证，被蚊子咬的时间最长久。

临时监狱规定，犯人家属每月可以探监两次，但不准携带食品，怕里面藏有毒药，便宜了这些罪大恶极的犯人。

在昭觉寺临时监狱的四年间，艾芜曾被拉出去批斗两次。一次是作为陪客，在斗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时，站在一旁陪斗，陪斗的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主席沙汀。艾芜没有职称，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黑干将”。另一次，是作为主角，被拉到大邑县安仁镇去批斗。那里集中居住着四川省文艺界的人士，由造反派主持，每天组

织他们学习和批斗，批斗是为了能在“实战”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那天批斗的，是已经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精神贵族”的沙汀和艾芜。他们由武装警卫人员，用吉普车来回押送着，被作为全省广大文艺界人士的“反面教材”、“前车之鉴”。

在昭觉寺坐牢，虽然不常拉出去批斗，但是每天总是揣着颗忐忑不安的心，坐等着一声刺耳的呼喊：

“提审艾芜，有人来审他！”

原来是各种大小造反派组织，也有一些外省市的，派遣专案组人员，深入牢房审问，要艾芜没完没了地回答提问，写材料。他曾写过一百多个熟人的材料，几乎天天埋头“写作”，回忆过去和这些朋友的交往。有时写得太简，或者太好，造反派想要捞到的油水捞不到，就痛加训斥，说艾芜极不老实，罚他重写，定期缴出“满意”的答卷。艾芜在一九八五年京西宾馆的宿舍里，和我谈起写“文革”材料时说：

“写了很多。不管造反派怎么吆喝，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写。”停了停，他有些自得其乐地加上一句：“说来也真怪：凡是跟我交往、够得上命令我写材料的，都是些好人！”他没有给坏人写过材料。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从北京派来了两个专员，要他写三十年代在上海文艺活动中现任新北京中央领导的事。这当然是指江青、张春桥。他们不是艾芜的朋友，无从写起。但是两位专员非常耐心地“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要他解放思想，无需顾虑，大胆提供材料。艾芜解说，当时参加左联的人，连住址也都是保密的，避免事发以后相互牵连；再说，他当时闭门写小说，不问外事，和他们没有来往。江青演的电影和话剧，他也没钱买门票，想看也看不到，提供不出任何资料。他们听了也无可奈何，终于空手而去。

在临时监狱里，除了忙于“写作”外，还忙于向最高领袖祷告祝福。早上起床，还没有洗脸，都要赶到最高领袖的像前，背几句语录，然后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接着再要喊一声：“祝林副主席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可以洗脸，收拾床被。过了一会，命令大家吃早饭的时候，又得赶到最高领袖像前，背语录，呼万岁，喊永远健康。喊罢才能吃早饭。中饭和晚饭也是同样的背诵和呼喊。到了晚上九时，命令大家睡觉时，在上床以前，再到最高领袖的像前，高呼万岁和健康。一日呼喊五次，天天如此。

但是有一天，突然通知他们不再祝寿了。牢房里的难友们个个吃惊，估计一定出了什么事，大家在放风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却都心领神会。后来终于知道：制订这个祷告制度的“接班人”，已经“永远”不再“健康”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从此以后，除了偶尔还有“写作”任务外，住在牢房里的人，可以不再高呼，安安静静地看些家属探监时带来的书了。艾芜的夫人王蕾嘉，把四十多本的《列宁全集》和三十多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地带进监狱给艾芜看。他在坐牢的四年间，把这些书籍通读了一遍。此外，还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列宁的《哲学笔记》、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文学方面，读了英文本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是和中文译文对照着阅读的。

在昭觉寺的生活，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结束。

那年七月，勤奋写作的艾芜闲不住在家休养，又去大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生活，两个月后回到成都，写了一部反映彝族人民今昔对比的中篇小说第

一章，取名《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刚刚复刊的《四川文艺》上。哪里知道，被“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小组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第三期《文化简报》上大事攻击，成都的《四川文艺》和一些大学《学报》，也发表署名文章，随声附和，对小说蓄意歪曲，横加批判。这使艾芜不得不再度中止创作，在家研究《诗经》，写下一些笔记。

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改正后，青海师范大学把我接到西宁，在大学任教，并兼编一个全国发行的语文刊物。骆宾基告诉我，说艾芜写有不少研究《诗经》的笔记，我就写信向他组稿，并问他怎么会研究起《诗经》来。他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回复我以下一封信，说到“四人帮”一伙怎样围攻他，以及他是怎样被迫研究《诗经》的：

范泉同志：

信和书都已收到，谢谢！

一九八一年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近作》，其中有一篇论《诗经》的文章，曾在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刊物《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过，是我研究《诗经》的第一篇作品，现寄你看看。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押在狱中四年，一九七二年释放后，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访问，约有两月，回成都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四川文艺》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大事攻击（一九七四年）。成都的刊物，也随声附和。我只好研究《诗经》，写了不少笔记。有的整理成文章，有的还未整理。文代会后，我又从事创作，放下《诗经》。

得您信后，有些兴奋，打算创作之暇，再把有关《诗经》的笔记，整理成篇。现将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尚未发表），寄您看看，如以为可以发表，即请使用。否则，退还给我。还有第三篇稿子，正在整理。

我去年回您的信，还问一件事，就是《文艺春秋》还有存的吗？我曾经在《文艺春秋》发表一篇小说《敲（割）猪草的孩子》，至今没找着。

今年暑假您没有回上海么？我六月去北京开会，七月去庐山，才回来不久。祝身体健康！

艾芜

1982年8月6日于成都

这封信里所说的《简报》，出版于一九七三年，不是一九七四年。信里所说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文章，是指《江有汜——诗经新解之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

艾芜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四川文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要重新提起笔，把被“四人帮”抢去的时间夺回来，用优异的创作成绩来报答党对他的第二次解放。

一九八一年二月，七十七岁的艾芜作第三次南行，不仅到了前两次到过的地方，还到了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历时两月，行程万里。他写下了结集为《南行纪新篇》里的十三个短篇小说。

一九八一年四月，应日本文化界的联合邀请，作为中国作家访问团团员，艾芜去日本访问。访问团团长是巴金，副团长是冰心和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团员还有草明、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和邓友梅。

艾芜写了《东京日记》、《广岛二日记》、《宫岛印象》、《京都日记》、

《奈良日记》、《在德岛》等系列游记，已经编入他最后一本文集《病中随想录》。

一九八一年五月，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副团长，艾芜又去朝鲜访问。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带了研究生前往重庆、桂林、贵阳、广州等地从事科研，路经成都时，艾芜夫妇设家宴，盛情款待了我。当时他住在红星中路新巷子十九号《现代作家》杂志社的一个院子里，他住的是一间长形的厢房，那里既是他的卧室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的会客、做饭和吃饭的地方。那天他的夫人蕾嘉、儿媳王沙、儿子继湘等和他一起，忙了半天，做了大圆桌上放得满满的一桌菜，请我和我的两个研究生边吃边谈。我们三十多年不见，已经有些不认识了。那天我跨进大门后，只见一个脸色枯瘦的勤杂工模样的老汉正在打扫院子，我问他：“艾芜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他抬头一看，立刻丢掉了手里的扫帚招呼我：“啊！范泉同志，你可来了！我已经等了你两天了！”他连我们居住的旅馆房间也早已预订好了。

艾芜的穿着还是那样朴素，生活还是那样简约，而对待朋友却又是那样热情！

两天以后，原中共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夫妇，设宴邀请我和我的研究生餐叙。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俩潜至上海时，我曾与他们来往，掩护过他们。他俩邀请艾芜夫妇作陪。我们又一次会晤，并一同摄影留念。

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又第三次遇到了艾芜。这一次，经周而复倡议，由我和曹禺、柯灵、骆宾基、艾芜等九人为编委，筹备出版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由我去上海负责具体编务，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艾芜准备把他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春天的雾》，先给《东方》发表。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范泉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信（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我正在校阅拙作《春天的雾》。这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黄伊同志（小说组组长）寄给我的校样。我于本月二十四日校完邮寄回去。我给他的信说，上海有家文艺杂志打算全文发表《春天的雾》。又问他何时出书。如果七八月才能出，那就先在刊物上全文发表，如果在五六月出书，那就选登一部分。等他回信时，再作决定。关于原稿有两份，一份是我写的底稿，一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人抄的。我的底稿，在北京开会时，黄伊告诉我，已给昆明一家刊物要去，打算选登一二章。我现在去信昆明，要他们把原稿退我。因为改的太多，恐不便排印。等黄伊回信后，即索取一份清样（或抄写的稿子）再寄上海。

希望您离开西宁时，给我一信。

此致

敬礼！

艾芜

1985年1月29日于成都

我在一月中旬到了上海。我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共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宋原放联系，取得同意后，一面送呈书面申请，一面开始发信组稿。曾收到欧阳山、陈白尘（长篇自传第一章）、李辉英（从香港寄来）、沙汀、骆宾基等的长短篇小说和戈宝权的论文以及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约定，稿未寄出）。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的雾》清样一份，也由黄伊

同志寄来。后因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王国忠不同意出版，《东方》流产，文稿分别退还。

一九八六年，艾芜创作的长篇小说《风波》，发表在《小说界·长篇小说》一九八六年的一辑里。

到一九八七年，艾芜完成了长篇小说《远山朦胧》的初稿(至今未发表)。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艾芜，进入了创作的第三个高峰期。他先后创作了《山中历险记》、《南行记新篇》、《春天的雾》、《风波》、《远山朦胧》等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他还写了不少散文、游记、杂文和评论文章，开始写了有关《诗经》的考释。

在这段时期，出于对祖国当代历史的沉思和对农村社会前途的严重关切，艾芜通过《南行纪新篇》、《春天的雾》、《风波》以及《远山朦胧》等作品，揭示了极左思潮和封建主义残余对祖国和人民带来的危害。

六 在医院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艾芜去四川广汉参观张人士家回来，感到不适，去医院诊治后，回家疗养。

一九八七年五月，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六月，在体内安装了起搏器。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早上，艾芜在家里走动时，因脑缺血，突然昏厥倒地，造成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当即送往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因为年龄大了，而且有心脏病，不能开刀，只能作保守性治疗，把碎骨捏拢接起。艾芜的学生刘竞程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这次去成都，两次到艾芜家，一次到医院看他。十月十一日下午到艾芜家无人，第二天上午再去，见到夫人蕾嘉（她已是82岁了），摆谈一个多小时，说艾芜于今年一月十七日早上在家里因脑缺血突然昏倒，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当即送川医。因年纪太大，今年已满八十四岁，又有心脏病，安装了起搏器，为避免生命危险，只能采取保守性治疗，医生勉强把碎骨捏拢接起。当然，不可能接得很好。他睡了三个多月后，拄双拐棍勉强可以在室内平地移步，一直住医院至今，已是大半年了。我去看他时，他的右腿短了一节，行动困难。他经常坐在沙发上，专门雇了一个人照顾他的生活。

我们摆谈时，艾芜的头脑非常清楚，语言清晰，记忆力惊人，就是精神很不好，说话细声细气的，似乎很吃力，不能多谈话。

我说：“范泉同志十分关心您，去年我去上海时，曾多次问到您的情况。范泉同志说他曾写信问候您，没有接到您回信，很挂念。”艾芜听了，说他生病，身体不好，很多朋友来信都没有回，请您原谅，并要我代为写信向您致意。

我们在一起还高兴地摆谈到往事，特别摆谈到一九四七年他到上海后，住在大场大江中学附近。当时何家槐在大江中学教书，您到大场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您还送了他一支浪琴自来水钢笔。他说：“以前一直是写蘸水笔的，自从有了这支浪琴笔以后，我才第一次使用自来水笔。”他谈到这段往事，证明他不会忘记您俩的珍贵友情，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悦，显得格外的兴奋。……

刘竞程是艾芜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他在重庆的所属党组织遭到破坏，潜逃到上海，带了艾芜的介绍信来看我。我像接待艾芜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在我家里吃饭，有时住宿。他找到了陶行知

办的育才学校的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参加西南服务团，随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出发时我送给他一个背包，用红漆写了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把被褥留在我家里走了。后来重庆解放，他找到了党组织，在重庆军管会工作，写信向我致谢。八十年代离休时，任中共四川省内江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专职主任兼党史办主任。一九八八年他来上海看我。我托他回去看望艾芜，向他问候，所以他寄来了这封长信。

艾芜的记忆力确实惊人，连四十多年前我送过他一支浪琴自来水钢笔的往事，还能记得。我却早已遗忘了。

艾芜不仅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住在医院里，常常在寂寞中耽于苦思冥想。有一次，他从人的感觉联想到人的创造力。他写下他的感想说，人是用五官感受到别的人和外界的事物，然后感觉到这些人和事物的名称和符号的印象（包括声音和文字符号），印象最多的，是人的面貌和表情。首先忘记的，是人和事物的名字。记得最久的，是人和事物的印象。他说：“人看见各种事物，会把它们组织成各种人的面貌，以及各种形象。蓝天白云会幻化为苍狗，杯弓会成蛇影。这可能是人的创造力吧。”

他的这些苦思冥想，蕴藏着毕生实践的丰富生活经验。

艾芜卧病床席，经年累月，长期看着天花板和墙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能不浪费时间，而在被迫闲看中，勤奋思索。他更能联系文学创作，在卧病思索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在看天花板和墙壁时，第一眼看了本来的形迹，是污点就是污点；但是看得久了，污点变了，有的像军人的脸，有的像小孩子的头。事实上，这第一眼的反映是真实的，后来的反映则是幻象。而这两种反映，有真实有幻象，倒是搞创作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于是他联系过去的论点，作了修正。他说他过去提出的公式是：（1）认识人生，研究人生，求真。（2）评论人生，改革人生，求善。（3）描写人生，求美。“这不够，还得加一句：创造人生。凡是从事写作的，尤其是写小说的，都明白，写作的人，都在写作的过程中，重新创造人物，创造故事和情节。发现人生的美。”

他终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自己过去的观点：不仅描写人生，还必须创造人生。

卧病床席，经年累月，也往往把病房玻璃窗外的树木花草，看成人形，而且变化多端，时而是老人的身影，时而是青年的头像。这种幻化，艾芜把它说成是“创造”，是再现许多人形的创造。因此，他说：“艺术就是利用这一再现，这一创造，进行文艺的创作的。”

树木幻化为人形，再通过联想，艾芜又醒悟到宗教为什么大都产生在东方的原因。他说：“东方的森林茂密，宗教信徒大都在森林中修身养性，森林会给他们各种幻影。这些幻影能发展他们的幻想，也能使他们的认识发挥一生积累的各种印象、幻影和幻象。这是基础组织。”他又说：“他们所见的幻象，欺骗了他们，使他们认为看见了神灵，或者认为神灵对他们作了启示，他们继而向人民宣示，成为宗教领袖。”

有时，艾芜的精神比较好，看了一些书报，就在病房的写字台上及时写下了一些读后感。比如有一次，他看到一则新闻，说两家人吵架，弄成两姓人斗争，记者称为“宗法社会复活”。艾芜则认为，这是由于大部分干部都在搞钱，农民有事找不上干部，只能找同姓人。他还进一步联想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搞四清工作时，发现一个大队的干部，都在一条街上修了新房子，

社员却没有。干部脱离群众。他认为这始终是农村的大毛病和常见病。

平时，在医院的孤独生活中，艾芜常常回想到青年时期阅读过的一些世界名著，写下了他“再认识”的感想。比如易卜生的剧作《群鬼》，他在三十年代读过潘家洵的中译本，后来又从英文本读过好几遍。他认为剧本本身有一个纰漏：“丈夫害了花柳病，同女仆生下的女儿，却又是健康美丽的，可以看出剧情有人工制造的痕迹。”再如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三十年代洪深译为中文，在上海演出。他认为剧本本身有个大漏洞：当少奶奶误认丈夫有外遇，抛弃孩子投奔自己追逐的男人时，却把丈夫祝贺她生日的礼物扇子带走。这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他又写到对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的再认识。他说小说写一支游击队，遭受毁灭性的失败，最后留下十九人，却要在人民中训练出新的游击队，给人增加斗争的勇气。这才是现实主义。只写游击队的失败，带有片面性。而现在有人把这种片面性的现实主义，看作是主流，这是错误的。

艾芜在长期住院的一九九二年以前，健康状况稍微好一些，基本上坚持每天或几天写一段“文革”回忆录，数十字至千余字不等，还不遗余力地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远山朦胧》作了反复修改。他的哲嗣继湘和儿媳王沙，在合撰的《病中随想录·前记》一文中说：

……这部近二十万字的作品，入院前基本成型，尚待完善。一九八八年冬父亲把它带到医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极其严谨，有时在我们看来，简直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哪怕是一个稍不满意的细微末节，也绝不轻易放过，删改增补反反复复。如此浩大的工程，于体魄健壮的人，也非一件容易的事。……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请，编了一本《文化老人话人生》的书，向艾芜组稿。他在医院里写了一篇《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文章，还写给我最后一封信：

范泉同志：

您好！我在医院，将近三年。胸部安了一个起搏器，帮助心脏工作。其他小病也不少。

好多友人来信，我没有回答。您的信也没有回，请原谅。

这几天精神比较好，勉强写好您要的文章，现寄上，请改一改，再行发表。

祝您身体健康！

艾 芜

1991年8月7日于成都

我读着艾芜在医院里写的这篇文章，觉得思路清晰，字迹纤细有致，除了英文“tomorrow”少写一个字母“r”外，其他没有什么差错。文章的格调高雅、乐观。他对生命进入老年，将要画上句号的事，十分平静，既听其自然，又积极争取尽可能自由地活动。他说：“年纪大了，可以继续作些研究工作。比如我研究《诗经》，偶有所得，亦很快乐。”他赞美孔子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他在研究、构思或回忆中偶有所得，有新的认识时，他就会愉快地记录下来。他不忘写作。他说：“有时回忆一些走过的地方，一些遇见的人，就会有新的认识，这能够引起写作的欲望。即使写了几百个字，或者几十个字，也是很愉快的。”

在住院治疗的后期，艾芜还是凭着他顽强的写作意志，鼓足勇气，十分艰难地写下了关于验证《诗经》的读书体会，特别是对于一些《诗经》中字义解释的验证。

我在一九八一年主编语文刊物时，艾芜将他在“文革”后期研究《诗经》的一些笔记，整理出《江有汜》、《十亩之间兮》等单篇，寄给我发表。当时，他就把“歸”字解释为“婚配集会”。为什么？因为右侧“帚”，是指有穗带籽的礼物，是妇女献给神的祭祀礼物，在古代文字中屡屡出现，一直是代表妇女的。而古代的祭神集会，男女欢聚一道，都要野合，就当时的风俗说，这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进步的。《礼记》说：“非祭男女不交爵。”说明了只有在祭祀时的男女，才可以自由交爵，欢聚性交。再从左侧“止”和“止”看，“止”是指高处，“止”是表示正在进行。艾芜描绘婚配集合的过程说：“在高出地方，‘如歸’中的‘帚’，先要敬神、祭祀、奏乐，然后歌舞，或者比赛，再进行饮宴，最后散到山巅水涯，隐蔽之处，成双成对地野合。”他说，在云南缅甸老挝之间的崇山峻岭，结寨而居的爱尼族，仍然保留着这种婚配集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他读了伍仕谦的论文《论文字本义应于偏旁相从诸字中求征》，将“止”的本义解释为足趾，他不以为然，但是他看到了论文中所引“止”的甲骨文作“𠄎”（甲600）和“𠄎”（甲2486），为他以前解释的“婚配集会”找到了更有力的证据。他说：“t、𠄎是象形，又有象征之意。我以为‘止’是性交。”又说：“看了伍仕谦的论文，引用了两个‘止’的甲骨文，更证明我的诠释，不无道理。”

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有不少古字，就像化石一样，要寻找它隐藏得很深的本义，已是十分困难。艾芜在住院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却留下了不少纸片，写的是《诗经》内某些古字的诠释。有些仅仅五十字左右，有些仅仅十多个字，也有仅写“胡逝我梁”四个字，什么也没有再写的。有些已经写出的，句子还不全，意思还没有充分发挥。所有这些，说明他在住院最后一段时期，如何顽强而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写作到底。

继湘和王沙在《病中随想录·前记》中，描绘艾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这样写：

一九九二年初夏，父亲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提笔已是万分困难。帕金森氏症的折磨，频繁的肺部感染，多数日子只能躺在床上接受治疗。但是，即使在这样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他却依然亲自动笔，支撑着病体，完成英文版《艾芜小说选序》、散文集《我和孩子序》。只要能够握笔，疾病的伤痛甚至死亡，在他眼里，渺小如芥尘，微不足道。进入秋天，父亲已完全无力写作，望着离病床仅一步之遥的书桌，父亲的神情带着从未有过的无奈。他对前去探望的老友谈到《易经·鼎卦》时说：“‘鼎折足，覆公餗。’现在我长期住在医院里，像鼎折足一样，想做更多的事总是力不从心，只有耗费国家的钱财。但是，我仍然应该努力做些工作。”父亲就是带着“耗费国家的钱财”的歉疚心情，带着“努力做些工作”的高尚愿望，带着一颗干净得一尘不染的灵魂，握着笔管，走完了生命之旅。”

那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八时五十分，经医院全力抢救，控制住了他的肺炎后，因心脏极度衰竭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八岁。

他在住院治疗的五年期间，反复修改了最后一部写革命英烈因出身不好得不到公正纪念的长篇小说《远山朦胧》，写下了十多万字各种体裁的随想录。

艾芜坎坷一生，漂泊一生。

他不怕坐牢，不就官职。他选择写作的道路，向往着通过文字的形象塑造，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苦人申冤，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仅以短篇小说统计，他一生写了近二百个短篇，其中解放后写的也有三十多个。虽然微薄的稿酬只能维持他多子女家庭的清贫生活，但是他义无反顾，仍以写作为乐。写作，是他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他是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1995年3月1日

附记：

一、艾芜一生的漂泊和写作活动，可以凝聚为七个板块，即在缅甸、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北京、在成都、在医院。“在北京”时期，因为忙于国内外参观访问或蹲点，并参加两期四清，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基本停笔，除本文提到的作品外，写作较少，为压缩篇幅，不再另列章节。

二、关于艾芜去延安问题。三十年代周扬在离沪去延安前一天，对艾芜说：“你要去延安，可以找夏衍。”后来艾芜找到了夏衍，夏衍要他与潘汉年联系。他不认识潘汉年，没有去找。四十年代在桂林时，曾通知艾芜一个人去延安，不带家属。他认为妻子王蕾嘉也是左联盟员，应该同去。为了照顾家属，没有去。一九四五年春在重庆，叶以群通知艾芜，说周公馆的徐冰，已办好他全家去延安的手续。当时艾芜正写长篇小说《故乡》的最后部分，准备写完交给出版社后再走。经联系，得到何其芳同意。后来《故乡》写完，交群益出版社时，日寇已投降，再向徐冰、何其芳要求去延安，他们说，现在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延安的人也要出来，就不必去延安了。

三、关于艾芜夫人王蕾嘉同志。她的简历，见本文第二章。她在上海劳动大学念书时，曾与周立波同学。她不仅写诗，包括新诗和古典诗歌，还写小说。她的短篇小说《边地》和《离乡》，曾分别在我编的《文艺》丛刊第三辑（一九四七，十二）和《文艺春秋》月刊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四八，五）上发表。她不幸于今年一月三日晨五时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雪压乔林同一色——回忆我和另境相处二十年的往事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和另境兄在上海交往了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经历了孤岛时期、日占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多次政治运动时期，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历尽沧桑，但是我们之间因从事文艺工作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友情，却始终如一，毫不动摇。特别是由于我们都曾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击，以致丧失了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果的壮年时期，甚至像另境，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不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抱憾终生，酿成了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悲剧。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在了一起。

现在，结合我们两人相互交错的文艺工作，回顾这二十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遭遇。

一 支持《堡垒》的击杀

一九三九年，我和两位新闻系同学一起，由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推荐，进入一家国民党主办、挂着美商招牌、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抗日报纸《中美日报》社，初编本市新闻，后编副刊《堡垒》。还在副刊的筹备组稿时期，经赵景深先生介绍，认识了另境和他的胞弟司徒宗（原名孔彦英，又名令杰）。

当时的日伪势力，通过特务组织“七十六号”的歹徒，早已侵入了形成孤岛的上海租界。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在租界上发生的流血恐怖事件进入了高潮。略举数例：七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大批“七十六号”特务袭击《中美日报》，幸赖看门的保镖立即拉上铁门，才无法冲入，转往《大美晚报》社大打出手，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排字工人各一人。八月三十日，《大美晚报》副刊主编朱惺公被特务暗杀。十一月二十三日，身任公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长的郁达夫胞兄郁华，因不向恶势力低头，秉公执法，而被特务狙击身亡。十二月十二日，曾为支援新四军抗日活动和为救济难民而举行过三次义卖代价券广播会的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被特务枪杀。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蛰居上海的进步文化人，不得不深居简出，用种种化名，在抗日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比如居住孤岛的王统照，就曾使用“容庐”、“韦佩”等许多笔名写稿；茅盾虽去新疆，但在孤岛出版的长篇翻译小说《孤独》，考虑到编者和出版者的安全，也用了“冯夷”这样的笔名。当时另境的主要工作，是从中华中学、华光夜中学戏剧科，发展到创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目的是想“以最短的时间，造就一批短小锋利的匕首和投枪，作用于抗战的刺杀”。剧专的教师如巴克（戴介民）、列车（陆象贤）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支持我编抗日副刊，他也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写稿。他自己有时化名写稿，有时用真名写稿，如用真名写了《对于方言剧的认识》、《论方言剧和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等文章。一九四一年二月，由于《堡垒》定期编发了锡金、朱维基、芳信等撰稿的“诗座谈”专栏，受到报社内部国民党当权者的指责，终于以“共党嫌疑”为理由，停止了我的编务，由国民党党员编辑钱佛公接编。

二 合办《生活与实践丛刊》

《堡垒》易手以后，我在另境的积极鼓励并参与下，和钱今昔、郑忠谔、司徒宗等筹备自办刊物。经过多次商议，创办了《生活与实践丛刊》，分辑出版。三月中旬，第一辑《论思想方向》出版，司徒宗紧扣丛刊宗旨，写了《教育·生活·实践》的文章。由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的“学协”西区交通站“交通”钱今昔，提供了辗转来自延安的文章：张庚的《蒲列哈诺夫论易卜生》。我根据他转给的材料，写了《窑洞大学教育》，歌颂延安的抗大。另境写了一篇《论群众》的文章。他从群众的情感、理智和动作三个方面来考察群众的本质，阐释群众情感的五种特性，并从许多革命的历史事件中观照英勇的群众运动，指出“群众是极端主义的忠实执行人”。他说：

中国历史上田横五百壮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五卅惨案中的爱国健儿，哪一个不是以身殉道，甘之如饴的！这种可歌可泣的群众场面，在这次亢占（按：临近孤岛沦陷时，一般在刊物上用“亢占”代“抗战”）中正不知有多少。像这种壮烈的事情，只有在群众行动里才能表现出来，为什么，就因为群众行动的时候，已经消灭了个人的情感和种种个人的利害观念，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高洁的利他观念存在，倘发现其中有自私自利的人或言辞，一定被众所斥，倘有人提出了多数人利益的标的，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所以亚里士多德曾有一句名言说：“中庸是道德的正义，但是最高大最优秀的志愿，却是极端。”所以群众是极端主义的忠实执行人。

文章虽论群众，实质却是在歌颂抗战和歌颂浴血于抗日前线的英勇健儿们。另境直面敌人，在这篇文章里毫不掩饰地谈到了抗战。作为一名手无寸铁、每日必须外出为衣食奔走的普通文化人，处身在敌伪势力已经侵入租界、流血恐怖事件层出不穷的环境里，能写如此倾向鲜明的文章，视被特务暗杀于不顾，极不容易！

不定期刊《生活与实践丛刊》出版了四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冲进了租界，出了四期、再也不敢去大陆书报社结算销售款的《生活与实践丛刊》，不得不从此停办。

另境还在一九四一年冬，为了扩大华光戏剧专科学校的影响，筹款出版《文学与戏剧丛刊》，由另境主编。第一辑书名《前奏曲》，编发了地下党员钟望阳等文学作品。十二月八日，刊物刚出版，还来不及发行，只取出一些样书赠送作者和剧专的学生，不得不全部销毁。

就在孤岛沦陷的这天早上，另境按照地下党早先的指示，来到剧专，摘下了校门口的招牌，宣告“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从此停办。

三 《剧本丛刊》和《文艺春秋丛刊》

孤岛沦陷以后不久，另境变卖了全部书籍和日用家具，携带家属，投奔苏北新四军解放区。一年后日寇发动“大扫荡”，又奉命遣散，携家属回到沦陷后的上海。由于日用家具需要重新添置，生活十分窘迫。即使如此，他仍坚决拒绝为日伪报刊写稿，宁愿由我介绍，参加复旦大学蒋寿同教授主持的整理史料工作，报酬极低，有时还发不出稿费，用煤屑支付，以致他的家属，不得不用双手制作煤球煤饼，手指发黑，长期开裂。到了一九四三年冬，

才与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订约，由他主编一套《剧本丛刊》，分集出版，每集十册。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五集，共五十册，团结了大批前剧专的教师和留居上海的进步剧作家们，他自己也积极写作历史剧，先后出版的有《李太白》、《沉箱记》、《春秋怨》、《凤还巢》、《蛊惑》等。《剧本丛刊》里的剧集作者有李健吾、杨绛、周贻白、姚克、袁牧之、佐临、吴仞之、鲁思、顾仲彝、方君逸（吴天）、朱端钧、魏于潜（吴琛）、锡金等。

一九四四年夏，抗战胜利在望，我经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介绍，进入永祥印书馆，主持编辑部工作，开始收购书稿，并筹划出版丛刊。在我制订编辑部工作规划时，另境积极参与，并在组稿时大力协助，介绍了一批进步作家，如吴天、吴琛、周贻白等。《文艺春秋丛刊》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创刊，先后出版了《两年》、《星花》、《春雷》、《朝雾》、《黎明》等五期。

一九四五年春，另境任新中国艺术学院教务长，聘请我讲授《文艺思潮》课。五月，另境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酷刑。我曾陪同另境家属去看望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等，多方设法营救。但是在另境被捕一个月后，日本宪兵队甲斐军曹带了翻译，通知永祥印书馆董事长许晓初，准备逮捕我。幸亏许晓初跟这位宪兵队长有过交往，他请来了和甲斐熟识的一家毛纺厂蔡经理作了担保，今后随传随到，我才免于入狱。事后，书店经理陈安镇给甲斐军曹的宪兵小队每人一个带有打火机的烟盒（这在当时比较珍贵），还请甲斐吃饭，“借调”他三百万元，才稳住了阵脚。但是，我在被传话三次以后，也躲藏了起来。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获得了自由。我立刻去看望另境，这才知道他曾坐了老虎凳，上了电刑，在日本投降前夕才释放。他说：“虎口余生，这条命是捡来的。”

四 茅盾主编《文联》的始末

日本投降后不久，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另境带给我茅盾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他们夫妇俩将转道广州、香港而回到上海；还谈到中外文艺联络社准备在上海出版一个机关刊物，由他本人主编，叶以群负责具体工作，已经先到上海，准备在上海找一家书店出版，要另境协助，代为寻找。另境让我询问我工作的永祥印书馆，是否能承担这项出版任务。

从表面上看，这时的形势非常好：抗日胜利，毛主席到重庆和谈，签订双十协定，正是出版事业可以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机。永祥的资本家陈安镇听说由茅公主编一个刊物，便一口答应，要我把这期刊的出版，纳入我拟订的编辑部总体规划，由我统一安排出版印制事宜。第二天，趁热打铁，我和另境作为介绍人，约叶以群到书店经理室，一起商议了开本、篇幅、出版周期、编排校印时间顺序、稿酬及编辑费等一系列问题，签定了合约。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一个十六开本、每期一个全张纸另加封底封面、以新五号字排印为主的文艺述评和报道性的半月刊《文联》创刊号诞生了。

茅公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并发表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总结了抗战八年来文艺工作的优缺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文联》第二期上，茅公又发表了《谈歌颂光明》一文，指出在我们歌颂光明的同时，必须暴露黑暗。茅公还为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写了《新

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的文章，说明文化运动必须配合民主运动等等。一九四六年六月，《文联》被迫停刊。这是胜利复员时期在上海文艺界最早指出“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方向，交代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战斗任务的刊物，而这个刊物，正是在另境的多次奔走联系下创刊的。

五 茅盾·楼适夷·李何林

这里应该穿插说明三件事：茅公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是另境和我事先安排他在上海的住所的；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党员楼适夷，曾在孤岛的流血恐怖时期，从香港秘密来沪，住在另境家里；曾在一九二七年入党的李何林，一九四八年许寿裳被害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暗中通缉，逃离台湾，潜居在上海的另境家里，然后再去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三月，另境接到茅公从重庆写来的信，说将在四月离开重庆，途经广州香港，大约五月下旬可以到达上海。他委托另境在上海找寻住房，房东或邻居必须可靠。

日本投降后，最先到上海的是属于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随后是大批地下特务的涌现，接着是由重庆坐飞机来的军政、财经、中宣部、工运等大批接收大员。他们把敌伪人员八年来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得来的物资一一劫收，大发胜利财。单就抢占住房一项说，只要是敌伪人员曾经住过的，他们都可以霸占下来。霸占的房屋多了，就用金条顶出去。当时茅盾找住房，并无金条，我就跟欧阳翠商量，经她同意，无偿地让出二层两间最好的前后楼房给茅公夫妇居住。灶房和客堂公用。选定住处是经叶以群同意的。

为了让茅公回沪后就能工作，我和另境曾到虬江路上的旧货商店去淘购那些准备逃离中国的日本人抛售出来的沙发、写字台、双人床、衣橱、桌椅、炉子、灶具等。这些家具什物，都是很新。茅公夫妇进入寓所，见了非常满意。另境曾为他们夫妇俩在室内拍摄两张照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三卷一期上。他俩坐着的沙发，放在中间的茶几，茅公伏案书写的桌子，都是我和另境从虬江路上许多旧货商店堆积如山的家具中挑选出来购买的。钱是我向书店资本家预支的。

其次谈谈楼适夷。

茅公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文艺阵地》最初三期，是在香港编定、广州印制的。由于日机狂轰滥炸，广州的印刷厂被毁，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起，改由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在已经形成孤岛的上海秘密排印，由另境校对，并协助茅公在上海作家中组织部分稿件。刊物印刷装订后，由邮局的地下党员设法秘密运港，然后转发大后方各地乃至解放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茅公应新疆学院校长杜重远的聘请，前往新疆任教，《文艺阵地》从二卷八期起交由楼适夷接编，仍由另境在上海负责校对。一九三九年夏，适夷在香港的活动受到当局注意，为了免遭不测，便生活书店协助下，秘密来到上海，住居另境在尊德里寓所晒台上的书房里。另境掩护了适夷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再说李何林。

抗战胜利后，李何林在台湾省编译馆工作，在台湾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二月，许寿裳被害（一说死于盗贼之手），不久，黄荣烂被捕后在狱中被

害，李何林受到监视，传被通缉，潜逃来沪，住在另境家里，然后再到解放区。我在另境家里认识了他。一九八四年我去北京看他时，他很认真地向我道谢，说当时他拿了我预支的稿费，去了解放区；还问我另境夫人的名字，因为他还记得她做的菜很好吃。谈到另境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时，他不胜唏嘘地说：“另境夫妇冒着窝藏逃犯的罪，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俩是好人！”

六 为创建进步文化而不遗余力

应该回过头来补充说明：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曾集资创办大地书屋，我介绍另境主持书屋的编务。他敦请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洪深等五人为编委，编辑出版《大地文学丛书》。一九四六年冬，出版了丛书的第一和第二种：洪深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和茅盾的《时间的记录》。前者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音韵的原理和运用，是作者积年研究的心得结晶，书前有郭沫若写的长序。后者是茅盾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六年的杂文结集，共收三十余篇。此后又曾出版过李青崖译的《饕餮的巴黎》。由于蒋寿同的私人原因，影响到大地书屋破产。很多已经组来的书稿，只得转给其他出版社出版。如由茅盾新写序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编入了我编的《寰星文学丛书》，由寰星书店出版；西谛（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交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李广田的《文学枝叶》和王西彦的《眷恋土地的人》，编入了我编的《一知文艺丛书》，由益智出版社出版。

另境在这一时期，还为春明书店编了《今文学》丛刊，为权威出版社编了《新文学》半月刊。《新文学》半月刊创刊于一九四六年元旦，曾出版五期，我先后写过三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论台湾文学》，第二期上的《论朝鲜作家》，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印度剧的起源及其发达》。为春明书店编的《今文学》丛刊，创刊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记得出版过两期，每期一个书名：第一期是《跨着东海》，第二期是《我是中国人》。执笔的有郭沫若、茅盾、艾芜、臧克家、碧野、叶圣陶、李雾野等。他自己写了小说《曹老师》，我为丛刊写过散文《浩瀚的海》。

另境为创建进步文化而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七 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我在上海编的横跨六年的期刊《文艺春秋》，从日占时期的不定期丛刊到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月刊，始终得到另境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在遇到关键性问题时，总是能够共同商议，研究对策，最终获得妥善的解决。

略举数例。

我在资本家企业永祥印书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力争编好期刊《文艺春秋》。为了把这个刊物尽可能编得生动活泼些，除了按作品性质和篇幅长短运用各种花边铅条组成不同版式外，还利用永祥印书馆本身有铅印厂、彩印厂和零印厂的有利条件，多刊照片和木刻插图，以构成形象化的特色。仅仅目录就用当时少见的彩印折页。另境全力支持。实际上他已成为这个刊物的特约摄影记者。比如第三卷里茅盾和郭沫若的生活照，欢送冯玉祥去美国的照片，欢送茅盾赴苏访问时的一组照片，第四卷里茅盾归国时与迎迓者郭沫若，叶圣陶等在驳船上谈话的照片，“‘五四’艺术节在上海”中邵力子、

柳亚子、熊佛西、陈烟桥等谈话活动的一组照片，回忆鲁迅先生殒殓之日的一组照片，第五卷里另境、碧野、戴望舒、许杰、谷斯范和我同去大场拜望艾芜、何家槐的一组照片，都出自另境之手拍摄。

一九四七年一月起，永祥印书馆总经理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将《文艺春秋》月刊的清样按期送请国民党检查官陶广川检查。当茅盾的文稿《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被陶广川在书店送去的清样上涂改以后，我与另境商量，决定回到孤岛和日占时期出版“丛刊”的老路上，自办一个丛刊，把被审改的文章移到这个丛刊上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和另境、何家槐、萧传芳、冯之原、徐同康等合办的文艺丛刊社成立，出版了第一辑《脚印》，将茅盾的文稿从《文艺春秋》里抽出，只字不改地全文发表在《文艺·脚印》里。

丛刊共出版七期，全文发表了因受检而被审改或被删节的许多文艺作品。另境在第2辑里写了一篇杂文《“意外”的扬弃》，认为有许多事情看来好像是意外，其实倒是意内的。面对这种“意外”，他未免见不平而“打上一拳”，见危难而“拉上一手”。文章暗喻了国民党扼杀人民言论，看似“意外”，其实是意内，因为它眼见大势已去，狗急只能跳墙。因此面对这类“意外”，他未免见危难而合伙为了这个丛刊，也是给扼杀人民言论的国民党检查官当头“打上一拳”！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文艺春秋》出版了第八卷第一期。为了迎接上海的即将解放，我特约了邵力子、唐弢、叶圣陶、孔另境、施蛰存、许杰等写了“新春随笔”。另境的一篇《展望》写得比较露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

“遍地烽火，漫天战云，我们是喘息在布满火药味的大气里，谁能忍受这火药味的，谁就有资格尝那行将到来的甘味。对于那些挟黄金携娇妾的逃难者，我要用一句老粗的话：‘滚他妈的！’”

什么是“行将到来的甘味”呢？

非常明显：“甘味”就是解放——上海的解放。

他说出了广大人民渴求解放的心声！他也呵斥了那些发了胜利财的国民党高层人物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

他的思想一直是红的！

八 在历次运动中浮沉

解放后，另境曾应齐鲁大学的聘请，前往山东任教。由于院系调整，齐鲁不复存在，而且工资每月仅一千斤小米，所以执教半年后又回上海。当时施蛰存在教学之余，兼任春明书店总编辑。他见另境返沪，便辞去编务，推荐另境继任。解放战争时期另境曾为春明书店编过《今文学》丛刊，因此书店的资本家立即同意聘任。翌年资本家潜逃香港转往台湾。被国民党疑为共产党派遣而枪决。春明职工因在填报工商报表时缺少资方代理人，要求总编兼任代理资方。另境曾为此事和我商量。当时我已在市工会工作，我劝他不要接受。他又去市出版局出版处征询意见，一位颇有声望的同志认为可以接受，还说接受了，才能行使总编不能行使的职权，从而可以改造这个旧出版

机构。另境听了他的话，终于兼任代理资方的职务。

兼任代理资方不过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另境被职工不断批斗。其中批斗最最积极的一位，正是沦陷时期落过水、解放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经朋友一再说情、软弱的另境吸收了他进入春明任编辑的人。

运动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开始，到一九五三年才结束。

公私合营后，另境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文化出版社第一个揪出了另境。他眼看形势不妙，留下“迁地避器”的字条，逃往苏州周瘦鹃家。周十分害怕，不敢窝藏。他只得仍回上海挨斗。当时他知道我已入党多年，就来找我，探询运动的性质，以及有什么可以解救他的办法。我也说不准这次运动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不过是一般的党员。但是我确曾建议他写信给茅公，转请上海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能否考虑他一贯靠拢党，做过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而给予宽大处理。他性格倔强，此后并未写信。但石西民部长确实没有同意戴另境的帽子。相反，在一九五八年双反运动中，我却戴上右派帽子，撤销我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职务，流放青海。在我即将离沪去青海时，另境得到了信息，到我住处来看我，希望我到青海后告诉他地址，保持通信联系。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我站在没有篷帐的卡车里，从青海省会西宁市，被送到鲁沙尔的山沟里。我一开始就患了严重的肺炎，而且害怕连累人家，所以不再写信给另境，一直到他受迫害致死，我还不知道他已不在人间。

事后我才知道：在“文革”运动中，另境虽已退休，仍被作为“漏网右派”揪斗。在第一次抄家后，他曾逃到硃石的堂叔家里躲避，但仍被造反派押回上海，并且罪加一等，终于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被投入监狱。由于他患糖尿病，狱中得不到治疗，保外就医时已经骨瘦如柴，不能走路。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正式宣布释放，同年九月十八日即与世长辞。

九 从左到“右”的突变

另境一生，坐过三次监牢，受过日寇酷刑，经历过无数次的揪斗。

另境在共产党员姐夫茅盾的影响和指引下，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上海大学念书。大学毕业后，他去广州参加革命工作，此后参加北伐。一九二八年秋在杭州地下工作时，因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仍继续从事进步文教工作。一九三一年秋在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任出版部主任时，因收发苏联报刊而被军阀政府逮捕关押，罪名是“共党嫌疑”。一九四五年春也是因为“共党嫌疑”而被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逮捕关押。二十年来他一直因为左倾而受尽折磨。

可是全国解放以后，从三反五反、反右以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却一直在“右”的罪名下被批斗、被投入监狱。

他究竟犯了哪些“右”的罪行呢？

我从他的书面检查里去找。

在三反五反的检查里，我看到他承认的罪行是：背了进步包袱，不刻苦钻研马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跟群众打成一片，在“社务会议”的章程里，订出“经理可以否定议案”的条文，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特权思想；

这件事，后来石西民同志曾在一次晤谈时乘便向茅公提及，因此另境才知道。

不顾人浮于事，请施蛰存兼任编审部主任，造成浪费。

春明的职工还说他“分化职工团结”，他却坚决否认：

我现在虽坐在经理人的座位上，但我与资本主义无任何渊源，本身也是薪给生活者。我为什么要分化职工呢？我难道不想团结大家搞好生产吗？……我过去二十年来也还没有做过危害工人阶级的反革命行为，我难道故意无原则地制造同志们的磨擦，企图达到某种反革命的目的么？

再看“文革”开始一年后写的检查，他承认的主要罪行是：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最初同意，后来却有怀疑，但嘴上没有说出来；经戚本禹评定、姚克写的大毒草《清宫秘史》的初稿《清宫怨》，在四十年代曾由另境编入《剧本丛刊》出版；自己写了一部尚未出版的《万古忠义》电影文学剧本，为戚本禹批为叛徒的李秀成领导歌功颂德；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专家领导出版社”的右派言论是正确的；倡议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张建立人才自由市场。

从改革开放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这些所谓“漏网右派”的“罪行”，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而像“出版工作者协会”那样的组织，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了好几年了，我现在还兼任着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出版史料》的编委。

十 雪压乔林同一色

从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九年，另境参加过五卅运动，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参加过抗日地下斗争，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他反对过帝国主义，反对过军阀，反对过日伪政权，反对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曾经在革命队伍里浴血奋战，在白色恐怖中地下斗争；他曾经从事过组织农民，从事过工人教育；他在姐夫茅盾的影响下，始终靠拢党，掩护过党员作家，为创建进步文化而不遗余力。事实上，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已经形成了他坚定的思想意识：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不妥协，不出卖自己同情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他在解放前的全部著作，一直到临近解放时写的文章，都可以证明他是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走的，不是走向右边，而是走向左边。可是全国解放以后，他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被作为“右”的靶子，一次又一次地被审查，被揪斗，甚至被逮捕关押。他有口难辩，但又不愿说着违心的话，因此只得一再留下字条，“迂地避器”。

另境的这种处身于左右夹击而又无可言喻的苦恼心态，我是十分理解和同情的。因为正像他的遭遇那样，解放前的国民党也曾经怀疑我，说我有“共党嫌疑”而撤了我的职；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怀疑我，说我有“共党嫌疑”而通缉我。可是解放以后，在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却居然还有人怀疑我是“南京暗探”——国民党特务，等到查清、确定子虚以后，又因为我对此事鸣放而定我诬蔑肃反运动的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流放青海整整二十年。当然，现在想想，像另境和我那样的遭遇，在知识分子中绝不是个别的。从解放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打倒“四人帮”为止，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矛头总是针对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总是成为老运动员，在他们身上好像有永远洗刷不尽的污垢，一定要把他们的大好岁月在左右夹击中销

蚀干净，一定要把他们准备报效祖国的聪明才智毫不顾惜地抛扔到撰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中。这真使我不禁想起宋代法成的一首七绝：

雪压乔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虚碧；
采樵人立渡头寒，极目圆蟾为谁白。

徐迟琐忆

翻译——求索

一九四六年夏，我在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郭沫若先生家里，认识了从重庆回到上海已经有了三个月的徐迟。此后，他多次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闲聊，有时还带来他最新的译作。比如他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依利阿德》，是从威廉·柯柏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发表在我编的《文艺春秋》四卷一期上的《倾国倾城的海伦》，就是其中的一节，全诗五十二行，不过五百六十四字，但是附在后面的说明，却近两千字。这说明了他在翻译时所下功夫之深。再如他翻译阿尔麦·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在重庆时翻译出一半，出版了单行本。回到上海后，他和宋蜀碧女士合译下半部，一九四七年十月发表在《文艺春秋》五卷四期上的《托尔斯泰办学校》，就是其中新译的一章。

复员回上海以后，徐迟最初忙于翻译，较少创作散文和诗。他谦逊地对我说，这些年来，他往往是通过翻译，学习了原著的思想和技法。他说他曾翻译过汉明威的《永别了战争》，他的散文风格就曾受到汉明威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他为香港的《星报》翻译电讯和战地通讯，他自己也去前线采访，写战地特写。他说在整个抗战时期，他写抗日救亡的诗，也曾翻译雪莱的诗；他写特写和报告文学，也曾翻译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斯坦因的《解放是光荣的》。

翻译使徐迟学习到很多，既扩大了眼界，也加深了文学素养。所以有一次在和我闲聊时，他几乎非常肯定地说：“翻译，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求索的手段。”

《艳遇记》的来历

一九四六年三月，徐迟从重庆回上海前，他的夫人陈松带了孩子先来，他因事暂留重庆。

在那段时间，他孤身一人。中断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后，他倒反而觉得生活轻松自由，富有诗意，可以在朋友家里无拘无束的闲聊，不必顾虑时间太晚，有时甚至可以不回家，住在朋友家里。有时一个人上馆子，饱餐一顿后，沿着江边散步，优哉游哉。他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中突然“解放”出来，品尝到放荡不羁的野马般生活，实在使他难以忘怀。

但是他又非常坦率地告诉我：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在他将要离开重庆前两天的那个晚上。

那天，他辗转相托，终于联系好飞机票，第二天可以去购买，第三天可以飞上海。那天晚上，他很高兴地去一位朋友家告别。在朋友家的客厅里，除了朋友夫妇外，还有一位长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的小姐，据介绍说，是学艺术的。他们四人一起，闲聊到十点。眼看主妇大打呵欠，他和小姐才不得不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俩下了山坡，在重庆的幽暗街道上漫步，闲聊，就像一对情侣，从两路口走到十八梯，一直走到她的住处。这时，他准备告别，可是那位说话逗人的小姐，却不顾时间已晚，热情地坚持邀请他，要他再上她家谈谈。

他陪她在幽暗的路灯灯光下，取出钥匙，打开门锁，上了楼梯，进入她的卧室。一头小猫从她那铺得十分整齐的花被上跳下来，竖直尾巴，直奔到她的脚边，叫着迎接她。再没有看见第二个人。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小姐和他一样，孤身一人。但是看看手表，时间却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了。

“谁都会想到，”徐迟坦率地说，“弄一个艺术家的情妇一定不坏。”

可是徐迟没有这样做。他想到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想到自己温暖的家，想到两天以后将在上海机场上迎接他的妻子。他在喝完一杯咖啡，谈了一阵以后，从那张安放在两个画架中间的椅子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那位美色撩人的小姐告辞。

徐迟坐在我书店编辑部的沙发椅子上，用幽默而自我告慰的口吻说：“一位看了我手相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很容易跟女人搅在一起，但是不容易出毛病，不会对不起我的妻子。而且我的妻子，也的确是这样肯定我的。”

我相信他说的话。在那次我到他住处吃饭时，亲眼目睹他和妻子陈松的感情很好。

我鼓励他把这段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写出来，不妨给夫人看看。后来他真的写了，而且在发表以前，也真的给他的夫人看了，还得到了他夫人的认可和赞赏。

这就是那篇《艳遇记》的来历。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一首呼唤解放的佚诗

徐迟从十九岁起，就开始写诗。他的诗，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这个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曾经发表过不少与“新月派”诗完全对立的自由体诗，打破传统的或外来的韵法、律法和格式，放弃文字的音乐性。施蛰存自己也曾写了几首《意象抒情诗》，影响所至，在《现代》上发表的诗，大多有这些特征：不用韵，句段不整齐，混用古字外语，采取意识流的跳跃手法，诗意晦涩难懂，被统称为“现代派”诗。发表在《现代》上的戴望舒所撰《诗论零札十七条》，就是这种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诗论。一九三六年，戴望舒在上海创办的《新诗》杂志，提倡“纯诗”，到一九三七年，杂志共出版十期，发表诗作三百余首。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付印时，“八一三”硝烟突起，抗日战争爆发，《新诗》毁于炮火，被迫停刊。从一九三三年起，徐迟受中国和欧美现代派作家作品的影响，在《现代》和《新诗》上写了不少朦胧晦涩、令人不易理解的“谜诗”。他与当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朦胧晦涩诗作的戴望舒、李金发、施蛰存等一起，被称为“现代派”诗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迟经历了三年的流亡生活，从上海、香港、桂林而重庆。在香港，他在戴望舒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和戴望舒、艾青合编的《顶点》诗刊上发表了不少展示雄风壮志的作品。一九四一年，他还以香港《星报》的特派记者身分，去昆仑关战役前线采访，写战地特写。在血和火的战争环境里，他的思想随着生活的转变而急剧转变。一九三九年，他写了《抒情的放逐》；一九四一年，发表了《和现代派告别》，批判了自己过去写“纯诗”的思想倾向。他在一九四九年写的《小传》中说：

从四十年代一开始，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初步懂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就跟了共产党走。我批判了、并舍弃了现代派。我批判地接

受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以及古典主义的希腊史诗和悲剧作家，学习、研究、介绍了他们，翻译了他们的作品。

从一九三四年写成、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最强音》看，徐迟已经从“现代派”诗风中解脱出来，迈向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了郭沫若任主编的《中原》杂志执行编辑。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我编的“文艺丛刊”第二集《呼唤》里，发表了一篇已经完全摆脱了现代风格的诗作《遥念》。这是一首发表在半个世纪前国统区一隅的一个小刊物上的诗，看到的记者当然不会很多。我请最后两年跟徐迟住在一起照顾生活的他的哲嗣徐建，查阅了十卷本《徐迟文集·诗卷》、《徐迟诗选》和《中国新诗库·徐迟卷》，来信说，都“未见收入，应当是许多人没有读过的”佚诗（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给我的信）。因此，我将全诗再一次按照原来的排列，在这里发表：

你在何方，在山峰中？
你在何方，在森林中？
你在何方，在冻冰的江上吗？
你在何方，还是在哪一个城市？

你一定在某一个世界上的农村中。
你一定在人民受过苦难的地方。

在这般黑暗中，在油灯下，
在雨声里，在这般寂寞中，
我思念你，但我知道你，
我看到了你，我歌唱你。

我羡慕你，你在一群人民中间，
一群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

只要我宣布了你在何方，
这里的亲亲戚戚要大吃一惊呢！
我心中有个秘密，倒也是一个快乐，
我可以暗笑这一些糊涂人。

他们不知道，一点不知道，
你是在他们惶恐的那儿啊！

事情又是如何的明白而简单，
只要来了那一天，我又看到你，
啊，那就是一个好日子了！
若不是好日子，我们何必一起呢？

那可是也不远了，
我们将要相见。

这是一首为了怀念一批前往“人民受过苦难的地方”参加革命战斗的文友而撰写的抒情诗。当时内战正烈，国统区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郭沫若、茅盾已秘密离沪，转道香港，候轮前往解放区。处身在“黑暗”中的徐迟，不免触景生情，以“寂寞”的心态抒发无限的“思念”。

这首诗里的“印度尼西亚”，是暗指解放战争前线；“好日子”，暗指全国解放。全诗四章，四二句式，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和格式。它以幽婉却又晓畅的歌喉，唱出了侧身于国统区“黑暗”和“寂寞”境遇中的广大人民，如何对解放战士的崇敬、对解放的渴望，唱出了他们如何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好日子”。这首洋溢着爱国激情的佚诗，无论从思想和技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徐迟在解放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

迈向高科技报告文学

在三十年代，徐迟以诗创作登上文坛。但是他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他的散文并不晦涩难懂。据他自己说，是受了美国作家汉明威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生活和思想的转变，他对那些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写战地实况和战时生活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很快发生兴趣。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自己也去前线采访，写战地特写。以后，他从翻译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和斯坦因报告二战时巴黎如何解放的《解放是荣耀的》，学习新闻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写作。全国解放后，作为《人民中国》和《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两度去朝鲜采访，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厂矿农场和一些巨大的基本建设工地，写了不少特写。他的特写集《我们时代的人》和《庆功宴》，就是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结集。进入六十年代，作为专业作家，他去水利规划设计院体验生活，写了不少水利建设方面的特写，也写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

“文革”动乱，徐迟被迫沉默了十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就已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四人帮”粉碎后，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也正是从这两条战线开始。一九七七年，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倡导要在党内和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那年七月，《人民文学》月刊的编辑周明，邀请徐迟回到北京，采访数学家陈景润，终于写出了为国内各大报全文转载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作了舆论准备，也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小平同志在与捷克总统谈话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从思想上引导徐迟对写科技报告文学的再认识。他决心写科技报告文学。于是《地质之光》（地质学）、《生命之树常绿》（植物学）、《在湍流的涡漩里》（流体力学）等一系列科技报告文学先后问世。他越写越投入，越是上下求索，越有心得体会，而终于排除种种困难，向高科技进

军。他研究原子、电子、光子、中子、质子，研究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他发现“二十世纪的不朽的纪念碑”是物理学。他看到物理学的成就“已经、正在、将要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的外貌和内里”。他在一篇报告文学《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中说：

物理学的巨大成就的信息却这样地激动了我的心，使我爱上了它，使我入了迷，而上下求索，使我写出这些热烈赞美它们的拙劣诗篇。

进入九十年代，徐迟和我通信，想和我合编一套名为“探索奥秘系列”的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后来因为撰写科技报告文学的作者太少了，难成“系列”，而且他的行止不定，联系经常中断而中途搁置。但是我还是收集了他的几篇未收集的科技报告文学，出版了一个集子《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他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为这个集子写的《后记》中说：

现在肯写高科技命题的人很少。我很寂寞。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些方面来。我希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科技界和科技出版界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现在科学技术已不分彼此，溶成一体，这是高科技的一个特征。有时工程的迅速发展猛烈地推进了科学发展，有时科学要停下步子来，等待超大型工程技术的建设成功。科学再也不是离开技术而踽踽独行的了。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势不可抑的大动乱和大变化之中。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从各种各样的大灾难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我在这个《后记》中突然冒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三年以后，徐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计算机》的文章，说如今这个世界上，万事都离不开计算机的语言，从最起码的写作、中文打字，到市场管理、工业生产、海湾大战、信息高速公路、生物基因、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因此，“只有计算机可以振兴中华”。其次，他说现在的人类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遇：天上的臭氧层出现大空洞、地上的地震、火山爆发、洪水、龙卷风、爱滋病、癌症、核子战、饥饿、暴力……所有这些，“唯有高科技才能逐一逐一的希望解决”，因此，“唯独高科技才能拯救人类”。

他仍然重复了三年前在《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一书的《后记》里说过的那句话：“只有电子计算机可以救中国，只有高科技可以拯救人类。”但是这次他又附加说了两句话：“高科技差不多就是计算机；计算机差不多就是高科技。”而且他说，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可以不必再说“差不多”，而直接说成：“计算机就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是计算机。”

这是他思想的一次飞跃。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导向下，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冲击了他，促使他不断求索，提高认识，从写一般的特写，发展到写波澜壮阔的高科技报告文学。

青年总是胜过老年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徐迟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发掘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几个问题时，回信说：

应尊重新人的作品，尤其于尊重旧人（按：指老作家）的作品。应承认新人有无限的创造力量，胜于旧人多多。

发掘与培养新人是不同的。培养新人是永久性的，是基础，它不仅是发掘新人的必须条件，更是整个文艺创作活动的基础。不是“非常必要”，而是“绝对”必要。所根据的是对明日怀着无穷希望的理论。

在回答我如何培养的具体做法时，他说：

我建议用卡片索引的办法。培养新人是长远的工作，一次（介绍新人作品的）“特刊”虽然聊胜于无，难望有怎样的成就，长远地记录一个个新人的作品在卡片上，然后由一些旧人长远地关切他们的发展，熟悉他们的情形，随时予以帮助，这样“培养”这两个字才有一点近似。

当时我正编辑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还兼编一个小型的散文刊物和香港《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来稿多，抽不出足够时间一一仔细阅读。我函询他能否帮助我阅读部分来稿，他回答说：

愿拜读若干诗歌（包括音乐），在开始时，我想结识两个写陶行知派或马凡陀派诗的朋友。

不必致酬（按：指他审读新人作品不取报酬）。但稿酬（按：指新人作品发表后的稿酬）中之百分之若干，应捐赠于组织机构（按：指由几位报刊编者联合组织一个专事推荐新人作品的机构）之内。这机构果真办起来了，谨声明：我愿意效力。

从以上回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徐迟是以豁达的胸怀和激越的热情，看待着文学新人的崛起。他认为培养新人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是整个文艺创作活动的基础，是老一辈文学工作者——作家和编辑不可推卸的责任。青出于蓝，明天总是会比今天好。他把无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新人的身上。

到了九十年代，进入老年以后，徐迟更加认为老年人的唯一好处，是帮助后来者。他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老人，能提示、提醒一点甚么，告知后来之人，也应当赞美你，感激你。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老年人，老年人是能帮助后来者的。老年人唯有虚心帮助人的好处而已。

到了老年，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点识相的，有点聪明的，有点有利于生活的发展的人。

唯有虚心帮助后来者，才是有益于生活发展的老人。老年人不能成为发展道路上的阻塞者。他在信里说：“不准老人阻塞自己，更不准老人阻塞青年的前进道路，否则就捶碎它，捶碎不了就爆炸它！”

徐迟对未来怀着无穷的希望。他对发生发展这一自然规律的认识，对青年一代总是胜过老一辈的进化论观点，五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毫不动摇。

飞向遥远的太空

在四十年代，我亲眼目睹，徐迟有着一个温馨的家。他和他那文静而美

丽的夫人陈松，有着志趣相投的深厚感情。陈松善持家政，让徐迟专心致志地写作，不再有后顾之忧。陈松的谈吐，温雅端庄，她谈及徐迟的某些诗文章句，有时会流露出情有独钟的赏识。徐迟在家爱静，往往长时间伏案写作，但与朋友交谈，却又热情奔放，袒露出诗人的本色。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松，总是委婉含蓄地嫣然一笑，不干预徐迟的抒情独白。一望而知，他俩的夫妻生活是非常融洽的。

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遭受厄运。一九七九年平反后，恢复我教授职称，在青海师范大学带了两批研究生。八十年代后期调回上海。到九十年代初，才与徐迟恢复了已经中断三十多年的通信关系。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夫人陈松，早已在一九八五年一月患癌症去世。

从报上获悉徐迟与陈彬彬结婚，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写信到武汉，向他祝贺。当时徐迟已与新夫人一起，去了深圳，在十二月十日才复我一信。他在信里说：“我已半聋，常听不清，好在有陈彬彬帮忙，请她代听即可传话，也还方便。”

徐迟的二儿子徐延在深圳市体委工作，我给徐迟的信，是由徐延转交的。徐迟有时住在“深圳创作之家”，有时住在市内的“赛格集团公司”。为了和他合编一套“探索奥秘系列”的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常和他通电话。电话很难打，他经常不在。有几次是陈彬彬接听的。从清脆婉转的说话声音听来，她是一位年轻而又很会说话的女士。不久，徐迟寄给我一张他与新夫人合影的彩照。照片是在深圳创作之家拍摄的。照片背后有徐迟写的两行字：“赠范泉兄：徐迟陈彬彬于深圳创作之家。”

这张两人相隔一段距离、各自摆弄不同姿态的合影，给我留下了一个不祥的印象：看来，他俩的新婚生活，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的和谐融洽。

果然，不久以后，传来了他俩分手的消息。

而比爱情的失落更加悲痛的，是长期照顾徐迟生活的爱女，去了法国，不能返回。

诗人陷入了失去感情依托的深渊。

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虽然离婚以后他还鼓足勇气，访问了三峡大坝工程，回浙江南浔镇老家一次，并在路经上海时访问了施蛰存等许多老朋友，但是在他谈话时，却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已失去了过去那种热情多话，春意盎然的色泽。正是由于他的感情失去依托，从心理上影响了他的生理——无法根治的老慢支日益严重，心力渐感衰竭，不能再敲响电脑键盘，从事写作。

于是，他错误地估量自己：等到哪一天思想凝固，冥顽不灵，不能帮助后来者，不利于祖国人民的生活发展时，他一定要在灵魂出窍之前，“登上一架航天飞机，作太空的遨游，飞到极远处，然后不再回来，免得成为人间的发臭的垃圾障碍物。”（见《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负病住院的徐迟，竟然真的飞向遥远的太空，再也不曾回来了。

我写信问了和徐迟同住一个楼宇的碧野，他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回信说：

徐兄事，我也不甚了了。人老多病，太过孤寂，我想，这是他轻生的主要原因吧。

徐迟不仅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认真负责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勇于开拓，迈向高科技的杰出的报告文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是诗文十卷，和一个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改革开放六十多年上下求索的光辉榜样。他几乎掏出了自己一颗赤诚的心，告诉我们：拯救祖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高科技——电子计算机。

我衷心悼念这位热爱祖国的诗人和报告文学家。

靳以谈两篇小说

从一九四六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夏，靳以曾经写给我十多封信。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到了在我编的刊物上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

“司马蓝火的那篇小说写得很好，可是武者的小说简直不好，我记得很早读过他的《母与子》，这篇连那篇一半也赶不上。”

信里所说“司马蓝火的那篇小说”，是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第六卷第五期上的短篇小说《懦夫》；“武者的小说”是指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武者小路实笃所写、林焕平译的中篇小说《爱与死》。“司马蓝火”是浙江绍兴嵇山中学教师祁崇孝的笔名。小说《懦夫》，塑造了一个心甘情愿“忍受无限制的吃亏”永远也不背离老板意志的剥削制度忠诚卫护者的没落典型。在这篇小说发表前，叶圣陶先生也看过，认为作者的表现手法绝无一般作家们常有的那种陈腔滥调，确实是一篇好作品。至于武者的中篇《爱与死》，文字简洁，情节生动，塑造了一个天真、活泼、健康、聪明、贤淑、痴情、顽皮、美丽、明朗而又可爱的日本少女的典型。小说于一九四一年在日本出版后，一年半时间里行销了一百三十五版，受到广大日本读者的欢迎。我在接到靳以对这部小说几乎是全面否定的信后，立即复信，希望他谈得具体一些。他在同年六月一日复信说：

“《爱与死》是一篇极其平常的作品，还比不上他以前所写的。我是站在读者立场上这样说，我不是批评家，所以不能具体地写出我的意见，请原谅。”

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靳以从江湾来到福州路，去书店找书，乘便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看我。我请他到附近的杏花楼冷饮部吃冰淇淋和汽水，边吃边漫谈，谈到了《爱与死》，他仍然认为这是一部很平常的通俗小说，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看法：

首先，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虽然作品的主人公谈到了“为活着的人们劳动”，但认识非常朦胧，在他的思想里，总是认为人是可怜的，却还不知道自己的可怜。正是由于处处充满了这种“未死而等死”，或者想活而“无法活得下去”的可怜的人，因此，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他的愤怒，产生一种向悲惨的命运复仇的思想——也就是“为活着的人们劳动”的思想。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图报于夏子（女主人公）的爱和灵”？这也正是他要“为活着的人们劳动”的出发点。所以说，他的苟活、他的求生、他的“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摆脱不了个人主义的泥坑，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

其次，是产生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写作的时间，可以推前一二年，但无论如何，已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时期。作者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去谴责这种不义的侵略战争，而以撷取爱情题材为满足，则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已可想而知。作者出身于贵族，一九四二年还公开发表过宣扬“大东亚”侵略战争的文章，为日本军阀鼓劲。像这样的作家作品，肯定不会创作出具有人民性的伟大作品来的。

靳以站在读者的立场上，终于说出了——一个批评家才能说出的一席话，使我听了非常信服。

萧红的死

骆宾基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写的《萧红小传》里，肯定萧红在重庆时期就患了肺结核病。他在分析萧红一九三九年流产后，仍不顾“那衰弱的实际上已潜伏了肺结核的身体”，发奋写作，写下了《回忆鲁迅先生》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她“心魂的领域”是广阔的，“她的眼前是呼兰河县城，那些朴实而又为社会所伤害了的呼兰河的人民”，她要通过文学的语言，为他们呼喊，为他们控诉。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她忘却了自身，忘却孱弱多病的自己。

在《萧红小传》第三十章以后，作者描述萧红在寓居香港的最后岁月里，虽然咳嗽、头痛、失眠，病象大显，她却仍然写完了《马伯乐》第一部，还卧伏在病床上，雨夜完成了《小城三月》，并为《时代文学》杂志的封面作了画。日寇占领香港后，她被不负责任的医生误断为喉瘤，喉管开了刀，喉腔安装了呼吸管。九天以后，即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她“终于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享年三十二岁。

《萧红小传》几乎权威性地介绍了萧红的最后岁月是怎样度过的。

此后，在丁言昭的《萧红年表》里，在国内外研究萧红作品的文章里，凡是谈到萧红晚年的病况时，一般都根据《萧红小传》的描述，认定她是死于肺结核。

我和萧红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我编了《作品》半月刊第三期后，和邵子南一起，到她居住的吕班路寓所看望过她，向她组稿。当时她从日本回来不久。我看到了她那文静而清秀的脸庞，使我联想到她的清丽而纤细的文风。最初，她说话有些矜持，但是当 she 了解我们的来意后，就显得毫无拘束，平易近人。她介绍她在日本的生活情况，答应给我们写几篇旅居日本的“速写”，半个月后交稿。后来“八一三”事变突发，刊物的社址毁于炮火，我在事变前去了无锡乡下，事变后搭车时铁路被炸，回不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取稿。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为寰星书店编辑文学丛书时，终于从骆宾基手里取得了萧红的遗著——一册土纸本的《呼兰河传》。那篇矛盾的序文，是骆宾基请茅公撰写、由我按文稿抄录后排印的。这年夏天出书时，作者已经去世五个半年头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在一次与骆宾基的通信中，因为教学的需要，顺便问起《萧红小传》中述及的有关问题，比如书里的C是不是作者自己，萧红是不是死于肺病，等等。他在十月十六日回复了我一封信。信上说，C确是他自己，关于萧红的死，他回答说：

不是死于肺病，也不是死于气管扩张。今天来看，萧红是死于粘痰堵塞。这是由我因病住过半年之久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了点医学知识，才肯定的。至于我离开后（回九龙去探看自己的寓所，目的是取回《人与土地》等稿件），究竟是因为日本陆军占领玛丽医院的刺激，还是因为另外有所矛盾，发生过甚么事，都不能作主观的推测。但是受外来的突然刺激而痰涌咽喉，堵住了插在喉腔的铜管呼吸道而窒息以死，是确切不误的。而当时，临时医务站是既无医生也无看护。

萧红就是在无亲无友也无医务人员在旁看护的孤寂中告别了尘世。孤寂，几乎伴随着萧红的一生。

但是性格倔强的萧红，即使在疾病缠身和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爱情折磨的孤寂中；仍然昂首挺立，绝不终止创作，而且还是以火热的心情，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写出她发自内心的呼喊。比如，在她写于一九三四年的成名作《生死场》里，使我们看到了如何艰难而寂寞地跋涉在人生道路上的金枝；在那反映童年生活的《呼兰河传》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荒凉而寂寞的小城以及小城人们的愚昧与无知。作者为生活在最低层的妇女们呼喊，为那些被愚昧与无知吞噬着的不幸的人们控诉。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文里，指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创作的。作品反映的孤寂和痛苦，既蕴含着作者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更反映了她一贯来对美的追求的执著。

一直到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性格倔强而不能说话的萧红，在拍纸薄上不得不书写：“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然而她不甘心放弃她毕生为之奋斗的美的追求，她最终仍然写下七个字的绝笔：“……身先死，不甘，不甘。”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的最后一章里，说明了萧红肺部的病灶已经结疤（钙化），验痰无菌，不是死于肺病，而是死于气管恶性扩张，长期咳嗽的缘故。而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写给我的信里，却连“气管扩张”也排除了，确认她是死于受到突然的刺激，痰塞咽喉而气绝身亡。

如果萧红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动乱，生活安定，有着比较完善的医疗设施，不再孤寂，有人陪伴，她是不会死的。

悼念陈学昭

当我拿起笔来写东西，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及一切——几种难过的疾病：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但腰椎骨增生，必须坐硬板凳；双脚浮肿，需要搁在一块高、低斜的木板上——专请木工师做的——刚搁上木板，脚好过一点，但搁上一忽，这块木板就在脚底下渐渐离去。我患糖尿病：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已经成了习惯，她无所谓痛苦、难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陈学昭先生：《可贵的痕迹》

本月七日，在南京召开的“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黄源老从杭州带来了一个不幸的信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顾问、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陈学昭病危！

昨天，终于读到报载，她已于十月十日凌晨，在杭州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我和陈学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但是从朋友那里，我知道她长期患了多种慢性病，其中最严重的，是腰椎骨增生和糖尿病。早在前年的时候，水谓亭兄就曾看到她把一颗一颗包着糖质的药片外衣，用小刀子艰难而耐心地刮着，刨着，等全部剥落以后，用温水饮服。一天服药三次，一次服药不止一颗，这要花费她多少已经是残留下来的生命的时间和因为长期患病而已经十分虚弱的体力啊！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她在今年八月，通过彭新琪同志，给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一部书，多么艰难地写了我估计可能是她最后的一篇文章：《可贵的痕迹》。她带着描述自己的口吻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文章给巴金老看了。巴老读着这篇几乎是绝笔的文稿以后，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她在法国巴黎的日子。巴老说，她的法语说得非常流畅；她为法国作家口译，迅速而正确。巴老学着她那部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用低沉但又感慨的口吻说：“一个人能够工作着，是多么美丽啊！”

作为一位前辈老作家，陈学昭先生虽然久病缠身，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日子很难过，但是她却说：“已经成了习惯，也无所谓痛苦、难过。”她一直毫不动摇地屹立着。从一九二五年起，她已先后给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一部，散文六部，诗一部，翻译的小说、童话和回忆录六部。

她已经留下了可贵的痕迹！

1991年 10月 18日

戴望舒和他的作品——答李福眠同志

李福眠同志：

十九日惠示敬悉。

先回答您的提问。拙编《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的戴望舒诗文，都是他主动交来的，那些稿件，大部分曾在香港发表过，但文字上都已作适当改动。也有一部分从未发表过，如《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一名篇，是首发。那些初稿在香港发表过的作品（包括译作），他交给我时，并未说明已在香港的地区报刊上发表过，是我八十年代从香港的戴望舒研究者的文章里发现的。那篇《狱中题壁》的题目，确是遗植，我在看清样时也疏忽了，应该是我的过失，不是为了避时忌而故意漏排了题目。诗篇的总题，是戴望舒自定的。

在这里，应该提供您一些背景材料，帮助您理解以上情况。

戴望舒曾去过法国和西班牙。他在抗战前的新诗创作，有艺术至上的观点。抗战时期，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活动家。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在民族解放斗争的烈火中逐渐转变，诗风明显改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香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下，有三百多位留居香港的文化人陆续撤离香港（包括茅盾、叶以群等），但是戴望舒没有走。一九四二年春，他在雅各理发室被日寇逮捕，被囚在奥卑利监狱，受尽折磨，经叶灵凤托人保释后出狱。为了生活，他与叶灵凤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受日寇文化部管辖）工作过，编辑过由《星岛日报》改名的《香港日报》的副刊，还被日寇找去担任过“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征文的“新选委员会”委员，客观上起了粉饰占领区的作用。在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沦陷期间，他写了（包括翻译）数十篇文章。

日寇投降后，作家陈残云、何家槐、司马文森、黄药眠、周钢鸣、周行、瞿白音、韩北屏、章泯、芦荻、陈占元、刘思慕等二十一人签名，写了《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版的《文艺生活》光复版第二期和《文艺阵地》复刊第二期同时发表，提出戴与敌伪往来证据三件，要求撤销戴主持的文协驻港通讯处，调查检举有通敌嫌疑的作家（当然包括戴）和会员。

据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卢玮銮在《香港文学》上发表的《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一文中反映：“新选委员会”名单中有戴的名字，“不是出于自愿”。当时出版的《南方文丛》第一辑收有戴文《梦乐希逝世》和《对山居读书札记》，同时收有周作人的文章，因为主编是别人，戴不能负责，而戴文两篇，纯属读书笔记型的知识性文字，并无美化敌人的投敌色彩。为《香港日报》总编罗拔高所著《山城雨景》一书写跋，仅是千字短文，并未涉及时事和政见。经卢玮銮逐一审阅戴在香港沦陷时期所写的数十篇文章（包括用笔名写的），“未见片言只字讨好日本人”。（以上至条，是《建议书》附述的三件附敌证据）。

《建议书》事件发生后，戴写信给文协重庆总会以及茅盾等申辩，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携妻女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总会接纳了他的申诉。茅盾等许多熟识的朋友，完全理解他不是个战士型的作家，但他的正直和善良却是无可怀疑的。茅公返沪后，他立即去看望茅公，受到茅公的安慰和鼓励。他经茅公的内弟孔另境介绍，与我来往。那年九月，他主动交给我在

香港沦陷时期所写而不能发表的七篇诗作，冠以总题“虜居诗抄”，以表明他在日寇占领期间的心态。这是他在日寇投降后第一次在全国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他具有自我剖白性质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作。他在交给我诗稿时，谈到了《建议书》，也谈到了他如何被日寇逮捕后受尽折磨，谈到了沦陷时期的生活和痛苦，谈到了《建议书》发表后他在香港的苦闷和惶惑。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虜居诗抄》在《文艺春秋》三卷四期上发表后不久，戴望舒非常高兴地到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说《虜居诗抄》的第一首《致荧火》七节之后，漏排了第二首《狱中题壁》的题目，同时又交给我一篇散文《记玛德里的书市》。那天我们一起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畅谈至下午三点光景才分手。

和戴望舒接触时间较久的一次，是一九四七年中秋节一起去浦东看望艾芜和何家槐。我们——包括碧野、许杰、孔另境、谷斯范，在浦东大江中学一起住宿，一起踢小橡皮球，一起听说书，一起座谈。戴望舒个子高大，外表看来很健壮，但患有哮喘，跑动困难。当时他已融汇在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洪流里，开始摆脱艺术至上的信念，参加了民主活动，思想转变得逐渐坚强起来。一九四七年夏，因为他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转任新陆师专中文系主任。一九四八年他与孙大雨一起，反对投靠国民党的校长董任坚，董串通法院，说他是香港来的汉奸文人，要法院出票传讯。他对孙源说，这些人卖身献媚，仗势欺人，有人给他们撑腰，犯不着与他们纠缠不清。（见孙源：《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香港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七期）到了暑假，他便举家回到了香港。

一九四九年初，戴望舒带了两个女儿，随卞之琳乘挪威轮潜往解放区天津转北平，安排在华北大学第三部一个研究室工作，室主任是艾青。七月，参加了文代会。建国后，调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法文编辑、法文科科长。署长是胡乔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晨，他给自己注射治疗哮喘的麻黄素，因为不适当地加大了剂量而导致他扑在床沿上昏迷过去。经送协和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年仅四十五岁。悼念会由茅盾主持，胡乔木、乔冠华列席致悼词，有郑振铎、丁玲、老舍、艾青、卞之琳、冯至等六百余人参加，十分隆重。胡乔木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悼望舒》一文，指出他“像许多纯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为“中国丧失了决定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而悲悼”。

戴望舒在他经历了极其曲折的人生历程以后，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刚刚起步，却因病而立即到达了终点。这无疑是令人十分悲痛的事。

戴望舒一生，出版过四部诗集：《我的记忆》（一九二九）、《望舒草》（一九三三）、《望舒诗稿》（一九三七）和《灾难的岁月》（一九四八）。他一生创作了新诗九十四首（包括漏收的两首）。他在三十年代被誉为现代派大师，实际上，他的突出的成就，是在把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古典诗巧妙地糅合起来，融化在语体新诗里。他摆脱了初期新诗的粗浅直白，在艺术诗的创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掌握以上一些背景材料后，您对戴望舒的《虜居诗抄》和《诗二章》里九首诗的创作环境、发表意向乃至作者当时的心态，可能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祝笔健！

1995年10月27日

附：李福眠给范泉先生的信

范老：

国庆假日，我在家过了几天“退休”生活，静静地翻看淘藏的二十三本《文艺春秋》。现向您请教：

贵刊发表的戴望舒的《记玛德里的书市》、《龙勃里亚侯爵》、《墙》等文，是否应您之约？《虏居诗抄》、《诗二章》（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似乎不是在贵刊的首发。《虏居诗抄》包括《致萤火》、《愿望》、《等待》、《过旧居》、《萧红墓前口占》、《口号》。其中，《狱中题壁》一诗漏题，后期更正。我怀疑，可能为避“时忌”，故意漏去的。诗篇总题，是否戴望舒自定？

撰安

李福眠上

1995年10月19日晚

邵子南和作品社

全国解放后，曾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西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的邵子南，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曾经和我一起，组织了文学社团作品社，并协助我编辑纯文艺杂志《作品》半月刊。

邵子南和我同年，四川资阳人。他在十七岁时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而被迫在泯江流域当纤夫，在重庆市当人力车夫，甚至还到庙里当小和尚，侍候一位年迈的“住持”（即方丈）。他在一九三六年流浪到上海后，和萧琳等同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邨的一幢三层楼房的楼底客堂间里（那里的亭子间里住着光未然，即张光年），以卖文为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我当时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系主任谢六逸和洪深教授的积极支持下，我和中学时的同学李励文、刘尔俸、马良等筹备成立作品社，马良又介绍我认识了邵子南和李雷，邀请他俩参加。李雷是诗人，地下党员，住在大场，在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任职，每星期六来上海市区一次，晚上住在邵子南处，睡地板。邵子南当时学写小说，也写散文，向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和黎烈文主编的《中流》杂志等刊物投稿。有作品发表，取得稿费，大家就有面包吃；没有作品发表，拿不上稿费，就得挨饿。他俩非常热情。由于我们志同道合，而且有着共同办刊物、编丛书的兴趣，所以一见面总是无话不谈。来往几次后，我也搬到邵子南处居住，睡地板，一起筹备组织作品社。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决定先出版《作品》半月刊一种，由范泉和马良出面主编；由刘尔俸与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联系，负责发行工作；由邵子南和李雷协助组稿，联系作者。我们没有钱乘电车，光凭两条腿走路。邵子南的腿劲特别好，因为他曾凭着这双腿，在水路拉过货船，在陆路拉过人力车。他带着我满天飞，认识了很多作家，包括丘东平、叶紫、沈起予、司马文森（当时他用笔名“林娜”），以及萧红等。叶紫和丘东平也加入了作品社。

六月十五日，《作品》半月刊的创刊号出版。

刊物的内容比较丰富。这是因为我的老师谢六逸、洪深等都大力支持，为我组织稿源，介绍郭沫若、田汉等写稿（三期内容详见《我编 作品 半月刊》一文）。

第3期刊物才取得几册样书，书还没有从装订所车送出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八一三”侵略炮火已经打响，设在南市区马良家里的作品社社址被炸，马良失踪（估计身亡），而我当时恰巧去了无锡农村刘家庄。事变爆发后不久，收到邵子南来信，告诉我他将随救亡团体撤离上海，嘱我火速返沪同往。我赶紧搭轮到了无锡，还没有奔进火车站，敌机已飞临上空，俯冲扫射，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我侥幸没有被炸死，但是铁路炸断，无法及时返沪。作品社遂告解体。

在期刊《作品》连续出版的同时，我和邵子南一起，筹划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一套“燎原文学汇刊”的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编有作品社四个基本成员的四本“处女集”，它们是：邵子南的短篇小说集《青生》、李雷的诗集《阳光曲》、李励文的散文集《尼德兰人》、范泉的童话式散文集《江水》。其中《青生》和《江水》已经打成纸型，《阳光曲》和《尼德兰人》尚在排校中。由于作品社被炸，存放在社里的《青生》和《江水》的纸型，也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炸弹。

特别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是邵子南的短篇小说集《青生》。此书共收五个短篇，即《归》、《青生》、《黄金》、《烟帮》和《家和万安老爹》。这些作品，以浪子还乡、四川旱灾、磨坊工人和矿工生活为题材，反映了作者从十七岁到二十岁这四年流浪生活的坎坷经历，十分珍贵。二十一岁后，他从上海前往西安，又转山西太原参加革命，二十二岁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一九四二年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写了著名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等反映边区民兵抗日斗争的小说，戎马倥偬，再也无暇去写他年轻时流浪生活题材的小说了。

和邵子南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爱听他讲述他那到处流浪、坎坷得出奇的生活经历。他总是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只要能够活下来，干啥子都行！”于是他到码头上背行李，当苦力；在一艘小轮船上，当了一名只吃饭不给工钱的“水手”。没有活干的时候，就找来一杆破琴，胡乱地拨弄琴弦，沿街乞讨。“天无绝人之路，生活得靠自己闯嘛！”他说。当他行乞到一座寺庙门口时，一位好心的老奶奶，介绍他进了寺院，当了小和尚。

我听得有些惊讶，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看着他。

“你不信？”他笑笑：“这是真的！”他像哄我似的，撩撩他头上的头发，笑着说：“这不是戒疤嘛！”

“你为什么要当和尚？”我有些好奇地问。

“当和尚嘛，生活安定，还可以偷偷看些文艺书。”

“那么后来”，我禁不住再问，“你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那是因为我不爱念经，老是偷看借来的文艺书，屡教不改，被住持逐出了庙门。”

“嗬，你不觉得可惜么？——丢掉了安定的生活。”

“才不呐！”他轻蔑地笑了笑，说明他进寺院只是为了好奇。然后又郑重地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卖文为生’这个行业，这才是真正的行业，因为这是——可以给穷人们说几句话的行业！”

真的，正像他经常向我说的那样，他是为了要让那些像他那样的穷人都 有饭吃而写文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终于加入了想望已久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三年，党派他到重庆《新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在一九四七年撤回延安前，他看到我在上海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就按书店地址写信给我，说将来他回到上海时，一定来看我。信里还说到一九三七年他离开上海时，曾接到我写给他的复信：说因铁路被炸，来不了上海，所有我放在他那里的衣被用品，连同 一个手提皮箱，全部送给他。因此他把这些都带走了。他还在信里向我表示感谢。

全国解放后，我从事工运工作，而邵子南在重庆，没有再来上海。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不敢写信给他，怕干扰了他，心想，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上海会晤。哪里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冬，病魔竟过早地夺去了他不满四十岁的年轻的生命，而等到我在青海知道，已经是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一年了。

邵子南文学创作先后结集的，有小说集《青生》（毁于日寇炮火）、《李勇大摆地雷阵》、《三尺红绫》、《我们是不同的》，诗集《组织》，传说集《刘巧送灯台》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曾经出版过他的创作小说选集《地雷阵》。

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今年九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季镇淮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总编辑委员和《大系·总序》的作者之一。从一九八七年八月到一九九六年七月这整整九年间，为了提高《大系》编选质量，编好这套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大书，他曾费尽心机，和我面谈两次，还认真参与编选争鸣，写了将近两万字的信给我，协助我充分调动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的积极性。《大系》能够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最高一级荣誉奖，是与季镇淮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

早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季老就来信，指出编纂出版《大系》的重大意义。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不仅将奠定近代文学研究之基础，而且对近代历史、近代文化史及现、当代文学之研究，均将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后，我草拟了《编辑设想》以及后来以“上海书店”署名、编印在《大系》各卷卷首的一篇《出版说明》等，寄给他，征询他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回信表示“没有意见”，还说：“上海书店发起此事，我想是一大好事，实开近代文学研究之大门，为后来者准备了极好的条件。此属于‘古籍整理’的普及工作，有益于社会广大读者，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会议”。由于各位总编委、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北京、广州、开封、苏州等地，不可能经常来到上海参加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在季老的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下，我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出版二至三期，讨论有关《大系》的专集和卷数、编选原则和要求，还请各集主编撰写《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二稿》，收到后逐一公布，组织大家从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到选材和篇目的审议，开展学术争鸣。

参加争鸣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有王元化、吴组缃、陈子展、张庚、楼适夷、贾植芳、柯灵、钟敬文、徐中玉、郑逸梅、张庚、时萌、魏绍昌、马学良、钱仲联、范伯群、伍蠡甫、端木蕻良、金名、章培恒、冯至、丁景唐、陈鸣树、郭豫适、何满子、孙文光、刘北汜、叶至善、秦瘦鸥、蒋星煜、袁进、锡金、钟培贤、蹇先艾、裴效维、陈子善等，而季镇淮、施蛰存、周振甫、任访秋等都是长期参与学术争鸣，为《信息》积极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季老，他不顾哮喘，负病执笔，动辄撰写五百字以上的长信给我，还悻悻然觉得“意犹未尽”。

从季老的来信看，不仅表露了他对提高《大系》编纂质量的殷切期望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还展现了他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的厚实的学术功底。

揭示近代文学的灵魂

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编辑工作信息》第五期上，编委伍蠡甫提出了《大系》编选观点的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选”和“文选”不同，不要用“文选”的尺度来编选“文学作品选”。在讨论中，季老明确指出：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该入选，因为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救亡图强的时代精神。他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里说：“自《切问斋文钞》以至近代，文以致用的观点愈来愈明确，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总集。后来这类总集屡见不鲜，可见时代文风的变迁。魏源本人的文风，以现代文学（的尺度）观之，则合格者甚少。其他许多进步文章家亦如此。因此这个观点已形成进步主流，到晚清的改良派或革命派而登峰造极。故康、梁、严等改良派政论文如落选，则无以见时代的进步倾向。”三天以后的二月十八日，他深恐他的阐释不清楚，再一次来信，更加透彻地说明：“实际这个时代最可贵的东西，就在于政治性的觉悟的提高，人们已顾不得文章的风采，而唯求文章有用了。‘用’的最高目的，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这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则不见其革新的色彩与时代精神。”

非常明显，如果用纯文学作品选的观点来编选《大系》各集——特别是散文集和诗词集，那么，一些政治色彩较浓、呼唤救亡图强的作品，都将落选。而这些作品，以及带有这种倾向的作品，恰恰是近代文学的灵魂。季老从一开始，凭借他对近代文学深厚的造诣，抓住这个要害，反复申述，给《大系》各集的编选者在对近代文学特点的认识上，在对《大系》的编选指导思想，作出了无可辩驳的正确导向。

唯物史观的运用

在审视和讨论《大系》各集主编提出的《选目初稿》过程中，季老总是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从近代政治实际和文学主流出发，认真负责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这里仅就《小说集》、《翻译文学集》和《诗词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最初，对《小说集》的编选，季老认为单本的小说容易选，反映当时现实的短篇小说不容易选。但是他建议要“从当时报刊上多选录短篇”（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在看到吴组缃等提出的《小说集 选目二稿》以后，他高兴地说：“我觉得非常好。许多短篇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而且，他还认为《选目二稿》确实做到了如主编之一的端木蕻良所说：“不拘泥于《文选》的途径，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脉络”（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对施蛰存主编的《翻译文学集》，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中说：“希望在《翻译文学集·导言》里能写出简而不繁、层次分明的近代翻译史。先非文学，后文学；文学又有先后（国别、作品）。”两年后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看到了已经出版的《翻译文学集》上披露的《导言》后，他提出意见说：“第二次翻译高潮是在晚清到‘五四’前夕的三十年，说法是可信的。唯第二节叙述高潮，未突出严复的地位，而只强调林纾，似觉有所不足。严复所译著不是文学作品，而有输出新思想、开风气的大用。不见严复，令人觉得忽略了翻译界的大人物。”

后来，施老接受了他的意见，在《翻译文学集》第三卷的“散文”一辑中，专门为严复开辟“论议”一栏，编选了他的《天演论·导言》等四篇散文，并在《第三卷编选说明》中对这些散文加以阐释。在审察钱仲联主编的《诗词集》选目时，同时阅读了他的专论《近代诗坛鸟瞰》一文，季老认为选目的重点不突出，对革命诗词的选目还可以增加。他说：“如龚自珍诗选题数（十七）不突出，而《鸟瞰》极其推崇；曾国藩诗选题数（三十）多于龚，而《鸟瞰》不及一语。曾国藩诗可以选，但不妨少一些，聊备宋诗派的一格。至于《鸟瞰》对南社诗人及其他革命诗人论述不足，而对同光体诗人的介绍则稍嫌过详，均可考虑有所增删。”（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

所有以上对各集主编提出的意见，包括多从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报刊上选录短篇小说，不应忽视在近代思想领域起过积极作用的严复政论译作，对近代文学的“开山”龚自珍的选目不能少于曾国藩，应该增加革命诗词的选题，以及在上节所揭示的近代文学的灵魂，充分说明了这是季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近代文学领域内唯物史观的运用。

为少数民族文学呼唤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作者，往往把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汉民族的作家作品，混在一起叙述，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拥有的民族特色，把少数民族文学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民族文学之中。

《大系》曾经通过简报，在季老的呼唤下，组织争鸣，研究是否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专集，并由谁来负责主编这个专集。经过讨论，决定开创这一难度较大的新事物——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而且由季老自告奋勇，非常负责地介绍我去看望他的老同学、中央民族学院的马学良教授，聘请他来主编这个专集。当季老闻悉一切事情都已办妥以后，非常高兴，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来信说：“这一集的出版，将大开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眼界，增加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影响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集进入《大系》，不仅为《大系》增荣，而且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法。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一无所知，评价它进入中国文学史还说不妥当。这里只是表示我很赞成、欢迎。中国文学史将不是老一套，必有新面貌了。”

在探讨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的重要性时，季老曾经现身说法，说出自己的深刻体会。他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每个时代都应该联系少数民族文学。过去我们的研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做，确是做得很少很少。我们文学史的工作还多得很。主要原因就是历史的习惯性，使我们只知道汉族文学，而忘记少数民族文学。我知道蒋湘南是回族，但我翻阅他的诗文集，就只留意那些与龚、魏和《史、汉》接近的作品，而不留意它们的民族特点，实际把它们看作汉族文学。这种例子多得很。以文而言，蒋湘南佩服龚自珍、魏源的古文，推尊司马迁、班固的古文，他自己的古文就被认为是汉族文学，不留意他的古文的民族特点。再如土家族作家的‘竹枝词’，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汉族文学，但如马学良先生所举例，显与汉族文士所写‘竹枝词’不同，因为它们表现了土家族的民族特点。可见作家所用文字不能视为区别民族文学的标准。”

在讨论中还谈到：现在一般的大学中文系为甚么没有或很少开设“少数民族文学”课，主要是因为难度大，讲授者既要掌握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又要研究不同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以及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这也是今天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作者把少数民族文学融化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原因。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应该的。季老从他编写文学史的切身体会中，发出了“还少数民族文学本来面目”的呼唤，显然是为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篇章。

给《大系》学术定位

从中国历史、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的角度审视与评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出版意义、作用和价值，季镇淮先生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地提出来的。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六年，他不止一次地用通俗而鲜明的语言，非常热情地给《大系》学术定位。

正如本文第一节里所说，早在编纂《大系》的酝酿阶段，季老就认为《大系》的出版，将奠定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将有助于近代历史、近代文化史以及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全国第五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我被邀请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建设过程和主要特点”的发言，季老则在寄给大会的贺信中，对《大系》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近年来成果之可言者，首先是上海书店编纂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套三十卷，是对近代文学一次有计划的展览，打开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大门，从此近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手此一篇，可以纵情阅读，各取所需，由之引向深入，达到研究之目的。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直接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提供资料的宝库，大开眼界，值得庆幸。……”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针对《大系》出版以后，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季老来信说：“《大系》的社会效益虽高，但经济效益不高，要亏本，当然令人不愉快。但这是暂时现象，我不相信这套独一无二的近代文献永远会受冷落。人们要爱国主义，《大系》就是讲爱国主义的书。到古诗词里去找爱国主义，舍近求远，荣古陋今，不思而已矣。当然空话不必说，事实终会作出判断。上海书店完成这项大工程，是有贡献的，值得欣慰。”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季老又来信说：“上海书店做了一件大好事，《大系》是一部好书。但目前文化界似尚未注意及此。近代文学研究仍需提倡，《大系》提供方便，并具体指导，当有促进。”同年十二月十日来信说：“《大系》是传世之文献。……这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用的书，为子孙造福。”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他来信肯定《大系》是“为二十一世纪准备的爱国主义的生动的教科书。”当他知道两千万字的《大系》即将全部出版时，他高兴地说：“我定承命写几行赞美之词认真地评价，非虚语也，请无以普通宣传视之。此书从头我就有兴趣，至此不衰，希望体力及眼睛稍复，早日酝酿此事。”（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一个多月后又来信说：“我希望不失明，能读到全《大系》，此今生之幸也。”

到了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我去信告诉他：《大系》最后两卷一百八十五万字的《史料索引集》即将出版，决定在八月十四日召开一次“《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座谈会”，邀请他出席，如不能来上海，请他写几百字的发言稿寄来。季老终于应我所请，在七月十四日，寄来了由他家里的小保姆笔录的长篇回信。这里另列一节，节录这封来信的主要部分。

最后一篇“贺辞”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表示热烈祝贺。

“出版这部书的好处，过去我已多次讲过，觉得这部书把青年们引进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大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部书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这和出版一般古书不一样。那么这部书究竟有哪些好处呢？现在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它有它的丰富性。这是指《大系》辑入的近代文学资料讲的，其中有许多佳作，足供研究近代文学的需要。看了这部书，就可以增长近代文学知识。它就像一部书目，可以根据它，去找书，发现问题。在从前，近代文学是写不进文学史的，大家以为近代文学没有好作品，而现在，看了这部大书，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部书的好作品多得很，而且它还把文学史的范围扩大了，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完全具备了。比如日记、笔记，都进入文学，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怎么日记也成为文学呢？实际上日记就是简短的散文。还有，少数民族文学，这在以前也是不入中国文学史的。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成为近代文学的选本，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以前只有汉文学史，从此以后才有真正的文学史。所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研究中国文学史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是现实性。《大系》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近代文学产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作家发出抗议的呼声，谴责统治者卖国投降，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所以《大系》对青年是一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科书。现在，我们对青年正在教育爱国主义，那么这部书的现实性是很强的，它符合政治上现实的需要，它的出版是很有用的，必然为社会人士及青年们所欢迎。

“第三，学术性。近代文学作家都不是单纯的文人或诗人，而大抵都是有学问的学者。他们读书很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他们的作品，历史基础很深厚，有些作品比较难懂。他们的用词造句，都是有来历的，他们是把文和学真正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很有学术性，很有研究价值，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考资料。

“第四，进步性。以往的近代文学写不进中国文学史，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比较详细的文学史，但都只写到清中叶，不再写近代文学。为甚么呢？我们猜想：大概以为近代文学没有好作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写进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近代文学比过去所有的文学都进步。它有一个特点，比如近代散文，已经用来办报纸，成为大家的读物，散文已经社会化了，文学已经走向社会，接近广大人民，成为认识事物的工具，是很有用的，已经不是少数人书桌上的东西了。梁启超的散文，不管过去一切古文的派别，而自求解放，自己寻找自己文章的读者，务必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懂，所以他的散文，一时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风行了二十年。这就是大进步。所以说，近代文学是进步的文学，这是无可争议的。再比如康有为的诗，自以为比李杜的诗内涵丰富，无所不包，整个的世界他都谈到了，所以康有为非常自豪。也确实，李杜的诗是没有康有为的诗那么广阔、丰富。这又是无可争论的。因为康有为生在十九、二十世纪，李杜不可能有康有为生活时代的条件。这也是无可争论的。再说，康有为是思想家，学识广博，经历丰富，走遍全世

界。生活经验如此丰富，所以他的诗比李杜的诗要广阔、深厚得多。总之，近代文学要比过去的文学进步，《大系》所收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近代文学的进步性就在这里。……”

以上是季老最后一次来信的摘录。此后我去信，再也没有回信，即使口述的信也没有。到了今年三月，我终于接到了他已于十四日病逝的北大中文系季镇淮教授治丧办公室的通知。这使我联想到在写最后这封信的时候，季老已是重病缠身，多么艰难地为履行他的诺言，而反复构思，一句一句地口述。从小保姆笔录的一些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看，更可以推断，当时的季老，已经连复看一遍改正差错的目力和气力都没有了。这真是一封“一字千斤重”的信啊！

思想·学术·著作

从最后口述的贺辞看，季老通过对《大系》各卷的阅览，揭示了六点：(1)不同意人们所说近代没有好作品，他指出：“好作品多得很。(2)新文学作品的各式体裁，是在近代时期完成的，因此新文学研究者应该研究近代文学。(3)突破了文学史编写的老框框：开拓了视野，扩大了范围。(4)不少近代文学家，也是学术家，他们的作品，为近代史作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参考资料。(5)近代文学比历代的传统文学都进步。(6)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决定了《大系》是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这是季老凭借他厚实的学术根基，独立思考的结果。

季老一生，从政治思想到学术研究，深受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恩师的培植和影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奔向长沙，进入临时大学，借读三个月后，徒步入滇，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正式生，成为朱自清非常赏识的弟子。一九四一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得导师闻一多的器重，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完成时，就已经推荐他任中文系助教。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导师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他先期北上。不料那年七月，他才到贵阳，就惊悉导师闻一多惨遭杀害。回到北京，他以万分悲愤的心情，撷取司马昭杀嵇康等历史题材，写了一组文章，借古讽今，暗喻国民党血腥统治的专制和残暴。一九四八年冬，北平还没有解放时，他已加入了由地下党领导的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编由协会领导的以进步组织“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名义主办的《教联报》，不断撰文论析形势，抵制南迁，还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从延安电台传来的信息，给广大师生员工以正确的政治导向，因而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地下党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受两位恩师的培植和影响。他一贯来勤学苦读，刻意求新，科学求证，独立思考，而行文则讲求清顺畅达，力避繁琐拖沓。早在西南联大读三年级时，他就采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老子》和《论语》《孟子》的文法，证明《老子》和《论语》《孟子》是“一个文法系统”，而得出《老子》一书，是出自战国晚年齐鲁人之手的结论，否定了历来认为老子是东周时期楚国人的说法。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主编北平《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季老在初期的学术研究文章，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

一九四九年以后，季老从传统文化特别是魏晋文学的研究转向文学史的研究（见夏晓红的“访谈录”）。他在闻一多点面结合各个击破治学方法的启示下，将上下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凝聚为三大板块，即先秦两汉、唐代和近代，又从三大板块中，聚焦到三个带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司马迁、韩愈和龚自珍。剖析这些人物在他们所处时代产生的辐射作用，就能将这一时代的纷繁而众多的人物事件，理清头绪，找出脉络，为文学史的撰写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季老从事聚焦人物的研究。一九五五年三月，他的《司马迁》研究专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第二板块的关键人物《韩愈传》一书，刚刚完成，尚待出版。

在文学史著述方面，季老曾参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年度“集体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指导工作（当时因院系调整，季老已从清华调北大任教）。季老不仅鼓励和支持学生辑入近代文学部分，以弥补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只写到鸦片战争为止的不足，而且还应学生的请求，执笔撰写了最难写的近代散文部分。紧接着，高教部派他到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任教，并在捷克科学院鲁迅研究所工作，到一九五七年回国。六十年代初，高教部组织高校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王起和季镇淮主要负责宋元明清和近代部分。为了编好这部书，参与编写的执笔者要有一个编写指导思想/system说明，作为编写的依据。这个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认识文学现象及其发展历史的文件，就是由季老起草的。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还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重印本，曾在一九八八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文革以后，季老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编委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他的著作除本文提到的《司马迁》、《韩愈传》外，还有《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是他的字号），即将出版的有《来之文录续编》。编注的书有《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主编的有《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晚年正在写作的有《中国近代文学史》，整理中的有旧稿《中国文学史》。

“吾将上下而求索”

应该指出：季老在七十多岁以后，一直不顾病弱，仍然孜孜不倦地离而不休，上下求索。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季老在给我的信里，对《大系·散文集》提了近六百字的意见后说：“我因体力不支，不能多写，暂行作罢。”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他来信说：“我的宿疾（哮喘）已到发病时间，特别小心，阴沉天气，决不能下楼找苦吃。大抵每日闷在寒斋，开始写文学史（指《中国近代文学史》）。可惜书难借得，自己的书也不能多翻，动则喘，静则止，以不动或少动为宜。”就在这封信里，他还建议我编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书目》。他说：“近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一个书目，总目，亲眼见到的，而后要一个简目。现在找书成大问题，图书馆不借出线装书，新书一出版就见不到，这种情况一时很难解决，你可以考虑再编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书目》，以便人们按目求书。”一九九一年夏，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一部《文化老人话人生》的书，约季老写稿，谈谈对老年的看法。他寄来了一封写给吴伯衡的信，以信代文，并无题目（题目是我发表时加的）。我读了信，才知道

季老是奉命进入老年的（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时，被列入离退休名单公布），按他本人说法，当时自己还不知道已经进入老年。他在信里，喜称自己像屈原一样：“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描述他负病“求索”的情况说：“一九八六年从春到夏，我接连发了两场大病，可谓惊心动魄。然而在住院期间，我照样看书，医院护士屡示禁止，也没有收书不看，且看且抄，笔记抄了上百页。”这哪里像是住院治疗？在奉命离休以后，他虽然哮喘依旧，眼疾（白内障）更甚，可是他说：“知人论世的工作永不衰竭。”

一九九二年夏，他的哮喘病复发，但是他仍凭藉药物坚持工作。他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来信说：“弟仍因宿疾在身，依旧不能外出参加任何会。今夏发病是反常现象。八月中旬以后喘势渐缓，但每月未尝无喘。此疾很难根治，有暂时停喘剂，所以在停喘之时仍可进行工作，惟效率极低。”正是在这种借助药物坚持工作的情况下，他阅看了最新出版的四卷本《大系·散文集》第二卷，并在信里告诉我：“《散文集》很有用，阅读之余，拟修改旧作《近代散文的发展》。”

从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九月四日和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的三次来信看，季老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开始力所能及地锻炼。初在校内未名湖北小圈子里走走，逐渐加远，往返约一小时。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下旬，还参加了民盟在香山饭店举行的四天会，听报告，参加小组讨论，能支持。但回校后，不能多走路，不能外出散步，不能多累。读书只能量力而行。当时我要在北大念博士生的我以前的研究生刘为民去看望他，他还托刘为民购买陈寅恪所有已出版的著作，准备探索一些新问题。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季老来信，说他仍在负病工作，但是目疾加剧。他说：“弟抱宿疾，仍在伏案，唯功效甚微。去年夏秋，写几篇小文，工作计划无大进展。喘疾较稳定、无变化。但眼睛不好使，无法治疗，只能休息。休息就是闭目养神，不能看书，需要长时间休息，这没有办法，只好如此。写字亦困难，朋友们赐函或贺年片，大多迟覆或不覆，只有抱歉。”

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三日以及六月十八日来信看，季老抱怨“治眼不能早复”，去协和医院检查两次，视力下降到零点二、零点三，已不能看书。而白内障不到一定程度又不能开刀。他说：“此事使我书不能读，文不能写。写信也很勉强。眼睁不开，下笔模糊。”但是即使如此，他在六月十八日还用墨笔写了一幅大字条幅送给我和我的妻子吴峤：

病眼寄范泉吴峤

开帘都是雾 空濛望放晴
读书苦字小 视人看不清
居家常摸黑 止水照不明
白内障除去 喜看天下新

这是他当时自我描绘眼病的狼狈情况。有甚么能比一个作家不能看书写字更痛苦的呢？他唯有寄厚望于去协和医院除去白内障。这真是一息尚存，求索不止！但是从此以后，他的来信却都是他的小保姆笔录的，他已不能执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寄来了由他的小保姆笔录的给《大系》的贺辞以后，再也没有接到他口述的信，直到八个月后，我收到了由北大中文系寄

来的他已病逝的《讣告》。

季镇淮先生是一位治学谨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文史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作出卓越贡献的我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为人正直，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为了建设近代文学体系，完成繁复杂乱的近代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他出谋划策，对《大系》的编纂出版，无微不至地热情关怀。为了挽救传统文化的失落，他放眼二十一世纪接班人的培植，因而更加鞭策自己，负病工作。他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来信说：“旧文学史稿，拟整理，不必出版，整理就行，以尽教师之责。如能不发病，五年时间可以完成旧稿的心愿。传统文化有中断的危险，现在青年人读经史的（点子是原信加的）还很少，几部古书可能在数十年后无人读懂，不能不为之担忧。如此则很可惜。彼时中国经济腾飞，国势大振，诚为有史以来最强最盛的大国，此无可疑。但如果文化不够繁荣，特别是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国人讲不清楚，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因此，我辈稍知古文历史者不能不为稍尽余力，以便青年接力。加强历史研究是当前重要任务。”

现在，不倦求索、默默奉献的季镇淮先生，终于丢下了他未完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止了《中国文学史》旧稿的整理，来不及构想如何撰写第三位聚焦人物《龚自珍》一书而离开我们了，这诚然是我国文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我沉痛悼念这位思想进步、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对“知人论世”工作永不衰竭的文史学家和教育家！

1997年10月20日

冯玉祥和他的丘八诗

—

冯玉祥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他所首创的丘八诗，用劳动人民的口语形式，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被茅盾先生赞誉为最早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号召而创作的诗篇。

冯玉祥是安徽巢县人，名基善，字焕章，从十一岁起，就在清皇朝的军队里当兵。此后，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一步一步前进，特别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思想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一九三三年，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九三五年冬，他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坚持抗日。一九三九年，因为主张抗日，受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排挤，愤而迁离重庆，住在市郊南温泉附近的余家祠堂里，闭门读书，谢绝会见国民党要员。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却与周恩来交往密切，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好友。有一次他问周恩来，他身边是否有共产党员。周恩来说他不是管组织工作的，回去向有关同志了解。几天后，周恩来告诉他，他的随从参谋周茂藩、赵力均、张公干是共产党员，而且说，如果认为不便，可以把他们调往别处。哪里知道，他听后不但不嫌弃，反而高兴地说：“其实，我早已感觉他们是共产党员。现在我知道了，今后使用起来可以更方便，更有利于他们在我这里发挥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参见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三五年第六期翟耀、袁水才文）后来，他接受周恩来“将得力助手介绍到旧部关系较好的部队去作抗日统战工作”的建议，推荐张公干到国民党三十三军刘汝明军长那里做副官处长，又在他的推荐下，让张公干任国民党三五六团团长的，成功地组织全团起义，把队伍拉到了解放区。

冯玉祥曾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事业，作过不少好事。当他听说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被捕后，就立即写信，并派遣他的老部下鹿钟麟去南京，面呈蒋介石，要求释放。当他获悉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张公干，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时，立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写信，并派遣周茂藩，带信去西安营救。而当国民党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将张公干押送开封反省院集训时，他又给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写信，并派地下党员陈天秩去开封营救。又因为诗人冯玉祥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协会的有些活动，不得不借用他的名义，在他的庇护下进行；有些被绑架的文化人，不得不借助于他，设法营救。这使蒋介石对他大为恼火，把他目为异己，而且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加紧发动内战时，让他以“考察水利”的名义，流亡国外，不让他插手国民党的任何军政事务。

二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复员后的冯玉祥从南京来到上海，候轮前往美国，名义上是考察水利，实际上是被迫退役出国。那天晚上，我随文艺界的几位朋友，一起去北火车站迎接。进了车站，站台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

群，情绪非常热烈。火车缓缓进站，停歇以后，只见冯玉祥面带笑容，从车厢里出来，在军乐和鞭炮声中，走下站台。他身材魁梧，衣着朴素，不断和欢迎的人群握手言欢，临别上车时，还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们又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去访问他。虽然等着他接见的人很多，但他还是首先接待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他的说话生动而具体，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毫无顾虑地畅叙他“爱国有罪，被迫退伍”的事，流露出对蒋政权极为不满的情绪。

八月三十一日，文协举行了欢送会，他在会上即席赋诗，并为我编的刊物，用墨笔书写了“文艺春秋”四个隶体字，又用行书写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的诗和题签，连同当时拍摄的照片，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

九月二日上午，在即将于当天下午搭乘“美琪将军号”轮船离沪之前，冯玉祥在住处举行了茶会，和大家话别。握着他那巨大而温暖的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也是他永远离开祖国国土的最后一天。

三

冯玉祥是一位爱国爱民、热情洋溢的诗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总是用他诗人特有的激情，毫不隐晦地写出他自己的心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军阀张作霖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优秀领导者之一的李大钊，十六日处以绞刑，壮烈牺牲。那时冯玉祥在陕西潼关，闻噩耗后大恸，统率全军戴孝，并于五月九日，挥泪书写《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的碑文诗，全诗十五行，最后两行是这样写的：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一九三三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革命的情况下，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接连收复多伦等四县，却遭到蒋介石地面部队的夹击，并暗中挑拨内部分裂。在各种压力下，冯玉祥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被迫解甲山东，在泰山发奋读书。但他决不消极悲观，在他住处的墙壁上题刻了两行勉励自己的诗句：

救民安有息肩日
革命方为绝顶人

一九三九年一月，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讨汪大会上，冯玉祥大骂汪精卫王八蛋，并在两天后写了一百二十八行的长诗《黄花菜》，历数汪逆一贯来的汉奸谬论，最后两行是：

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
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冯玉祥六十寿庆时，重庆《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在“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的总标题下，刊载了毛泽东等各方面的祝电、贺词，并发表了周恩来的寿文。冯玉祥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谢寿诗》，表明自己的心迹。其中有四句是：

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
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
努力不懈不怕牺牲，
尽自己的本份打倒侵略的敌人。

抗战胜利冯玉祥在乘轮归返南京途中，写了《民族引》诗一首，共三十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抗战胜利今还都，应当欣跃又狂欢，为什么心头不轻松？为什么面上少笑颜？那是为了政局未开明，那是为了各地有内战，大家个个皆不安，何时和平得实现？……同胞还须努力，为了实现那一天！

四

冯玉祥的诗，正像他的为人一样，带着朴质的农民气息，胸怀坦荡，明白如话，但却强烈地反映了他火热的心情和迫切要求的政治愿望。比如一九三五年，张公干受组织委派，去红二十六军工作，走后不久，冯玉祥非常想念他，写了四句诗：“我思公干，品行极好；我思公干，回来才好。”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在上海文协送他出国的欢送会上，即席赋诗：

冯玉祥，退了伍，到各处去说和平民主。
看我好朋友，已经作古，手抚着木棺，热泪如注。
回想九年前，战败失国土，此次回来，觉得颜面全无，父兄对不住，姐妹对不住！
今天文化界，朋友欢送我，能说什么话，觉得真痛苦。
文化能兴盛，可与汉唐伍；文化若衰落，政治不进步，不是随便说，可查中外和今古。
几句丘八话，不知如何补。

这里，诗的第一行，坦率地说出了他出国的政治意图。第二行，暗指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惨无人道地杀害了闻一多、李公朴那样的爱国民主斗士。第三行，是回顾“八一三”抗日时，他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防守上海南翔一带，不支而退，至今内疚，觉得对不起人民。第四行，是启示我们：要运用文艺武器，干预政治，粉碎敌人的内战阴谋，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华。

他的这种心情，更加清楚地表白在他登上“美琪将军号”轮船以后所写的《出国之歌》里，他明确宣布：要在不久的将来，“回来建设新中华”。

在美国，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反美援蒋的爱国运动，并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当时，他结合政治斗争，写下了许多反

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即兴小诗和长篇三字诗。在一幅赠送给翦伯赞的自绘山水人物画上，他写了这样的题词：

乘小船，上高山，
脱下长衫，
打倒卖国独裁的汉奸！

冯玉祥的爱国活动，在一年半以后，终于不能容于美国。他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被撤销考察水利的公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冲出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包围，搭乘苏联轮船，借道苏联归返解放区，准备出席第一届政协，不幸在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而遇难。就在他遇难前的两星期，在苏轮“胜利号”上，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小燕》。在这首一百八十行的长诗里，他仍然矢志不渝地宣传反美援蒋，争取和平民主：

……不可轻人民，人民主人翁，不可恃武力，武器非万能，不可再援蒋，延长我战争。……

五

冯玉祥把自己的诗称为“丘八诗”。丘八诗究竟有什么特点？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祝贺他六十大庆的寿文里说：“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这几句话，说明了丘八诗是取材于作者的生活感受，既无矫揉造作之态，更无搔首弄姿之嫌。茅盾先生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丘八诗：

文艺界抗敌的联合战线成立之后，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冯焕章将军。他是“文协总会”的理事。

“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是当时文艺界同人致力的目标，冯焕章将军是实践了这两句话的。他写了很多白话诗，他自称为“丘八诗”。那时，大部分的职业作家一时之间还不能改变风格，使自己的作品适于“下乡”“入伍”，而冯焕章将军虽以业余

诗人，说到就做到。他这种精神令人不能不钦佩。

从茅公的这一段回忆里，可以看出丘八诗的风格特点，是采用工农兵的语言形式，用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反映为工农兵渴求表达的心声（主题）。冯玉祥出身军旅，自学文化，虽然当了将军，却“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均见周恩来寿文），所以他的思想感情能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能用清直平通的老百姓语言，唱出人民群众的革命心愿。

作为诗人的冯玉祥，正像他政治上追求进步一样，越到后来，越是勤奋。他的哲嗣冯洪达在回忆他的文章里说：在美国时，“他身边总带个小本，看到了，想到了，便马上记下来，虽然当场韵脚不一定能押整齐，但对那一经触动、稍纵即逝的灵感，他是立刻紧紧抓住不放的。在他的遗物中，有许许多多小的活页纸片，上面或钢笔、或铅笔、或毛笔，写满了诗句”。

冯玉祥的一生，从十一岁当兵开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终于从一个旧军人，一步一步走向进步，靠拢革命，转变而成为一个坚持抗日、争取

和平民主、坚决反美援蒋、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生命的爱国者和民主斗士，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和景仰；他那独树一帜的“丘八”诗篇，在抗日战争的磨炼中，越来越倾向白话，开创了与政治紧密结合、用劳动人民口语形式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诗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邵力子和新春随笔

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曾经邀请六位作者写新春随笔，他们是：邵力子、叶圣陶、唐弢、施蛰存、许杰和孔另境。

为了组稿，我经常到居住在上海五原路的邵力子先生家里去闲聊，还谈论时局，有时还和他们一起偷听解放电台的新闻广播。有一次，我正和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倾听解放区电台广播时，邵老回来了，招呼我坐在客厅的沙发里闲聊。他说他从南京回上海不久。谈话中，邵老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并不讳言，但认为，如果能够真正悔改，则为时尚称未晚。邵老还谈到派他当国共和谈代表的事，他说实在难当，因为代表只能是代表，不能自作主张。后来，他把我们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写成题为《柳暗花明》的一篇新春随笔，在我编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

新春随笔《柳暗花明》，暗喻蒋介石不肯“悬崖勒马”，而成为一个骑着“瞎马”的“盲人”，必然会走向穷尽的世界；暗喻共产党才是创造繁花似锦的“又一村”的人。文章最后肯定地说，国民党政府唯有真正努力改弦易辙，吐故纳新，才能进入“又一村”，达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这可以说是邵老留给国民党政府的最后谏言。

可是国民党政府不接受他的忠告。最后，他只得和张治中等其他代表一起，留居北平，永远不再回来。

这次新春随笔，除了叶老一文是回答读者提问，其他五篇，都是从不同侧面或视角，抒写了自己对当前时局的观感。比如唐弢一文，指出“变革”必须彻底，而且要“循乎民情，这才可以求其实效”。施蛰存的《再“过年”》，讽喻有产者在灯红酒绿之中过年，虽尝够年味，却难免杞人忧天；而无产者，由于赤条条地毫无牵挂，就无所谓过年，可以随遇而安。孔另境的《展望》，比较露骨地欢迎解放，希望品尝“行将到来的甘味”。许杰的《面对着新的现实》，更是预言“人类的春天”即将到来。

这次新春随笔，凝聚着当时在上海的知识阶层满腔热情迎解放的情结。

记贺宜

一 走向儿童文学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经陈伯吹兄介绍，我认识了正在上海市幼稚师范学校任教的贺宜兄。他比我大两岁。我们是老乡。当时陈伯吹正在发起组织“上海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我和贺宜都参加了。参加联谊会的，还有金近、包蕾、何公超，邢舜田等文学作者和儿童文学美术工作者二十余人。

贺宜是金山县亭林镇人，他的老家离我的出生地吕巷镇不到二十公里。他小时的经历十分坎坷。由于他生肖属虎，而他的父母和祖母都是属羊，被认定为“克星”，因此从小就受到父母的虐待。他的母亲连奶也不喂给他吃。十四岁时初中毕业后，父亲再也不愿培养他，不给他学费念书，他只得从此辍学。他的生活费由姑母提供。他在上海和表兄一起，住在南市文庙的上海图书馆。他向图书馆借书，读了很多世界文学名著。他完全依靠自学，学习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十九岁那年，在沪光小学找到了教语文的工作，于是他开始了自立的生活。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贺宜一直在小学或报童学校、难童学校任教。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四岁，他一直在幼稚师范学校任教，还讲授“儿童文学”课。他不仅长期来和少年儿童交往，有着扎实的写作儿童文学的生活基础，而且还从“儿童文学”课的讲授中，直接体会到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为他毕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准备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以及从生活中提炼、概括的艺术手段。

二 进入“儿童世界”

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创作了童话《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在上海出版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从此他写作不辍。除了“八一三”战事因家乡沦陷奔走逃难，以及在“史无前例”时期挨斗劳动、被迫搁笔外，一直到他七十岁时因病住院不能执笔为止，他从未停止过写作，年年有作品问世。即使在江西的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任教时期，虽然曾经随学校背着行李，逃避日军追袭（从吉安、赣州、于都、宁都，直到广昌县甘竹乡的饶家堡），但是一路上他都在写作。他开始创作长篇童话《野旋的童话》，还写短篇童话《横行将军》、《装甲的乌龟》等。到了饶家堡，写了论文《谜语的研究》，取材于《聊斋》的儿童故事《画皮》和长达一百二十行的寓言诗《人的考验》。特别是《人的考验》，可以说是贺宜儿童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作品写的是“一只做腻了猴子的猴子”和一只“老猾的狐狸”，为了想要做“人”，自愿遵照神的吩咐，经受三次考验。第一次考验，是截断了自己的尾巴，像人一样站起来行走。第二次考验，是学说人话。它们狡猾地编造了种种“人的语言”，而且“比人说的更美更甜”。最后，神提出第三次考验：要它们中的一个，作为祭神的牺牲，让另一个真正做“人”。结果，“猴子圆睁着惊恐的眼睛”，说自己“从没有沐洗过”，不能作圣洁的“牺牲”。而狐狸则强调“刚吃过了荤”，说素食者猴子“才配做‘牺牲’”。它们推来说去，争论不休，谁也不愿做“牺牲”。最后由神宣布结论说：“你们确然都很聪明，但是应该重新装上尾巴，因为经不住人的考验，只配做畜生！”

作品爱憎分明地指出：凡是自私、诡譎、讹诈、谎话连篇的人，形同畜生，算不得人。作者选取反面教材，十分形象地教育小读者，写得比较成功。一九四六年他将文稿交给我发表时，曾经表白说：“去年写了这首寓言诗，自己觉得还比较满意。”作品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第2卷第6期上发表。但使我十分惊讶的是，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贺宜文集》诗歌卷和一九九一年发表的《贺宜著作年表》里，都没有提到它，也可能是作者自己早已遗忘了。

三 创作的飞跃

贺宜的勤奋写作，特别显示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因为一九五九年三月，他从北京调回上海从事儿童文学专业创作，写作的时间充裕了。在这以前，经过将近三十年的业余写作经验积累，他满怀信心地面向全国，搜索真人真事长篇创作的题材。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形象吸引了他，使他萌发了为刘文学立传的构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四十六岁的他终于长途跋涉，去四川省合川县嘉渠公社刘文学的家乡采访了一个月。他开始了传记文学的创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再去刘文学家家乡访问，住在那里三个月，先后访问了刘文学的母亲、老师、同学以及所有熟悉刘文学的人，完成了长篇传记小说《刘文学》的初稿。经过修改，于一九六五年出版。这部十六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的完成，可以说是贺宜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以来的一次飞跃。过去他偏于遐想，往往运用童话寓言的形式，借助拟人化了的动物来演绎、阐释人类普遍的真理，或以一般少年儿童的学校生活、乡村和城市卑微儿童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篇幅不大，没有跳出自己所经历过的个人生活的圈子。现在则突破这一界限，他面向全国，面对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艺术加工，投入长篇巨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境地。这当然是一次可喜的飞跃，预示了他已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可是正当他去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搜集有关地下少先队同敌人斗争的材料准备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打入“牛棚”，靠边劳动，精神和肉体受尽折磨。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才容许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组工作。他利用恢复工作的时机，前往大庆，因为这时候，他被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吸引住了。

他九月到了大庆，访问了王进喜和有关他的人 and 事，确定了如何围绕王进喜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过程来写这部传记小说的基本框架。十月，他从大庆前往玉门油田、陕西长庆油田、湖北江汉油田、四川五七油田等处访问王进喜的领导、战友、学徒及其亲属。一九七二年七月，五十八岁的贺宜再次前往大庆油田采访。一九七七年四月，一部十五万字的传记小说《咆哮的石油河》开始在《少年文艺》月刊上连载；一九七八年五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为了反映王进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铁人精神，小说《咆哮的石油河》形象地描绘了他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生活和斗争风波。这段解放前的生活经历，正是解放后形成王进喜的英雄性格和创建英雄业绩的基础，是构成铁人精神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比较完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也足以证明：作者在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敢于面向全国，撷取重大题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生产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编辑生涯三十七年

贺宜在五十一年的写作生涯中，专职或兼职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多达三十七年。

一九三四年，那时他才十岁，就曾去上海图画书局，主编《生生》文学月刊，但只出了一期，因受压迫而停刊。当时他已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十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开始用个人的名义，主编《童话连丛》，由华华书店出版。刊物用丛书的形式出版，是为了避免向官方申请登记。书名“连丛”，是连续出版的丛书之意，暗示这套丛书将永远出下去，出不完。“连丛”前的限制词“童话”，是因为少年儿童最喜欢看童话，而刊物的实际内涵却不仅是童话，还有戏剧、故事、诗歌、小说、特写、访问记等。刊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以童话为主的拟人化形式，曲曲折折地向少年儿童揭露黑暗社会，指点光明的途径，鞭挞黑暗，歌颂光明，给少年儿童进行反帝爱国的思想教育。

《童话连丛》共出版十二期，其中十一期是贺宜编的。十一期的书名依次是：一、《老虎的尾巴》，二、《猩猩公的故事》，三、《狐狸救山羊》，四、《愚笨的裁缝》，五、《同心合力斩蛇妖》，六、《星期日的童话》，七、《十一个小面人》，八、《国王的皮鞋面》，九、《勇敢的小小潘》，十、《龙和鸡》，十一、《哑巴国奇遇》。其中第二期作为书名的一篇童话《猩猩公的故事》是我写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鄙视劳动的剥削者终究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应编者的约稿，在一九四七年秋专门为《童话连丛》写的。为这个刊物写稿的，还有陈伯吹、许杰、穆木天、臧克家、谷斯范、金近、沈百英、陈鹤琴、赵景深、鲁兵、何公超、包蕾、田地、郭风、陆静山、圣野、施雁冰、黄衣青、孙毅、阳光等。

一九四八年秋，由于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组织上通知贺宜立即离开上海。他在编好《童话连丛》第十一期后，于一九四八年九月转入解放区。

一九四九年八月，贺宜随军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新少年报》社长兼总编辑，正大光明地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五一年十月，调往北京团中央，任《中国少年报》副总编辑。一九五九年三月，调回上海，从事儿童文学专业创作，但仍然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一直到他病重不能握笔为止。

他先后当了兼职和专职编辑整整三十七年。

五 童年无趣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先到上海筹办刊物，然后再回青海。在从北京到上海的软卧车厢里，许杰、陈伯吹、欧阳文彬和我同住一室。我问陈伯吹，贺宜为什么不来。他说贺宜病了，不能外出开会。因此我一到上海，立刻去看望他。

那天看到的贺宜，除了神情略带滞缓，说话的音调比较低沉外，其他看不出什么。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老乡见面，而且别来无恙，觉得分外高兴。他对我戴上右派帽子流放青海以后的这段经历，特感兴趣，倾听着我神话般的种种奇遇的诉说，津津有味。他说他病了，小便失禁，连少年儿童

出版社每星期一次的例会也不能去参加，否则他倒真想有机会到青海去看看。

这次和他见面，我们还谈到金山县家乡的事。这是从我去了金山以后看到家乡的建设新貌这一话题引出来的。我说现在金山的公路四通八达，从他老家的亭林镇到我老家的吕巷镇，乘公共汽车不过是一支烟的工夫。说到这里，他好像若有所感地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童年时最快乐的一件事。

“当然还记得。”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能够吃到一颗水果糖，是最快乐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家里穷。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目不识丁，靠粘元宝的手工劳动来维持家用，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颗水果糖。可是我家的对面，偏偏开着一片南货店，每天放学回家，走过那里，只见柜台上放着的大玻璃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口里就不知不觉地馋得淌下了涎水。我不敢向母亲要钱买，常常跑到三里外的乡下戚家埭去找外婆。外婆也很穷，但是她喜欢我，只要我去，她总是把一颗早已准备好了的水果糖给我吃。因此我是甜了嘴巴苦了腿。虽然每次来回要走六里路，才能吃到一颗水果糖，但是我挺高兴。这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乐事。”

他思索了一会，郑重地说：“这真是一件童年的乐事！倒不是因为你能吃到一颗糖，而是因为你能得到外婆那样真诚的爱！”

“那么你呢？”我随口问。

“呵！”他叹了一口气，缓缓地、有些苦涩似地说：“我可以说是没有童年的乐趣，在家里没有一个人怜爱我。可是我也有短期的自得其乐的乐事。那是在我读了一些武侠小说以后，我醉心于当一个小侠客，可以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把这个可诅咒的世界翻个身！因此我的童年乐趣就是苦练上天入地飞檐走壁的基本功。我曾在脸盆里学潜水，曾脱光衣服偷偷地在小河浜里学游泳，撑着河底向前爬动的两个手掌，被碎玻璃片划得鲜血淋漓，却不叫一声痛，而且还觉得其乐无穷。后来，准备和一个小朋友一起乘船入山访道的时候，被我父亲知道了，赶到船边，拉我上岸，给了我两个响亮的耳光，拖回家里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这自得其乐的童年乐事也就成为泡影……”

我们这次交谈，真可以说是相互亮了童年的相，无拘无束地说了许多心里话。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六 光辉的榜样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贺宜又进了华东医院。五月，因为吞咽功能失常，食物吸进了气管，引发高烧，生命垂危；为了抢救，切开气管。从此他再也不能说话，颤抖的手也不能写字，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一直依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延至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日凌晨四时许，逝世于华东医院，享年七十三岁。

贺宜一生，从小受尽歧视和折磨，苦难的童年决定了他同情劳苦大众，要求进步，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为创建进步文化而努力不懈的道路。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越到后期，越是光彩照人，不仅为培养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作出卓越的贡献，也为儿童文学

作家们作出一个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为创建进步文化而勤奋写作的光辉榜样。

我为失去这样一位热情、真挚的老乡和战友而感到无限的悲痛！

记杨逵

杨逵失踪了。

这是一个从台湾来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杨逵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当国军的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时，杨逵就宣告了失踪。

也许杨逵是已经牺牲了。

但如果杨逵真的已经死去，那不仅是台湾文艺界的损失，更将是中国文艺界的损失。

在日帝国主义者统治台湾的时期，杨逵曾用日文写文艺作品。当一般人俯首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威武时期，杨逵始终独树一帜，并不曾被任何人御用，也从没有为军阀的侵略政策宣传。正相反，他为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为了开辟台湾的革命文学的道路，他——作为编辑人之一的资格，主持了《台湾文艺》月刊的编辑和发行，也因此数度入狱，但始终未能磨灭他光辉的斗志。他很骄傲地直立着。黄凤炎先生在写给我的一篇关于记述杨逵的文字里，他说：“杨逵，他的确很骄傲，正因为骄傲他才有耿直的个性。他说：‘因为我贫穷，所以我傲骄。’他常常用这句话来自诩他的行为。而这，也正是他可敬的‘骄傲’的由来。”

胜利以后，杨逵立志不用日文写作，开始学习汉文。在短短的两年间，杨逵居然能写非常锋利的鲁迅式的杂文。他准备从短文章发展开去，最后他希望能运用汉文写作他渴望写作的长篇和短篇。

然而他的志愿才刚刚开始，却就遭逢了致命的打击！

在杨逵的许多朋友里，都称颂杨逵的为人和个性。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在朋友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会默然谛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开座谈会的时候，一等到他发言，郑重而有力的语调，常常会令人听了肃然起敬，鸦雀无声。然而杨逵决不是一个冷面的“假道学”，决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无聊绅士，只要在一个熟朋友的面前，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话，热情得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是久经沧桑的中年人，然而他却是每一个年青人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斗士。

现在，离“二二八”事件已经有半年之久，询问了许多台湾的朋友，杨逵的消息却依旧是杳然无闻。我每次用颤抖的手，翻阅着他亲笔签字赠送给我的遗著，一阵难堪的感受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几乎不能自信他会真的死在那次无言的“伤害”里。

活着，我相信杨逵还活着——至少像杨逵那样的人永远会活着，永远会活着……

1947年9月17日

赵家璧寻根

一次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赵家璧学长。

那是一九三四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光华附中》半月刊上发表的独幕剧《归》，深得讲授《西洋史》的老师、已经在当时文艺界颇有声望的潘序祖（笔名“予且”）先生的赏识，决定搬上舞台，由他组织了十多位同学，在学校的食堂里排戏，他任导演。他要我在排戏的现场当观众，提意见。排戏中途，一位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已经毕业了好几年的学生来看他，送给他一包新出版的书。他俩坐在食堂一角的凳子上，谈了一阵，然后潘老师大声把我叫过去，给我介绍：

“这位是赵家璧同学，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是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出版部主任。”

说着，他把赵家璧送来的一包书打开。这是三版新印的“一角丛书”之一《予且随笔》。他抽出一本送给了我。

和赵家璧第一次见面，时间很短暂。我们只是寒暄了几句，没有谈什么。

在排戏结束，走向宿舍的路上，潘老师告诉我，赵家璧热爱文学，十七岁时，已经在附中编辑出版一个刊物。我当时也是十七岁。可是潘老师说，他和我不一样：我编的是由老师挂名主编、由学校支付出版经费的刊物；他编的，是由学生会主办，自筹资金，独立出版的校刊。

此后，虽然我曾读过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七～一九二七）、《良友文学丛书》和《晨光文学丛书》里的部分作家作品，我自己也曾从一九三七年起，面向社会，主编过《作品》半月刊、《文艺春秋》月刊（一九四四～一九四九），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由我策划并负责总编纂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八四～一九一九）筹备成熟，召开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的时候，才想到应该借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主编赵家璧的首创经验，因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派了专车，特邀他来出席指导。

这是我和赵家璧学长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时我才十七岁，这次见面时我已七十一岁。十七和七十一，虽然只是两个数字的颠倒，但是时间的流程却已经过了整整五十四年。

这一次，正像我预期的那样，他在编辑工作会议上，非常坦诚地提供了他编《大系》时的宝贵经验。他说各个专集的导言，必须写各该文学品种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要真正起到导读的作用，因此，要有一定的数量（篇幅）和质量。其次，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上，希望先抓一部“样板”，在肯定以后，再一部部推开。这样做的好处是：出版了第一部书后，既可以探索是非得失，总结提高，又可以据此样板，向它看齐，形成套路。

这的确是好主意。我虽编过一些丛书和套书，但从未编过品种如此众多、版式如此复杂、篇幅多达两千万字的大型套书。为了提高编选质量，我在组织各位编委、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在连续出版的不定期刊《编辑工作信息》上放言无忌地探讨、争鸣外，重点抓了各集导言的写作，并选定品种最多、版式设计最复杂的三卷本《翻译文学集》为首先出版的“样板”。

由于我亲自动手，用“徐文伟”的假名，当了这部一百九十三万字大书的责任编辑，从审稿、校对、通读到图片搜集和设计，一个人包干到底，因此压缩了出版周期，提前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出版。

我带了刚出版的《大系·翻译文学集》去山阴路看望赵家璧。

他满怀喜悦地反复翻阅，从护封、硬面、环衬、扉页、图片以至不同文学品种的题头设计和字型选择，仔细琢磨，连连点头，认为有所创新，特别是对每卷卷首的彩色图片插页，赞不绝口，说富有史料价值，仅此一点，已是极有个性的一大特色，是已经出版的几套《中国新文学大系》应该有而不曾有的。

在这次交谈中，他用老同学的口吻告诉我：大约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他在光华附中念书时，曾以学生会的名义办过一份校刊，名为《晨曦》，三十二开本，每期约十万字左右，每学期出版两期。他请了四位老师当顾问。其中，潘予且老师给他的帮助最大，主要是他能出主意，给方便，但是他决不包办代替。从组稿、审编、校对、跑印刷装订厂、拉广告，一直到发行，都是他和另外十多位同学自己干的。因为他被推举为主编，工作也就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但是当一个个困难顺利解决，新出版的《晨曦》一册在手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因此《晨曦》磨炼了他，培植了他从小热爱编辑出版工作。他说他毕生走上编辑出版工作的道路，找根子，就是在光华附中高中念书时主编了《晨曦》。

这次寻根的长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后，虽在他和宋原放主编的《出版史料》季刊编委会上多次见面，但是很少谈论正题以外的事。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上海书店出版社召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座谈会”，邀请他参加，他没有来，说是因病不能出席。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常病，不会太严重，没有去拜望他。哪里知道在去年年初的报上，竟读到了悼念他的文章，这才知道，他已在去年三月二十一日不幸病逝。

半年以后的去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颁发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饮水思源，我也禁不住回想到获奖的根子之一，应该是赵家璧学长在十年前给我的坦诚而无私的点拨。

回忆出版家周铭谦

大约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经光华大学同学沈子复的介绍，认识了周铭谦同学。他比我小两岁。在我从光华附中直升光华大学念书时，没有看到他。后来我离开光华，去北京学习，可能他才进入光华念书。

第一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由子复陪同，在我工作的永祥印书馆二楼编辑部。他告诉我说，他想办一个出版进步文艺作品的出版社，希望能够得到我的支持，组织一批书稿。当时我正在编辑《文艺春秋》月刊，接触的进步作家不少，手头的书稿也积存不少，要编一套丛书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第二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在他寓所的客堂间里。我把准备组织的作家和作品开列清单给他看，并声明在先：大家都是光华同学，我不取任何报酬。他看了清单，表示同意。初步确定丛书的名称是“一知文艺丛书”，“一知”是从“益智”演化而来的。后来他征得合作者方德修同意，确定采用“一知”的名称。这是因为“益智”太偏于知识性，缺少文艺气息的原故。

第一次开列的作家作品有：骆宾基的中篇小说集《一个倔强的人》、王西彦的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梅林的散文集《红花集》、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顾仲彝的剧本《白莲花》。

到了一九四八年，为了在经济上援助已故作家王鲁彦的遗孀，又增加了鲁彦的短篇小说集《短篇集》。这些小说都是在鲁彦生前尚未结集成书，是由他的朋友们汇编起来，解决鲁彦家属经济困难的。

作为一位进步文化的出版家，周铭谦同学在短短的解放战争期间，给我留下了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印象：

一是他义无反顾地慷慨支援了贫病或有难的作家家属。王鲁彦家属贫病交迫，他知道后捐助了一笔钱。那本鲁彦的书稿《短篇集》，是在鲁彦家属得到经济支援后，觉得无法偿还，才请鲁彦的生前友好辑佚汇编起来的。再如骆宾基，当时因去东北策反一支武装部队接受党的领导，而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长春，后转解沈阳，有被处决的可能。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冯雪峰组织下，大造舆论，并找寻关系，设法营救。周铭谦同学在获悉这些情况后，还没有拿到书稿，就预支了稿费，从经济上支援了骆宾基的母亲和妹妹。

二是乐于结识一批进步作家。他常常带了一些礼品，跟我一起去拜访住在上海或路经上海的进步作家，有时还请他们吃饭，而绝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去看望为他提供书稿的作协梅林、剧专顾仲彝等，还曾敦请那些不为他供稿的翻译家黎烈文、何家槐、吴景崧等吃饭或茶叙。

三是在发行区域日益缩小、通货膨胀几乎月月变本加厉的情况下，周铭谦同学仍能坚持出版，很有感情地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以《文艺春秋》月刊为例，一九四七年一月，二百页的刊物定价三千元；六月，一百五十四页的刊物定价八千五百元；十二月，一百页的刊物定价一万五千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万元；三月，四万元；四月，八万元；五月，十二万元；六月，十六万元；八月，一百万元；九月改革币制，定价金圆券五角三分；十一月，金圆券五元；十二月，定价空白，等出版时填写（打橡皮数字），可见物价时刻在变，无法控制。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仅仅五十页的《文艺春秋》，

填写的金圆券定价是八百元。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印刷机已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出版事业是可以停办了。但是周铭谦同学却并不后悔，在他路经福州路到我书店的办公室来看我时，反而非常乐观地对我说：“我不灰心，因为越是困难，出版事业的大好时光越是接近到来。我们还是严肃地工作，一本一本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干！”他在出版工作最困难时期说的话，使我真正看到了不为个人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一位出版家的高大形象。

有不少人抱着唯利是图的目的，出版发行过不少书，这是出版商；也有少数出版工作者，以社会效益为重，甚至为谋求社会效益而不顾经济效益的，这是真正的出版家。周铭谦同学虽在困难时期出版过少量进步书籍，但是从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作风格看，他却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

光华大学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邵洛羊在《抗日战争时期光华大学建党始末》一文中，说到一九三八年秋，他在入党后因革命需要，进入光华大学，秘密组建“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光华大学工作组”时，周铭谦就是参加工作组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可见周铭谦同学思想一贯进步，长期来靠拢党，四十年代后期他能不计得失投身于进步文化的出版事业，绝不是偶然的。可惜他在四十一岁时因病而过早地伤逝。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热爱祖国出版家而感到无限悲痛！

林放二题

一 雄文璀璨垂千秋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为了组稿，我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新民晚报》社的社长室看望赵超构（林放）先生。赵老看到我来了，就从他的坐椅里站起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还连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老相识了！”

我非常奇怪。从一九五八年起，我远离上海，长期住在青海的喇嘛寺里，到一九七九年才把我接到西宁，在一所大学任教，调回上海，也不过是最近几年，还没有跟新闻界同志接触，怎么能说“我们是老相识”呢？

“那是从见到你给本报写文章时算起。”赵老笑着，用略带幽默的口吻说，“四十年代你不是给《夜光杯》写过文章吗？因此我们的神交已经四十多年了！”

经他这么一提，我才恍然记起：大约在一九四七或一九四八年光景，由袁水拍主编《新民报·夜光杯》时，我确曾写过稿。上海市公安局在八十年代初整理“文革”期间抄家物资时，还给我二十八封信，其中就有袁水拍用《新民报》信纸写给我的两封信。一封信里说：“希望抽空给《夜光杯》数百字，长短均欢迎，千万帮忙！”一封信里说：“承赐寄大作已刊出，兹剪奉报纸。希望继续赐稿或转一些别人的给《夜光杯》。”究竟我写了多少文章，写了哪些文章，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从这两封信证明，我确曾在四十多年前给《夜光杯》写过稿。赵老的记忆力确实使我吃惊。

“现在毕竟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有些近事往往转眼就忘，有些远事倒还记得清楚。”他补充说。

接着他谈了许多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为了让我认识报社的其他同志，那天他拄了拐杖，陪我看望了几位我想结识的朋友。

此后我和赵老又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丁香花园，一起吃了饭，留了影；一次是在他家里，他把他的新著签署后送给了我，还把为我写的文章《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的初稿给我看。他鼓励老年人放言无忌，多写文章，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

赵老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位长期奋斗并取得光辉成就的新闻文学家。他以“林放”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杂文，笔锋犀利，爱憎分明，承继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却又结合新时期和新情况的需要而有所创新：有时浓墨重彩，浑厚苍劲；有时文雅婉秀，淡抹轻勾，充分反映了当前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它将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而永垂史册。

二 为革命摇篮塑像

赵超构同志写于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延安一月》，大胆而巧妙地反映了我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从政治到文艺、从思想到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和成都同时发表，就好像是一声春雷，惊醒了广大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伟大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因此，这部作品，被周恩来同志称誉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我读《延安一月》的第一个印象是“大胆”。我说“大胆”，这是因为作者敢于面对现实，在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头一个站出来，正式并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以介绍毛泽东同志为例，当时国统区的许多反共报刊，都不惜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毛泽东是“草莽流寇”、“罪魁祸首”之辈，而作者却肯定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说他既精通马列，也熟读《资治通鉴》等著作，精通中国历史，因而能把“共产党理论”“活用到中国社会”，小如变工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为什么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施政方针政策深得人心而行之有效的原因。作者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成长取向和发展动力，言人所未言或不敢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读了《延安一月》以后，也明确肯定了“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我读《延安一月》的第二个印象是“巧妙”。所谓“巧妙”，是指作者在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如此森严而刻意挑剔的监控下，居然善用笔墨，貌似客观评说，实质却是倾注着主观的热情和赞赏。比如说到边区的军队，“连步枪都不够分配”，战斗也只能“和敌人做捉迷藏的游戏”（意即打游击）。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却指出了这支军队有两大特点：一是党的领导深入部队基层牢不可破，二是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彻底，因此“单用武器的标准来估计它的力量是要失败的”。这倒是作者想说的真话，作者以满腔热情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

只要你是想回顾历史，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延安一月》，仍然有着它历史文献的价值，它所塑造的革命摇篮的形象，仍然有着丰富的现实观照意义。

吕思勉轶事

我在光华大学念书时，非常爱听吕思勉先生的历史课。他讲课时常常眼望天边，来回踱步，用带有常州口音的普通话，谈论史事兴衰，沧桑巨变，夹叙夹议，爱憎分明。在谈到胡夷侵袭华夏时，一种民族的正义感溢于眉睫，流露出一股浩然的正气。事实上，他不仅这样说着，而且也是这样做着。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常州相继失守。旅居在孤岛的吕思勉先生，由于故乡常州的城门口站有日兵岗哨，出进必须脱帽鞠躬，他就坚决抵制，不再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就这样，他在常州的老家房屋，因为没有人住，长期得不到修缮，终于由残漏、剥蚀而倾倒，木料和砖瓦被盗一空，他也毫不顾惜。到了一九四二年八月，进出常州城门的人，可以不再弯腰鞠躬，只有那些戴帽子的，要向日兵岗哨脱帽致敬，才可以过去。因此吕思勉先生干脆光着头，回到常州的老家，而且他还起誓：“不到抗战胜利，我决不再戴帽子，光头到底！”

吕先生回到了常州，最初住在亲戚家，用刚刚从开明书店取得的一笔稿费，在老家房屋的废墟上，盖了两间屋，附加一间作为灶房用的茅草棚。他和家属定居以后，在满是瓦砾和石灰块的住宅废墟上，种植一些容易存活的南瓜和扁豆，成天吃着扁豆烧豆腐和子姜炒南瓜。他就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过着这样简陋的生活。但是他却严肃地工作着：日夜操劳，笔耕不辍，每天至少要定稿两千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吕先生又从常州老家来到了上海。那年十二月三十日放寒假时，他买了一顶六合帽，第二天，堂堂正正地戴上六合帽，趾高气扬地回到常州老家去过年。他在日记《扬眉记》里高兴地说：这种六合帽，是明太祖平定胡元以后所制定，因此他“戴之昂然归故乡”！充分流露了他当时的那种抗战胜利、扬眉吐气的爱国主义激情。

从一九四一年起，我冒着被日伪绑架或枪杀的危险，在孤岛的上海给一家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编副刊，向吕先生组稿，并且事先声明，稿酬很低。但是吕先生一口答应了。他还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于是他用了“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很多化名，写了不少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文章。实际上，当时他的经济情况非常拮据。他夫妇俩有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但是他还要负担另外三个人的生活：一个是离婚在家的“再从”堂妹，另外两位是“再从”堂弟夫妇俩。而光华大学的教薪，一年只发九个月，加上国难时期，经常欠薪。有一次，为了医治夫人的病，不得不把御寒的大衣也卖掉。生活的担子如此沉重，他只得在认真教书的同时，努力为开明书店写书。汪伪的报刊也曾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组稿，甚至通过他的一个落水的学生来向他游说，他用“为开明书店订约写书”的话来搪塞，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

吕先生寓居在孤岛时期的心态，可以从他当时用“谈言”这一笔名发表的一篇散文《狗吠》中看出来。文章一开头，描写了阔别故乡三年有余的“我”，见了故乡来人，不免要问起故乡的情况。来人却答非所问地回答：“现在狗吠的声音，比以前厉害了。”这是什么话！这使“我”听了莫名其妙。文章就从这一悬疑开始，借狗吠这条线索，步步深入地说明了狗为什么越来越疯狂吠叫的原因。原来狗目睹了新来的一批批鬼子在夜间干尽坏事而狂吠，狗

又因为狂吠而被为非作歹的鬼子们残暴地击杀，半死不活的狗拖着血淋淋的肠子满街乱窜而叫声更加凄厉……他有力地控诉了日寇占领下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忧国忧民，寝立不安，这就是他蛰居孤岛时期的真实心态。

回想到抗日战争时吕思勉先生在沦陷区的生活，特别是关于他戴帽子、修房子、写稿子的一些轶事，使我清楚地看到了他那心系人民、疾恶如仇、秉性耿直、言行一致的爱国史学家的风范。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他那熠熠闪光的爱国主义思想，却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忆池宁

池宁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舞台美术家、电影美工师和书刊装帧设计师。他的文学造诣较深，能在学习和工作中，通过自己灵巧的悟性，创造出足以深化作品主题思想的幕景、道具或封面构图，用光和色的烘托和变幻，构成符合故事情节的氛围，充分调动观众或读者观赏作品时的美学情趣。

我和池宁认识，是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当时上海早已沦为“孤岛”。我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桃源村，离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场地很近。剧艺社每次新剧公演，我都去观看。有一天出门，我在村口马路上遇到了教过我书的复旦大学顾仲彝教授，他把我带到了上海剧艺社，参观几套刚刚按照设计图纸加工绘制成的布景。他还给我介绍了正在舞台一角用水粉在布景上添补色彩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池宁。

和池宁交往比较密切的时期，是在一九四四年我为上海永祥印书馆负责筹建编辑部以后。当时，我一面向住居在沦陷后的上海、从未靠拢日伪的进步文化人组稿，以便胜利后出版几套丛书；一面以“丛刊”形式（可以不向日伪申请登记），出版一种变相的期刊。期刊第四集《朝雾》、第五集《黎明》的封面设计，以及“文学新刊”第二集分别由吴天、赵景深、顾仲彝等六位作者撰著的六册封面设计，都是出于池宁的手笔。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池宁曾经潜往苏北，参加新四军，任鲁工团戏剧组舞台美术教师。一九四三年因为反扫荡，需要精简人员而返回上海，先后任同茂演剧社、联艺实验剧团、上海艺术剧团等许多进步戏剧团体的舞美设计。当时他住在一座楼房晒台上增建的一间简易砖房里。我去看他时，如果不下雨，总是从狭小的砖房里提出两个可以折叠的小帆布凳，坐在晒台上闲聊。有时我带了一瓶酒，买了一些熟菜，和他两人在晒台上对饮。只要有酒，池宁的谈劲大增，说话滔滔不绝。

池宁告诉我，他只是一个初中生，当过小学教员。他从小热爱绘画，后来又干过一家装饰公司的工艺美术。他说舞台美术的要害，是在钻研和把握作品的主题，用绘画语言来衬托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要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幕景，完美地表达出来。因此这项学问，需要他不断学习，需要具备高度的文学艺术素养。他虚心而又好学，阅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和艺术理论书籍。他终于为不少进步话剧在日伪鼻子底下演出，成功地完成了舞台美术装置，比较突出的有：《雷雨》、《日出》、《女子公寓》和《这不过是春天》等。我国电影史上杰作之一的《小城之春》。以及解放后的优秀影片《祝福》、《林家铺子》、《以革命的名义》、《早春二月》、《革命家庭》、《小二黑结婚》（与人合作）和《鲁迅传》（因故未摄制）等，都是由他负责完成美术设计。他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一四年六月出生于浙江瑞安的池宁，比我大两岁。上海解放以后，他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电影室副主任，这时我才知道他早在一九三五年二十一岁时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十年动乱时期，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后，于一九七三年六月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1992年1月

第四辑

我编《作品》半月刊

一 作品社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学时的同学李励文、刘尔倬等商议，准备组织一个文学社团，出版期刊和丛书。又和马良、邵子南、李雷等商议，他们都积极支持，愿意共同筹备。后来又由邵子南介绍了丘东平、肖琳，马良介绍了叶紫等参加。社团定名为作品社。

一九三七年四月，经过几次商议后，决定先出版《作品》半月刊一种，由范泉、马良出面主编；由刘尔倬筹划资金，负责发行工作；由邵子南、李雷协助组稿。经过两个月的积极筹备，终于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了《作品》半月刊。

《作品》半月刊的创刊号内容比较丰富。郭沫若特地从日本寄来了稿件《给威廉迈斯达译者》，并附信表示热烈支持。由陈琳翻译了鲁迅用日文写的遗作《王道》。任钧写了评论《读戴望舒的谈国防诗歌以后》。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东北作家李辉英的《白面》、从菲律宾回国的作家林娜（后来改名为司马文森）的《人间》、全国解放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的方之中的《李保镖》。诗歌有白薇的长诗《爱的女神》、田汉的歌词《洪水插曲》。散文有邵子南的《归》、李励文的《雨》。报告和通讯有孙陵的《“中国留学生”》、凡容的《马莱亚途中》、肖明的《莫斯科文艺通讯》。我和邵子南等写了书评介绍丘东平的中篇小说集《火灾》等多篇。

《作品》半月刊的第二期因为等待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文稿，延迟到七月十五日出版。主要内容有：郭沫若的评论《自由并不是中立》，沈起予的长篇随笔《我的自白》。陈琳翻译了日本外村史郎写的评论《苏联文学的现状》。短篇小说有夏征农的《被苦难熬过的妇人》、林娜的《盲者》。散文有邵子南的《文斋先生》、范泉的《江水》。诗歌有李雷的长诗《阳光曲》、田汉的《洪水插曲》续篇等。报告和通讯有洪为济（后来改名“吴天”）的《殖民地的故事》、张春桥的《孩子们》和狄耕的《这里没有良民》等。

《作品》半月刊第二期出版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突发后的第二天，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群情激昂，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资金反馈受阻。经过社务会议研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将半月刊改为不定期的丛刊形式，第三期即改名《山河颂》，以陆地的战地通讯《山河颂》为书名，安排在八月十五日出版。就我回忆所及，这一期曾发表了郭沫若从日本寄发的最后一篇文稿《随笔三则》（原题已忘），洪深的随笔《读书偶记》。短篇小说有丘东平的《仲夏夜》、邵子南的《烟帮》、范泉的《金山嘴》。散文有李励文的《南国春秋》、叶紫的《书简》（记得另有题目）。李雷写了一篇抗日题材的通讯《在大场》。别的篇目已记不起来了。

这一期刊物，仅取得样书数册。到出版前两天，即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突然发动侵略战争，设在南市区的作品社社址被炸，存放的丛书纸型和期刊被炸毁，马良被炸失踪（估计身亡）。当时我刚巧去了无锡农村刘家庄，

因为铁路被炸断，无法回上海，李雷和邵子南随救亡团体撤离上海，刘尔俸回到山东老家没有回来，作品社遂告解体。

二 洪深·谢六逸

我编《作品》半月刊，是由于洪深和谢六逸先生的鼓励。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张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在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发表后，洪深先生就开始和我通信。当他知道我因为日寇侵略得寸进尺，华北也将变色，再也不愿去日本半工半读时，他劝我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可以一面念书，一面从事文艺创作或编辑工作。他说上海的文艺界朋友多，出版条件好，文艺活动的空间也比较开阔，希望我在上海闯一下。我听了他的话。一九三七年春，转学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我进复旦新闻系，是因为系主任是谢六逸先生。而我和谢六逸先生的交往，是由于洪深先生的介绍。当时我住在江湾的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星期六的下午，我总是要到谢六逸先生的家里去看他，和他聊天，有时就在他家里吃晚饭。谢先生为人厚道，作风平易近人，谈论问题时那种既真诚又热情的仪态，总是使我解放思想，妄言无忌地表述我自己的观点，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有一次谈到了编刊物。我说我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时，曾经编辑过《光华附中》半月刊。那是一个学术文艺性的综合期刊，十六开本，每期约十五万字，虽然在名义上我是邢鹏举老师的助手，实际上他很少过问，只是在组稿和划样发排时提些意见，因此我反而得到了独立思考的锻炼。现在我的兴趣，倒是在今后能够编辑一种纯文艺刊物。

“那好啊，我支持你！在新闻系学习，编辑实践是最最重要的。”

谢六逸先生非常豪爽地说。他介绍了他在日本念书时中国留学生集资创办刊物的情况、日本文学艺术界以及新闻出版界编辑出版书报杂志的情况，也介绍了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兼职主编《立报》的文艺副刊《言林》的情况。正因为编刊物，他才熟识了一大批文艺界的朋友，还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只有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只有在编辑实践中，才能逐步掌握新闻编辑学的实践规律，并相应地在实践中日益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水平、编辑水平和写作水平。新闻学这个学科，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学科，是一门在实践中体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的新兴学科。”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已是将近半夜。我非常激动。睡在床上，还反复忖度着这些内容丰富的介绍，并且长时间地思考如何真正进入我实践的境界——闯出一个新天地。

第二天星期日，我去看望我中学时期的老同学李励文和刘尔俸。他们都热情支持我的设想。刘尔俸的父亲是一家专事运销业务的报关行总经理，经过儿子的思想工作，他终于同意提出一笔现金，交给刘尔俸，作为社团基金的投资。

谢六逸先生给我介绍了郭沫若、郑振铎、许广平等，洪深先生给我介绍了沈起予、田汉、白薇等大批作家。《作品》半月刊创刊号就这样顺利地在六月中旬出版了。

翻阅着即将发行的《作品》半月刊创刊号样书，谢六逸先生笑容可掬地

对我说：

“有特色，你编出了风格！”

然后他说明：为什么说“编出了风格”。他的意思是说，仅仅从目录看，已经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我的编辑个性：一是运用文武线作框，细线作题列的分隔线，刊名和刊号作天头，交叉得恰到好处；二是文章分组，两面套成一版，一目了然；三是题目和作者的字体、标号以及空铅间隔、页码，甚至铅版题头，都搭配得很好，形成一个极其和谐的统一体，使人看了目录，就留下一一种素朴的美感。

“当然，”他接着说，“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他指出了在目录上不应该忽略时间，这是最大的缺点。其次，“特稿”的安排不妥，包括字体、标号和中止号的使用。第三，正文的标题格式很好，但像小说《白面》那样因为对话较多，采用老五号直行排字的形式，显然是浪费了篇幅，十分可惜。

“但是总起来说，优点多于缺点。”谢六逸先生用爱抚的口吻分析说：“这是你走向社会交给我的第一份考卷。不错，有个性，有特色，有你独自的风格！”

这是他对我语重心长的鼓励。

他那认真负责、条分缕析、循循善诱、蕴含着热忱期待与无限深情的话语，一直到今天，使我记忆犹新，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际。

三 李雷·邵子南

我编《作品》半月刊，李雷和邵子南是我主要的合作者。

为了便于组稿，我从复旦的学生宿舍迁居到当时属于法租界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四十二号客堂间。那里住着邵子南和肖琳，有时还住着李雷，亭子间里住着光未然（即张光年）。我们都是些没有钱的青年人，有衣服大家穿，有面包大家吃。谁得到了一笔稿费，就由谁请客，有时还在晚上提了暖瓶，到豆腐铺里去买豆浆，一路上哼着光未然写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当然，在我们这群流浪青年的合唱里，李雷的声音是最响亮的。

李雷是东北诗人，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的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山海工学团的校址设在上海郊区的大场，但是他几乎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六都到市里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谈论许多有关创作或其他的问题。

李雷非常热情。

可以说，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还不曾遇到过像他那样热情、像他那样勇于交心的朋友。当他一旦发现我可以做他的朋友时，就不顾一切地为我着想，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想方设法来解决我的困难。他知道我们都很穷。每次他取得一笔稿费时，总是尽其所有，买来了香肠面包和廉价的黄酒，请我们吃喝。而他自己，却生活得非常刻苦。他穿着的那件陈旧得接近破烂的淡蓝布长衫，一双袖口已经冒出了一些缺少纬线串连起来的棉织纤维。他穿着的那双独一无二的、已经泛出了土灰色的黑皮鞋，鞋帮补了再补，其中一只后帮，是在脱落以后重新缝合起来的，两个后跟的垫铁也几乎已经磨平了，走起路来只听得“嗤哺！嗤哺！”的声音。面对着如此艰难的生活，他却非常乐观，爽朗的笑声总是伴随着他。有一次他把上一年冬天得到稿费后新买的一件棉袄送进当铺，把换来的钱带给我们，让我们去安排生活。可是

正当他从口袋里取钱时，一不小心，竟把当票也取出来了。我们这才发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慌忙捡起当票，塞进自己的口袋，一面自我解嘲地说：“当铺嘛，还不是我的衣柜！我只是借用当铺里的衣柜，存放我暂时不穿的衣服罢了。你们看，这，又有什么！”

接着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李雷的这种满腔热忱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另一位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四川人邵子南。

他和我同龄，但是他有着几乎令人不能置信的坎坷经历。我多么爱听他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他如何当了一艘小轮船的“水手”，如何在重庆拉了黄包车，如何在码头上当苦力，如何在嘉陵江畔拉纤，如何抱一杆破琴沿街乞，如何在头上烫了戒疤，当了一个小和尚……

“你真的当过和尚？”我十分惊讶。

“可不是！”

说着，他低下了头，用右手摸索着头发，要我细看他那些留在短发丛中的戒疤。然后抬起了头，举目远视，像在忖量着他那三年的流浪生活似的，用总结的口吻说：

“只要能够活下来，干啥子都行！”

停停，他又说：

“当和尚，生活安定，比沿街乞讨要好多呀。”

“那么后来，”我禁不住问，“你为什么又不当了呢？”“那是因为我偷看文艺书籍，不爱念经，屡教不改，被‘住持’逐出了庙门。”

“你不觉得可惜吗——丢掉了安定的生活？”

“才不呢！”他轻蔑地笑了笑，然后又郑重地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第十七个行业：卖文为生！为了今后不挨饿，必须把文章写好。俗话说：‘文穷而后工’，看来不假！”

他真的是为了吃饭而写文章吗？不是！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为了要让那些像他那样的穷人都有饭吃而写文章。这是他的心里话。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写出了《李勇大摆地雷阵》那样的名篇，还接受党的派遣，担任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他是重庆市广播电台台长、西南文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病逝（参见《回忆邵子南和作品社》）。而李雷，我仅仅知道他到过延安，在延安的出版物上发表过作品，全国解放后，在东北的一所大学里当过教授，戴过“右派”帽子，但是至今生死不明。

李雷和邵子南，在我主编《作品》半月刊的全过程中，曾经热情地协助我一起组稿，一起跑印刷厂，一起校对，一起车书。刊物锻炼了我们，把我们熔融在一起。

四 主旋律

《作品》半月刊的主旋律，正如创刊号的封面上标明的：高举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那些文艺作品里的主人公，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就创刊号的三个短篇小说看，李辉英的《白面》是以洋车夫为题材的。

小说描写一个“指望两条腿养家的人”赵老大，由于体力不支，吸上白面，以致不得不酿成出租自己的老婆而终于被人骗走，落得四大皆空的悲剧。方之中的《李保镖》，是写一位长期来忠于职守、曾经为了护卫老太爷而被绑匪枪伤过的李保镖，到了少爷一辈，却因为无意中踩痛了少奶奶的脚板，而被逼得自杀的经过。林娜的《人间》，则是描绘了菲律宾私娼的惨状：一个天真活泼的18岁少女小扶西，因为椰园不景气而被辞退以后，为了养活瞎眼的母亲和六岁的弟弟，逼得她走上出卖肉体的道路，最后又被“暗探”侦破逮捕坐牢，迫使骨瘦如柴的小弟弟不得不搀扶着瞎眼的母亲流浪乞讨……

创刊号里的两篇散文和两篇报告文学更富有反帝反封建的特色。李励文的《雨》，写一个革命党人如何在赴义以前的监狱里，利用生命的点滴时间，写他的血泪挣扎史。邵子南的《归》，真实地反映了他在吃人的社会里受尽煎熬、到处流浪的切身感受。凡容的《马莱亚途中》，揭露了马莱亚殖民当局连一句“血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的诗句也不能容忍，断定是共产党的暗号，而把诗歌的作者驱逐出境。孙陵的《“中国留学生”》，控诉了日本宪兵在我国东北的所谓“满洲国”，残酷地迫害那些把子女送回关内、当了带引号的“中国留学生”的家长们。在《作品》的第二和第三期里，反帝的报告文学有洪为济的《殖民地的故事》和李励文的《南国春秋》，抗日题材的通讯有狄耕的《这里没有良民》、陆地的《山河颂》和李雷的《在大场》。夏征农的《被苦难熬过的妇人》、丘东平的《仲夏夜》、邵子南的《烟帮》和范泉的《金山嘴》，都是取材于社会下层贫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一切为了穷人们！”

这是李雷的一首诗里的一句话。

而《作品》的主要倾向，正像这句话所表述的。

我们本着这样的主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作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同人刊物，因为我们，战斗在这块园地里的我们，走着同一条路，说着同一句话，唱着同一首歌，写着同一个字。

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

五 叶紫·丘东平……

我编《作品》半月刊，有几位曾经热情支援过我的朋友，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叶紫。

第一次看到叶紫，是在一家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他说话很低沉，身体很虚弱，据他自己说，是患了肺结核病。他和邵子南一样，曾经传奇般地生活在下层社会里。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的父亲和姐姐被害以后，十五岁的他就逃离家乡，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曾经沿街乞讨，为一家富农打过杂，甚至当过兵，在一所小学校里教过书，还在一家报社里当过不太称职的编辑。二十一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才固定了他的卖文为生的生活。

他勤奋写作。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奴隶丛书》里，收了他由六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丰收》。他那些用血泪的生活编织起来的小说，曾经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但是他平易近人，只要是他知心的朋友，总是有求必应，

毫不虚饰。他非常高兴地加入了我们的作品社，还热情地谈了他过去组建无名文艺社的经验和教训。说到提供稿件，他满口答应，一定要把他正在打算写的一个长篇，在写成头三章后就交给我们连载。

可是过度辛劳的工作，加上营养不良，当我们第三次去看他时，他的长篇还无法动手，只是把一组书简交给我们，作为他入社的应尽义务。谁能想到：此后不到两年，他被日益沉重的疾病所困扰，终于留下了写作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遗愿，撒手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而这时他才不过是二十七岁的青年。

其次是丘东平。

东平常到我们的客堂间来，有时就在一起吃饭。

他中等身材，脸色黧黑，说话的时候抑扬顿挫，吃罢了饭（其实是黑面包片），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再把右腿搁到左腿上，倾侧了头，好像一个哲学家似的对你看了又看，深思熟虑地在头脑里打了一转，于是滔滔不绝地开始他的带着广东口音的独白。他一打开话匣，就再也顾不到别人的意见，像一个会独唱的诗人，永远津津有味地讲他要说的话，批评他要批评的人，赞美他要赞美的朋友。

他有哲学家的头脑，诗人的热情，演说者的风度。

他为《作品》写了一个此后不曾收编起来的短篇小说《仲夏夜》。

此后，他参加了新四军，教育了一批日本俘虏。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次敌人的袭击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时他才三十一岁。

第三是孙陵。

孙陵比我大两岁。他祖籍山东，却生长在东北。三十年代初，他就在东北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诗和小说。后来进入关内，便成为“东北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洪深先生的介绍。全面抗战以后，郭沫若先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期，他是郭老的部下。全国解放时，他在台湾。八十年代初，他和周锦等编纂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丛刊》，他写了总序，将我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出版的散文集《绿的北国》也收在第一辑里。一九八三年病逝。临终时，据说他还念念不忘一些老朋友，连声说：

“我再也见不到巴金先生了。……”

第四是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姓何，福建人，和我同年。小时候，曾在菲律宾当过童工。十二岁时回国，十七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林娜”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提供给《作品》的两个短篇小说，都取材于菲律宾当童工时的见闻。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稳定地使用了“司马文森”这个笔名。

认识司马文森，是由于李雷的介绍。他性格内向，但思路敏捷，欢喜讲故事，讲他在马尼拉时接触到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形象，娓娓动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能埋头苦干，约期不误，一个月里可以赶写出几个短篇。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

第五是李辉英。

发表在《作品》创刊号里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东北作家李辉英写的《白面》。这是在洪深先生介绍后寄来的。当时我不曾和李辉英见面，仅仅建立了通信关系。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了作代会闭幕式以后，到艾芜的房间里去闲聊时，才意外地遇到了从香港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李辉英。

我提起一九三七年《作品》半月刊上发表他小说的事，他还依稀记得，但那篇小说他却丢失了。他要我找到刊物，复印一份寄给他。此后，他回香港，我们的通信至今没有间断。当他知道我将要创办一个文艺刊物时，他很快又寄来了一个短篇小说。虽然他已七十八岁高龄，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已经十多年，但是读着他的新作，那精心的构思和圆熟的表述技巧，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爱不释手。

六 关于丛书

最后，应该说一说已经打成纸型，印出样书，却被毁于“八一三”战火的丛书第一辑内容。

作为作品社的丛书，因为后来打算组建一个“燎原出版社”，而以“燎原文学汇刊”的名称，在《作品》半月刊的第二期上刊出了预告。第二期付印时，恐怕用“燎原”字样去申请出版社登记，不容易获准，又把“燎”字改成了“辽”字。

“燎原文学汇刊”第一辑，包含作品社四个基本成员的四本“处女作”：

邵子南的短篇小说集《青生》，李雷的诗集《阳光曲》，李励文的散文集《尼德兰人》，范泉的短篇童话集《江水》。

邵子南的《青生》收有五个短篇：《归》、《青生》、《黄金》、《烟帮》、《家与万安老爹》。这些作品，以浪子还乡、四川旱灾、磨坊工人和矿工生活为题材，反映了作者流浪异乡的坎坷经历。李雷的《阳光曲》，收有长诗《阳光曲》、《骑白马来的人》、《乡村之夜》以及短诗三十余首，诗情激越，用铿锵而悠厉的韵调唱出了穷苦大众的苦难和希冀。李励文的《尼德兰人》，收有《歌声》、《爪哇草》、《从古卑到芝不栋》、《尼德兰人》等散文十五篇，写的是南洋华侨的反帝血泪控诉。范泉的《江水》，是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散文集，收有《鱼》、《灭亡》、《旧塔》、《英雄们》等十八篇散文式的童话，童话式的散文，蕴含哲理，是力图开创一种新文体的尝试。

丛书刚刚印好，就和《作品》第三期《山河颂》一起，在战火中永远消失了。……

我编《作品》半月刊，是我闯进社会，向激励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老师谢六逸先生交上的第一份考卷；也是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文艺战友，在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学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当时的向往被毁于民族存亡关头的战火，但是此后，我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像我们开始时的步调那样，继续往前走，毫不动摇，经受住了长期的严峻的考验，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使我有勇气，回忆我们当时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我禁不住敞开我感情的闸门，搜索我因年迈而已经开始残败了的记忆网络，把那些曾经在当时和我一起战斗、以及激励和支援过我的师友们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地记录了一些，作为我对已经谢世的师友们的深切悼念，对至今还健在的师友们的衷心祝福！

1989年5月25日

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

一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曾编过两种期刊和两种副刊：期刊是《学生生活》半月刊和《生活与实践丛刊》，副刊是《堡垒》和《集纳》。《学生生活》半月刊的出版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主办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由《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人黄幼雄负责发行事务，我仅负责编辑工作。为这个刊物写稿和作画的，有叶夫、吴景崧、陈琪等。因刊物再也找不到，很难记叙当时的细节。《集纳》是《中美日报》的副刊。我接编后改为纯文艺性质，主要写稿的有横恒（女）、钱今昔、过客（蒋星煜）、徐翊（徐开垒）、钟子芒、马博良、谢紫灵、黄琦等。从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孤岛”为止，前后仅编两个多月，时间十分短促。

二

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我编过《中美日报》的副刊《堡垒》，共一百四十七期。《中美日报》是国民党CC系的报纸，挂着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的招牌，社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东侧的大楼里。我去《中美日报》，是由于复旦大学的推荐，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复旦大学推荐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新闻系同学郑忠谔（编国际新闻）和杨继民（编本市新闻）。

《堡垒》是学艺性副刊，每周出版三期。和《堡垒》同时创刊的，是另一副刊《艺林》，由鲁思同志主编。两个副刊交替出现。当时的“孤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美日报》遭受敌伪特务的袭击，再三被迫休刊。《文汇报》、《大美晚报》和《申报》也一再被炸，记者如张似旭、邵虚白、程振章、李骏英等惨遭暗杀；而一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则甘心为敌伪效劳。如周作人、张资平、穆时英、刘呐鸥等，包括我在中学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柳雨生，也都先后落水当了汉奸。敌伪报纸《中华日报》、《新申报》、《总汇报》、《上海商报》、《时代晚报》、《民族日报》、《晶报》、《肃清画报》等，期刊《新世纪》、《日本评论》、《大众言论》、《教育月刊》、《国风》半月刊等三十多种，相继出版，多如牛毛。一些留在“孤岛”的真正进步的文化人，有的闭门译写，有的休笔蛰居。只有地下党领导的文艺和文教工作者，通过一些文艺社团和学术教育单位等外围组织，坚持出版进步书刊，开展各种文艺性的革命斗争活动。在党领导下比较活跃的话剧界，也都侧重于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宣扬民族正气，鼓舞抗日斗志。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堡垒》创刊了。它的特点，是以短兵相接的姿态，毫不隐讳地与敌伪展开白刃战。那时我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来的严永洁同志常住我家，使我懂得一些抗日反汪的革命道理。因此，我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能无视白色恐怖，做了一些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该做的事。

三

在一四七期的《堡垒》副刊里，从内容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揭露敌伪的文化阴谋。这方面的文章，曾先后发表过陆维良的《从日‘满’作家座谈会看出日本的文化阴谋》、耳耶的《给武者小路实笃的信》（指出武者小路实笃已经充当了日本军阀的扬声筒）、马青的《周作人新论》、舀郁的《张资平也要混水里摸鱼》等。

二是横扫一切毒化书报。曾经编组“文化毒素扫荡号”多期，给毒化书报点名归类，唤起人们擦亮眼睛，坚决抵制。在《变色的文化市场》里，还无情地揭露了东北、朝鲜、台湾、华北等地敌伪文化的各种丑态。

三是批判漠视抗战的西崽倾向。如批判影片《玉蜻蜓》、《刁刘氏》等内容黄色、麻痹青年抗敌意志。批判索非、黄嘉音等置身于抗战之外，只写家庭琐事的出世文章。所谓“西崽”，正像昆如在《论“西崽相”》（副刊第二十六期）里所说，是指那些“对抗战毫无感兴，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放几支冷箭，回头又假装天下太平，说几句‘哈哈，今天天气……’”的西崽式文人。

四是发表带有时代气息的学术论著。如锡金的《论诗的分行》、朱维基的《开展诗歌运动》、孔另境的《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邹啸（赵景深）的《两年来的通俗文艺运动》、钱今昔的《孤岛文艺运动的策略》、过客（蒋星煜）的《艺术略论》、束霄（锡金）的《诗歌奋起战斗》等。

五是介绍进步作家论著、推荐在“孤岛”出版或经销的进步文艺读物。前者如史叶的《热爱自由的普式庚》、钱今昔的《阿志巴绥夫论》、朱维基的《波兰大诗人及自由的战士密基维支》。后者如《文艺新潮》、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曹靖华、尚佩秋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死敌》等。

四

编辑副刊《堡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在“五四”青年节的前夕，《堡垒》发表了一篇咒骂国民党三青团的文章，题目为《上海青年界抗议》，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逢到纪念节日，还要长篇大论，满纸勤勉，那不仅是多事，抑且根本对于青年，没有表示诚意，因而我们严重抗议。

这些话确是说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痛处，因此三青团恼羞成怒，决定用暗杀的方式来谋害我。这种事被报社的总编辑詹文浒知道了。他通知我，要我住在报社，不轻易外出。过了几天，詹把我接到他坐的小汽车里，说是为了我的事，去看望一位负责人。汽车回环盘旋，终于驶到一座高楼大厦的门口。走进大门，登上电梯，大约在十多层的楼梯口刹住了车。一位听差打扮的壮汉早已等候在那里。就在他的引导下，按了电钮，我们走进了一间放着许多古玩的小客厅。詹进入内室。不久，陪同一位头发花白、身穿绸袍马褂的老汉，走出门来。詹陪着笑脸，介绍了我就是《堡垒》的编辑。老汉一面就座，一面连连点头，好像事先早已知道了似的，连声说道：“好好好，我

来打个招呼。没事，没事！”接着是他们寒暄了一番。整个会晤我没有说一句话。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光景，退了出来。事后詹才告诉我，老汉的名字叫蒋伯诚，是国民党留在“孤岛”上的总负责人。

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咒骂了三青团，詹文浒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十分热心地为我解除后顾之忧，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到今年春节，我和当时一起在《中美日报》工作的同事胡道静（现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谈起时，经他阐释，才恍然大悟。他说当时我们都年青，只知抗日，连《中美日报》是CC系的报纸都不知道。日寇投降后，他进了《正言报》，才逐渐搞清《正言报》是三青团的报纸，而《中美日报》是CC系的报纸。三青团和CC一贯对立，狗咬狗。当时我正巧夹在两头恶狗之间，扮演了一只兔子的脚色，人还活着，算是万幸。想起来真叫人毛骨悚然。

过了半年，在一九四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从报社出来，走出长耕里，突然有两员彪形大汉，从我左右两侧靠拢。我机警地意识到：可能是汪伪特务来绑架我。我加快步伐，走上公共汽车候车站的候车台阶。一辆公共汽车刚巧停到我的脚边。车门开启后我并不上车，因为两个特务已经站在我的两侧。马路对面的一辆小汽车，正在调头向我驶来。当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动手拉门，快要关上门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奋身一跃，跳上汽车。只听得砰的一声，车门关闭，终于把这两条特务尾巴甩掉了。从此我再也不出报社，长期和报社的排印工人住在一起。

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中旬，由于《堡垒》编印了“诗座谈”专辑多次，发表了锡金、朱维基等的文章，受到报社内部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共党嫌疑”），而终于从二月十六日起停止了我的编务，由钱佛公接编。

五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编副刊，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而已，有很多的具体实际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总编詹文浒用“乐之”、“乐斯”等笔名写下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文章，交副刊发表；当他在下半夜检阅报纸“大样”，发现副刊里有露骨的进步文章时，擅自抽调，补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为了占领这一文化宣传阵地，我总是委曲求全。到了停止我编务后，我就和钱今昔、郑忠谔等商议，自力更生，合资创办了生活与实践出版社，出版学艺性的期刊《生活与实践丛刊》。

记得当时我们曾开过几次会，商议了经济问题、稿源问题、印刷问题、发行问题。用“丛刊”的形式分辑出版，有两种好处：一是可以逃避登记，立刻出书；二是可以不定期出版，比较主动。在写作分工方面，也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今昔写哲学，郑忠谔写时事，我写文艺。

当时，钱今昔是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学生协会”西区交通站的“交通”。党的有关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矛盾论》等，通过他分送给西区的学协小组。“学生协会”的工作对象是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它是党的外围的秘密组织，负责人是暨南大学化学系的学生王经纬（即陈伟达，现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学协分东西南北四个区。西区学协负责人姓龚，人们都叫他“龚大哥”，《生活与实践丛刊》里发表了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章，都是由他提供的。

《生活与实践丛刊》第一辑《论思想方向》，终于在党的支持下、在我们积极筹备下创刊了。那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是《堡垒》易手以后不到一个月。创刊号里有来自延安的文章：张庚的《蒲列哈诺夫论易卜生》，是西区学协负责人龚大哥交来的。其他六篇文章是：白丁的《论思想方向》、钱证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二三见解》、柳金的《青年的团结》、侯补道的《亚欧战局》、司徒宗的《教育·生活·实践》、范泉的《表现上海的文艺题材》。白丁是我的化名，钱证是钱今昔，柳金是周楞伽，侯补道是郑忠轸，司徒宗是孔令杰。

由于这个刊物是我们自己创办的，再不会受到敌伪的干扰和压力。所以，我们都能畅所欲言。在钱今昔的文章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向马恩列斯学习，批判了“代顽固派说教”的叶青、张君勱之徒。

《生活与实践丛刊》大约出版过四辑。第二辑是《自由及其它》，第三辑是《窑洞大学教育》，第四辑的书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窑洞大学教育》是我根据学协提供的资料写的，歌颂了抗大，歌颂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教育事业。

六

回想到“孤岛”时期的文艺活动，总使我禁不住在眼前浮现起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想到那些不避环境的险恶、不受敌伪的诱骗、经受住艰难的物质生活的考验，赤胆忠贞，为抗日反汪而挥毫战斗的师友们。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形象，晶莹剔透，光彩照人，永远鲜明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从新四军来到上海的杨斌，比我大六岁，圆润的脸，中等身材，体格壮健，能说一口略带湖北方音的普通话。他特别喜欢我的孩子海平。每次来到我家，总是买了苹果送给我的孩子，还把他高高举起，逗着他。我的孩子也习惯地叫他“苹果先生”，和他十分亲昵。他知道我搞文艺工作，有好几次和我谈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还提醒我，进出要小心。我没有约他写稿，但是他那语重心长的话，却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九四三年以后，他回解放区，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从南京雨花台的烈士陈列馆里，才又看到了他的遗像：“啊！苹果先生！”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阅读烈士生平介绍，我才知道：一九四一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他是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九四七年被叛徒出卖，在南京解放前牺牲。那时他才三十八岁。“他教育了我，文艺和生活……”我浮想联翩，泪水遮断了我的视线……

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一部二十四史，卷帙浩繁，真不知从何看起。但是吕先生却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有时，我到 he 家里取稿，是在吃饭的时候，他却连吃饭的时间也不轻易放过，嘴在碗口进饭，眼在书上琢磨。有一次吕先生轻轻告诉我：“居然有人想用名利来诱劝我落水……”他淡淡地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然后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了他早已写好的稿子，递给了我。他为了抗战胜利，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

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作，这是在战斗！

在年轻的作者中，锡金、朱维基和芳信，是我常说的“三剑客”。芳信和我接触不多。锡金是江苏宜兴人，正直豪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善于辞令，有时带有些孩子气。每次和他见面，看到他那豁达恬静而略带孩子气的笑容，总使我感到亲切而又温暖。维基是一位热情的诗人，敦厚淳朴，豪放不羁。他的诗铿锵有力，旋律强劲。在一行行漫长的诗句里，伴和着激越的节奏，热情奔放。读他的书，有纵横恣肆而不失规矩、葱茏粗犷而气韵雄浑的感觉。和我相处长达十七个年头的孔另境，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但在风寒料峭的“孤岛”时期，他却能像松柏一样的挺拔，箪瓢陋食，巍然屹立，用他那犀利的杂文笔触，鞭笞敌顽，捭阖自如。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钱今昔，有着爱憎分明的性格，对敌桀骜不驯，对友醇厚温婉。虽然他专业地理，却为了对敌斗争，而从事文艺创作，还写了哲学论文，可以说是一个多面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瘦长的个子，苍白的脸庞，不善辞令，不求闻达，真诚朴质，和蔼可亲。他和我在一张双人办公桌上工作，空闲的时候，阅读莎翁原著，译写一些章节，也和我偶尔谈及“信、达、雅”的要求。他为报纸写《小言》，也为《堡垒》写过一些短文，读来笔含春雨，墨透烟云，确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

七

在我离开上海五千余里、走了二十多年的空白以后，回到上海探询那些曾经在“孤岛”时期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文艺界师友们，真使我大吃一惊：差不多半数以上已经仙逝了。

上海社科院文研所要我写些“孤岛”文艺回忆录。我在“孤岛”时期虽然胡乱地涂写了一些什么，但滥不成章，不值得一提，倒是那些文艺界师友们的战斗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头脑里，教育了我，使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有勇气悼念他们。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成为悼念。我谨向景崧、杨斌、维基、芳信、另境、司徒宗、生豪、子芒等同志以及我的老师吕思勉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我衷心感谢他们在风云险恶的环境里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

迎着敌人的刺刀——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

一 占领阵地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家长期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他已介绍了邵力子的侄女、我在复旦新闻系念书时的同学邵德璜在那里工作。他说现在这家书店准备成立编辑部，先出版期刊。因为书店的董事长许晓初是他的学生，要求他推荐一位编辑部的负责人，因此他来找我，希望我去。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在解放后是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曾任青岛工学院院长、武汉测绘学院院长，为人刚正不阿，思想一贯进步。一九三九年冬，他曾推荐我去《中美日报》编辑一个抗日反汪的学术文艺性副刊《堡垒》，后来因为我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稿，而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撤销我副刊的编务，但是作为介绍人，他却没有责怪我，反而在我向他汇报我已被撤职，副刊已由钱佛公接编时，笑了笑安慰我：

“你编得不错，我都看了。”

他思索了一会，又带着十分真挚的感情缓缓地说：“别着急！今后，我会再去找你，介绍你干别的！”

今天，他终于不顾眼病和行走困难，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我的寓所，要我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扎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冲进了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以后，我长期失业，并利用失业的空闲时间翻译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一九四三年冬，光华大学的姚璋教授介绍我去南洋中学教书，生活刚刚安定下来。现在听说要我去搞编辑出版工作，我当然有些疑虑：是不是要把刚刚接手的教育工作丢掉？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创办一个不变色的期刊，能行吗？

我沉重地思索着。

看到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金通尹先生耐心地给我解释。他说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兼顾，可以少教几节课。但是去书店工作，那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这个沦陷了的上海，意义十分重大。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文化阵地，不能丢！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那么，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金通尹先生热爱祖国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种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不再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毫不犹豫地脱口回答：“我去！我去！”

想不到这一去，就是整整的八年。

二 迎着敌人的刺刀

当天下午，我去看望了许广平先生。

许广平先生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一星期，被上海的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她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刑讯了七十六天以后，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由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保释出来。出狱不久，我去看她，只见她满头白发，步履艰难。这使我非常吃惊。此后，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许广平先生陆续告诉我她蒙难的全过程。她说她留在“孤岛”不走

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看管、保存鲁迅先生的遗物和藏书，她认为这是她应尽的义务；其次，是为了孩子海婴身体孱弱，经不起长途的奔波。而日寇以佐佐木德正为首的十多个人到她家里搜查、逮捕她的原因，是为了要从她口里追查出一些抗日留沪知识分子和出版工作者的下落，要她提供几个抗日期刊的组织结构和内幕情况。她绝不透露真情，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朋友们的生命和安全。也正因为这样，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入狱第五天，就被拳打脚踢，沉重的耳光把她的脸也打肿了。还拔出长长的指挥刀，搁在她的脸面上，威胁着要斩杀她。为了套取她的口供，要她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剩下最后的汗衫短裤，狠狠地鞭笞；满身创伤以后，才叫穿上。然后再脱，再鞭笞，再穿上。循环往复地凌辱和拷问。而最最令人发指的，是惨绝人寰的电刑，一天通电十多次，通通停停，停停通通，强大的电流把人打得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在这样酷刑的威逼下，许广平先生只吐露一句话：“我不知道！”

这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民族的仇恨！

正因为有着这种切身的体验，许广平先生的敌情观念非常强，警觉性高，观察十分锐敏。当她听到要我去一个新单位，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办一个不变色的刊物时，她不能不为我担忧。她联系自身的血的经历，作了具体分析以后，给我指出两点：一是要我调查了解这个单位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搞这种容易被敌人摧残的出版事业；二是要我作好坐牢甚至是流血的思想准备，因为任何编辑出版工作都不可能不带有倾向性，而迎着敌人的刺刀，要搞好带有不变色倾向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三 文艺见春秋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终于从几个侧面，查清了永祥印书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永祥印书馆创立于清朝末叶，是由陈永泰独资经营，以印刷为业务。到了一九三一年，陈永泰去世，由他的哲嗣陈安镇接办。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五十万元。同年七月，增资到二百万元，并在福州路三百八十号增设了总发行所，又受盘了山东路的大昌元印刷纸号。到一九四三年七月和一九四四年二月，更两度增资到四千万元（以上都以当时的伪币计算），受盘了中国艺林彩印公司、美纶股票印刷公司以及 Slovo 俄文报馆，因此彩印、铅印、铸字等印刷机械完全具备，还有一个开设在上海福州路抗战前是上海杂志公司旧址、销售书刊、账册、文具用品的门市部。

永祥印书馆的总经理陈安镇，并无任何政治信念，也未加入任何政党，是一个唯利是图、善于投机的资本家。他抓住日寇占领租界，上海沦陷，人心思“走”，工商业萧条的机会，低价受盘，蓄储实力，争取全面发展。他把永祥的股票上市，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在出版业险象环生、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永祥偏偏从单一的印刷业务发展到兼营出版，完全是为了宏扬名声，以此提高股票的价值，是出于商业买卖上的一种投机需要。因此在出版业务上，正如金通尹先生所说，他可以请“我们”去，也可以请汪伪的“他们”去主持。面对着这样一块还没有染上任何政治色彩的文化阵地，我当然打消一切顾虑，闯了进去。

我到永祥的第一件事，是创办期刊。

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逃避登记，决定用期刊的形式，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

采用什么样的丛刊名称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刊物能否在敌人的鼻子下生存下去的问题。

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大家提出不少名称，有带古典色彩的，有侧重时代意义的，各有各的特色，但我最后还是听取了许广平先生的意见：“要讲究战略策略，要善于保存自己。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战斗不在于名称。越是通俗、朴素、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倒越是具有战斗的现实意义。”

当时的上海，一些汉奸文人力求把地狱般的上海粉饰成太平世界，开设的书店名为“太平”（如福州路的“太平书局”），主编的期刊名为“风雨”（如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真是谈风吟雨，天下太平，叫人不再想到我们正是处身于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正在各条战线上英勇抗战。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决定我们的文艺刊物要反其道而行之：将抗日大后方文艺战士们们的信息，不断向沦陷区扩散，以鼓舞沦陷区广大文艺青年的抗日斗志，并相应地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对于一些留居在上海的正直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我们则以最大的篇幅，发表他们用真名或笔名写的文章。

丛刊定名为《文艺春秋》。

这是因为这一名称比较通俗、朴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是一个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其次，是因为刊物的扉页上每期编刊了一条条文艺界信息的报道，天南地北，前方后方，凡是显示民族正气的文艺信息，无不广采兼收，包罗万象，总冠以“文艺春秋”的专栏名称，使这个丛刊名实相符，也就是从文艺的园地里窥见春花秋实的意思。

“文艺春秋”报道专栏里发表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我在《中美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胡道静从大后方寄来；二是留沪的文艺界师友接到内地来信后口头转告；三是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邹韬奋在上海医院里病逝的信息，是许广平先生告诉我的。为了蒙蔽敌人，我故意把逝世的地点移到苏北，写成这样的报道：

素以犀利笔锋著称的我国时事评论家邹韬奋氏，最近于江苏省北部患脑癌逝世。临终前双目失明。

虽然许广平先生详细告诉我韬奋在上海医院里逝世前与病魔搏斗的惨痛情况，但我只能作三言两语的不确切报道（连逝世日期也没有写），这当然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追查，实质上也是为那些抢救过韬奋同志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上海的医务工作者作掩护。

有些信息，则来自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吕思勉先生计划写《五胡猾夏录》一书，是经过我们多次交换意见后确定的。那时我要求他用史学家的笔，影射和挞伐日寇侵华的现实，后来他构思成熟，告诉我决定写《五胡猾夏录》：“五胡”，暗喻日本帝国主义；“猾夏”，就是侵华。

扩散抗日文艺界的信息，后来也成为日寇追捕我的罪名之一。

四 保卫鲁迅遗书遗物

《文艺春秋丛刊》一诞生，就投入了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鲁迅先生生前，旅居北平的时间最久。“三一八”大屠杀后，他被通缉，不得不南下。那时他还打算将来再回北平，所以把他生平搜购的中外图书和碑帖，都留在北平寓所。南下以后，他仍继续将搜购的图书，随时运往北平。一九三六年先生在沪逝世后，纪念委员会除编印《鲁迅全集》外，还打算翻印他收藏的碑帖，作为研究我国文化沿革的参考。后来由于“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寇全面侵华，翻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北平故居的藏书是极为丰富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消息传来，说是“鲁迅在平家属”准备出售藏书，而且正“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我就决定在丛刊第一辑《两年》里，编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特辑》，并用“本刊”名义，写了一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展开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我写的这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大意说：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在世界多事之秋，用“高尔基研究院”和“托尔斯泰纪念馆”一类的形式来纪念鲁迅，但对于一位民族巨人的遗产，不论是他的遗书或遗物，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地加以保护。遗憾的是，偏偏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今天，竟有人借用“鲁迅家属”的名义，想把鲁迅的藏书用拍卖的形式来消灭。这决不是鲁迅家属的意愿。因为第一，所谓在平鲁迅家属，不过只是名义上的鲁迅前妻一人，而对于她的生活费用，周作人曾经在答复某杂志编者的信中早已表示愿意负担，所以决不致成为问题；第二，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暨其公子周海婴君，更在九月十日刊登广告，切实声明：“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由此可见，出售鲁迅藏书的，必然另有其人，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坚决保卫研究鲁迅的资料，开展鲁迅遗书遗物的保卫运动，希望知情读者将出售藏书的有关资料，包括出售的书目，出售者的姓氏和兜销的具体情况，来信来稿揭发。

在这一期里，还编刊了有关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其他资料，包括许广平周海婴的启事、一些报章的新闻报道、《新中国报》的专论、《海报》第二版君宜的文章《鲁迅藏书出售说》以及本刊的《启事》等。刊物的内容这样安排，是和许广平先生商量的。我写的那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也是按照我和许先生交换意见后写的。

由于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以及后来唐弢同志去北平向鲁迅前妻朱夫人作了解说，鲁迅先生在北平的遗书遗物终于保存了下来。非常明显：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斗争，正像纪念文章所影射的，矛头直指周作人，而当时的周作人，早已“荣任”了敌伪阵营的显赫大官。这是不能不引起日寇惶惑不安的事。而这件事，后来也就成为追捕我的罪名之一。

五 揭露国民党

引起日寇注意，最后决定追捕我的另一个罪名，是对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揭露。

特别是在丛刊第三辑的《春雷》里，发表了题为《桂林作家的流亡》的通讯。它充分揭露了国民党抗而不战、以退为战、儿戏人民的事实。通讯说：

“当时战雾已经迫近，桂林当局便下令疏散，人们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充作自己的疏

散费。但是不久，又宣布局势好转，人们重又归来。可是曾几何时，紧急疏散令下来了。已经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逃光了的桂林人民，哪里再有钱来逃难呢？官老爷们带了太太和马桶夜壶，上了火车，唯有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欲走不得欲住不能的境况里啼笑皆非！”

这篇通讯报道，更明显地揭露了国民党对抗日进步作家的迫害：

“战时的生活是非常畸形的，商人可以赚大笔的钱，惟有文化事业一落千丈，尤其是战时的中国，执政者对待文化人总是采取了监视的态度：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有被禁止发行的。恶意检删和故意扣压的结果，作家们就得不到应有的稿酬，贫病交迫，生活十分悲惨。”

“监视”、“禁止”、“检删”、“扣压”，这哪里像是抗战大后方的自由天地？通讯列举了大批作家，如艾芜、邵荃麟、葛琴、周钢鸣、韩北屏、熊佛西、欧阳予倩、田汉、孟超、王鲁彦等的悲惨遭遇。在谈到艾芜时说：

“艾芜在柳州，一家六口，简直陷于穷途。虽然文协救济了他一万五千元，数目不能算少，但要回到他那阔别十年的故乡，却还是成为问题。他在这次逃难途中，尝尽了流亡的辛酸，搭车时曾遭到一位有车可乘的朋友的拒绝。”

通讯重点报道了小说家王鲁彦的死，他是因为不堪流亡的折磨而死的。

王鲁彦在没有离开桂林时，创办期刊《文艺杂志》。由于战时生活费高昂，加上多病，便陷入贫病交迫之中。他不能继续在桂林生活，只能将刊物转给王西彦续编，自己则和家属一起，回茶陵去养病。这期间，柳亚子曾为他发起募集医药费，当然对他不无小补。但后来茶陵沦陷，他在临危前扶病跟随他的夫人，带了儿女三人逃难。逃到衡阳，打算乘火车再回桂林，可是搭车的人拥挤不堪，他病体虚弱，上不了车，就在火车站上等车，躺了三天三夜。最后连车站的工友也感动了，帮他上了车，才算到了桂林。可是经过这次长途跋涉的劳累，加上国事日非，忧患交逼，他终于不能支持，在八月二十一日病逝。

为了进一步剥开国民党的画皮，我在丛刊第四辑《朝雾》里，写了一篇《鲁彦之死》，明确指出：

“他的生命的过早夭折，表面上看来固然是由于肺病，究其实，是更有深刻的原因在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桎梏，终于因为抵不过黑暗势力的逼迫而苦恼死了。”

所谓“黑暗势力”，当然是指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上海，已经不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的上海。当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初期，对抗日爱国人士，一律冠以“重庆分子”或“共产党”的帽子，搜捕不遗余力，而且被捕者无不遭受严刑拷打，很少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寇败局已定，南京、上海一带的大汉奸们纷纷向国民党蒋介石“输诚”，蒋介石就提倡“曲线救国”，要敌伪“戴罪图功”，“保卫东南”，“粉碎共党阴谋”。于是日寇大量增兵上海，对“重庆分子”非但不再逮捕，而且“礼聘出山”，成为拉拢对象；对攻击国民党、有“共党嫌疑”的人，则到处搜捕，施以酷刑。吴

天、锡金、芳信等遭到搜捕，巴克、柯灵、孔另境、司徒宗、吴琛等被捕。作为《文艺春秋丛刊》的编辑人，有着反对国民党的现行活动，当然也就成为日寇追捕的对象。

六 甲斐军曹

那一天，正当我在书店的编辑部给丛刊第五辑一篇连载稿划样的时候，书店的总经理突然来了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是日本人为了《文艺春秋丛刊》的出版，需要和我面谈。他说他们正在和他谈话，坐在中法药房的会客室里，他并且郑重地告诉我：“务必立刻就来，不然他们要来请你了。”

“请”，是怎样的“请”法呢？如果我不去而立刻逃跑，那后果又将是怎样？如果我去，又将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我迟疑了片刻，终于想到自己的事不能连累别人，答应立刻就去。

在中法药房的会客室里，我见到了上海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宪兵队长甲斐军曹，和他带来的一个日本翻译。两人都佩带手枪，都在背后悬挂了一柄套着皮壳的匕首式刺刀。他俩有意脱下外衣，露出凶器。

经过介绍，闲谈一阵以后，终于说到了正题。

甲斐军曹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而且还说，经过调查，搜集了我的资料，证明我在上海负有活动的特殊使命。他还拿出一方白纸，上面画着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系统表，其中写着“范泉”的名字，在“范泉”的名字旁边，写了“即徐炜”三个字。

我不否认“徐炜”是我的名字，但我否认我是“共产党”，并为名单上写着的“锡金”辩护。争论毫无结果。

陪同我们一起谈话的，有书店的总经理陈安镇、中法药房的总经理（也是永祥印书馆的董事长）许晓初和一家毛纺厂的蔡经理。这位蔡经理，是曾经在日本宪兵队里被拷问得死去三次而最后释放出来的，他和甲斐熟识，我估计可能就是被日伪拉拢的所谓“重庆分子”。他是由书店总经理请来，为我游说和解围的。他看到我们争论不休，就插言夸说甲斐的宽宏大量，而且郑重声明：

“要是甲斐先生还有其他的话，那以后约范先生到茶室谈谈。要是甲斐先生今后一定要范先生去宪兵队谈话，那我愿意跟范先生一起去。”

在蔡经理保证我随传随到以后，第一次谈话就此结束。

第二次谈话是在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的会客室里，第三次谈话是在霞飞路的一家茶室里，第四次谈话是在蔡经理的办公室里。说来说去，扣住了我的三大“罪行”，除了扩散抗日文艺界的信息外，还有两条：发表了矛头直指周作人的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文章以及揭露国民党抗而不战、以退为战的通讯。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实质上是要通过我，追查一批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锡金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作家的下落。无休止的追捕和审问，就像无形的啮人的枷锁，紧紧地套住了我的脖子。我终于躲起来了。

正在这个时期，书店的总经理通过蔡经理给甲斐军曹请客，还“调借”给他三百万元，并给甲斐的一组宪兵送去每人一只自动打火的烟盒子。事后知道，这是金通尹先生在营救我（许晓初是他的学生）。

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公告》指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国内的死硬派还是坚持“对等议和”，上海的日军发言人还说什么“战胜国不能向战败国投降”。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十五日，日本天皇接受无条件投降。至此，敌人对我的追捕完全解除。

我自由了！

我用两天的时间修正了原先基本编好了的丛刊第五辑：《黎明》。

我用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热情歌颂了在敌伪宪警特务的监视、逮捕和严刑拷打下英勇不屈的文艺战友们。

《文艺春秋丛刊》到此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紧接着出版的，不再是丛刊，而是《文艺春秋》月刊，一直出版到全国解放为止。

七 致哀和致敬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文艺春秋丛刊》迎着敌人的刺刀，在荆天棘地的上海沦陷区，连续出版了五辑：第一辑《两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版；第二辑《星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出版；第三辑《春雷》，一九四五年三月出版；第四辑《朝雾》，一九四五年六月出版；第五辑《黎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

为这五辑丛刊执笔的主要留沪作家，有许广平（用笔名K.P.）、吕思勉（有时用笔名程芸）、顾仲彝、锡金、孔另境（有时用笔名东方曦）、吴景崧（用笔名吴志平）、吴天（用笔名方君逸）、师陀（用笔名康了斋）、吴仞之、朱维基、鲁思、袁鹰、司徒宗、周贻白、钱君匋、钱今昔、吕翼仁（用笔名左海）、池宁、沈子复等。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吕思勉先生。他毕生勤读好学，刻苦钻研，曾把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批阅了3遍，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著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蜚声于国际史学界。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汪伪报刊妄图利用他的声誉，曾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组稿，他却一一谢绝。“孤岛”沦陷以后，汪伪通过他的学生，拉他下水，他更大义凛然，毫不动摇。为了不愿向常州的日敌岗哨折腰鞠躬，他宁肯长期留沪，不回老家。当时他已年届六旬，年老体弱，但是处身于存亡关头的民族正义感使他变得非常年轻，他用“野猫”、“六庸”等笔名在我编的抗日反汪的副刊《堡垒》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又用“程芸”等笔名给我编的《文艺春秋丛刊》写稿。还应我的约请，准备给书店写一部影射日寇侵华的《五胡猾夏录》。

当时留在上海的文艺界人士，有的因为顶不住生活艰难的折磨，而在不同程度上投入汪伪的怀抱；有的则像松柏一样，巍然屹立，岁久弥坚。比如为丛刊第四、第五辑设计封面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池宁，住在一间低矮而阴暗的晒台搁楼里，根本谈不上工作和休息的条件。担任剧团编导的吴天，住在一家小理发店的楼上，楼梯又窄又陡，没有照明设备，从春光明媚的马路上走进只有一个人可以回旋的楼梯间，真可以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住在这样低矮的斗室里，生活十分艰难，妻子即将分娩，住院的费用还没有着落。孩子出生以后，“东处找钱西处找米”。孩子病了，没有钱找医生。直到孩子病重，用卖掉东西的钱去请了医生，结果诊断出是晚期的“结核性脑膜炎”，已经无法挽救。一些留沪文化人仅仅是为了不向敌伪低头，受尽

了贫穷和疾苦的折磨。

现在，这些迎着敌人的刺刀曾经英勇搏斗过、曾经在沦陷区为广大文艺青年呐喊过、曾经在黑暗的年代里透露过真理和自由曙光的师友们，差不多大半已经成为古人。写到这里，往事如烟，一幕幕地回想到他们在血海腥风的黑暗年代经受住了多么严峻的考验，我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怀着无限真诚的心意，向与世长辞的同志们致哀！向迄今健在的同志们致敬！

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

一 停办和流产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敌伪的压迫已经解除，应该得到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被迫停顿的文化事业可以复活起来，被摧残的文化工作可以重建起来。这时候的书店资本家陈安镇，眼看不能坐失良机，批准了编辑部拟订的七大丛书出版计划，并即开始陆续组稿（其中部分书稿是在一九四四年开始组织的）。一切书稿，归口到大学文库、科技丛书、新译丛、文学新刊、各科学学习丛书、青年知识文库、少年故事丛书。在出版期刊方面，除《文艺春秋丛刊》改为《文艺春秋》月刊外，先后又出版了四种期刊：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司徒宗、欧阳翠主编的《少年世界》半月刊以及我和陈钦源合编的《文艺春秋副刊》。

关于我介绍给书店的《文联》半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生创刊号，十六开本，是一个以报道（国内外文化动态）、评论、介绍（新出书刊）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停刊。我已写了一篇《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版始末》，不再赘述。

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二十五开本，每期约一百数十面，对外用“文章社”的名义编辑。吴天，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洪为济，笔名方君逸，在一九三七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曾经发表过他的报告文学《殖民地的故事》，用的是“洪为济”的名字。当时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组织和领导当地抗敌后援会。一九三八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一九四四年我编《文艺春秋丛刊》时，经孔另境介绍而来往，他曾为《丛刊》写稿。日寇投降后，我把他编的这一期刊，纳入编辑部计划，以文化综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

《文章》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创刊了。先后共出版四期，在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四期后停刊。为这个刊物写稿的，主要有郭沫若、田汉、夏衍、陈烟桥、蒋天佐、景宋、周建人、赵景深、徐迟、魏金枝、周贻白、朱维基、凤子、李健吾、于伶、艾芜、蔡楚生、任钧、端木蕻良、吴岩、于在春、欧阳山尊、沙汀、许席珍、赵丹、史东山、吴祖光、王西彦、林焕平、叶以群等；作画（包括木刻）的有叶浅予、丁聪、新波、李桦、罗清桢、王琦、章西崖、吴作人、朱鸣刚等。

每期一篇由编者撰写的“文化一月”，尖锐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当局如何坚持内战、摧毁民主自由以及在上海等地倒行逆施的事实，暗示真正的民主自由还得要流血争取，是这个刊物的一大特色。这里略举数例。比如创刊号内报道：“马歇尔特使抵渝，同日《自由导报》被封”；“青岛文德女中学生费筱芝因甄审事，在张贴标语时被保安队枪毙。教育局唯恐引起公愤，就说费母是文化汉奸”；“本市《周报》、《民主》等杂志在报摊上被非法禁卖”；“市立剧院负责人顾仲彝为了阻止士兵不买票入场，因而被打，说是：‘打你这个负责人！’”三月一日出版的第二期报道：“蒋主席宣布四项诺言，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

“当局表示，暂无游行自由”；“报纸时见天窗”；“政治协商会顺利完成，重庆举行庆祝会，暴徒殴打出席代表，郭沫若等重伤”。五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报道：“停战协定淮阴小组到南通，学生列队欢迎，当局禁止。欢迎小组学生失踪。记者孙平天被暗杀（挖眼割鼻），投在江内，尸身发现”；“昆明惨案责任者升官”；“政府军队不顾一切，继续北上，扩大内战”；“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特务捣毁，枪杀编辑”；“重庆复旦大学特种学生殴打洪深”。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四期报道：“内战继续，边打边谈”；“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等晋京呼吁和平，在下关被‘苏北难民’殴打成伤”；“《消息》停刊，《民主》、《周报》有停刊说。广西、西安、贵阳、北平查禁报纸”；“西安记者被杀”；“茅盾的《清明前后》被禁止销售和演出”；“京戏名伶叶盛章因不愿歌功颂德而被打”。

应当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在《文章》的第三期上，发表了署名“马蒙”的文章《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在上海的期刊上第一次公开刊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秦邦宪（博古）的大幅照片，介绍了他们的生活起居、衣着爱好、写作习惯、家庭成员等各方面，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少年世界》半月刊是三十二开本、每期三十二面、以高小和初中学生为对象的少年读物，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创刊，同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第六期后停刊。为这个刊物专写“时事知识”的是巴克（中共地下党员），专写“写作指导”的是许杰、于在春，专写“修养”的是孔另境，专写“科学小品”的是贾祖璋、贾祖珊、严大椿，写儿童小说和童话、寓言、故事、报告的有司徒宗（长篇）、魏金枝、贺宜、赵景深、任钧、范泉、施蛰存、罗洪、欧阳翠、莫洛、姜天铎等。主编之一的欧阳翠当时在永祥印书馆任编辑。

《文艺春秋副刊》是随《文艺春秋》月刊附送，由我主编，由陈钦源具体负责，六号字排，三十六开，每期约三十二面，专收短小精悍的文艺短评、回忆录、人物志、杂记、书话、文坛琐闻、文艺书讯、影评等，是以刊登中长篇文学作品为主的《文艺春秋》月刊的补充，一九四七年一月创刊，每月出版一期，连出三期后停刊。为这个小刊物撰稿的主要作者有：陈翔鹤、戈宝权、柯灵、晦庵（唐弢）、黄裳、李何林、陈敬容、梅朵、辛未艾等。

按编辑部计划，还打算从一九四六年底起，每年编辑出版《文艺年鉴》一部。

刊物相继停办，编辑部计划流产，都是因为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而在他统治的区域内，则更进一步扼杀民主自由，控制言论出版，迫使一些原来就是抱着投机目的经营出版事业的资本家，眼看无利可图，还有毁产危险，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屈膝投降的原故。

二 资本家投降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一天下午，书店总经理陈安镇带来一位穿着比较朴素、身材比较魁梧的中年人，来到编辑室，给我介绍说：

“我来介绍，这位是敬业中学校长陶广川先生。陶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很熟悉，对文艺也很感兴趣，书店准备请他当顾问。”

“天窗”：文章或新闻被检查后挖去一块，成为空白，像开了个天窗。

我当然表示欢迎，握手，寒暄。陈安镇接着说：

“陶先生学校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来。但是在审稿方面，我们可以请他协助，可以由书店派人送去，帮助你承担期刊的一部分审稿工作。”

最初，我不知道陶广川是怎样的人。后来我请金通尹先生调查后获悉，陶广川是“国大”代表陶百川的胞弟，国民党员。他参加书店的所谓审稿工作，当书店的顾问，是资本家找来的保护伞，因为据说，“有关方面”对书店出版的几种期刊内容，很不满意。

我理解：资本家已经接受审查，正式投降！

我采取表面接受暗里抵制的做法，送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书稿，聊备“审查”一格，期刊的文稿则强调付印时间仓促，不送审。

陶广川不常来，来后也总是到经理室，偶然也来编辑室和我聊聊，语言谦逊，强调学术观点，表达一些比较开明的见解。当然，他的姿态，给我留下一种世故深、心计险的印象，觉得不易应付。自从他当书店顾问以后，首先推荐给陈安镇一部百万字的《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著者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唐子长。后来又向“青年知识文库”推荐了一本沈锦如写的《三民主义概观》。到了六七月间，三个期刊相继停办：（《文联》在六月出版终刊号，《文章》和《少年世界》在七月出版最后一期），可能与陶广川贯彻上级意图有关。但是书店资本家强调《文艺春秋》在敌伪时期历尽艰险，已有一段斗争的历史，它是书店继续存在的象征，主张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出版。陶广川既拿了书店的劳务报酬，当然也得遵照陈安镇的意旨行事。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为这个刊物取得了已经申请一年多的“京警沪字第一百五十八号”登记证。

《文艺春秋》月刊曾将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五期，作为第一卷。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起，仍保持《丛刊》的二十五开本形式，基本上每月出版一期，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临近解放前夕，出版到八卷三期为止，每卷六期，从未出过双月刊，合计出版四十四期。这是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出版的纯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发行量最大、基本上按月出版的纯文艺期刊。

为这个期刊写稿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田汉、洪深、臧克家、端木蕻良、欧阳予倩、耿济之、黎烈文、丰子恺、蒋牧良、闻一多、邵力子、戴望舒、钟敬文、陈白尘、巴人、周而复、李健吾、靳以、穆木天、艾芜、熊佛西、骆宾基、许杰等一百余人。解放区作家如艾青、刘白羽、吴伯箫的文稿，是由冯雪峰交由当时在上海开设作家书室的姚蓬子提供的，有的是周而复从延安来到上海时直接交给我的。有些南洋的来稿，如林林的诗文等，是他们在菲律宾、印尼等地买到了这本刊物后，按地址寄来的。

应该说明的是：从一九四七年一月起，书店将《文艺春秋》的每期清样多打一份，送给陶广川审阅。陶广川在清样上有时要用墨笔或钢笔涂改。当茅盾先生的文稿《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也被涂改后，为了全面传播茅公的声音，也为了今后给类似被涂改的文章创造一个全文发表的机会，我和孔另境、何家槐、肖传芳、冯之原、徐同康等合资组建了文艺丛刊社，出版了《文艺丛刊》。第一期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名为《脚印》，第一篇文章就是从《文艺春秋》月刊的清样里抽出来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丛刊》共出版过七期，全文发表了不少被审查涂改的诗文。这正可

以证明：即使是纯文艺期刊，出版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需要经历一个披荆斩棘的斗争过程。

关于《文艺丛刊》，我将另写回忆。

三 节外生枝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编辑的三种丛书。

在书店的七种丛书中，我曾编辑了“青年知识文库”和“文学新刊”，执笔编译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

“青年知识文库”的构想，在我一九四四年进入书店。

以后就开始酝酿。那时估计敌伪的占领不会长久，就建议书店收购书稿，积蓄力量，既可照顾留沪正直作家们的生活，还可陆续排字，打成纸型，等待胜利后成批出书。我的设想得到了支持。因此几乎在编辑出版《文艺春秋丛刊》的同时，我已开始组织书稿。

“青年知识文库”是一种篇幅不大、涉及各科知识的青年读物，每册字数从三万到六万不等，三十六开本，分辑出版。第一辑出版二十册，第二辑出版十册，第三辑仍是十册，合计四十册。“文学新刊”是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丛书，也兼收少量的文艺译作，三十二开本，分集出版，每集六种。曾出版四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是以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为依据，用浅明简洁的语言，适当简化的情节结构，编译原著的故事，每册约三万余字，四号字排，三十六开本，曾编译改写（retell）过十五种。

这里我想比较具体地谈三件事。

第一件，关于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我在一九四四年组稿时，他原定写一本影射日寇侵华的《五胡猾夏录》。后因国际形势剧变，德意惨败，眼看日寇的末日也已为期不远，所以迟未执笔。抗战胜利后，由我建议，请他写一本《历史研究法》，总结一下他从十六岁就已经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以来四十五年的学习体会，他欣然表示同意。当年（一九四五年）撰写完成。他的观点非常先进。他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极为赞赏，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史事的考察和理解，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次从先进的方法学角度阐释学习心得的书，是他留给后学者的一笔珍贵的遗产。此书至今仍在日本、美国以及台港图书馆流传或翻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此书重印出版。

第二件，关于支援作家。结合在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我确实在经济上曾经支援过一些作家。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八时，我带研究生住在长春的旅馆里，锡金来看我，约我晚上去他家里吃饭。晚上，我和研究生同去。锡金一面饮酒，一面向我的两名研究生谈到他如何在沦陷了的上海，被日寇追捕，幸得我的资助，得以逃离上海，进入新四军解放区。从这件事，我又想到了碧野。他要先去北平，然后投向八路军，苦无路费。记得当时我也曾支援过他。一九八四年春节，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文革”时期抄家物资时，发现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写给我的二十八封信（包括郭沫若在一张名片上写给我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艾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我的信，他提到我准备支援沙汀和他的事，这才使我想起确有那样的事。当时我听说沙汀患肺病，从解放区回到老家养病，生活困难，我写信要艾芜转给他一笔钱，转寄时不说是谁寄的。还记得在日寇投降前后，我曾把我的《鲁

迅传》一书译稿向开明书店出售版权后取得的全部稿酬，送给了当时生活比较困难的《鲁迅全集》第一版（复社版）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诸如此类，我在物价飞涨、生活极其艰难的战乱年代，确曾支援过不少作家，现在很难一一回忆了。

第三件，关于节外生枝的事。为了抵制书店资本家接受审查和出版单行本横遭干预，我把组织来的文艺创作书稿，交给其他出版机构出版，迫使我在书店以外，节外生枝地为中原出版社、益智出版社和寰星书店编了三套文学丛书。“寰星文学丛书”出版了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茅盾作序）、臧克家的短篇小说集《拥抱》、范泉的散文集《创世纪》、李健吾的剧本《云彩霞》等。“益智文学丛书”出版了骆宾基的中篇小说《一个倔强的人》、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王西彦的长篇小说《眷恋土地的人》、梅林的短篇小说集《红花集》、顾仲彝的剧本《白莲花》等。“中原文学丛书”出版了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王西彦的长篇小说《寻梦者》、许杰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范泉的散文集《翻身的日子》和台湾高山族传说集《神灯》（黄永玉作插图）等。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不久，永祥印书馆的铅印、彩印、零印厂工人选我为工会主席，我开始兼搞工会工作。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六”轰炸后不久，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沈峻坡把我从书店借调到市工会，协助编辑机关报。一九五三年一月起，我完全脱离书店，参加了市工会的工运工作。

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八年，实际工作是在解放前的五年。回忆在那五年期间，我看到了一些龇牙咧嘴、阴森诡诈的鬼魂形象，令人一旦想起便不禁毛骨悚然，栗栗畏惧。这真是一段砭人肌骨、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

1989年7月，上海

青海流放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上海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向母亲辞行。我告诉她我要去青海“工作”。母亲不识字，不知道青海离上海有多远，她问我是不是需要一天的工夫才能赶回来。

“回不了，”我很老实地告诉母亲说，“青海还没有通火车（当时青海还没有铁路），要赶回上海，五千多里路，大约总得四五天工夫吧。”

“四五天？”母亲大吃一惊。迟疑了一会，她又非常敏感地轻声问我：“莫非你在上海犯了什么错误吧？”

母亲的猜测完全正确。我是因为双反运动向党交心时，真正说了心里话，对肃反运动提了“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被认为“诬蔑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薪，名义上调往青海，实际上是流放到青海去改造我的世界观。但是我怎么能说清我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为了不让孤独生活着的母亲再度受到心灵的创伤，我只能面不改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回答说：

“没有的事。这是‘工作’需要嘛，是上海市出版局把我调去的。今后你的生活费，我按月照寄。我还争取每年回来看你一次呢。”

“可是，要是我有急病，你……”母亲说话的声音有些硬咽，说不下去了。

那天夜里，我听见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出身贫农，小时候拾过破烂，十八岁时嫁给我父亲。父亲是小学教师，生活清寒。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因此负担更重。由于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父亲患了肺病，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撒下母亲和三个孩子去世了。那时母亲才三十二岁，我才四岁，哥哥十一岁，姊姊十二岁。为了生活，我们都帮着母亲从事粘元宝等手工劳动，还到田塍路脚去割野菜。经常把猪吃的豆渣炒熟了充饥。生活的重荷压得我姊姊也患了肺病，无钱医治，永远离开了我们。幸亏这时外祖父贩卖糠麸致富，支援了母亲，才使我和哥哥进了学校，培养成人。但是哥哥精神失常，不能工作。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知道她相依为命的儿子要远离她到五千里外去，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这一夜，也可能是以后的无数夜，她是无法安眠的。在她被苦难煎熬的一生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投河自尽，但是她不，她活着，而且顽强地一直活到今天，“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培养你们长大成人嘛”！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想到这里，想到母亲艰苦的一生，我不禁在床上辗转反侧，暗自流泪。

但是母亲是坚强的。自从父亲和姊姊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母亲流过泪。第二天，母亲送我到吕巷镇公共汽车站，当我上车告别的时候，母亲非但不流泪，还强忍着笑了笑，向我招了招手，似乎在说：“祝愿你一路平安！”

是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终于平安地来到青海省的鲁沙尔山沟里。这是一个漫山遍野被白雪覆盖着的冰凌世界。由于挡不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我前后死去过两次。一次是初来不久，我患了肺炎，当地治疗无效。眼看躺下不能工作，领导叫我独自去西宁，找省医院治疗。省医院发现我病情严重，但没有床位，要我自找旅社，每天门诊。下午三时，从省医院出来，边走边找旅社，全部客满。当时我每走一步，好像胸口被捅了一刀，痛彻心

肺，呼吸一次，也得停顿几回。就这样，走了将近十一个小时，还走不到两里路程，终于倒在马路边，冻得失去了知觉。是两位巡夜的人民警察发现了我，将我背到一家由马戏团承包下来的旅社，在一间猴子住的灶披间里，支起两块板，作为我的床位，用温水把我救活。第二天，由人民警察借用马戏团的板车，把我拉到省医院，才在医院三楼过道的厕所门口，安排了我的病床，把我收留下来。还有一次是为了水。我住的喇嘛寺前沿，是一条足足有两丈多深的干山沟。山沟底部，有一口围着石栏的井，喇嘛们喝水做饭，都得到这口两丈多深的河底水井里来提水。那天正飘着雪花。当我担水走上泥泞的沟坡时，一不小心，右脚往悬崖般的斜面滑去，收不住腿，从两丈多高的沟坡顶上摔下来，一头撞在井沿的石栏上，满身鲜血，昏死过去了。两个盛水的铁皮水桶，也被摔得弯弯扭扭，桶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很快结起冰层，内红外白，人像一串孩子们吃的冰糖葫芦，躺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幸亏喇嘛尼玛来担水。他是我贴壁的邻居。他在黄昏的暗淡月光里，认出了我，才叫来另一位喇嘛尖措，把我抬回寺院，救活过来。

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但是比起母亲的苦难一生来，这一点周折又算得了什么。母亲的坚强形象指引着我，使我这个死了两次的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死。我要活着！像母亲那样坚强地活下去！后来当青海通了铁路时，我急不及待地一再请假，争取回到老家去探望我日夜思念着的母亲。

“啊，你回来了！”喜出望外的母亲见到站在她面前的我，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可是不久，母亲默默地不说话，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一遍又一遍。我想，也许我自己洗的衣服不干净，也许我穿的一双胶鞋太破旧。我向母亲解释说：

“路上不好走，要背行李，要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火车调汽车，汽车接汽车，上下车好多次，中途还要住旅店，所以我穿了一双破胶鞋。”

“不，”母亲带着决断的口吻说，“不是这些。我估计你在青海的日子不好过。”

“为什么？”我有些吃惊：难道母亲也知道我死过两次吗？

“你看，”母亲用怜惜的眼光盯着我，“才四十出头的人，去的时候身强力壮，现在回来，却是又黄又瘦。去的时候不抽烟，可是现在，你看，连手指也熏得焦黄了。我估摸，你在青海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你在青海究竟干些什么？”

听了母亲的问话，我倒是放心了：她不知道我在青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于是壮大了胆撒谎。我说除了青海的天气冷些，路程远些，地势高些，山头多些，其他什么都跟上海差不多。我说我在那里的一所中学堂里教书，由于学生多，工作累，也就不知不觉地抽起烟来了。我用这样的解释来消除母亲的疑虑。事实上，我在青海的主要工作是修房造屋，成天呆在建筑工地上。一间间新房盖起来了，可是乔迁到新房居住的，都是一些不修房屋的干部，真正修房造屋的我，却永远住在破旧的寺院里——先是阿訇住的清真寺，后来清真寺要拆迁了，才又安排我住进喇嘛寺。这座世界闻名的喇嘛寺，原有喇嘛四千多，平叛后多数已遣返老家从事农业生产，留下的贫苦喇嘛看守寺院，大约不到一百人，因此随着山坡分散建造的寺院群落，除了大经堂、小金瓦寺、班禅故居和花寺等供人膜拜外，绝大部分房屋都空着，年久失修，有些已经破烂坍塌。我住的一间还算是比较好的，泥墙泥地泥屋顶，屋顶下钉了木条，糊上报纸，名为“顶篷”。各个房间的顶篷是相通的。成群结队

的老鼠不分昼夜地常在顶篷上跑马一般地奔驰，有时还你追我赶，厮杀一阵，吱吱呐喊。顶篷成为它们比武竞赛的体育场。房间的南侧有一扇小木门，可以上锁。木门旁是一块方格子窗，用白纸糊着，透不进阳光，白天写字也得点蜡烛。床是土坑。住进这样的房间，最初不习惯，思想的疙瘩解不开，于是买来八分钱一包、装有二十支的筒装劣质烟，有时买些廉价的烟叶，晒干搓碎，用废纸卷成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精神上的麻醉已经成为我不可缺少的生活乐趣。日子就是这样地一天天打发过去，后来也终于觉得轻松愉快，习以为常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居然跟其他“右派”不同，享受到县委书记一般的待遇，日子十分好过。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有一天，一位姓张的“造反派头头”走来，跟站在我们身后监督我们劳动的刘“副司令”说：“现在独缺画像的人。”

“可以问问那些北京上海来的。可以废物利用嘛！”副司令回答。他灵机一动，转过脸来把我叫住：“喂！范泉！我问你！”

当时我正和另一个“摘帽右派”扛来一桶浆糊，放在地上，开始用扫帚在县委招待所的墙上边刷浆糊，边贴一张张人家写好了的“大字报”。听到叫我的名字，便立刻转过身，面对“副司令”。

“你会画画吗？”他问我。

“不会。”我回答。

“你从来不曾画过吗？”

“画过。那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美术课上。”

“画过就好嘛，可以试试嘛！”那姓刘的“副司令”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笑了笑，跟姓张的“头头”商量了一阵，吩咐那位指挥我们贴“大字报”的“造反派”，把我带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给我绘画的纸笔和水粉，要我画一幅毛主席像。临走时向我训话：

“你可以不参加学习，好好画。要带罪立功！”

我有什么“罪”？我也不要立什么“功”，唯一使我告慰的，倒是我可以借此机会不参加学习，可以离开这伙成天吆喝的人，可以关起门来过一些清静的日子。我再不能有其他选择。冒着当“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我反复尝试调色和上色，照着原件，小心翼翼地画，终于画得非常成功。从此我居然成为“造反派”心目中的“右派画家”，容许我长期不参加学习，在这间办公室里建立了我的“独立王国”，还有他们指派的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作为我的助手，陪伴我，常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听他讲述如何在土匪的队伍里从事策反工作的故事。日子过得很好。我也从“造反派”抬在肩上游行时使用的大幅毛主席半身像，发展到绘制那些建造在县委大楼前近十米高屏风上的毛主席全身油画像，发展到数以百计的毛主席像语录牌。别的“摘帽右派”重新挂牌游斗，我这个“摘帽右派”却逃过了这一“劫数”，甚至还容许我在运动中回家探望我母亲。

可是这一次，看到多年不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非常衰老的人了。母亲的双目深陷，面有土色。从那安放饭菜的凉橱里，我发现一碗豆腐肉糜的菜，爬满了虫子。眼睛已经看不清虫子的母亲，却还是吃着，连虫子一起吃。听邻居说，她整天吃粥，不买菜，有时到隔壁的菜馆子里去买一碗肉糜烧豆腐，常常要吃一个星期。难怪这次看到母亲，她一再诉说“造反派”如何把她逐月节约下来的二百一十元钱，在抄家时拿走了。她说“造反派”

已经告诉她，我是“右派”，在青海改造，因此她再也不忍使用我每月寄给她的二十元钱。“这是你的血汗钱，我准备积起一个整数来还给你。”母亲说。

“你不能那样。给你的钱并不多，是你最低的生活费。你看，我的脸色不是比过去好了吗？我在青海生活得很好。”我说尽好话，宽慰母亲。

可是在我的心里却从此蒙上了阴影：金山的“造反派”怎么知道我在青海改造，而且为了我，株连到母亲，批斗她，罚她跪在许多碎碗碎玻璃片上。要她和我划清界线，揭发我。我不知道那多年来饱受创伤的母亲的心灵，又经受了多大的伤痛！我感到无法补偿的内疚，心想住一夜就走，免得“造反派”要她交代时说不清。

“不，你别走。”母亲非常坚定，“天下哪一个母亲不了解自己的儿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犯错误，你没有‘罪’，今天搞不清，总有一天会搞清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

母亲一反常态：不仅原谅我对她的撒谎，而且还笑逐颜开，用她最近几个月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亲自去菜场买了一只活母鸡，请人宰杀好，在长期不用、积满灰尘的土灶上烧，还上菜馆买来了几个熟菜，买来了小瓶白酒，像宴请多年不见的亲友那样地款待我。那天晚上，母亲向我吐露了她唯一的心事：

“我已经八十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伸冤的一天。”停停，她又说：“下次你来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

几天以后，当我告别母亲，当母亲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向我招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圈有些红润，好像在重复着那天晚上的那句话。

“妈！我很快又会来看你的！”我从车窗口探出了头，大声说。

但是我怎么能相信，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向母亲的诀别。

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突然接到上海打来的“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我立刻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启程。经过整整三天两夜，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只见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着一双眼睛，张开了嘴，离别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已经有十六个小时了。

母亲死得非常不平静。

是母亲等待我回来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

是母亲不放心我这个沉浮于上海和青海的儿子，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妈，我回来了，你安息吧。”我一面说着，一面抚摸着母亲的眼皮，让她合上了眼。

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终于在母亲的骨灰盒面前，读到了上海市出版局寄到青海来的平反改正通知书。青海师范大学也派车把我从喇嘛寺里接出来。一九八一年，经青海省省委常委讨论通过，青海省教育厅重新授予我全省第一个“教授”的职称。我的中共党籍也恢复了。一九八六年十月，上海市委组织部又将我调回上海，根据我个人的意愿，重新回到了上海市出版局系统工作。

虽然我的壮年时期已经被迫丢失，但是千真万确：我仍然精力充沛，正为上海书店组织力量，编纂一部将近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母亲，安息吧。

我差点挨揍——流放青海的第一件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任期内，戴上“右派”帽子，和其他一百多位“右派”一道，作为第三批“支边”者，由出版局派员押送西宁，住在离市区四华里的东郊李家庄。

那时的西宁市，开设在煤屑马路两旁的商店，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墙壁是用土块垒起来的，屋顶不用瓦片，是在木椽上铺盖树枝，覆上泥土，滚压结实以抗雨雪的。称得上所谓“洋房”的建筑，仅仅是军阀马步芳时期修建的一座像教堂一般的湟光电影院，以及在它对面的一家三层楼旅社。这些建筑的门窗都很窄，像是害怕阳光会挤进去似的。

十二月，西宁的晨晚寒冷刺骨，常常是雪花纷飞，远山近山一片皑皑白雪。有时露了太阳，也是软弱无力，像是故意不把这些厚厚的积雪融化似的。我们这些上海人，刚来乍到，好像掉进了冰窖，加上高原缺氧，走一段路就会气喘，很不习惯。一九五九年元旦，晴天，放假。同志们都上街去了。我因为一天只吃两顿饭，到了中午总觉得饥饿，就请了假，想到街上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走了很久，又累又饿，到了大十字，看见南大街上一家熟食店正在零售刚刚烧好的猪头肉，我买了一包，饥不及待地匆匆走进西门口的一家拉面馆，付了钱，要了半斤拉面。

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端放到我的面前。

拉面的葱油香味沁入我的鼻孔，使我食欲大增，更加觉得饥肠辘辘，垂涎欲滴。我立刻拿起筷子，打开我买来的那包猪头肉。

可是不等我举起筷子捡上一片猪头肉，那位下罢面条站在旁边的伙计，像猫抓耗子一般，蓦地冲过来，一把抓起我刚刚解开的肉包，像丢掉带有传染细菌的垃圾一样，用力向店堂外面的马路扔去，还用震耳欲聋的吼声吆喝着：

“鞭哪！你，马路吃去！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正当我稀里糊涂，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见那端送拉面的伙计，从店堂的另一头走回来，怒不可遏，满脸通红，拉下了白帽子，往空桌上一扔，嘴里“鞭哪鞭哪”地，边走边卷袖口，一副打人的架势。

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拔腿就逃，连放在桌上的那个装着几元零钱的小钱包，也顾不上拿。

我冲出店堂，一口气冲过两条马路，然后歇了一会，缓了缓气，眼看没有追捕的人，才一面为缺氧而大口大口呼吸，一面慢慢地、又累又饿地走向李家庄。

走进宿舍的大门，遇到了临时负责看守任务的办事员小马。他是青海省人事局派来的干部。我满怀委屈地把不准我吃猪头肉的事告诉了他。

“啊，你真幸运，没有挨揍！”他好奇地笑了笑，接着又严肃地说：“你没有看清，你进的是一家回民开设的清真馆。伊斯兰教规是不准吃猪肉的。看到你在他们馆子里吃猪肉，不揍才怪哩！”

鞭——青海方言，指生殖器，是骂人的脏话。

我在青海三十年的文艺活动

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带的最后一批研究生通过了答辩），我在青海三十年来的主要文艺活动，可以归纳为四方面：一是画了许多以毛主席像为主要内容的水粉画和油画二是编写脚本并摄制了五部幻灯故事片，给电影院放映；三是编了三年的语文月刊；四是培养了两批六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先说画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需要游行时扛几幅大型毛主席油画像，就提倡废物利用，指令我这个已经靠边站、仅仅手提浆糊桶给造反派张贴一些大字报的“废物”，承担这一任务。当然，我非常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画过画，要是画不像，丑化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不是就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吗？我表示不能胜任，不会画。

“你真的不会画吗？”这位造反派头头似乎有些生气，铁着脸问，“你是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的，难道就从来没有画过画吗？”

“画是画过。那还是在我小学念书的时候，在美术课上，学过水彩画，可是后来……”

“画过就好嘛！”头头不等我说完，微微一笑，有些得意忘形地教训我：“你要知道，给你干这个，也是一种废物利用嘛。”说到这里，他似乎发觉说溜了嘴，立刻清了清喉咙，改口说：“呃呃，嗯，我是说，你现在干的，谁都会干，等于是废物。你嘛，肯定不是废物，肯定会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这是——你要知道，这是个光荣任务嘛！”

当时我心里想的，当然不是光荣不光荣，我只是想：与其被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揪斗、靠边、刷浆糊，还不如冒“现行反革命”的险，边学边画，过些清静的日子。因此我答应试一下。

我看了许多绘画书，耐心细致地画，终于完成了任务。

造反派看到我在大幅画布上画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神采奕奕，就大加赞赏，认为我这个“废物”可以“利用”，给我一顶“右派画家”的帽子戴，并指令我画更多的画。

我在木板上、砖墙上、布面上，大约画了一百多幅的毛主席全身和半身像，还画了近百幅的毛主席语录画。在木板上画的是水粉画，画后刷一层清漆，可以长久保存下来；在高达九米的砖礅上，爬上脚手架高空作画的，都是彩色油画毛主席全身像。一九八四年，我去湟中县人民医院看望一位医生时，还看到医院的门厅里高悬着我在“文革”时画的两大幅语录画：一幅画的是正在做外科手术的白求恩大夫，一幅是救死扶伤、送医下乡的医务工作者形象。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造反派要“抓生产”，指令我编分场脚本，并用照相机拍摄那些先进生产大队的先进事迹，然后制成幻灯片，在电影院放映。我曾去拦隆口公社的班仲营和黑咀等大队蹲点，编写、拍摄并制作了五部幻灯片。

我这个“废物”，总算第二次又被造反派“利用”了一回。

“四人帮”粉碎后，七十年代后期，青海师范大学把我从喇嘛寺里接出来，在大学任教。进入八十年代，师大党委有鉴于师范教育不应局限于在校培养师资，对全省在职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让中文系先办一份《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并指定已经平反改正的我为刊

物的主编。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曾主编过文学期刊四种，报纸副刊三种，丛书七种。国统区的著名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许杰、赵景深、陈伯吹、艾芜、李何林、骆宾基等，我都熟识，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为我编的刊物写过稿。现在我编语文刊物，首先想到的，是语文大师叶圣陶先生。

我很冒昧地写信给叶老，向他汇报了我被错划为右派后流放在青海的坎坷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叶老在北京工作，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怀疑年事已高的叶老可能已经把我忘了。

“我还记得您。”他的复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

他在信里告诉我，前年割除胆结石后，视力听力极度衰退，心思体力已大损于前。但是他仍不厌其烦地说明语文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在提高教师的认识，让他们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学生启发和引导，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应用的能力。因此教师的教，最终是为了不教。

叶老的这封五百余言的信，我加上“启发和引导”的题目，第一次引进青海，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第六期上发表。

我编语文刊物，最初是唱独脚戏：组稿、审稿、编稿、校对、发行，都是独力承担。刊物出版一年以后，经省委宣传部批准，向全国公开发行。为应付日益繁重的编校发行任务，经校党委同意，由中文系聘请了茅盾的内弟媳金韵琴做我的助手。她曾应茅公邀请，在他家长期做客，对茅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比较熟悉。最初，她写了《茅盾的童年》等，介绍茅公少年时期参加作文比赛等情况。此后，她把茅公给孙女儿讲析古诗的文稿，以“古诗诠释”的总标题，给刊物发表，从一九八一年五月连载到一九八二年二月，评析了《画鹰》、《哀江头》、《卷耳》、《秋兴》、《诸将》等诗篇。从一九八二年五月到七月，又发表了茅公在小学念书时写的作文三篇。可以说，这是将茅公未发表的文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引进青海，在青海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老作家赵景深和许杰，在我编刊物的第一年，就积极寄稿，大力支持。赵景深先后写了《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谈鲁迅诗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茅盾给我的两封信》。许杰写了一组《野草》诠释的文章，共五篇。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刊物从一月号起，特辟“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专辑”，连续到十二月号。在专辑里编发的纪念文章共三十九篇，从外省引进的作者，有李何林、陈伯吹、任钧、陈鸣树、张德林、钱今昔、王永生、钱君匋、古远清等。

小说家艾芜和骆宾基，是我四十年代的老朋友，到一九八二年秋才联系上。骆宾基提供了金文考释的文章，艾芜寄来了一组《诗经》新解，发表了《江有汜》、《十亩之间兮》等。艾芜怎么会研究起《诗经》来呢？他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写给我的信里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押在狱中四年，一九七二年释放后，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访问，约有两月，回成都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四川文艺》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大事攻击（一九七四年）。成都的刊物，也随声附和。我只好研究《诗经》，写了不少笔记。有的整理成为文章，有的还未整理。文代会后，我又从事创作，放下《诗经》。

得您信后，有些兴奋，打算创作之暇，再把有关《诗经》的笔记，整理成篇。现将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尚未发表），寄您看看，如以为可以发表，即请使用。

可惜刊物出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后，因为我要带研究生，无法兼顾，而中文系又找不到可以代替我的主编，只得宣告停刊。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我带了两批六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和第一批研究生一起，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的科研项目。我把研究生带出青海省，让他们认识了一批现代文学老作家，如臧克家、萧乾、端木蕻良、骆宾基、周而复、欧阳山、楼适夷、艾芜、柯灵、王西彦、许杰、施蛰存、贾植芳、林焕平、蹇先艾、李何林、叶圣陶、任钧、陈伯吹、蒋锡金等，其中李何林、贾植芳、陈鸣树、王永生、许杰、钱谷融等十多位专家教授，根据我的要求，给我的研究生讲了课，拓展了他们科研的广度和深度，完成了对现代作家楼适夷、施蛰存、端木蕻良、骆宾基、李劫人的研究，通过了论文答辩，取得了硕士学位。

以上，就是我以“废物”的身份，流放到青海三十年来的主要文艺活动。回顾这三十年间，最初的二十年，我连订阅一份《参考消息》，也被批斗一个半月，当然，再不敢阅读什么文艺书刊，写什么文艺作品了。事实上，我不仅被人们看作“废物”，甚至一直被定性为“坏人”，谁来重用我，谁就是“重用坏人”，丧失阶级立场，不免被揪出来批斗。我所属县的一位文教局局长，赏识我掌握外语，精通汉语拼音，让我在全县小学校长学习班上讲授汉语拼音，结果在“文革”中以“重用坏人”的罪名，让他在冰天雪地里赤脚扫雪。长期来我一直在基建工地上当施工员、出纳员、保管员、拉运砖瓦的押运员、司机招待员、守护工地的夜间巡查员，十足成为麻将牌里的“百搭”，什么都干。造反派指令我绘画和摄影，那是歪打正着，使我冒险干了一些文艺工作。现在想想，这二十年来的生活，倒是非常丰富多彩，不仅使我看到了炎凉的世态，也使我交结了一些真心护卫我的朋友，比如曾经救活过我的喇嘛尼玛、和我一起同住了九个月的小偷拉官卜、在农村劳动时不把我看作摘帽右派的老妈妈，她们的高洁的灵魂，都是我今后写作的上好题材。今后，我一定要写一些在青海底层生活里使我至今仍然清楚看到的闪闪发光的人和事。

我至今还活着……

最近，从香港回来的一位亲戚，带给我一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绿的北国》，重磅米色道林纸印刷，普蓝的硬面精装封面上烫着金光闪闪的书名。这是我写于日寇占领上海时期、出版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的第二个散文集。

台湾的成文出版社为什么要翻印我这本小书呢？由孙陵、夏志清、周锦等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在卷首的《本书题记》一文中推荐说：“笔触灵巧细致，风格却又粗犷。其中一些小品，像诗人的低诉，又似画家的挥洒。读了之后，不仅有美的感受，更能启发灵性；虽然文字不多，却似哲学家滔滔不绝的宏论，经得起咀嚼，而且含有深刻的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这是文学“珍品”之一，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同时选入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丛刊》第一辑里的大陆作家作品，还有陈衡哲的《小雨点》、郑定文的《大姊》、缪崇群的《唏露新收》等。看到这里，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以为我和陈衡哲、郑定文、缪崇群一样，早已离别人间，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这也难怪，和台湾长期隔绝，解放以后，眼看我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我已经作古。即使在离开上海不远的南京，也有人以为我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被枪毙了。这话怎么说呢？那是在茅盾先生病逝后不久，我偶然用过去沿用的“范泉”笔名，写了一篇短文，投寄《人民日报》发表。大约一个月后，《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者转给我一封信，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汪××同志读了我的短文后写给我的，信的大意说：他是四十年代《文艺春秋》月刊的读者，但那个刊物的主编范泉，早在一九五五年时就已经给枪毙了。他问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被枪毙了的范泉。

“正是那个范泉，”我回信说，“但是我没有被枪毙过。”

经过来回几次通信，才弄清在一九五五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期，南京的一家报纸曾经在一片通信中说过，处决了多少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其中包括《文艺春秋》主编范泉。其实这一报道，倒也确有根据，只是略有出入。原来一九五四年六月，胡风在写给毛主席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里，提到了四十年代上海两种文艺刊物，即“国民党检查官”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南京暗探”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所谓“南京暗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特务。当然，根据有反必肃的原理，我和李健吾就像胡风本人一样，同步进入肃反运动的被重点审查行列。当时我在上海总工会系统工作。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总工会肃反办公室主任沈峻坡，立刻被拉下马，勒令停职检查。经过一二十位干部组成专案组，抄家，外调，长期审查以后，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时，终于得出结论：我不是国民党特务，连任何反动党团也没有参加过，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作为《文艺报》的附册，却已印发全国，谁都知道我是国民党特务，传说“处决”，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罪有应得。

当然，由于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肃反审查的折腾，在我个人的思想情绪上并不平静，我禁不住在鸣放时提了“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因此，被确认为“诬蔑了伟大的肃反运动”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贬职青海，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得到平反改正，那时我已经年过花甲了。

胡风的一句话，使我丢失了整个壮年时期。

而这也正是我为什么长期来被迫销声匿迹，被人认为我早已作古，把我

过去涂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目为“遗产”和“珍品”而向我唱起赞美诗的原因。其实我至今还活着，而且在四年以前，还调回上海，回到了原来的出版系统，目前正为上海书店组织力量，编纂一部十二专集、三十分卷、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但是现在活着，不等于说过去不曾死过。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臭老九的罪该万死，那是名正言顺的，而且似乎一般还应当以“死无葬身之地”为正当的归宿。比方说，四十年代曾经勤奋创作，为《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写过不少短篇小说的阿湛，比我年轻得多，和我一样戴上右派帽子去了青海，却从此音信杳然，再也没有回来，连死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有一次，柯灵兄和我谈起，托我在青海打听。我托人辗转查问了半年，才弄清他是在某个劳改农场被折腾死了以后，埋在牧区茫茫白雪的山沟里，一旦白雪融化，尸骨也就被狼群啃走了。当然，我是比他“幸运”得多：虽然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凌世界冻死过两次，但是我好像只是到了一个冥冥乾坤的边缘去旅游似的，还没有来得及向马克思报到，就被几位好心的人，包括喇嘛尼玛和尖措，把我救活过来了，而且此后又一直活到今天，没有在“正当的归宿”处定位。这肯定是大出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先生们在当初的意料的。为此，我现在倒是十分果断地确定了这样的信念：不管我年逾古稀，我还是应当把阿湛他们的干劲接过来，拼着命干，多干一些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因为，毕竟，我至今还活着……

1988.9.上海。

第五辑

岭上梅开大地春——参加第四次作代会的一点感想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当我带了研究生从贵阳来到广州以后，中国作协广东分会送来了青海作协的电报，说中国作协特邀我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要我直接飞往北京。

参加这次作代会，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印象。

首先，是我亲耳聆听到党中央发出的“创作自由”的声音。创作可以自由，可以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指导下，让作家们自由选择自己的题材和艺术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是我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我来到青海以后的二十八年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我在青海高原曾经走过一条人们无法置信的坎坷的道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这个看来已经成为“废品”的人，从喇嘛寺里接出来，恢复了我的名誉，给了我优越的工作条件。长期来我一直酝酿写一部青海题材的小说，写我自己，写知识分子在青海高原走过的道路。但是我不敢写，我害怕我会写出“伤痕文学”来。现在，我的这种顾虑完全打消了。“创作自由”，这是党中央对文学创作生产力的解放！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等大批错划为右派的作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上台发了言。

其次，是我遇到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界老朋友。他们之中，有从香港赶来参加大会、三十年代就给我编的《作品》半月刊写了小说《白面》的李辉英，有在四十年代从延安到上海以后悄悄和我来往的、带给我延安作家文稿的周而复，有在临近解放时冒着所谓偷听“敌”台的“罪”名，一起偷听淮海战役胜利信息的剧作家陈白尘，有在我文学活动中大力支援了我、我也在经济上大力支援过他们的老战友臧克家和艾芜、锡金和碧野、沙汀和骆宾基……

第三，作代会使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老朽”们，不甘沉默，决心振作精神，发挥余热，大干一场。具体地说，由周而复、骆宾基和我发起，与艾芜、曹禺、柯灵等商议后，决定创办一个以老一辈作家为主要撰稿人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在上海出版。组成的编委成员中还有艾青、姚雪垠等。当时参加作代会的上海市委宣传部王元化部长，已经表示同意这个刊物的出版登记，经过作代会上即席组稿后，不到两个月，陆续收到了陈白尘的长篇自传小说第一章、艾芜的中篇小说、李辉英等的短篇小说、戈宝权的评介诺贝尔得奖作品的论文等。

这真可以说得是：岭上梅开大地春。

附记：这篇短文是应青海的《西宁晚报》写的。作代会后，我去了上海，经过近两个月的斡旋，由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王局长不同意，《东方》大型文学双月刊终于成为一颗“未出膛的炮弹”。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历程

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虽然从二十年代起，在茅盾、郑振铎等倡导下，已经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但是直到现在，研究近代文学的队伍还不到二百人，与拥有六千余人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近代文学年代久远，资料散失，查找困难，而且一直没有人作过系统整理，不了解近代时期究竟有多少文学样式，又有多少代表作，一句话：摸不清近代文学的家底。因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虽然阐述比较详备，却都只写到清代中叶，再不写近代文学。而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也只教到近代文学的前沿，然后一笔带过，跳到“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文学课程。中国近代文学竟成为写不进《中国文学史》著作、教不上《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怪物”。

但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轨程，是从长期持久的古代文学，经过急遽变革的近代文学时期，才跨入了现代新文学的质变阶段。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为了自救，官僚地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甲午以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终于形成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几千年来统治我国的儒家世界观和道德观，开始逐渐崩溃，影响到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进步传统，也批判地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在中西文学的交融中，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比起古代文学来，中国近代文学是进步的文学。它是开始走向社会、接近人民群众的文学。几千年来古代文学，总是跨不出士大夫的书桌，而近代文学，如梁启超的散文、康有为和黄遵宪的诗歌，能放眼世界，从书桌上解放出来，通过报章杂志的传媒，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鼓舞爱国斗志的工具。那在近代时期走向高峰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倾向口语，还直接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方言乡音。小说变革方面，梁启超大声呼唤过：“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形成高潮的时期，近代小说从译介小说中汲取营养，不仅在创作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方法上，促使近代小说不仅扩大了体裁品种，还丰富和变革了表现手法，最终正是在近代时期，诞生了我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狂人日记》，使中国近代文学跻身于近代世界文学之列而毫无愧色。

从变古到创新，既从过滤中继承，又显示出富有活力的开拓，终至引发了深层结构的质变。

没有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期量变，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质变。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是不可能取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的。

中国近代文学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

为了给中国近代文学从无到有地塑像，编纂一部两千万字三十分卷的大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我的初步设想得到出版社和市新闻出版局同意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克服编纂困难和组织编纂力量问题。

一九八六年冬，我才从青海调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是刚刚成立，人力极其有限。一家小社怎么可能编纂一部难度远远超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仅仅不过十年，而且是当代人编当代作品，资料齐全，作品的影响和代表性一目了然，更无需标点断句、简化字体。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而且近代文学资料繁、散、乱，既浩似烟海，又隐显错杂，不少资料已经濒于佚失，要寻找一百年前的原著初版本，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找到以后，还要衡量取舍、点校、整理，任务繁重，工程巨大。但是我却心中有数，决不知难而退。我考虑到我自身的有利条件：由于我三四十年代已经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批老一辈的作家教授有过来往，建立了一定的信誉，只要我亲自去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肯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我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季镇淮、施蛰存、王元化等，组成二十五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十二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同时在出版社内部，除了我和我的青年助手龚建星（后期是郑晓方）在出版社工作外，聘请了三位四十年代已有交往的老编审王知伊、周劭和杨友仁，作为社外顾问，组成“《大系》编辑室”，在每周一至二次的碰头会上，议论并解决编纂工作中随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编纂构架建成以后，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召开了“《大系》编辑工作会议”，介绍了我们的编纂设想，宣布了《大系》总编辑委员会和各专集主编的名单，研讨了如何编好这部大书的有关问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和副局长赵斌，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中，热情支持这一巨大的出版工程，认为这是上海建造的“文化长城”（指文学《大系》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主编赵家璧，介绍了他当时的编辑情况。编委王元化、施蛰存、徐中玉、贾植芳、柯灵、章培恒等相继发言，谈了有关编辑工作中必须注意和应当解决的问题。在两天的讨论中，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理解了编辑《大系》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上初步取得了共识。

紧接着考虑的，是如何集思广益，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我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十六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不定期地出版二至三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情况介绍、访问记、通知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编选指导思想和选材问题上，发表了各家的争鸣书简。

我终于在市新闻出版局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我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的工程。

集思广益 组织争鸣

通过连续印发的简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编辑工作信息》，我们有意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重点讨论了四个方面。

首先，是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两千万字三十分卷应该如何分配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十个专集，增加到十二个专集，即增加《民间文学集》和《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卷。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文学理论集》、《诗词集》、《戏剧集》和《俗文学集》，都从三卷减为二卷，而原定五卷的《小说集》，增加到六卷以至七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少数民族文学集》主编。

其次，是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简报上公布自己的《编选设想》，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中，由编委伍蠡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1)“文学作品选”和“文选”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3)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入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成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量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几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

第三，是重点讨论了《小说集》的三次选目。

《小说集》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大系》的核心部分，曾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一九八八年五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

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发的简报第三十号上公布了《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诚恳的答复》，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小说集·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蕻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的选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各个专集在简报上展开的讨论是不平衡的。除了《小说集》外，《散文集》的讨论也比较激烈。有关小说和散文的争鸣，我们在一九八九年夏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在同年十月出版，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该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总序》，我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改同意后，我们立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印发了《信息》第三十八号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十月十一日《信息》第四十五号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信息》简报最活跃的时期，是一九八八年一月至一九九一年六月。为这个简报写稿的，有编委马学良、王元化、任访秋、伍蠡甫、吴仞之、吴组缃、陈子展、陈则光、时萌、张庚、郑逸梅、周振甫、季镇淮、范伯群、柯灵、钟敬文、施蛰存、徐中玉、钱仲联、贾植芳、章培恒、楼适夷、端木蕻良、魏绍昌等。国内专家学者参加争鸣的，有何满子、郭豫适、冯至、丁景唐、孙文光、刘北汜、叶至善、钟贤培、吴泰昌、锡金、袁进、裴效维、汤钟琰、徐开垒、陈子善、左鹏军、吉少甫、姚福申、林其镡、秦瘦鸥、陈鸣树、郭延礼、赵家璧、王勉、关德栋、蒋星煜、周而复、蹇先艾、马荫良、徐铸成、陆佩弦、曹树钧、骆宾基、许杰等。

揭开中国近代文学奥秘

《大系》三十卷，从十二个方面，多角度地给中国近代文学理清了头绪，描绘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在我们组织近百位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学者整理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国近代文学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奥秘：

一、“近代意识”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的发现

从十九世纪中叶龚自珍眼看世道陵夷，危机四伏，呼吁“大变”、“速变”，魏源献出“师夷制夷”的御侮救国方策，到甲午海战覆败，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全面变革文学，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曲界革命”的口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无不响应，他们面向世界和新潮的现实，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转化，形成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近代各文学流派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共识。正是这种在忧患中形成的“近代意识”，从“五四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它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在批判时给《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批作家的总称。“鸳鸯蝴蝶”，顾名思义，是指他们的创作都是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无聊作品，带有贬义。其实这是片面的过甚其辞。他们的作品和影响，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1)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民俗风物、社会潮流，是时代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2)他们之中的不少作家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反对传统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祸害，揭露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等，有进步倾向。(3)现代文学的不少著名作家，如陈独秀、叶圣陶、李劫人等，也曾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相互间并不排斥。(4)很多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是在鸳鸯蝴蝶派的摇篮里哺育成长的。比如张天翼、施蛰存和戴望舒，从小就曾受到鸳蝴派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时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社刊《兰友》，就曾特邀鸳蝴派著名作家程小青、赵苕狂等写稿，并以他们为榜样，学习创作侦探小说。特别是张天翼，在写鬼狹奇案小说《头等车室》、长篇侦探小说《十八号》的同时，还写了揭示豪门丑态的小说《无光珠》、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博士》等，他那带有幽默和讽刺味的写作风格，当时已经初步形成。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鸳蝴派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桥梁，起过必不可少的承启作用。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由于整个文坛非桐城谬种，即鸳鸯蝴蝶，被他们占领，只有把他们批倒批臭，才有可能树立起新文学的大旗，因此，当时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批判的影响，而至今对鸳蝴派仍然抱着全盘抹煞不屑一顾的态度，那是错误的。因此《大系》编选了这一流派的许多作品，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三、近代翻译文学的崛起，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产生变化的外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当时译介外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结果。其实译介外国文学，近代时期早已开始。以译诗为例。过去译诗都使用四言、五言、七言、楚辞、古风等，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已经尝试用白话写诗的胡适，开始用白话体翻译了苏格兰女诗人A·Lindsay的《老洛伯》，这是产生于近代时期的第一首白话体译诗，它在艺术方法上，对新诗的创作影响很大。进入本世纪后，科幻小说大量引进，侦探小说也译介过来。从此，创作的科幻和侦探小说也随着诞生。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是从《茶花女》开始。《茶花女》作者小

仲马的倒叙方式，被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首先仿效。西洋小说中有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用日记或书信体写小说的。影响所至，符霖的《禽海石》，就是采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写的小说。徐枕亚的长篇小说《雪鸿泪史》，是采用日记体写作的。包天笑用书信体创作了小说《冥鸿》。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仅仅记述两天的工作，但是作者用插叙的艺术手法，追述了工人的小史。这些都是突破传统小说的技法、学习外国小说的明显例证。在戏剧方面，由于直译西方剧本，在我国舞台上演出有困难，因此剧本的翻译，一般采用意译、编译或译述，便于观众接受。也有把外国剧本改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剧本的，如一九一九年根据法国萨尔都的剧本《女优杜斯卡》改编为四幕悲剧《热泪》，在东京上演，效果良好。这种既翻译又创作的改编，至今仍在沿用。而且由于西方剧本的译介，从无到有地产生了话剧这个文学品种。因此在清末民初的译介外国文学，对繁荣我国创作有益，也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在编纂《大系》的过程中，发现了无数个可以说明质变已经开始的“第一”

除了本文已经提到的许多“第一”外，再集中举几个“第一”的例子：

(1)第一个既被改编成连台本戏上演一九一三，又被改编拍摄成影片放映一九一六的短篇小说，是吴趼人创作的《黑籍冤魂》，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月月小说》一卷四期上。(2)发表在报纸上的第一篇连载小说，是《申报》第二十七号上的《乃苏国奇闻把沙官小说》，时间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日。(3)第一批纯粹的白话诗，是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二卷六期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4)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业戏剧杂志，是一九一四年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陈佩忍（去病）、柳亚子等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5)第一批开创外国剧本翻译纪录的，是一九一七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翻译出版的《夜未央》、《鸣不平》等欧洲现代戏剧剧本。(6)我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正式的话剧演出，是一九一七年春由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春柳社，改编演出了《茶花女》。(7)我国第一部吴语小说，是出版在近代（一八九二年）的《海上花列传》。(8)第一次发现长篇方言小说《海天鸿雪记》的作者，不是阿英所说的李伯元，而是二春居士。小说是随一八九七年创刊的《游戏报》单页附送的。(9)钱钟书认为一八六四年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等，是最早的译诗。施蛰存认为第一篇译诗应该是《旧约全书》中译本里的《雅歌》。(10)第一部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被公认是林纾一八九九年译出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但是经过整理近代文学资料，发现一八七三年一月开始在《瀛寰琐记》杂志上连载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才是最早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名著。(11)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的《瀛寰琐记》，是我国第一本文艺杂志。(12)《指南报》是近代创刊的第一份文艺报纸，时间约在一八八一年左右。(13)近代第一种《伊索寓言》的译本，是出版于一八四一年的《意拾喻言》，“意拾”是粤语“伊索”的音译，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为英人学汉语而翻译，书上对照排列了英语、汉译、国语拼音、粤语拼音四种。(14)在近代文学中，第一次形成了与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

无数“第一”的发现，充分说明现代文学初起时的质变，实际上在近代文学时期早已开始。

一部帝国主义列强残酷侵略和掠夺的近代史，决定了中国人民群起抗争

的近代文学爱国主义意识。可以说，整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形象教材。《大系》的十二集主编和编辑成员，与后期参加编审工作的俞子林、路惊、彭卫国、刘毅强等一起，在编委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探讨中，在上海图书馆的祝均宙、孙继林、张伟的积极协助下，以强烈的现实感，从观念到形式，孜孜不倦，锐意求新，终于高质量地胜利完成了这项被市新闻出版局在一九九一年已经确定为“重点出书工程之一”的大书。这是我们集体努力的结晶。

《大系》的编辑构架

早在一九八七年春，我已草拟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编辑设想》，撰写了《缘起》（也就是后来印在各卷卷首的《出版说明》），开列了准备聘请的总编委名单，以及十个专集的名称和主编、副主编名单。此后两年间，经过实践和探讨，增加了两个专集，相应地增聘了编委，确定了总序的作者，并调整了几个专集的编辑力量，到一九八九年春，才最后排定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顺序号，完成了以下编辑构架。

（一）缘起

从一八四一年中英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清王朝腐朽崩溃、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反映在文学上，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反映现实社会、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语合一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隐显错杂、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二）总编辑委员会

（按笔画顺序）

马学良 王元化 任访秋 伍蠡甫 吴仞之 吴组缃
陈子展 陈则光 时 萌 张 庚 郑逸梅 周振甫
季镇淮 范 泉 范伯群 柯 灵 钟敬文 施蛰存

徐中玉 钱仲联 贾植芳 章培恒 楼适夷 端木蕻良
魏绍昌

(三) 总序作者

吴组缃 季镇淮 陈则光

(四) 12 专集 30 分卷的顺序号

1. 《文学理论集》2 卷, 1~2 号;
2. 《小说集》7 卷, 3~9 号;
3. 《散文集》4 卷, 10~13 号;
4. 《诗词集》2 卷, 14~15 号;
5. 《戏剧集》2 卷, 16~17 号;
6. 《笔记文学集》2 卷, 18~19 号;
7. 《俗文学集》2 卷, 20~21 号;
8. 《民间文学集》1 卷, 22 号;
9. 《书信日记集》2 卷, 23~24 号;
10. 《少数民族文学集》1 卷, 25 号;
11. 《翻译文学集》3 卷, 26~28 号;
12. 《史料索引集》2 卷, 29~30 号。

中国现代文学史侧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前言

大量社团和流派的涌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些社团流派的各自影响和相互作用，促使新文学运动日益丰富多彩，并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全面地、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编纂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表述形式。它不受文学史体例的限制，也不以社团的政治态度进步与否作为取舍标准，而是力求做到有原则地有闻必录，兼收并蓄，客观反映，实事求是。

为什么说对社团流派现象及其发展轨迹的描绘，是现代文学史的另一表述形式呢？

首先，是因为社团流派的发生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比如文学研究会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五四激起了当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觉醒，当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笔参与这个伟大斗争时，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周围群众包括自身在内的被重重桎梏着的黑暗人生。尽管他们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却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创作目的：为人生。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时期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不可能产生以“为人生”为建会宗旨的文学研究会。这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产生的文学社团，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再从存在的时间看，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在解放前的三十年中，出现的数目不少，而存在的时间都不长，除了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少数几个时断时续历经数载外，绝大多数只存在一二年或二三年，其中不少只有几个月的历史，真可谓“昙花一现”，原因则几乎都与社会经济、政治有关，而这一点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外国文学的介绍及其影响是分不开的。伴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许多文学观念与流派思潮也闯进了长期封闭的中国，从近代末期起，激发了不少作家的注意和仿效的兴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新月派的诞生，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思潮便是外国相应流派思潮的照搬，因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必然要和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再加上自身的创造，就很自然地会产生不同的特点。

第三，社团流派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卷里，可以说是色彩纷呈，外国的各种流派思潮在三十年的中国文坛上，几乎都试演了一遍。这种多维多元的性质和态势，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特殊面貌。因此，要想确切地描述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轨迹，离开这种多姿多彩的社团流派现象，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第四，几乎所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家，都与一定时期的社团流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鲁迅与新青年社、郭沫若与夏社、茅盾与文学研究会、巴金与孤吟社、夏衍与狮吼社、田汉与少年中国学会、欧阳山与广州文学社、曹禺与南开新剧团、张天翼与兰社。要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要讲现代作家的发展道路及其创作特色，则又离不开与他成长有密切联系的社团流派。

第五，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在不同信仰的作家群体组建起来的不同社

团流派中，不可避免地会在相互间产生种种矛盾和斗争。比如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为人生派与鸳鸯蝴蝶派、左联与民族主义文学派，等等，通过斗争，有的消亡，有的发展。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同时也在文学创作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有的淘汰，有的互补壮大，为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增光添色。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绘离不开社团流派现象及其发展轨迹的原因，为什么说这部辞典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表述形式。

早在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对于初上战阵的文艺青年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对于他们组建的文学社团，虽然微不足道，但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热情鼓励、具体指导与扶持。比如厦门大学附中学生和集美中学学生于一九二八年组建了鹭华社，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鹭华》月刊，一九三四年初托人将刊物送给鲁迅后，鲁迅立即介绍给苏联的国际文学社，并在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作家的新作品新成果时，在茅盾撰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简介中，鲁迅作了以下补充：“《鹭华》（月刊），厦门出版。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号。一九二八年已有《鹭华》，附刊于日报上，不久停刊。这是第三次复活，内容和旧的不同，左倾了。作品以小说、诗为多，也有评论及翻译。”再如北平第四中学学生唐诤等于一九三三年夏在故乡太原组建了榴花社，并在《山西日报》上编辑《榴花》周刊。他们写信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杨杏佛在上海被特务暗杀，六月二十日，鲁迅才从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殓仪回来，收到了榴花社的信。虽然鲁迅也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但他不顾自身的安危，立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而且结合山西现状，作了知无不言、言出肺腑的亲切指导。他说：

新文艺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况，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后来不出鲁迅所料，周刊出了七期，就被查禁。

茅盾在一九三五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的《导言》中，也高度评价了青年学生们组建的那些社团和出版的刊物。他说：

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即消灭，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事实证明：不少有声望的作家都是从一些小社团里逐渐成长起来的。比如巴金写于一九二三年的第一首主题触及政治、向反动军阀开火、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长诗《报复》，就是在同人小社团孤吟社的社刊《孤吟》上发表的。郭沫若因为在留学时组建夏社，才第一次读到了白话新诗，因而尝试写诗，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充满叛逆的反抗精神的一系列新诗，汇编成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诗集之一《女神》。十七岁的中学生张天翼还陶醉于鸳鸯蝴蝶派艺术时，与施蛰存、戴望舒等组建文学社团兰社，出版小说旬刊《兰友》，发表了他当时创作的侦探小说《头等车室》、《夜宴记》、

《博士》、《无光珠》、《十八号》等，已经初步形成了他观察精微、词语幽默的创作风格。所有这些社团，成员不到十人，刊物形同小报，但是却真正成为作家的摇篮，使一批青年人“练得一副好身手”，是使现代文学“有声有色”的前奏。这些成活时间不长、表面看来谈不上有什么影响的文学社团，实际上正如茅盾所说：“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因此我们尽一切可能，在全面搜索中一一收录。

本辞典总共收录辞目一千零八十二条，其中正目六百六十七条，参考目四百一十五条。正目的资料比较完整，除少数辞条的内容略简外，一般都有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文学活动的历史记叙。资料不够完备的，采用几句话介绍方式，编入附录，作为参考目。有时一个社团在不同历史的发展阶段演化为多种名称的，或一个流派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由于视点不同而被套用不同名称的，也都列入参考目。所有这些社团流派的总体时间跨度是：从五四运动前的十多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区域跨度是：不仅包括国内（大陆、台湾和香港），还包括国外（日、美、南洋四国）；不仅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还包括沦陷区（日占时期的北平、上海、南京、苏州、汉口、台湾、香港和以“满洲国”为称号的东北地区、以“蒙疆自治政府”为称号的蒙疆地区）。

文学社团是作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文学或政治的目的而组建的集体或若干集体的组合。它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大致相同的文学主张为基础而组建的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是以大致相同的政治信念为前提而组建的社团，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著作者协会等，那些为实现帝国主义或汪伪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而组建的社团，如奉天放送话剧团、蒙疆文艺恳话会、华北文艺协会等，也属于这一类；三是一些社团的联合体，如上海剧团联合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等。文学社团和非文学社团的区别，主要以是否有文学创作（包括文学评论）为依据。不少演剧团体本身有剧本创作，或自编刊物发表剧艺评论的，不论是古典剧、话剧、歌剧、舞剧或活报剧团体，我们都收录；没有创作而仅仅从事演出活动的，是艺术团体，一律不收。凡是用文言写作而并无革命内容的社团，是属于旧文学范畴，除“南社”需要与“新南社”对照而作为参考目编入外，其他一律不收；但少数与新文学对立、并与新文学社团论争的旧文学社团（流派），如甲寅派，以及虽发表旧体诗文，却公开拥护新文学运动的社团，如新南社，都适当收录，以反映新文学运动日益发展的取向。个别用旧体诗词反映革命内容的革命文学社团，如怀安诗社，性质不属复古的旧文学范畴，因此也都收录。而对于社团成员文学创作的考察，一般以铅印出版物为主。但也有少数文学社团，迫于战争环境和战时条件，只出版油印刊物，如太行诗歌社；或张贴壁报，如鹰社；也还有仅仅是手抄传阅的，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铁窗诗社——这是在中共地下党员领导下组织起来从事政治斗争的文学社团，社员的创作虽已大部分失传，但就少量辗转留存的烈士遗作看，鲜明地反映了壮怀激烈、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英雄形象，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有这些在特殊环境里油印和手写的文学创作，都在我们考察之列，有关社团也都一一收录。

社团不等于流派。流派是指文艺思想或创作艺术方面的派别。一个社团一般不可能就是一个流派，因为不少社团或者是存在时间短，或者是共同追求的目标不明显，或者是虽有明显的共同追求，但在创作或理论上并无特色，

在当时当地说不上有什么影响，像这样的社团，不能说是已经形成了流派。但是有时也可以是一个社团单独形成一个流派，如现代评论派、论语派；也可以是一个社团涉及一个以上的流派，如内涵比较复杂的文学研究会；更可以是一个流派横跨几个社团，如小诗派、象征诗派、鸳鸯蝴蝶派。因此社团的建立不等于形成了流派。流派是一群作家在大致相同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指导下，经过共同的探索，或在艺术风格上取得基本相近的特征（如浪漫派、现代诗派），或在哲学思想上具备大致相同的要求（如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文学派），并在当时当地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因此文学流派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有作家的队伍，二是要有共同的追求，三是要有作品的影响。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个别以外，流派的形成，在作家本人总是不自觉的。而往往是在事后，由一些文学评论工作者或文学史编纂者根据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及其影响，分析归纳后附加上去的，如东北作家群、为人生派等，它们都是事后的概括。

关于流派的条目，我们收录的不多：凡公认的都已收录，有争议的作为参考目收编。另有一些概念不够明确、但在讨论现代文学时或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常常提到的流派，如乡土小说、身边小说等，我们也都相应作了介绍，便于查考。

这部辞典是一九八三年时由我倡议，在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全体同志的协助和青海省教育厅批拨专款大力支持下，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建立以我和我的研究生刘为民和李怀亮为主的科研组，组织北京、上海、福建、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上海铁道学院、广东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沈阳市人民政府业余大学、四川成都师专、江苏南通工校等单位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社团的部分成员或知情人，经过两年的采集、编写，由我两度统稿完成了第一稿。此后，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由潘项德、钦鸿、张伟等同志相继作了二度补漏工作，由葛中义同志通读缩改，并将部分辞条重写，最后由我统稿完成了第二稿。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一年，将文稿交上海书店后，提出改写和浓缩要求，于是由徐宗璉、潘颂德和柯益烈同志用一年半时间，全面改写，并由潘颂德、徐宗璉同志三度增补了部分辞目，由我第四次统稿审改，从九十万字缩成六十万字，完成第三稿。

在编写过程中，曾先后得到田间、蹇先艾、臧克家、贾植芳、成仿吾、赵铭彝、苗得雨、林焕平、吴似鸿（蒋光慈夫人）、骆宾基、丁景唐、朱金顺、胡可、马良春、陈伯吹、司徒慧敏、吴强、李何林、孙昌熙、陈白尘、林宏、郑效洵、孙席珍、孔孚、于承吾、叶迈、徐迺翔、许杰、任钧、赵景深、雷石榆、胡絮青（老舍夫人）、曾敏之、郑莹、王永生、楼适夷、俞元桂、汪金丁、锡金、柯灵、端木蕻良、丰村、王西彦、孔罗荪、周而复、朱子奇、王瑶、碧野、李岳南、罗铁鹰、凤子、艾青、欧阳山、徐光霄、田仲济、陈子展、吴奔星、公木、于黑丁、杜宣、凌鹤、臧云远、王世家、周巍峙、谷牧、万平近、包白痕、刘安章、李尤白、孟浪、刘沙、冯至、施蛰存、刘炼虹等同志的书面和口头指教；部分辞目的撰写，曾参考学术界近年来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谨在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是一项拓荒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虽然我们前后花了

十年时间，行程数万里，跑遍全国主要省市和部分高校图书馆，走访和信访了数以千计的有关社团的作家和关系人，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考察不全，错误和遗漏仍然难免，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给予批评指正，并提供有关资料或资料线索，以便今后修正补充，力臻完善。

1992年6月

金色的晚晴在熠熠闪光——《文化老人话人生》题记

我们试图作一次创新的尝试。

过去出版的书，总是写青年的多，写少年儿童的也不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让这么多老年人来唱主角，自得其乐地谈论他们自己。为了弘扬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展示我国老一辈文化人为促进人类进步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邀请了上百位七十岁左右到一百一十岁的全国著名的作家、科学家、戏剧家、翻译家、音乐家、书画家、学术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和新闻出版家，描绘他们在进入老年（六十岁）以后的生活和心态，回顾他们如何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从童年走向老年的某些经验和教训，抒发他们对于人生——特别是到了人生最后历程“老年”阶段的理解和看法。不论他们从事何种专业，事实上，他们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创造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成果。他们正是我国人民中的智者和真正的精英。他们那丰富而渊博的知识和阅历，包括他们从各自的特定地位和角度审视自己童年、青年和老年人生的经验体会，都将给予读者以各种有益的启迪，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说，这是一部总结人生经验，留赠后代借鉴的书。

过去出版的书，一般都是见文不见人，少数只在题头刊印一帧作者的头像或半身像，有时也可能在文章里安插一些图片或生活照，却很少注意到作者和书籍内容有直接联系的各种形象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由于经历了“史无前例”时期，成千上万的珍贵图片、文稿和手迹被毁，但至今存留下来的一些，仍然有着抢救保存的价值。因为正是从这些生活形象里，结合“关于作者”、书影（剧照）和手迹，可以看出老一辈文化人是在怎样的专业道路上，从青少年时期起，在风雨剥蚀中孜孜矻矻、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理解作者写这篇“话人生”文章所蕴含的文章以外的丰富内涵。因此这部书的出版，既是全息介绍了作者，也是别开生面地在抢救一些文化老人今天为止还存留下来的形象文献。

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少有成就的文化老人，正在逐年凋谢。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请他们挥毫抒怀，即使是点点滴滴，也该是多么珍贵。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我从外面走进巴金老寓所的客厅，只觉得一片灰蒙蒙的阴暗，可巴老却还是伏身在一张小得只能靠上两个手肘的小方桌上，聚精会神地书写。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说：“巴老，今天是大除夕，客厅里这么暗，怎么连灯都不打开，还在写啊？”他像往常一样地总是带着笑，轻声回答：“手颤，字写不好。我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只要还能写，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写一些。”巴老没有搁笔。他虽然患了不治的老年性支气管炎和帕金森氏症，常会感冒，咳得全身无力，有时被迫去医院输液，可是他决不推卸作为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提笔书写。他毕生正直。做学问，刻苦努力。干工作，脚踏实地。对朋友，真诚朴直。对读者，无限热忱。说自己，非常谦逊。与人为善，竭尽所能。为人民的福利，他可以把全部的积蓄和珍藏，捐献得干干净净。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总是说：“我是靠读者养活的，没有读者，也就没有我。”这一回，他用颤抖的手，连续几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终于艰难地给本书写了六张稿纸的文章，向读者倾诉了他最近的心声。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诚挚的感情啊！

多少文化老人已经提不起笔。剧作家曹禺住在医院里，只觉得笔重千斤，“仿佛举泰山那样，无能为力”。抗战时期的名记者徐盈，说话已经不太清楚，是由他女儿徐东整理了这篇《我的老年生活》后寄来。漫画家张乐平，因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手颤不能作画写字，他的文章是口述的记录。老戏剧家赵铭彝的《老有所忆》，也是由他夫人按照口述记录的。曾经创作过不少小说和剧本的陈白尘，由于脑神经紊乱，虽能写些简短的书信，却已不能构思作文。记得四十年代淮海战役还在激烈进行时，我曾在他上海寓所的二楼卧室里，与他一同偷听过解放区电台。八十年代中期，我准备在上海编一部大型文学期刊时，他在出差广州的旅社里赶写了自传小说的第一章寄来。现在，我编这部“话人生”的书，去信征稿，他却在医院回信说，因患脑病，“搁笔已近三年”，不能应命。发表在这里的《病况》，是经他同意，把他几次来信谈到的病况连串起来整理而成的。他在信里说：“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是比死还痛苦的。”这也可以说是提不起笔的文化老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痛苦！

提不起笔的还有双目已经完全失明的小说家沙汀。发表在本书的这篇《只要健康能够维持》，是他在北京寓所口述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经过录音反复播放反复修改，还是比较满意的。口述这篇文章以后，他离开北京，回到他四川的故乡去了。但是他仍然雄心勃勃，准备借助录音机，继续“写作”。

提不起笔的还有接近瘫痪的小说家骆宾基。他两度患了脑血栓住院，我屡信不复。我请克家夫人郑曼在京查询，才知道已经不能写字，说话也十分困难，只能说些不连贯的双音词，外事无力闻问。由于子女都在国外，连写复信的人也没有。这里发表他卧病前写给我的一封长信，是为了说明他一九四七年三月执行党交给的策反任务而在长春被国民党逮捕的原因的。当时一起被捕的有六人。七月，两人病死，另一人传说被枪决。上海的冯雪峰为营救骆宾基，组织刊物大造舆论，说他是返归东北探亲。我编的《文艺春秋》月刊就曾首先编刊特稿，发表中共地下党员萧白的专文和骆宾基的有关图片，是冯雪峰通过丰村转给我的。接着，其他刊物也相继造舆论，直到一九四九年因李宗仁就任“代总统”释放一批政治犯，才在舆论压力下和民主人士营救下，同时释放了他。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提不起笔——甚至永远不再提笔的，还有一百一十岁的书法家苏局仙和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去年七月，我和编委孙为、彭新琪和摄影师王忠根四人去南汇县周浦乡拜访苏老，只见他白发红颜，神采奕奕，健朗地端坐在命名为“水石居书斋”的靠背座椅里。他坚持每天扶桌慢走两千步，虽然目力减退，但握管运笔如常。为了酬答我们的访问，他写了四张“寿”字条幅，由他七十九岁的次子苏建侯加盖红印赠送我们。他的书法雅逸俊秀，古泽盎然，曾获得全国群众书法比赛一等奖。国内名胜黄鹤楼的长联，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生于晚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三年元旦，不料在他一百一十一岁寿诞前两天，竟在不到一小时内溘然无疾而终，使上海失去了“第一老人”，使我国失去了一位从十岁临池练笔算起连续挥毫一百年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八十五岁的女作家陈学昭，近年来患了多种慢性病，其中最严重的，是腰椎骨增生和糖尿病。因为腰椎骨增生，她必须坐硬板凳；但因为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又因为身体虚弱，双脚浮肿，应该增加营养；但因为患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她长期在矛盾的痛苦

中煎熬。但是她那么坚强，她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成了习惯，也无所谓痛苦、难过”。她在走到生命的终点以前，为本书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可贵的痕迹》。她在寄稿的信里，还说出了她读别人文章的读后感，她说：“荒煤同志的话很好：‘人老，心不老。’”这使我们看到了她藐视死神、青春之火仍然荧荧地在她内心深处隐隐燃烧。

怀着同样的心情，很多文化老人不服老，仍然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九十六岁的经济学家陈翰笙，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于一九五一年回国的，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家破人亡，但是他并不消沉，就像其他革命知识分子那样，一经平反，又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宏伟建设事业，至今还兼任着六种社会职务。九十二岁的著名女作家冰心，由于思想开朗，乐天知命，因此不聋不聩，思维清晰，有时还在创作短篇小说。同样九十二岁的老作家许杰，耳聪目明，满脸红光，下笔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而且记忆力惊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曾在上海的一位医生诊所里认识了大约二十岁光景的巴金。伍蠡甫和万籁鸣也都是九十二岁，他们仍勤于写作和绘画。被香港、新加坡报刊称誉为“电脑”的“掌故大王”郑逸梅，虽然已是九十八岁高龄，却仍然笔耕不辍，月写数万言，从民初写作算起，已有八十个春秋，创造了连续写作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这里应该谈谈三位从事文艺工作的中顾委委员：欧阳山、夏征农和张光年。欧阳山在一九二七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时，就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和指导。此后因受通缉，逃离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活动，继续接受鲁迅的教导。一九四一年去延安，曾创作以解放区农民干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全国解放后，从一九五七年起，他开始创作已经酝酿了十五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到一九八四年冬，我带研究生路经广州去拜望他时，已经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他的文学实践深受鲁迅的影响。这次他为本书写的《耄耋小诵》，就是申述了鲁迅给他的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老年”的教导的。八十八岁的夏征农，一九三二年参加左联后，正式从事文学活动，三十年代创作了短篇小说近三十篇。一九三七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在第二期里发表过他以“征农”署名的短篇小说《被苦难熬过的妇人》。这些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结算》，由生活书店出版。七十九岁的诗人张光年，曾以歌词《五月的鲜花》（阎述诗谱曲）和组诗《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谱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而蜚声文坛。此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屈原》、歌词《三门峡大合唱》等大量作品。他一直毫不减色地保留着我在三十年代和他同住一寓时留下的印象——豪放明爽的性格，饱蘸激情的笔触。去年秋天，他才从大西北回京不久，又开始计划创作长篇史诗、撰写回忆录和有关《文心雕龙》的学术论著。

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十年间，可以说是进入老年阶段的中年期，不能算老。八十四岁的吴组缃去年写了四句五言诗，送给他的一位八十华诞的老学友，他说：“八十不为老，现今条件好；兄心是海洋，百岁还嫌少。”确实，他们之中，八十九岁的作曲家贺绿汀，不仅忙于整理自己的集子，而且还创作白话长诗。八十九岁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曾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作出贡献，现在虽到耄耋之年，却仍继续努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八十八岁的小说家艾芜，长期因病住院，搁笔已久，这次又破例执笔，写了话老年文章寄来。八十八岁的翻译家李霁野，不顾严重的白内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凭感觉“摸瞎”，写了四千多字的文章，十分感人。

八十七岁的诗人臧克家，以友情为重，忍着腰痛，冒着盛暑，畅谈自己的实事，一发而不可收，竟写了近六千字的长文。八十七岁的楼适夷、冯至和施蛰存，学贯中西，继续在编辑、著作和翻译上作贡献。八十六岁的蹇先艾和蔡尚思，一个自称“不服老”，一个自称“忘年人”。黄佐临和陈伯吹，也都是八十六岁，他们勤奋乐观，一个忙于艺术指导，一个坚持“小儿语”终不悔。八十五岁的钱君匋，书画篆刻文章满堂红，自己惊叹自己越来越年轻。八十四岁的秦瘦鸥，新著不断问世。八十三岁的柯灵，正创作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八十二岁的张骏祥，虽然患了较严重的心脏病，却仍自信“我还没有老”。八十二岁的袁文殊，自叹一辈子吃了人民的大米、小米、玉米、高粱，没有很好报偿，一定要想方设法努力补过。萧乾和赵超构，同是八十二岁，思想都很开朗，一个奋笔描绘自己，写回忆录；一个善于评说他人，杂文越写越老辣。从八十岁到八十一岁的季羨林、周振甫、陆诒、朱雯、王辛笛、金克木，有的身心健康，照常著书立说；有的患了眼病或心脏病，却仍量力而行，笔耕不辍。八十岁的力学家钱伟长，认为“对广大人民谋福利作贡献，将是最大的幸福。”八十一岁的林焕平，带了三十一名硕士生后，双目已接近失明，却还在特制的铁框框里，凭着触觉继续写作。

从六十岁到八十岁这二十年间，可以说是进入老年阶段的少年时期，简称“老少年”。我们组稿的“老少年”，起点在七十岁左右。根据“六十多来兮，七十不稀奇，八十小弟弟”的上海顺口溜标准衡量，这些都是“小弟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汪曾祺所说的“却老”型。比如七十九岁的陈荒煤说自己“人老，心却不老”；七十九岁的贾芝，说自己“离而不休”。七十七岁的华君武，说自己“说老不老，说小不小”。患过乳腺癌的七十一岁谢希德，说“不知‘老’之将至”。七十六岁的著名架子花脸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说他把京剧事业作为精神支柱，使他生活在振奋和希望之中，因而忘却“老”字。七十五岁的吴祖光在接到征稿信后，觉得无从下笔，因为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到了老年。七十八岁的陈残云不仅自己戒了烟，还劝别人也戒烟，可以多作奉献。七十六岁的碧野，干脆大声疾呼：“碧野不老！”七十八岁的周而复甚至还反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正是这些“老少年”们，目前干劲十足，充分利用退居二线的好条件，大事研究和著译。七十九岁的戈宝权在频繁出国作专题报告介绍中国文学的同时，继续译著，就最近三年合计，荣获的苏联、法国和香港地区的勋章和博士学位就有六起。周而复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已出版到第四卷。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曹雪芹》第三部也将完成。徐迟正用电脑创作长篇小说《江南小镇》，碧野正在写五十万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生命的花和果》。蒋孔阳的美学论著去年获奖。贾植芳正写七十万言的回忆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季镇淮在编纂一部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孙道临从话剧舞台转向影视世界。杨沫开始整理她的八卷本《杨沫文集》。王西彦准备写一百万字的新的知识分子三部曲，写他们的追求和挫折、梦想和破灭、喜剧和悲剧。汪曾祺醉心写“系列”，黄秋耘酝酿写长篇。黄裳来信说，他主要的十八种著作都是在六十岁以后写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女表演艺术家们的青春逐渐消蚀，形体逐渐改变。为了给观众长期保持过去演出时留下的美好形象，她们不得被迫离开舞台。但是，一辈子在舞台上“打滚”惯了的演员，一旦告别舞台，哪能没有失落感呢？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把这种心理苦恼，称为“步入老年的困

惑”。当然，其他剧种的女表演艺术家们如话剧黄宗英、越剧袁雪芬、徐玉兰、傅全香、范瑞娟等，也有同样的失落感。但是她们很快认识到：这样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像实践出真知一样，人总是越老，经验越丰富，见识越宽广，理解越精确，说话越有价值。她们在舞台上既已历尽沧桑，必然会筛选出她们所属剧种的“真知”。因此，她们把她们的努力从前台转向后台：培养下一代，将表演艺术在总结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创新。个别越剧演员如傅全香，正为电视连续剧《李清照》塑造形象，但她同时也在培养下一代。话剧演员黄宗英，也从舞台转向影视，转向文学创作，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

话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探讨怎样才能健康长寿的问题。黄佐临、吴阶平、钱伟长、陆诒、楼适夷、赵超构、华君武、钱君匋、郑逸梅等谈得比较突出。黄佐临在中日友好老人健康研讨会上的发言《永葆青春之诀窍》中，说到一般的养生准则“不外乎生活有规律，饮食要节制，多运动，少生气，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好色等等。”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他在学郭林的气功后，治好了连医生也无法治愈的膝盖骨质增生，更提出了他永葆青春的两条座右铭：“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钱君匋的养生之道是“按时进餐，荤素搭食，不使过饱；按时作息，不吸烟，少喝一点绍兴酒，遇到不愉快的事很快就过去，不与人争长短”。华君武说：“现在每早作气功（静功）、老年健身操、太极拳、散步一小时，还跟七八位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通信，这是‘精神上的青春宝。’”陆诒也很重视精神因素，他认为“一个人老与不老，身体当然是物质基础，精神状态也极重要”，他除每天早上打打拳以外，特别注意精神上“保持乐观、向上，还想做一个天真、纯朴的老少年，乐在其中矣”。同样，赵超构的所谓“优哉游哉”，楼适夷的沉浸于儿童天地，郑逸梅的赏玩珍稀文物，苏局仙的处身于家庭乐园，都是有益于健康的精神因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吴阶平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以科学论据论证了“心理因素”对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他认为要颐养天年，长寿百岁，既要注意躯体的适量锻炼，更要重视心理的自我调节。这心理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精神因素。在同样的生理条件和养生准则的前提下，心情开朗乐观，也就是黄佐临在座右铭里所说的“开口便笑”和“大肚能容”，必然会更能健康长寿。这可以说是从这次众多老人的话人生文章里总结出来的一个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

通过这次组稿，没有写文章而口头或信函表态的，有夏衍、曹禺、钱学森、艾青、马烽、孙犁、杨绛、张庚等。他们对本书的出版，非常关注。当编委孔海珠去看望夏公时，他说：“你们为编辑这本书而打印的《简报》，我每期都看，很好。现在写的人已经不少，我就不想写了。”一会，他又说：“我还不算老，老的人很多。”姚雪垠为了倾注全力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最后两卷，一般的文章都不写了，但他对我们的工作却十分赞赏，写来了信，认为这确是在“抢救文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因高血压头晕，离京回太原疗养；孙犁也因重病初愈，不能写作。但是他们都还亲笔写来了信，表示支持。艾青、杨绛也因健康原因，经克家转知，或亲笔来信，不再寄稿。今年已经八十二岁的戏剧家张庚，来信说：“还想做一点能做的事，特别是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和帮助”。现在把他们的部分来信，编在最后一辑里发表。

这次组稿，前后不到半年，有些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写，有

些科学家因忙于规定时间的科研任务而没有写，有些则因为不明住处而无法联系，有些又因为来稿过迟而不能编入。但是就目前发表的情况看，来稿约占我们组稿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已经鬓发飞霜，但是他们精神矍铄，不拘一格，挥毫畅叙他们过去的沧桑变幻，进入老少年以后的大展宏图，进入老中年以后的壮心不已，进入真正的老年以后仍不离翰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纪录。即使是那些患有病痛或久病缠身的老人，出于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情，也呼吁人们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多作奉献。因此，不管他们写的是翰墨生涯、科技世界或舞台角色的塑造，他们那异彩纷呈的文章，都给人以醒世铭言，谆谆教导，从宏观看，就好像是满天金色的晚晴，在我们的头顶上熠熠闪光，鼓舞我们向上，引导我们前进，让我们看到姹紫嫣红的未来，辉映着一片冬尽春归、花香鸟语的喜人景象。

这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书！

这是一部热爱生活的书，热爱人生的书！

这是一部由老一辈智者现身说法，向青年一代总结经验的人生宝鉴！

1992年元旦

一套永久保存的书——《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新版题记

五十多年前，我任总编的上海永祥印书馆发行人陈安镇，建议我编译一套富有教育意义、不受时间和国别的影响、能够永久保存下来的少年读物，而且要求篇幅精练，售价大众化，所有少年儿童和有儿童情趣的成年人，都能常备阅览。

我于是着手选择一些在任何年代都能启迪智慧、陶冶心灵的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和一些以少年儿童为主角，或内容符合儿童阅览的世界文学名著，撷取其精髓，编译成简明而通俗的文学故事，保留原著的插图，定名为“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每辑十册，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作为语文课外读物。在编译时，根据原著精神，尽可能突出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整体故事情节的演绎，使典型人物在压缩了的篇幅中显得生动活泼，主题鲜明。在文字表述上，争取做到符合儿童思维特征的口语化，甚至把一些难以上口的外国人名地名和度量衡，也适当加以中国化，务使小读者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经济负担，欣赏到大量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学名著的精髓，让他们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受到启迪和陶冶，然后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引发他们在成长以后，争取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原著。

在我选择的第一辑十册中，有五个长篇和五个短篇集。五个长篇的典型人物，有天真而聪慧的小女孩爱丽思，有本性善良而吃尽苦头的游侠唐吉诃德，有一身坏习气而最后又变好了的木偶匹诺曹，有在母亲的虐待和姐姐的欺侮下慢慢变成一个诡谲、自卑而残忍的孩子红萝卜须，有在远离人类社会的环境里，凭藉勇敢和劳动拯救自己的航海者鲁宾逊。五个短篇集里的精选短篇，也各有不同的典型形象，即使以飞禽走兽为题材的《伊索寓言》，通过巧妙的比喻和启示，仍以人们的各种形象为印记，寥寥几句醒世警言，却蕴含着深邃的哲理，焕发出令人炫目的流光溢彩。

旧版《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十册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出齐后，两个月内再版，十个月内印了六次。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贬值，由于这套丛书有纸盒套装，印制质量上乘，又不受时间和国别的局限，因此成为当时抢购大潮的商品之一。而在光复不久后的台湾省，不少成人和少年竟把《丛书》作为学习汉语文化的阅读材料，因此仅台湾一省，销售了七万部。

五十年后的今年四月，吉林省时代文艺出版社发现了这套丛书可以重新排印出版，在征得我同意后，由责编魏洪超同志从长春寄来了全套复印件。我反复阅读多次，在文字上作了认真的推敲和修改，前增“导读”，后加“附记”，并在新版出书的今天，补写了这篇题记。

组成全套丛书的十册书名是：《爱丽思梦游奇境》、《堂吉诃德先生》、《天方夜谭》、《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集》、《格林童话集》、《红萝卜须》、《格列佛游记》、《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

1997年8月29日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导读

一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是二千六百多年前希腊的一个奴隶。驼背，外貌丑陋。但是伊索的才华出众，深得全国民众的赏识。他们终于为他赎身，并推举他为治理国家的大臣。伊索寓言的创作是以飞禽走兽为题材，通过巧妙的比喻和启示，达到人们对于为人处世道德准则的认识，导致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的治理目的。作品通俗而又简洁、精辟，寥寥几句醒世警言，却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虽经数千年的风云岁月，而仍然焕发出令人眩目的流光溢彩。难怪当时的希腊民众称他为圣哲。后来伊索奉命出使他国，因有人忌妒他的才华而被推下悬崖摔死。生卒年月无从考查。

《伊索寓言》几乎有世界各种语言的译本。在我国的最早译本，是一八四四年由英国人罗伯特·汤姆用浅显古汉语翻译的《意拾喻言》。“意拾”，是广东话“伊索”的音译。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最近，英国罗伯特·坦普尔夫妇根据一九二七年在法国出版的希腊文版本《伊索寓言全集》译成英文，共三百五十八篇，已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它展现了一幅“动物世界”的可怕的图画：邪恶、自私、奸诈、报复……这是伊索寓言的本来面目。可是这些寓言故事，正可以说明生活在二千六百多年前粗俗而残酷的古希腊奴隶社会里的伊索，是一位政治和社会讽刺家。而最初被译成英文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由于对文学中的性和暴力严加压制，因而当时的译者已经作了很大修改，那些译文变得温和而富于道德说教。

编译在这里的五十篇寓言，力求通晓畅达，凸现文学故事性，为少年读者所喜爱。

二 《爱丽思梦游奇境》

孩子的梦是最离奇古怪的，但是这些梦里都有生活的影子。那种天真烂漫，把人生的西洋镜赤裸裸地拆穿的时候，孩子看了固然有趣，成人看了也会觉得有哭笑不得的震撼和快乐。震撼的是那梦里傻得真实，讽刺得淋漓尽致；快乐的是那梦里疯得天真，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亲切，叫你看来爱不释手。

《爱丽思梦游奇境》就是这样一部书。这部书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直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三十年了。在这一百三十年里，读过这部书的人，恐怕已是无法估计了吧？尤其是英美的小读者，差不多没有一个孩子不看这部书的。人们还把它改编成舞台剧，在舞台上演出；改编成电影，在银幕上放映。从这一点看，也可以看到这部书惹人喜爱的程度了。

这部书的原作者是英国的路易斯·加乐尔（Lewis Carroll），他的真名是查尔斯·路德维基·杜基孙（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1891）。

这个编译本的篇幅约合原著的五分之一。

三 《木偶奇遇记》

《木偶奇遇记》是一个可爱的教育故事，是描写一个坏孩子怎样变做一

个好孩子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把全世界一切坏孩子的顽皮、好动、贪心、怕读书、说谎话、轻信坏人、无知、不听忠告、偷懒等等的坏习惯，都集中在木偶匹诺曹一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因为匹诺曹有着这么多坏习惯，所以他吃尽了种种苦头，受尽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灾难，在绝望中死里逃生了好几次。但是到了最后，匹诺曹为什么还是得救了？这是因为，匹诺曹到底还是一个孩子，他天真，他丝毫没有害人利己的恶意，他的心地非常善良；虽然有许多事情做错了，甚至一次两次三次地继续错下去，但是只要他肯后悔，愿意改过，还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所以匹诺曹的行为，这个《木偶奇遇记》的故事，可以作为全世界坏孩子变好的一个好榜样。这故事的教育力量，是多么的深远而巨大啊！

这篇童话的作者，是意大利的戈洛笛（C. Collodi），他的真名是罗伦齐尼（Cario Lorenzini，1826—1890）。原著的出版时期，是一百一十四年前，即一八八三年。这个编译本的篇幅约合原著的四分之一。

四 《红萝卜须》

《红萝卜须》是用“幽默”和“揶揄”贯串起来的一幅人生的图画，一部充溢着惨笑的家庭题材的儿童小说。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就是典型人物红萝卜须的创造。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聪慧的头脑，他和一般孩子一样地需要父母的爱和家庭的温暖。然而偏心的母亲却处处虐待他，自私的父亲又始终忽视他，狡猾的哥哥和姐姐都利用了周围的环境，一味地欺负他。时日略久以后，红萝卜须就慢慢地变成一个诡譎而自卑的孩子了。这是说明一个坏环境可以使好孩子变坏的故事。这故事恰恰和《木偶奇遇记》相反，但是它在启示人生的教育意义上，却是完全相同的。

《红萝卜须》的作者，是法国小说家赖纳（Jules Renard，1864—1910）。他和自然主义派有着很深的关系。他对自然与人生有着细密而透彻的洞察力。他是烘托重于表现的文学画师。原作出版于一八九四年。出版以后，深受读者的欢迎，曾被改编为舞台剧，并摄制成电影，都获得极大的成功。直到今天，红萝卜须在法国，犹如阿Q在中国一样，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典型人物了。

这个编译本的篇幅，约相当于原著的四分之一。

五 《堂吉诃德先生》

《堂吉诃德先生》出版于一六〇五年，离开现在已经有三百九十二年了。可是对于堂吉诃德的性格，以及他的随从桑丘的可爱的性格，却至今仍然生动而鲜明地烙印在广大读者的头脑里。

这部书一直到今天仍有极大的生命力。最大的原因，是作者创造典型人物的成功和讽刺社会现实的透彻。当时的西班牙，还继承着骑士制度的风尚。这部《堂吉诃德先生》的出版，就是给骑士制度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虽然作者讽刺的手法暴露了人物的缺点，但是从社会现实的反映看，却处处令人感触到人类的善良本性，而且还充满了丰富的生活的智慧。所以西班牙政府曾经明令学校里的学生，每日至少要读《堂吉诃德先生》中的一节，因为这

部书可以给少年读者多方面的启示和陶冶。

这部书的作者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作者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平凡：曾经当过兵，受伤五次；做过摩尔人五年的奴隶；周游过西班牙全国；因为触犯贵族而坐过牢。这部书就是坐在监狱里写出来的。

这个编译本里的人物译名，为了使小读者容易记忆，竭力简化。篇幅约合原著的三十分之一。

六 《安徒生童话集》

丹麦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是北欧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童话，全世界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细读安徒生的童话，可以使我们留下三种印象：第一，是文字的朴素美；第二，是诗一般的情绪美；第三，是结构的机巧美。作者的故事叙述和写作的口吻，完全按照儿童心理，用孩子的目光作为自己观察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编译在这里的六篇童话，是安徒生童话里比较著名的几篇。在文字上，为了适应我国小读者的习惯，将原著略加删改。例如《夜莺》、《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篇里的鬼神部分，《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里的教区书记，都作了改造和加工，使小读者更加容易接受。

作者安徒生，幼小时非常贫困。父亲是一个穷鞋匠，母亲是一个洗衣女。十一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再度嫁人，才把他送到一个贫民学校里去念书，后来又把他送到工厂做工，还曾学做歌剧演员，学做木匠，都没有成功。二十四岁起开始写作，受到读者欢迎。三十四岁出国游历，好几国国王请他进宫讲故事，赐给他荣誉勋章。

七 《格林童话集》

格林兄弟的童话，和安徒生的童话有明显的不同：安徒生的童话带有文艺的趣味、诗的情调和浪漫的气息；格林兄弟的童话，具有质朴的风格、散文的底蕴和古典的色彩。从写作显示，安徒生更偏重于创造性；从结构看，格林兄弟更忠实于民间的传说。

格林兄弟，哥哥名叫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弟弟名叫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他们的半生都在德国各地图书馆大学里工作，自己就在那里研究学问。兄弟两人非常和睦。当弟弟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病逝以后，哥哥在弟弟的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说了下面的话：

“在求学时代，我们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共用一只桌子。后来，在大学时代，也是同住一间房。毕业以后，我们还是同住一间房。最后，我们住着相连的两个房间。我们之间，没有丝毫隔膜：财产共有，书籍公用。”

仅仅这几句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俩的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即使是他们写的文章，谁也难以指出，哪一篇是哥哥写的，哪一篇是弟弟写的。

八 《天方夜谭》

传说是这样的：波斯的一个国王，怀疑王妃的贞操，因此定了一个新法，每天必须有一个少女，做他的王妃，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杀死。这个新法实行以后，死掉的姑娘不少。但是有一位大臣的两个女儿，自愿到宫里去做王妃。她们做了王妃后，每天晚上，总是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给国王听，这样，使国王听得入了迷，不再把她们杀死。《天方夜谭》的产生，就是把她们在一千一夜里所讲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结果。

《天方夜谭》里所收故事的体裁，可以分为四类：（一）寓言，（二）短话，（三）故事，（四）小说。这是阿拉伯文学不朽的杰作。到了现在，各种文字几乎都有译本。

编译在这里的三篇，是《天方夜谭》全书中最有趣味、最感动人的作品。故事各有优点，像《神灯》的曲折离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智慧，《航海的故事》的勇敢，对于少年读者会产生不同角度的启示。

九 《格列佛游记》

《格列佛游记》共分四部：第一部“小人国”，第二部“大人国”，第三部“飞岛游记”，第四部“兽国游记”。其中“小人国”和“大人国”最有趣味。曾经拍摄过电影，被全世界的小读者们喜欢，所以这里也仅编译了第一和第二两部。

凡是读过《格列佛游记》的人，都会断定这是幻想。是的。这是一部幻想的游记。但是从描写的事实看，却使我们觉得情景逼真，十分动人，几乎不能想象这是一部幻想的游记。这部书写于十七世纪初期。当时英国的政治非常腐败，言论极不自由，因此作者只得用奇妙的幻想来讥讽现实，但是书籍出版以后，不但年轻的读者喜欢阅看，皇室和贵族也都争相传诵。这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了。

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m Swift, 1667—1749）是英国的小说家，幼年陷于贫困，晚年又非常的失意和孤独。在他临死以前的两年间，竟沉默得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个编译本是原著篇幅的三分之一。

十 《鲁宾逊漂流记》

《鲁宾逊漂流记》是一部世界著名的航海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和人们渴求海外发展的淘金思想。少年读者应该从远离人类社会的野外适应角度，来看待作品主人公如何高度警惕地在孤立无援的环境里，进行各种各式的自我保卫和生产劳动。这样，在阅读了这部小说后，可以在艰苦的逆境中，增强你们克服困难的信念，提高你们自立和自卫的能力，培植你们处理各种事务的毅力和决心。

本书原著发表的时期是一七一九年四月至八月，作者是英国小说家达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这个编译本的篇幅约合原著的三十分之一。

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谁都知道，为藏族民间艺人世代口耳相传，有四百万行一千万字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但是有谁能知道，由无数博学多才的藏族学者创作、有四百七十万行三千三百万字的《班玛散巴哇传》，才是一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的长度刚好是《格萨尔王传》的两倍。

《班玛散巴哇传》是以描述西藏地区佛教传播史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据玛德沙木札和尕尔玛扎西的论文记载，公元八世纪时，吐蕃国王赤松德赞邀请了东印度原萨诃尔国的王子萨托到西藏传教。赤松德赞听了十善业、十八界、十二因缘等法门后，决定在雅鲁藏布江畔修建一座桑伊寺，供出家人修行学经。但是由于妖魔作祟，屡建屡毁。于是邀请了正在尼泊尔传教的天竺乌文亚那国的上师班玛散巴哇。相传他是无量光佛的转世身，智慧超群，法力无边。一路上，他用密宗法咒降伏了沿途设下各种障碍阻止他入藏的妖魔鬼怪。公元七百六十一年，赤松德赞在温布唐迎到了班玛散巴哇。经历了降妖斗法的曲折过程，终于在公元七百七十五年，建成了桑伊寺。吐蕃王国第一次出现了身穿袈裟的喇嘛。从此信徒日众，还培养了精通竺藏两种语文的译师一百零八人，将大部分佛教经典译成藏文。而且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大乘佛教终于击败了西藏地区的旧有宗教笨布教，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班玛散巴哇在西藏住了大约四十年（一说十余年）。在启程回归天竺前，他和弟子将许多法籍藏进山岩庙岛，让后世信徒通过挖掘的艰苦考验，再得经书流传。这种传播方式，就是“伏藏传承”，而挖掘者则被称为“德尔冬”。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这四百年中，发掘出的各种经典图书、佛像和法器，多得不可胜计，仅《班玛散巴哇传》就有一千一百余种。

由于藏传佛教有宁玛、萨迦、噶当、噶举、希解、角郎、格鲁等七个派别，各派对班玛散巴哇的描述，往往凭借各自独有的视角和想象力，来加以渲染和创作，把这位带有浓厚色彩的传奇人物形象，塑造得各有异彩，栩栩如生。公元十七世纪时，吐蕃王室的后裔尔金林巴，是一位著名的大德尔冬。由他从亚龙沟谢哲岩洞中发掘出来的《班玛尔唐》，经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的校订，并针对各派学者的争议，撰写了总结性批语，肯定像班玛散巴哇大师那样具有无穷法力和海洋般智慧的人，做出超人的奇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对这些奇迹确信无疑。这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话，平息了学者们的论争，直到现在，《班玛尔唐》作为真实可信的诗体传记，受到各派僧侣的珍视。

举世闻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成功地描绘了数十次大小战役，场面惊心动魄，人物形象也刻画得个性鲜明，璀璨夺目。但是由于它是世代相传的说唱文学，难免有粗糙不足之处，如有些唱词重复，有些场景雷同、有些情节不符合逻辑。而以《班玛尔唐》为代表的《班玛散巴哇传》，则是一些学者的创作，构思比较严密，表述比较精微。它透过一幅幅气势磅礴的魔幻画面，生动地展现了人在寻求解脱时的痛苦与挣扎、失望与期待。它把深奥艰涩的宗教义理演绎成生动可感的神话，不仅为上层宗教人士所喜爱，也为一般僧侣和信徒们所乐于接受。直到今天，广大藏区到处可以看到班玛散巴哇大师的塑像和画像，在布达拉宫的仁增拉康殿，也供奉了他的塑像。《班玛散巴哇传》的艺术意义也就全部在这里。

1988年10月29日

探寻历史尘埃里的珠宝

研究必须占有资料，而且应该是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都不是现成的。那些淹埋着研究客体的原始资料，往往浩如烟海，隐显错杂。如何从这些千头万绪的原始资料中，通过整理和鉴别，筛选出鲜为人知的“稀世珍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还需要访问一些知情人，搜集一些密切关联的其他素材，从众多资料的互补与映衬中，才能受到启示，获得比较明确的认知。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静止的存在。不仅事物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嬗变，那些从事研究的人，也会因为时间的差异而产生不同或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估。比如“文革”前后的现当代文学史家们对柳青、施蛰存的评估，就是互有出入，大相径庭的。这显然是由于研究工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因此占有资料，实质上就是从资料的海洋里，遵循时代的节奏，突破不断运动着的迷乱的现象，探寻研究客体的原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过程。

当然，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是一个花时费力、极其艰苦的过程。经年累月地枯坐图书阅览室而收获寥寥，是常有的事。

钦鸿同志曾和徐迺翔、闻彬同志等一起，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海洋，六年如一日，编纂了一部一百十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由于他长期从事扎实细致的探寻第一手原始资料工作，信访和走访了将近五千人次的作家和作家知情人，因此在完成《笔名录》的同时，发现了许多还没有人知道、却又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社团、作品、报刊和笔名等，需要开掘出来，恢复它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或澄清我们过去的错误认识。比如在鲁迅的译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中的回末诗，过去都以为是鲁迅的译诗，钦鸿同志却在向锡金同志的信调中获得启示，十分细致地考查了鲁迅著作中的有关自述，参阅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条分缕析，终于考证出这十三首仿效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结语的回末诗，都是鲁迅的创作，是译者为了“适合于我国人”而有意创造的一种“译演”手段。他不仅证明了回末诗的内容符合于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证明了回末诗的创作是符合鲁迅长期来爱好旧体诗写作的习惯的。这样，他令人信服地第一个提出这十三首诗是鲁迅的创作，从而丰富了鲁迅诗歌创作的数量和体式。

再如茅盾的一篇重要佚文《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是钦鸿同志参阅了蒲风和杨骚等许多关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的诗论后发掘出来的。原来茅盾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补正蒲风倡议这一运动时认识的片面性。茅盾认为：不仅要从提高诗歌创作的数量质量着眼，更应该从劳苦大众中壮大诗歌的创作队伍着眼，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运动，是“诗歌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的“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才能“真正有战斗的力量”。茅盾的这一论断，对此后的文艺运动也曾产生过积极的思想影响。但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发表这篇论文的《战歌》月刊已经失传。钦鸿同志从杨骚的著作中发掘了这篇佚文的三个重要节段，虽然未窥全豹，却已完整地保存了茅盾对文艺运动普及提高问题上的阶级观点和辩证论述，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弥足珍贵。

洗刷历史的尘埃，让人们重新看到一些不该被遗忘而遗忘了的作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冰心的三弟冰季，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勤于写作，并且有着鲜明个性，取得一定创作成果

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经在当时出版的《红黑》、《人间》、《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上发表。在一九二九年秋出版的第一本收有五个短篇的小说集《温柔》里，沈从文以《冰季和我》为题，写了一篇序文，对作者“用文字解释生活掺入人生的第一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九三一年冬出版的第二本收有七个短篇的小说集《幻醉及其他》，冰心写了序文，说这些小说使她“越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觉得作者“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深忧的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了人间的一切”。的确，从《温柔》到《幻醉及其他》，冰季的笔触已经跳出了描写男女恋情的狭隘圈子，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下层，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浪中的一滴不应遗忘的水珠。但是此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被遣送到大西北终老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连他的姐姐冰心也已经记不清在她弟弟的什么书里写过一篇什么样的序文，直到读着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家——记冰心的三弟冰季》时，才重新唤起了她的记忆，禁不住在“披读之余，感极而涕！”

1990年7月31日

现代弦高的真实写照

一九三九年重庆，冯玉祥将军给我国民族工业史上白手起家的粤点大王洗冠生题词：“现代弦高”。

弦高是个典故。那是在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贩牛商人，名叫弦高。有一次他在贩牛途中，走到滑（今河南境内）地，无意中遇上来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他想到自己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便急中生智，向统率秦军的将领说：“我奉郑国国君之命，特意送来十二头牛，犒劳贵军。”秦军见此，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于是接受了馈赠，并立即下令撤了兵。

洗冠生从一个提篮叫卖的小贩，孑然一身，无官无势，凭着他一手好技艺和殚精竭虑的拼搏精神，九起九落，终于在旧中国拥有厂店五十九家，股东三千，职工上万，日进斗金，雄资百万的巨擘，左右了我国食品工业达二十余年之久。洗冠生的成功，是由于他高超的技艺和经营管理的才华胆略。

任何工商业的经营管理，都离不开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洗冠生早在民国初年设摊买卖时，就已经遭受青帮“白相人”的大打出手，几乎摧毁了他小本经营的谋生根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大总统要登基，都督造反，南市封锁，市民不得外出，使一开始就是产销一条龙的洗冠生，几大缸制作陈皮梅的梅子发了霉，导致他倾家荡产，成为赤贫。此后集资苦干了二十多年，京沪厂店的基础日趋稳固，但是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和汉口，迫使冠生园一再拆卸机器，从京沪迁往汉口，又从汉口迁往重庆。那位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孔二小姐，竟因为吃了冒牌冠生园的月饼嗑了牙，而不问青红皂白，命令副官带领一帮打手，将冠生园的看门员工活活打死，惨不忍睹。洗冠生深深体会到国家兴亡，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业的盛衰，因此在日本侵占我东三省时，向东北杨靖宇等义勇军将士赠送机制饼干一万斤，陈皮梅二千斤。“七七”芦沟桥事变突发，他汇款十万，犒劳英勇杀敌的前线士卒。日军在上海不断寻衅，发动“八一三”事变，在事变前四天，他又将库存的全部罐头和饼干，赠送给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转给保卫祖国的战士。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曾为冠生园的创业出过力的电影皇后胡蝶，为了逃避日本占领军要她去东京拍摄影片《胡蝶游东京》，而爬山越岭二十多天，到了香港转往重庆以后，洗冠生承担了她的全部生活费用，开始“劳军公演”，准备为抗日宣传进一步效力，却不料被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霸占，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的座机失事身亡，她才恢复了自由。

陈宁的纪实小说《天下一冠》，用铁一般的事实，形象地写尽了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如何在旧中国乌烟瘴气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寻找生存的一线机缘，在一件件令人目瞪口呆的突发事件磨炼中，终于擦亮了眼睛，适应了需要，发展了自己。小说的作者经过多年反复周密的采集，并深入生活，因而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虽然只写了一个人，却诉说了旧中国民族资本家共同经历的坎坷命运。这可以说是一部现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值得一读。后记

范泉坎坷一生，拼搏一生。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已和他认识，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最近五年来，他和我结婚以后，好不容易可以不再外出办公，安定地生活一阵，写了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文稿，但是想不到在他编好这本书，写了《题记》，交稿以后不久，经医生化验确定，竟患了癌症，将

在舌头和颈胸部动大手术，术后可能成为残废。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如果他术后苏醒过来，即使不能说话，不便吃饭，我相信他还是非常坚强，能够尽他的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衷心祝愿他手术顺利，早日恢复健康！

吴峤

1998年4月12日

